



当代西方女侦探系列

# 死亡竞选

〔加拿大〕盖尔·鲍恩 著  
伍文君 等译



漓江出版社

## 主要人物表

JOANNE KILBURN	乔妮·克尔本	安迪之撰稿人
ANDY BOYCHUK	安迪·波尔丘克	反对党领袖
EVE BOYCHUK	伊芙·波尔丘克	安迪之妻
ROMA	罗玛	安迪之母
CRAIG EVANSON	克里格·伊文森	政客
JULIE EVANSON	朱丽·伊文森	克里格之妻
MARK EVARSON	马克·伊文森	克里格与朱丽之子
LORI EVARSON	萝利·伊文森	马克之妻
CLAY	柯雷	马克与萝利之子
CAREY	凯里	安迪与伊芙之子
RICK SPENSER	瑞克·什班什	电视台记者
IAN	伊安	乔妮已故丈夫
HOWARD DOWHANUIK	豪沃德·道汉尤克	省政界领袖之一，安迪的竞争对手
DAVE MICKLEGOHN	德夫·迈克里约翰	安迪之助手
LANE MICKLEGOHN	兰·埃帕里贝	神秘妇人
CHARLIE APPLEBY	查里·埃帕里贝	兰之夫
SOREN EAMES	梭伦·伊默斯	牧师，安迪之同性恋人

## 死亡竞选

安迪重重地摔倒在灼热的卡车金属车厢上。从最初的几秒钟开始，我们就被那一刻的景象吓倒，仿佛被一种冰冻的氛围笼罩着。及时行乐的政客们似乎并未觉察这一刻的变化，仍然手握盛着啤酒的、包有塑料的玻璃杯，站在后台口若悬河地大谈政治。克里格和朱丽·伊文森这对天生的政治佳偶，避开众人的目光，正喝着瓶中的清凉饮料。安迪的朋友和家人在这大庭广众之中出头露面，感到很不自在，一直坐在后台的一排叠椅上，微笑着。那些坐在前台外面的听众却一直眼巴巴地注视着空空如也的讲台，期待着，期待着。

紧接着是一阵骚乱，人人都想挤到安迪身边看个究竟，也包括我在内。讲台高出地面约4英尺半，够得着。我倒退了几步，稍一使劲就把身子扑到了台上，顺势倒在滚烫的金属台面，我的小腿外胫刺痛，下巴被这一撞摔着了。不过正是在那一刻，我看见了瑞克·什班什。

那一刻曾经是，现在仍是那么不可思议：他那张熟悉的面孔不知从什么地方隐现出来，正从支撑金属车厢后部的简易金属梯上爬起来，他的身子出现在金属面讲台上：头、肩、手臂、躯干、腹部、腿、足。他显得块头很大。一个劲地爬阶梯，脸涨得通红而有光彩，仿佛他的生命就依靠着这阶梯似的。讲台的金属地面叫人简直受不了。我能嗅出焦味。我记得我清楚地想过，一个像他那样大个子的男人会在灼热中丧生。接着我转身朝安迪的身子爬去。那金属车厢表面热得将我的手掌烤热了。

扩音器里，一位妇女的声音反复叫道：“请哪位医生到这儿来一下。”她的声音是那么沮丧、空泛和失望。一看到安迪，我就明白找医生已无济于事了。安迪就躺在我面前，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他的身子看来蜷缩在一块——毫无生气。自我认识他以来，仅此一次，没别的可说——他是那么的无关紧要。

我丈夫死后，我曾选修过一门心脏急救课，从此使我没感到那么危险，少受那些突如其来置人于死地的意外事件的威胁。我将安迪的身子平躺下，这时我就能听到我老师那年轻、自信的声音——什么也不能伤害她。她说：“我希望你们这些女士们最好不需要用到这些知识。不过一旦用上，就记住ABC（急救三步骤）。”想到这我开始发抖。A 第一步：检查气管通不通。我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安迪的下巴，将他的头稍后倾。他的肌肉滑腻而松弛，但气管是通的。B 第二步：检查呼吸。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倾听、观察他的胸部是否有呼吸的迹象。我自言自语：没有呼吸。我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不过这声音听来却不像我的。赶快做四次急救，然后进行C 第三步：检查血液循环即脉象。我俯下身子捏安迪的鼻孔。“啊，我真难过，安迪，我真伤心。”我俯身口对着他的口。ABC急救三步曲——可我永远不需做第三步了。

他嘴唇及口中散发出一股味儿，这味很熟悉，搞不清究竟在哪儿，但那股刺鼻辣烈味，叫我不敢再去嗅它。不假思索，我明白我嗅出了危险。

这时候，我朝讲台望去，只见瑞克·什班什从黑色的热水壶里往玻璃杯中倒水。我毫不犹豫地。他的手发抖。几乎握不住杯子。水溅泼到他的手臂和肚子上，看来他还是倒满了杯子，举到嘴边。

这当儿，世界突然变小了——人们关注的仅此一点：至关重要的莫过于阻止他喝这杯水。我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向着他的双膝扑了过去。这突如

其来的一下可叫他脸孔朝下狠狠地摔了下去。有好一会他一动不动，准是晕过去了。

过后几分钟又是一阵混乱。救护车来了。什班什也恢复了知觉。当救护人员将安迪抬上担架时，什班什坐了起来，将两条腿向前伸展开，我走过去拾起安迪的讲稿夹，绊了一下他的脚。

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声音。

安迪生命中最后一天开始时算得上是他最美好的日子之一。6月份他已当选为省里我们党的领袖，我们随即策划了一次夏末野餐会，让人们能够与这位新任反对党头目握手言欢，尽情吃喝玩乐，打打小球。很简单，这样做有益于身心健康。但就政治活动来讲，这里面就另有文章了。哪怕是一种老式的野餐会，8月里阳光灿烂的那一天也有足够的素材去拍一部伯格曼的影片了。

获得这次竞选提名就是一场大战。安迪的提名尤其如此，因为正好轮到我们党在下届政府中组阁。在公园里，人们真是受宠若惊，可也有不少人看到领袖将手伸到别人的手中时，大为不快的。安抚这些人，使他们谅解他这次大选获胜，是安迪举办这次野餐会的初衷和主旨。但玩政治可不光是这么回事，它需要手腕，那些在《政治科学百例》中也没谈及的伎俩。

多年来，人们对安迪·波尔丘克的家庭生活存在许多解不开的疑团。他的妻子伊芙是个古怪而孤寂的人。有关她的奇怪的行为早有不少谣传。如今安迪当上了领袖，我们总不该再去纠缠这些旧事了吧。

夫唱妇随，妥协让步使安迪的家庭生活有了转机，有了天伦之乐，有了床第之欢，有了充满艺术氛围的业余生活。这一切都有严肃的政治目的。那一天我们不得不开始安抚安迪的冤家。这并非易事。我一大早就驱车去公园检查一下看事情办得如何。两位肌肉健壮的年轻女人已经在我们的临时讲坛的底部拉好了横幅，上面写着“安迪·波尔丘克评价日”。我一见横幅，就交叉着手指说：“就这样，啊，请拉好来。”

不一会横幅就拉好了。天气无可挑剔：湛蓝的天空，宁静而炎热。到中午，我们租来停车用的夏日轮休农田就已车满为患，我们只好再请农田主人出让更多的空地。整个下午，车辆川流不息地开过小山这边来。在野餐营地，有热的食品及冷饮供应。从吊在树上的扩音器中传来飘渺的音乐声，令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大家心绪好极了。

特别是安迪，在8月的那一天里，阳光普照，玩得既开心，又三句话不离本行——政治。我从未见过他那样开心。

我观看他打了几局棒球后显得很激动，他得胜了，汗流浹背地离开了球场。

“我今天可是露了一手。”他说，脸上放出光彩。“乔，现在还时为不晚。我还能打主攻手。”

我也笑了。“你当然能。”我说，“不过今天到会的五千人却是来听我帮你起草的那个雄心勃勃的演讲的。同时——”

“同时我不得不牺牲我的球艺来与这些政客们周旋，以满足你的虚荣心。”他露齿笑了，并用手背擦去额上的汗水。

“英雄所见略同。”我说，“还记得你大受欢迎的那次演讲中的那一段话吗？那是有关如何抓住机会将公众的利益置于个人野心之上的问题。知道吗，你想成功就得在这上面做文章。这个公园里仅有一处供应热水的洗澡间。

德夫·迈克里约翰说过3点30分他将溜到那儿，带件干净衬衣给你。你还有5分钟，忘了那些哥儿们，想想公众的利益。洗澡间就在小山那边公园特许店的后面那栋绿色的大楼内。洗完澡你就可以登台，向人们讲一些他们乐于讲给他们的子孙听的事。”

安迪笑了：“好，你只要等到明年就知道了。”

“你敢这样说。”我说。我站在那儿目送他跑上小山，看着他那轻捷的身影，瘦削的臀部，运动员般优雅的动作。在山顶只见他停下来与一男人谈话。太远了我看不到那人的面孔，但无论在哪儿，我都能认出那人强健的拳击手般的身子。他是豪沃德·道汉尤克。他曾任我省政府省长达11年，任反对党领袖7年。他与我交朋友的时间比他任职时间更长。他就是6月大选中被安迪击败的政敌。看见这过去的和未来的领袖的会晤，看见大草原上蓝天映衬出他们的侧面像，我悟出其中定有一些特殊的、有象征意味的东西存在。很明显，他们的谈话严肃而富有感情。不过最后似乎危机解决了。只见豪沃德拍拍安迪的肩膀，眨眼之间安迪就消失在山头的那边，豪沃德却笑着朝我走来。

“你看来很快活。”我说。

“我没有理由不快活。”他说道，“这么好的天气，和你在一块。我刚才及时赶过舞台那边去听那些寻欢作乐者唱歌，直到那些小姑娘开始跳舞我才离开那儿。她们怎么称呼她们自己来着？”

“她们自称晃晃荡荡的人。”我告诉他，“我不明白她们怎么会起这么个名字。我猜想那些让孩子们穿红色有经纹的缎面裤子和饰有金属片的孩子的家长一定也是赶时髦的。有时我并不认为我们太过分保守。”

“我有时也同意你的观点。”他耸了耸肩说，“来，乔，别辜负了这好天气。让我们去看看烤鸡人，我来为你买一份早些的晚餐。”

我咕哝道：“我整天吃个不停，我想一定吃坏事了。正如我奶奶说的那样：‘吃进一分钱东西，长一磅肉。’”说着我与豪沃德从讲台穿过一条路走到烧烤坑边。一位来自家禽协会的男人正照管着五百个分开的烤肉器。他来回地走动，用一把油漆刷将酱油涂在鸡肉上，并将手伸过烤架的另一端，将没放好的鸡片摆好，用他厚实的、长有骨痂的手指，将烤得卷起来的鸡片尖部剥了下来。

豪沃德那张苍老的鹰脸被太阳的热力烤得红彤彤的。他正入了迷地注视着烤鸡人的一举一动。

“乔，搞政治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允许你有时间去享受生活中干些小事带来的乐趣。瞧这家伙，我敢肯定他今天一定烤了两千只鸡。他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面带笑容地一个劲地干着。你看他翻动那些烤片是那么的适时。这正是我现在超脱了政治要享受的简单的乐趣。”

“打算找时间去欣赏玫瑰花吗？”我笑着问。“豪沃德，你是个骗子，两天前你才告诉我任何不关心政治的人都从脖子以下全死了。我才不会认为你会改弦易辙呢。”

路对面，玩乐结束，演讲开始。高音喇叭传出难以辨清的声音。讲台前的那片地里，聚集着的人群沸腾起来了。刚才还在大谈简单乐趣的人突然又满口政治了。

“无论谁登台演讲都要推进政治运动。”我挽起他的手臂，问道：“难道你打算从周围的场面隐退？”

“正是。我当然要的。”

“你会改变主意再跑回来从政的。你知道，只不过是躲在政治舞台的幕后而已。安迪会启用那些顾全大局而不拆他台的人。”

“不，我不会是那些离开政坛又回来讨点小便宜的人。”

来自家禽协会的那位男人正把烤肉器从烤架上取下来。他用大拇指和中指抓住那鼓形棍的尖端，让手腕足以能够轻轻地将鸡肉一弹推下他另一只手拿着的一个平底铝煎锅中。

“你呢？乔，你一点没想过政治角逐？那位在补缺选举中取代你丈夫伊安席位的家伙只不过是个粗暴庸俗的人。”

“没有机会。豪沃德，我喜欢随遇而安。我想我倒是已经从伊安的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了。孩子们又很成器，我最终有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今年能从教学中解脱出来就已经等于上了天堂了。况且，你知道，我给安迪写的演讲稿真是再恰到好处不过的了。它将给我的学位论文提供几个绝妙的例子。要是赶得上你的生日完成，我将会把第一本送给你。想不想读读一篇题为《萨克其万政治：其理论与实践》的论文？”

“不想，上帝呀，看了你的论文我会发现自己一直都做错了的。”他看看表说：“主要议程的时间到了。我们拿一碟烤鸡肉吧。顺便问一下，你猜猜看，我极力主张安迪出场前谁来做开场白呢？”

“他妻子？”

豪沃德转了话锋：“我又不能创造奇迹，乔。尽管伊芙在场，我可请不动她。我看见她坐在后台他们家那辆小拖车里。车里还有安迪的家人和一些来助兴的人们。”

“还不就是平常逢到这种场合那股劲头——就像那样自以为是大大咧咧的样子。反正你猜错了，伊芙是不会给安迪演讲作介绍的。再猜猜看会是谁。”

“不会是克里格·伊文森？”

豪沃德指着路对面的讲台笑着说：“他站到讲台上来了。”

“你低估了你自己，”我说，“你创造了奇迹，特别是在昨晚与兰·麦克纳尔那次可怕的会晤曝光后。我不信安迪不为此事更担心。你知道，我试图与他谈，可他说一个星期后人们就会把这事忘得精光的。此外，既然人人都了解麦克纳尔是个怎样的人，谁也不会把这事当真的。”

“朱丽·伊文森把这事当真。”豪沃德冷冷地说，“今早上她跟踪我，并告诉我安迪要么辞职，要么被除名——我想作为受委屈的一方，他的感受会是这样的。克里格应当有权选择给予他与他罪行相符的惩罚。”

“好，”我说，“要是克里格决定要走，我或许自告奋勇为他拿外衣。刚才你难道没有将安迪带到外边的谷仓后？告诉他报界那帮年轻人可能会无理取闹。他早该对此心中有数。克里格和朱丽刚要克里格从落选的不快中扭转情绪，安迪该怎么做？他会从对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加拿大人说，一旦我们党当选，克里格最好忘了他成为副省长或是首席检察官的妄想，因为他已无可辩驳了。”

“公道些，乔。那个笨蛋麦克纳尔已经早把安迪带进一个死角了。安迪所能说的只能是我们一旦当选，他将给克里格找一份能发挥其天才的差事。你像我一样清楚，克里格不会是辅佐安迪的最佳人选。”

“啊，上帝，豪沃德，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克里格的能力是有限的。我甚至敢大胆地对你说，克里格不该成为副省长或首席检察官，不过他毕竟是

个有身份的人。就选举这点而言，他差点也当选了。安迪只比他多获得了十票，也不算多。但愿麦克纳尔没让安迪浏览列有所有要职的那张单子，也没对安迪说克里格不能胜任那单子上列出的任何工作就好了。那小人请求他给克里格说出一个能应付得了的工作，我真愿安迪别上钩，或许是家庭事务厅厅长？那种事连我的狗也做得了。难怪朱丽气得发了疯。说到……我们最好到那边去。朱丽随时能从五千人的的人群里观察到，并确切得知有谁没在那儿听她的克里格讲话。”从家禽协会来的男人打开一个金属冰柜，从里面拉出最后袋装的新鲜要烤的鸡肉，着手将它们一一放到烤架上去。那是4点刚过的时候。那帮打球的人正好从棒球场回来，一个个又饿又累。家禽协会来的那位男人今天晚上不打算带鸡肉回城里去了。有好一会豪沃德静静地、入迷地观察着那男人的活计。然后他耸耸肩，抓住我的手。

“我们走，夫人。”他对我说，于是我们手拉手穿过人群，朝讲台走去。我们走近讲台时，德夫·迈克里约翰跑出来迎接我们。从我能记事时起他就一直担任安迪的行政助手。他对安迪的献身可以说是绝对的。谁也不知他究竟多大年纪——当然他肯定早已超过建议公务员退休的年龄了。不过由于他精力旺盛，使他的年龄也就成了无关紧要的问题了。他小题大做，屈尊于此却又是那么不可或缺。

那天，如同平常任何时候，他正拿着一个有夹纸装置的书写板。也如同平常那样整洁可人。他身着雪白的短裤和一件印有萨特像的T恤衫。

“我喜欢你这件上衣。”我说。

“我对每个人说安迪一直在我省南端为我们众人奔波。”他说，“你们俩肯定没给他帮忙，我使出浑身解数，与此同时将那帮家伙也弄到那儿——”他朝安迪的家人和朋友招手致意，他们都坐在沿后台的一行折叠椅上，像幼儿园中的孩子似的。“而你们俩倒跑得无影无踪。”

“豪沃德一心想去看他心目中的主角——烤鸡人。”我解释说，“反正我们现在来到这儿行了吧。你找到安迪，把那件刚洗净的衬衣交给他了吗？”

“当然给他了。”他说，“我是个细心审慎的人，我了解小事的重要性。”

我伸出手来拉他的手。“德夫，别向我们使性子。你干得很好。你是怎么把伊芙弄到这儿来的。”

然而，出乎意料地，他尴尬的目光朝下避开我们。“嗯，不过事情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我今天还得小心翼翼地将一片石英装到讲坛上。她说晶体的电磁场要与安迪身上带的小扩音器的电磁场联结，从而去掉负电并能再充电。”

“啊，上帝呀，德夫，别这样干。”

他把双肩抬平，他胸前上衣上的萨特像皱成一团，蔑视着一切。“她在这儿，对不？”德夫拿着一片玫瑰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石英，他说：“你可以将这东西置于水中，你知道吗。伊芙说这片石英会让喝这水的人带上电，并使他们二者的电量平衡。实际上，我们就这事谈妥了。”

“你干嘛不给罗玛倒一杯加冰块的水呢？”我指着讲台远处说。安迪的母亲罗玛正呆呆地坐在那儿，尽可能地远离她的儿媳。她看来会和稀泥。“实际上，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一片石英，将它扔进全城的水源中——这样会让全城的人都来关注我们所有的问题了。”他说。豪沃德就在我旁边，无所顾忌地注视着远处的棒球场。

德夫从他的书写板上拿起一把钳子。“你别做丑人，乔。事实上你本来

就可以高抬贵手的。我早想告诉你我们是真正的赢家。”德夫一边说一边用手抚平他短裤上的皱褶，看着我说：“瑞克·什班什今天也来了。”

提起他我的印象很深。“他来这儿干啥？我知道他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是件大事，可这次活动对电视网却无关紧要。为什么那些加拿大 CVT 电视台的家伙居然会派出他们的首席政治评论员来报道草原上一次规模不大的野餐会呢？”

“我也不明白。”德夫说，“但我今天倒是大喜过望。今天来了好多嘉宾——所有小孩都在猜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家伙们则打开了话匣子缅怀着旧事。乔，你认为这次在草原腹地的活动对民意测验有多大意思呢？”他问。

“你得去问豪沃德，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豪沃德却径直往后台走去。在后台那些大牌政治明星们——他们以此自称，一面从塑料杯中呷着温啤酒，一面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这事无关紧要。我们反正不可能听到豪沃德的高见，因为克里格·伊文森刚讲完毕。安迪这会儿正穿过讲台朝讲坛走去。听众肃然起立。

他们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就是为了安迪站在他们面前这一刻。现在他终于亮相了。人们激动得以疯狂的旋律齐声鼓起掌来，还不断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安迪，安迪，安迪。”这两个字是如此清晰而有规律，如同心跳的节律一般。人们呼喊直至嗓音变哑，呼声渐渐小到几乎听不见为止。

我们可以看见台上的安迪了。那天他穿着天蓝色的开领衬衫。当他看到我和德夫时他报之一笑，并将他的棒球帽在空中向我们挥动着。台下的人群情绪变得更为激昂。仿佛安迪就是一位点石成金的能人。末了，安迪抬起手来做了个请安静的手势，然后转身朝着我和德夫，向我们做了个要喝水的手势。

“拿水来。”我说。

“我早有准备。”德夫说完就跑到后台，拿来一个盛有一只玻璃杯和一个黑色热水壶的托盘。在经过我身边时，他停下来，指着壶边上贴着的一张手书的小标签，上面写着：“仅供安迪·波尔丘克饮用。所有其他饮用者将会丧生。”

我看后笑了，并且说：“想不到连普通人都待他像兄弟。”

德夫将托盘递给了礼仪小姐。她是一位穿着花样图案连衣裙的大个子女人。我记得那天我一个下午都在想，她热得够受了。她嫣然一笑，将托盘递过去给安迪，安迪做了一个感谢的手势接住了托盘。

此时我挪动到讲台边，那里有一蔽日之处，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安迪和听众们。

这时听众正期待着安迪的演讲。他们一边在他们的大浴巾下找块凉爽的地方，一边从热水壶里给自己倒水和不冷不热的饮料，给小家伙几块钱，支使他们到早就搭好的娱乐宫去开心。那以后的情形，甚至连警察也感到吃惊，居然没有人能真正回忆起安迪最后的时刻里他们所目睹的一切。可我目睹了，况且记忆犹新。

安迪将水从热水壶中倒满玻璃杯，将水一饮而尽，然后打开了装着我为他撰写的演讲稿的蓝色皮夹。他这种惯有的动作，我已见过上百次了。可这次他不是将大拇指扶住讲坛，俯身向着听众开始演讲，而是回过头来看看我和德夫。

他仍然面带笑容，但却有某种难言的隐私掠过他的面庞。他窘迫而忧伤，正如有人对他提示出一个问题揭了他的短似的。随即他一转身背朝着讲台就重重地倒了下去。我敢肯定从他转身到摔下的时间不到5秒钟，但这5秒钟犹如一生那么长。

我打量着那空荡荡的讲台，明白一切都完了。我搂起文件夹，那里装着我为安迪撰写的最后的一次发言稿。安迪的家人与朋友一帮子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摸头不知脑。安迪之妻伊芙·波尔丘克从椅子上站起来朝活动梯子走去。她堵住梯子，试图阻止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将她丈夫带走。

8月的太阳低悬在天空中。当伊芙站在那儿堵住梯口时，她的背部沐浴在阳光中，煞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她身着短的由未经漂白过的棉布做的太阳裙，四肢全褐色，看起来——具有强健的运动员般的双肩，结实的双臂，修长的双腿，发达的肌肉。总之，她看起来坚实不可摧。唯有她的面孔呆滞，死气沉沉，目光吓人，空泛莫测。

警笛声愈来愈近。德夫·迈克里约翰走到伊芙身后，将她从梯子口推开，开始指挥随救护车来的急救人员。“将安迪抬过讲台边来，”他说，然后对我说：“过来，乔，让我们跳到台下，以便让他们把安迪的身子放下来给我们接住。”

我们就照这样做了。当伊芙看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她走过来抓住德夫的手，我们三人一块跳到了台下。我们当时看起来一定像是演荒诞派戏剧的演员，但正是我们几个人最后一次将安迪从讲台上抬下来的。

他们没把救护车开到讲台边。因为台前挤满了人。我猜一定是有人告诉他们不用着急的，我们不愿让救护人员抢在头里，他们倒是力图这样做。可是德夫，这位一贯最以礼待人的人，缠住那帮人，叫他们走开。正当我们抬着安迪朝救护车走过去时，一位身穿蓝色连衣裙的妇女走了过来，一声不响地从德夫手中接过担架的一头，与我们一道走了过去。

我早已注意到她了，因为她是那么一位真正的美人儿。我猜想她快六十岁，仍是红褐的头发，有着生来红头发人所具有的有雀斑的皮肤。当救护人员中的一个将安迪的身体放入救护车时，她将一只手伸向救护车敞开的两扇门。手势是那么引人注目，我们市地方报纸《太阳观察家》报的记者邓尼斯·惠蒂特克给她拍下了这一镜头，刊在翌日的头版上。

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这一幅让人窒息的照片时，本该为自己庆幸。事情可能会更糟。拍下那幅照片后几秒钟，那天下午的噩梦又转向了另一个角落。

伊芙·波尔丘克早在救护人员将安迪的身体抬入救护车之前就爬进了车内。她低俯着身子坐在救护车内为病人家人提供的护送病人上医院的小弹簧椅上。救护车已经发动的当儿，一个瘦小的黑影从人群中冲了出来，向车子追去。她用一种难懂的语言大声叫着，她就是安迪的母亲罗玛·波尔丘克。

在八十二岁高龄之际，她从萨克斯顿西端整洁的小屋被带到这里观看儿子大选获胜的场面。我们竟然将她遗忘了。她在加拿大已住了70年，但对英语仍很生疏。乌克兰语才是她心中的语言。她大喊大叫阻拦那辆载着她儿子离开救护车时用的就是乌克兰语。那情景如同看默片一般：一个穿玄色衣服的身影跑过田野，尘埃在她沉重的双腿四周卷起，空中的太阳已经下山了。救护车加速驶离，但这情景并不是无声的，你即使不懂乌克兰语，也听得出她声音中那巨大的悲痛。

我没认出那个跟在她身后跑的男人，他又高又瘦，看起来像歌唱家詹姆斯·泰勒。红褐头发的妇人与我站着，一直看到他追上罗玛，将她小小的身子搂住有好一会儿。而后仍然搂住她，穿过尘埃飞扬的田地，朝我们走来。当他走近时，我们能听见他正对她用柔和的声音重复着用来哄孩子的废话。

她放声大哭起来，她的痛楚如同蒸汽弥漫在空气中。那位褐红头发的妇人感觉出这一点。她伸开手，将指头置于罗玛下巴底下，轻轻将老妇人的面孔抬起来，让罗玛看她。她们站在那儿，互相对视着，或许有10秒钟之久——是悲痛将这两位妇人联结在一起了。接着罗玛发出可怕的、凶悍的叫声，一种咆哮声，像一只猫被踢时发出的叫声。她向那妇人靠得更近，对着她的脸啐了一口唾沫。那高瘦男人抓住罗玛，我伸手去抓褐红头发的妇人，可是她一溜烟地跑到停车的田地去了。我拔腿去追她，跑了几步，我意识到无用。安迪已死，追她何用？于是我只好站在那儿，倾听着警笛在空中呼啸，警车鸣叫着驶过小山。

不久有人抓住我，突然间我女儿梅卡来到我身后，用她那被太阳晒黑了的、结实的双臂搂住我。

“啊，妈妈。”她赶紧把头伸到我的脖子底。那是她做小女孩时惯常的动作。从她的肩头望去，我看见豪沃德把双臂搁在我的两个儿子肩上。他们还穿着棒球制服呢。我记起了在安迪预定发言之前，他们与他打了一场球。

“那么谁赢了？”我本能地问他们。安迪也会同意我这样问的。

“我们赢了。”我的大儿子彼得说。他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头了。他自幼以来只大哭过一次，但他常常流着泪跑来追他姐姐和我。

西边一束金光将天地分隔开来。从彼得的肩上望去，我

可以看见一簇簇的白杨树。金色的阳光洒在树叶上温暖着它们，使它们变成了琥珀色。

我闭上双目。另一个金色阳光的日子又回到了我的记忆中。我看到我的古典文学教授站在讲台后，9月的阳光透过窗子玻璃溢满室内。她对我们说起海里厄和法厄同的神话。她说着一边微微摇着头，语调哀伤。她告诉我们法厄同曾试图驾起太阳神的四轮马车穿过天空，宙斯将他打下车来，将他姐姐变成了白杨树。正当他俩在哭他们死去的哥哥时，他姐姐的泪水却凝固成了琥珀。

当我用双臂拥抱我儿子时，我明白我的心已经变成了木头了。

---

Phaeton 法厄同，希腊神话中太阳神之子。The myth of the Heliades：希腊神话：赫利阿得斯即赫利俄斯的女儿们，法厄同的姐妹。法厄同因驾父亲的太阳车失事摔死，赫利阿得斯哭得极为悲伤，神因此把她们化为白杨，直到如今，白杨的叶子仍在悲哀中飒飒作响，赫利阿得斯的眼泪变成了琥珀。

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走过阿尔伯特街大桥时，心中对这次谋杀仍百思不得其解。头天的暑热尚未散尽，城里很闷热，带来又一个炎热的日子。瓦斯克纳湖上的薄雾蒸腾起来。透过那薄雾，我可以看见湖上那些不怕热的人驾驶的冲浪板闪闪发光的风帆。我在桥上遇见的那些穿T恤衫的慢跑的人衣服上也满是汗斑。同时我也感觉到我从梅卡衣柜里抓出的那件全棉夏装湿乎乎地粘在我背上。

我被热浪包围，倒也不觉得不舒服，因为我经历过谋杀的震惊后，孤立地处在一种麻木状态中，这使我反而感到安全。这种感觉我早已熟知，我敞开胸怀来迎接它。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经历的谋杀案，也并不企盼这种麻木感渐渐消失后会有什么到来。

早在3年前，两个陌生人以一种无法感知的野蛮行径将我丈夫伊安杀害。他的死改变了我生活中的一切。这打击太大了——我失去了丈夫，孩子们失去了父亲，这使我感到天旋地转，但也就是伊安的死暗示了那种几乎摧毁我的人类存在。

直至那年12月的一天早上，我打开门看见安迪站在那儿，颤抖着将那令人痛苦的消息告诉我时，我一直相信，像我这样谨慎的人依赖法律的条款和作用完全可以使自己安全。那些人对谋杀伊安缺乏动机，唯有那暗示的冷笑仿佛成了他的死因的唯一解释。这所有的一切向我袭来，将我击败，不再持有从前的安全观。

经过了漫长的社会生活中的跋涉我才振作了起来。况且我认为我赢了，我战胜了黑暗势力，战胜了伊安被谋杀后使我失去了生活勇气的黑暗势力，但就在我逗留在桥上看着水面上闪烁的阳光，嗅着那从人行道上升腾起的热气的时候，我明白一切并没有结束。我能觉察出黑暗势力重又抬头，我害怕极了。

伊安去世的那天晚上雪很深。那是在12月末圣诞节与新年之间的一周里。天一直下着雪，伊安去的那天又正好是冬天暴风雪最大的一天。

那天刚吃过早饭他就驾车到了省里西南角。他此行是因为他运气不佳掷硬币轮到的。那天同时举行两个葬礼。一个是在城里，为一个政要人员的夫人举行的。另一个是在斯威夫卡伦，是为一个四十岁时就当选为立法会议员的老人举行的。那天的前一个晚上，伊安和豪沃德在一次假日聚会上对饮，他们决定以掷硬币来决定谁去参加那两次葬礼。结果伊安输了。

我们当时为他要去的事发生过争执。他在淋浴时我叫他听听天气预报，他根本不听，还赌咒，随即消失在澡房内。15分钟后，他面色苍白，气急败坏地钻进了那辆沃尔沃牌汽车，往斯威夫卡伦扬长而去。那就是我在他活着时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在后来的审讯中，他们拼凑出我丈夫在生命最后的几小时的情况。在葬礼中他的讲话得体动人，引用了坦纳森的诵词。（诸如：“我是我遇到的众人的一分子……”，“中断是多么的无意味，要结束了，让未打磨的生锈，使用中不生辉”，等等。）仪式完毕后，他到教堂的地下室去用了咖啡和三明治，与一些支持者谈话，吻了一位寡妇，把水壶灌满了水，就踏上归途。那是4点刚过的时候。

想必是那个女孩子让他停车的。当然，我是在审讯中见到她的。一个目

光呆滞的十七岁女孩，长着一头僵硬的散开来的淡金色头发，嘴上涂抹着一种淡淡的不中看的红紫色的唇膏。她的男友比她大，有十九岁。他有着齐肩的金发，山羊般的双眼周围有粉红色的一圈，目光空泛。

他们看来倒不像凶犯。

那个男孩和女孩都有各自的律师。不过他们很相像：都是热情奔放，靠不住的年轻人。他们逃过了死亡，并请求我们向辩护人讲述了出事那晚我们的思想状况。那男孩的律师说话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来强调他句子中的关键词。我曾是为许多讲稿的撰稿人，用不着看他的笔记我就知道那些词是画了加重线的。

“他情感上受挫，”那男孩的律师说，他的声音激动而刺耳，“他的电视机坏了。在暴风雪的晚上他的汽车轮胎又没有气了，他又急着要带女朋友去赴晚会。当伊安·克尔本停车来给他帮忙时，我的当事人已是激动不已，所以当克尔本先生拒绝送他和他的女友去参加晚会时，我的当事人一时性起，失手用他带在身边的扳钳作了案。事情很简单，理由很单纯，就是情感受挫所致。”

“一共打了十四下，”首席公诉人说从座位上跳起来。“病理学家说了十四下，致使克尔本先生的脑浆四溢，喏，看看这张照片吧。”

当我看到我丈夫的黑色的脑浆在白雪的映衬下是那么的吓人时，我对原来世界的逻辑思维完全打乱了，以至于好几个月以后，我才能将这些细节拼凑起来，拾回我的记忆。当时正是安迪使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基础来重建安全的。

我丈夫死后9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后院里摘花，这时我觉察到身后有人。那不是别人，正是安迪，在暮色苍茫之中我难以看清他的面部表情。正如他常常对友人说的那样，人的脸色也是不可捉摸的。

“乔，”他说，“我花了好多时间来琢磨伊安出的事。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是千倍的糟糕。但今天我回忆起一些事，或许会对我们有帮助。我高中时读过一本书，名叫《黑暗的心》——我猜想大约所有十二年级的学生那年都读过那本书。我记得，反正当时教我们的女老师是这样说的：柯芝（书中人物名）有一颗神智清醒的脑袋，但却有一个发了疯的灵魂。我想那些杀害了伊安的孩子一定也像这样。说不定这倒能自圆其说。反正世界还是有理性的地方，乔，这就是我到这儿来要说明的。”

过后很久，当我回忆他这番话时，觉得虽然谈不上是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但至少那个9月的晚上我是非常赞同他的话的。把我丈夫被谋杀看作是突发事件，精神不正常。是安迪使我有可能会去重新认识这个有意义的世界的形象。但如今，这位曾经拍过我的肩膀，将我从黑暗中心转过来的人，其自身却让黑暗吞噬了。

我转身步入了在演讲者一角处弯成弧形的小径。“一个神智清醒的脑袋，一个发了疯的灵魂。”我咕叨着。一个牵着一只矮脚长耳猎狗的妇人从我身边经过，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朝她报以一笑，解释说：“我这是在念咒语呢。”她勒紧了牵狗的皮带加快了脚步。我并不责怪她。如果我是她的话，我就要从我身边跑开呢。

我虑及医院里还会出事，或许这会儿将现实抛在脑后，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豪沃德那天早上5点钟就打过电话来。他的声音既疲倦又忧心忡忡。

他说：“乔，我现在在草原医院，这里出了大乱了。还要多久你才能

过来呀？”

“豪沃德，我在睡觉，不能等一下吗？”我说。

“等30分钟行吗？要是你不想驾车的话，德夫会开车去接你。”

我看了钟，我睡了三个小时，显然德夫和豪沃德根本未睡。

“不用来接我，我愿意步行，呼吸点清新的空气。为什么不叫德夫到公园来接我，顺便带我去医院呢？”

“那好。我就叫他到花坛那儿接你。”

“豪沃德，公园里到处是花呀。”

“到红花那儿，你知道的，那种小小的刺人的红花。”他说完挂断了电话。

在阵雨中，我发现了那种小花。那刺人的金鱼草。肯定是我一转过小山，德夫就已经在那儿等我了。他仍穿着去野餐那条白短裤和印有萨特像的T恤衫。他一定已经在医院里呆了一整个晚上。

我将食指戳过去，不偏不倚，指在萨特的鼻梁上。

“存在先于本质。”我说。

“再没有比今天的事更确切的了。”德夫说着一边舒展他的双肩。“啊，乔，这件事变得愈来愈糟糕。”

“现在怎么样了？”我问。

“嗯，毋庸置疑安迪已被谋杀。病理学家已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安迪死前几秒钟摄入了氰化钾。他们认为那是他在台上饮用的水中含有的。你知道，那个黑色热水瓶中的水是我亲自灌满的，后来又贴上了一个小条子以防出错。”

我感到一阵寒气从胃中冲出来。水中居然含有氰化物，我的本能判断是对的。

德夫等待着进一步证实。“啊，德夫，警察会知道你写的条子是开玩笑的。”我说。

“嗯，目前他们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因此我仍无罪。乔，你可真是英雄。全靠你拦住了那个大个子什班什，没让他喝那水壶中的水。你算是救了他一条命。如果他喝下了那水，就会有两个人丧生，而不是……”说着他咽了咽口水，注视着小游艇。吊在餐馆门前的柱子上有条纹的套筒风标在清晨宁静的热风中摇晃着。德夫又咽了咽口水。

“说到英雄，德夫，你本身就干得不错，”我说，一面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臂。“医院那边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挤满了传媒人员，乔，你不会相信大厅里居然会乱作一团。他们已经请来了一个摄制组，以便将情况在《早晨好！加拿大》节目中作现场直播。安迪被谋杀一案将在早上7点5分作跨海岸（即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报道，好家伙，那是覆盖范围最大的了。”说完他凄惨地笑了。他把这最新的消息告诉了我。“伊芙坚持说她要将在安迪的遗体带回吾尔夫河老家去，由她主持安葬。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事。”

“乔，”他说，“15年来我们一直做和事佬。说得好听些，”我们都认为安迪娶了个不寻常的女人。现在，我们这儿集合了全加拿大所有的传媒人员。而伊芙却要把我们领袖的遗体装入袋中，再放进她那半吨重的小车后部，通过横跨加拿大的公路，将他运回去，埋在她花园内猫的墓旁。”

当我们穿过停车场向紧急入口走去时，不约而同地都笑了。那笑声听起

来一定很古怪。不过倒也好，德夫指着急救室的门，我们到了。“瞧，往那儿去，怎么样？”

我顺势望去，只见瑞克·什班什左臂悬着，显得比平时更高大。大夫们一定是留他在医院过夜，以便观察。他那件漂亮的奶油色上装弄得很脏，前额上有两道纵横交错的、深深的刀伤。这时有一辆出租车开到门前，他忙不迭地一挥手，坐到了司机身边，以优雅的动作将车门关上，开走了。

于是我对德夫说：“另一个神话破灭了。”

德夫露齿笑了：“你是说我们的伙计瑞克穿着脏衣服吗？”

“不对，我是说我们的伙计瑞克跳进了出租车的前座。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曾告诉过我，他总能从东部人走到汽车后座的样子，将他们一眼识别出来，哪怕他们只是单个行动时也一样。瑞克·什班什就是这样一个劲钻到他的达克牌汽车中，潜入前座，像个跨栏跑运动员。真是令人费解。”

“又是充满了疑团的一天。我的朋友。”德夫说着打开了玻璃门入口。

医院里特殊的气味令我止步。我记起那天早上他们把伊安的遗体抬进来时，我早就来了。我不相信安迪也会是这个下场。

德夫一个劲地盯住我问：“乔，你没事吧？”

“没事，”我回答，“我还中用，用得着就来吧。”

“那这样的话，我就去找豪沃德会见报界人士，你去照顾安迪夫人。你知道，安迪常常管她叫夫人的。他曾经说：‘来，德夫，看来我们得自个儿去爱尔士多运动日，夫人不赏光接受邀请。’说完他往往摇摇头。他们将她安顿在会议室内。就在过几道门大厅的尽头。你对她可不能让步，乔，不能让她把安迪弄得让人嘲笑。这可是我们一直顾全的大局。”

德夫拥抱我后步入休息室。传媒人员正在那里喝着咖啡，检查照明及音响系统。两位手持手提电视摄像机的男人尾随着他。我一直注视着他小心翼翼地地上缠结的电线中走过去，并将一瓶杜鹃花从接待台上移到豪沃德准备开记者招待会的桌上。然后，他摇摇头，又把花放回原处。

后来我打开双重门，步入走廊，去找那位夫人。

他们把伊芙安顿在一间新的厢房内。我踏着柔软的地毯沿着走廊走去，迎面扑来一种新的油漆味。从通往大厅的各个房间门上的名字，就很清楚这儿是医院的电力房，医护和管理人员从这儿去上班。我来到一间标有会议室的房门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敲敲门，走了进去。

我觉察出的第一件事是，无论按谁的标准，这个房间都算得上豪华。记得7年前大选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党曾许下诺言：一旦当选，将实施宏大的新的医疗设施方案。豪沃德曾说他们的做法是：“要建一家包治百病”的医院。安迪蔑视这种做法，但那些人买下了这家医院。结果我们竞选失利。如今，7年过去了，在这7年的丑闻和争权夺利之后，省里现有的医院数目如同我们下野时一样多。然而，为了笼络选民，政府在前年冬天着手在省城的最大的医院草原总医院旁扩建新的附属医院。

这是做来摆样子的，是他们对随之而来的问题，诸如病床和高精医疗设备等如何得到的有力反驳。他们会用这些作为对他们的许诺已兑现的例证。不过，我们也能利用它作为向一个让所有乡村医院饿肚子，而倾囊为省城修如此豪华医院的政府控告的证据。我来到会议室门口，仔细地回忆见过的一切：亮堂堂的橡木会议桌，装有软垫的大真皮沙发有着鸽子胸部的颜色，默默无闻的灰色墙壁上点缀着一件件光彩夺目的具有当地民族风格的工艺品。我想就这间房子的摆设足以让安迪作一个十几分钟的有力的发言，抨击执政党。

接着，这一切都化为乌有，别说安迪能就此作一次最有抨击力度的10分钟的演说，更不用说去修改时态、润色他的讲稿了——安迪已经死了。再也不可能有演讲了。我还能为他做更多的事。我能照顾他的妻子。她就坐在橡木桌子的首席。背对着窗户，透过这些窗户，弥漫城市的热浪夹裹着粗犷的光线将会议室的空间占领了。不过，这个房间是异常的冷而宁静。通过窗户我可以看见街上的行人，但屋子里却是宁静、死寂。

我走到窗口，在她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好！伊芙。今天你身体好吗？”我问。

她用低沉有力的声音答道：“不怎么好。”佯装笑了笑又说，“昨晚他们不让我一个人呆着，所以我就呆在这儿了。”

“你看来气色不错。”我说。当真如此。她仍然穿着赴野餐会那天穿的那件未经漂白的棉夏装，但她那浓密的灰色头发却梳理得很光，用一枚发夹束到脑后，刚刚上过妆。在她身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只袋子，一只大的装工具有背带的皮袋，像旅行者携带的那种。配上她那晒黑了的皮肤，希腊凉鞋，和她那副沉默寡言、有点不落俗套的外表，俨然一个旅游者突然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似的。

“伊芙，”我说着用手盖在她结实的手上。“德夫认为我们该谈谈。”

“打开窗户说亮话是不是？”她问道，然后大笑起来。

“对，有点像那样，”我说，心里疑惑是不是医生们曾给她服了某种药。“是谈有关……”

“有关安迪的葬礼的事。”她说，“德夫告诉过你他很怕我会给你们大家丢面子。”她说这话时带有嘲讽味，听起来这声音像是来自远方。

我趁势说：“对，就是谈这事。”

“他告诉你我的打算没有？”

“他说你一直想将安迪的遗体带回吾尔夫河老家去，私下里举行一次葬礼。”

“难道你不认为我有这种权利吗？”她的声音低沉而克制，不过话中有话。

“我知道你有这个权利。只不过安迪对许多人来说太重要了，我想我们得给机会让这些人向安迪道别。”

她打量着我。她的眼睛非同寻常——呈灰绿色带黄色小斑点。那是猫的眼睛，像是盯着看我身后看不见的、永远不可能看见的东西。

“当然啦，”她说，“盛大的葬礼是最好的政治场合，所有人都会谈及安迪的信仰，你们所有人会重新献身于安迪的政治原则。在我们离开公墓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得到的选票就会领先了。”

她说得对，我们当中没有人对下届选举抱有幻想。正如他们所说的，那只不过是孤注一掷而已。现在我们稳操胜券，但选票是会变的，能有东西缓冲一下最好。一次盛大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葬礼会有许多文章报道，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些文章扩大影响。

在萨克其万，没有一个政界人士敢低估安迪葬礼的影响。令我吃惊的是伊芙居然也想到了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伊芙不喜欢政治，她也不喜欢政界人士。我与安迪相识15年，伊芙与我谈话的次数我数得清，她在政治场合，大庭广众中露面的次数我也数得清。

可是今天她来了，听起来像个集会组织者那么精明干练。她成了普罗秋斯——就在我眼前变了形。我吃了一惊，不知如何将谈话继续下去。

伊芙看出来，她说：“乔，你打算怎么办？”她的话叫我又吃了一惊。伊芙向我求教，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嗯，办法我倒是有。将被谋害的丈夫下葬方面，我倒有些经验可供借鉴。我极力不让自己说话时表现出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要做伊安死后我做的事。我会叫德夫安排好一切。我会亲临葬礼，我将竭尽全力直至一切都处理好，然后，我就回家，我也就累垮了。”

伊芙起身向窗口走去，看看街景。时间流逝，我再度打量了那个房间，以便将某些细节储存在我的记忆中，今后作为写任何政治家发言稿的素材：墙角精心镶嵌着烟色玻璃柜台，漂亮的橡木餐柜里面放了一圈有玻璃塞子的圆酒瓶，有如水晶般在阳光下闪光，那醒目的花瓶内装着草原百合花，摆在会议桌的正中。

伊芙转过脸来朝着我，拿起地板上的袋子，甩到肩上，并耸了耸肩：“好，我们去找德夫吧。”

我不敢相信事情居然会办得如此顺利。我对德夫说过我会办事。显然，我办得不错。当我拿起钱包和伊芙一道往房门外走去时，我暗暗庆幸自己事情办得漂亮。

不过我高兴得未免过早了。我完全忘记了离开侧翼的新房子步入医院中心建筑群时，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以回忆起来。那儿聚集着《早上好！加拿大》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六七个新闻人士。豪沃德和一位身着医院白色短上装的妇女正站在一排麦克风后面。那女人西装翻领上用

别针别着一张医院的身份证，她正在宣读一份声明。其时正是7点5分——我们正在作跨海岸现场直播。

我得稳住她。伊芙是信赖我的，而我这时却将她引进了布满鲨鱼的水域。没多久，一位地方报纸的记者便认出了她。摄像师立即将镜头对准了我们。有人将麦克风伸到伊芙面前，问她是否知道是谁杀害了她的丈夫。我对那位面带狞笑的提问人很生气，同时也生自己的气。但伊芙表现得很出色。她说她知道如果她不发表看法的话，人们是会理解她的。她又说她将尽全力协助警方破案。至于葬礼的安排，那是安迪的朋友大卫·迈克里约翰的事。我打量着德夫，他站在摄像机镜头范围之外，医院发言人身旁。我能看出他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

我抓住伊芙的手臂，拉她与我一道走，并说：“让我们离开这儿吧。走到你似乎知道该去的地方。”于是我们双双有目的地朝通往停车场的那扇沉重的玻璃门走去。离开会议室的凉气，我们又回到了城市的暑热包围之中。那城市如同公共盥洗室里那些自动干燥器中的一个烤炉一般。

伊芙是高个子，约5英尺10英寸，至少比我高出一个头。当我们到达那道将医生们的停车场与公众停车场分界的篱笆时，她对我俯身耳语：“你知道我们要上哪儿吗？”我们停下来向四处张望。不到20英尺处停着那辆酱紫色的旧别克牌车——安迪的车。一定是德夫将它从野餐营地开到医院来了。我指给伊芙看，她伸手去钱包里摸索了一会，拿出了钥匙。

“我们来排五点。”她说。我们溜进汽车前座，动作轻捷得如同两个去上班的妇女。伊芙砰地将车门关上，将头扑在方向盘上，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是那么大声、吵闹而哀伤。

她有权这样做，我也有权这样做，但这次没轮到她哭。

今天我被认为是强者。我坐在她身旁，玩起放在仪表盘上的纸咖啡杯来。德夫和安迪还有我那天就是同坐这辆车去野餐会的，在城边我们还停车下来吃过冰淇淋，喝过咖啡。这纸杯就是那天留下的。

车外的暑热中，光着大腿身着鲜艳的夏装的妇女们正步行去上班。我看着她们，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感，尽管看来她们做的是这样一件普通的事。别克车内伊芙仍哭个不停，我用纸杯排着五点。一、二、三——一张给德夫，一张给安迪，一张给我。

伊芙的哭声戛然而止，如同它开始时一样唐突。她伸手到放手套的箱子里，取出一个装有湿毛巾的压扁了的盒子。我们每人取了几条用来擦手和脸。然后伊芙转身朝着我。

“乔妮，”她说，“我要回家去。我讨厌这座城市。要是德夫来主持葬礼的话，我在这儿就没事可做了。我得去看凯里，告诉他他父亲死了。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如何看待此事，但我不想让他从电视上听到安迪的死讯。”她不提“谋杀”两字。她心目中比我更忌讳这两个字。她可说是劫后余生，但却挺过来了。她坐在那儿，取出梳子来梳理她的头发，从后视镜中认真地打量着她的面孔。我想她那时比我们对她的赞许更超脱。或许我不该那么快放弃我对佩戴护身符能带来与外界和谐的理论。一定是护身符在保佑伊芙。

她挺住了。伊芙是个强壮而勇敢的女人。她对儿子的温情能触动了我脆弱的本性。因为到那一刻为止，我根本不记得她的儿子。我猜想他该快十岁了。那是10年前出的事故。我已经在安迪的自传中读过有关记载。由于常看，也就不需要特别去记录它了。

“安迪夫妇有一个孩子，是男孩，叫凯里，现在安迪选区内，吾尔夫河圣经学院办的派因斯学校，学习残疾人的生活技能课程。那是一所特别设施的学校。他们夫妇常去那儿看望孩子。”

是不是这样？我怎么知道的？我从未问过此事。我倒是忆起所有春天的黄昏，薄暮暝暝，安迪带我的孩子们到省议会门前的草坪上打棒球。我还记得去年冬天梅卡滑雪折断了腿有十来天用夹板牵引着，安迪每天都会花1小时来看望她。我倒是不记得是否曾向他问起过他的儿子或他妻子的事。安迪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在他身边的人都知道，在他的演讲稿中会忘却他的妻儿，然后又在下一次演讲或是第二天早晨谈起那些真正关键的政治事务。我看了看安迪的遗漏，内心感到很惭愧。我明白摆在她前面的将是孤寂的岁月，但我能料到的仅仅是接踵而来的恐怖。出于冲动，我伸手过去抚摸她的手。

“伊芙，让我和你一块走吧。我离开城里一会儿没关系的，我可以乘公共汽车回来。”

“对你合适就行。”她耸耸肩说。她又把手缩了回去。唉，谁又好责怪她呢？15年来我从未设法与她接近。我当然也不敢有让她拥抱我的奢望。她系上安全带，把车钥匙转到点火处，就把车开出了停车场。我们驶出城市，上了公路，这期间她一言不发。

当她开口时，她的声音由于痛苦，显得细而紧张：“这一切我都熬过去了吗？”

我力图回答得巧妙些，但却无法寻得。当我最后说话时，我如实对她说了，说谎也无济于事。

“我不知道你是否节哀，伊芙，我就没有。”

她转过脸来朝我不解地微笑，随即我们俩都回到了自己的思绪中。

车外热浪席卷过田野，大部分的庄稼已经收割，极目望去，是一片焦黄色。那是8月末一个令人心醉的好日子，是那种你深知漫长的一天光和热将要逝去，黑暗即将来临的日子。

我想到今后那冷清、没有色彩、空虚的日子，惊恐直冒上我的咽喉。就在昨天一切是那么确定有保障。可是现在却……如果说这种惊恐是对我而言的，那当然是坏事，但若是对我身边的妇女，那将会一千倍的糟糕。我转脸过去问她觉得身体怎么样，得到的是无声的回答。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变了。

汽车驶出城外，伊芙小心地驾驶得很好。但这会儿时速表上的小小的绿色指针颤抖着，时速接近130公里了。由于紧握着方向盘，她从手腕至手臂内侧的血管绷得僵硬，她的身体也由于紧张弯成了弧形，就连她那浓密的青灰色的头发也带一股冲劲。当她转上贝里·帕莱茵西边的上跨桥时，时速表上的指针跳过了135公里。

这时小汽车和驾车的妇人仿佛都融化了。似乎这小小的指针在时速表上用数字记录下了她内心巨大的痛苦。那辆旧的别克牌汽车危险地震动着。

“看在上帝份上，伊芙，放慢点。”我说。

她看着我如同忘了我的存在一般。她的眼睛因悲痛而发呆。她说：“我一直试图使自己相信，我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相信如果我们坚信这个愿望，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她用嘶哑的声音说，“我认为这不会是真的。”

我感到车轮不能带动车身了，伸手过去抓住了方向盘。那辆笨重的老别克牌车在我们转过上跨桥顶时，将把我们摔在路上。我们的下面是立交路，

车辆从上跨桥驶入高速公路。星期一上午下面有许多小汽车。

“请你，伊芙，请……”我的声音不对劲，是在啜泣，尽管不厉害。

但我的哀求倒也奏效。她抖动了一下身子，仿佛从梦中醒来。

“我有一会儿精力不能集中，”她说，她的声音似来自遥远的地方。接着她放慢了车速，小心地驶入了高速公路。

上路后半公里，她突然刹车，将车停在路边，跌跌撞撞地走出车外，俯身向着沟里干呕起来——那是一种可怕的、极痛苦的干抽泣。当时我的双腿抖得厉害，无法走过去看她。我把车门打开，让那暑气、沥青和尘埃味扑过来，那味道真吓人，不过，我明白，我还活着。我坐到驾驶座上，伊芙爬了进来，顺手关好车门。

我们默默无语地行驶了约 10 分钟，伊芙平静地对我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只要我能够，伊芙，什么事都行。”我答道。

“要点吃的。”她伸开双手做了一个没有的手势。“我记得从昨天早上起我就没吃过东西了。没人拿东西给我吃，我想在我见凯里之前，我需要吃点东西。”

我记得我认识的一位医生说过，外科医生在失去病人后总是很饥饿的。他说那是因为与要重新获得生命力的需要有关。我打量着瘫倒在旅客座位上的这位妇女，心想，假若说有人需要重新获得生命力的话，就是伊芙了。

圣徒餐馆坐落在吾尔夫河外横贯加拿大的高速公路边，由吾尔夫河圣经学院的人经营。无论你对他们的神学理论持什么观点，他们做出的油酥面馅饼可是省里首屈一指的。如果你讲究吃的话，从城里驾车行驶 40 英里坐在那发亮的贴有白色佛米卡耐热塑料的餐桌边，喝上一杯咖啡，品尝一下当天做的馅饼倒也是值得的。

我和伊芙就捷足先登了。那天的馅饼是草莓味的。我们吃了第一个又要了第二个。这本不过是我们两个女人间的一件平平常常的乐事。头顶上的电扇搅起咖啡浓郁的香味和新鲜烤饼的味道，厨房里的收音机传出歌星达比·波恩唱的那首《你点燃了我的生命》之歌。我们对饮无语，但这沉默并不难堪。当伊芙吃完，我重又打量她时，发现她虽是面带倦容，倒也平静。

“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吃馅饼了吗？”她问。“我有 10 年没喝过咖啡了。我避开有刺激性的食品。”

“我想我们对这些事应该更注意些。”我说。就连我自己也觉察出我的声音听起来是盛气凌人的，连伊芙这位不善于察言观色的人都觉察到了。

“别不可一世，乔妮。依我看政界人士净化一下思想，变开朗些不失为坏主意。”她说完转过脸去注视着窗外。从餐馆穿过停车场有一家小小的汽车旅馆。门前有块牌子写着：为你们寻回上帝最初的王国。伊芙坐着重又凝视着远方的汽车旅馆。她的双手却忙于将桌边的垫子一小点一小点地掐下来。

最后是我打破了沉默，说：“你从来没真正地了解我们，伊芙。你甚至从未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她将脸从窗口转过来时眼睛微眯着说：“我从来不了解你们，还是让你们自己说说吧，乔妮。你们那种难以置信的自我陶醉。你们这些政客认为这个世界的创始和末日都由那六幢议会大厦来主宰。我从来不了解你们！不过，你们也从来不了解我。”她提高了嗓门：“啊，你们有你们的观点——我听说过了。相信我，人们都肯定我了解你们的抱负，了解你们蔑视什么，了解你们是如何认为我是个可靠的人，一个令人难堪的人。你们会说：‘让她呆在乡下的家中，把她干的事撂在一边，别让她危害我们。叫她离我们远些，眼不见心不烦。’”

和我们围坐在桌边的人一个个静了下来。就连基督徒也喜欢看看把戏。圣徒餐馆里那些晚些来吃早餐的人们似乎嗅出了血腥味。收音机里传出阿梅·格朗特赞美她爱的上帝的歌声。正是在这个临窗的隔间里，伊芙给每个人留下了一个值得回忆的早晨。

“他妈的，你们谁也不曾花时间来了解我。你们没有人试图去理解我们的婚姻。”说着，她溜出了隔间，将皮袋甩上肩膀，朝我古怪地笑了笑，又说：“你们从来不了解我丈夫。他曾经是你们那个世界的中心，但你们当中谁也不了解安迪的基本情况。”她朝门口走去，转过身又说：“谢谢你的早餐，乔妮。谢谢你陪我到这儿来。现在让我自个儿呆着吧。你们这些人对我不会有好处的。你们连什么狗屁都不懂。”她盯住我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我付完账后，见她手里吊着车钥匙朝停车场走去。我起身跟着她，但又立刻意识到这样做不妥，就折回餐馆，又要了一杯咖啡，顺便看看贴在收银

台上的公共汽车时刻表。我还有两个小时来消磨才等得到车。我呷了一口咖啡但却咽不下。随即而来的记忆使我的喉咙被痛苦紧锁了。不到 24 小时前，我正在奥斯勒大街上的银河餐馆里，一边吃着冰淇淋和三明治，一边听着安迪和德夫为我们的竞选对手有无胆量今年与我们抗衡而争论不休。那是一次漫无边际、无目的、气氛很好的谈话。

我克制着不让泪水流出来就跑到了外边。圣徒餐馆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达比·波恩的父亲在唱着那首《他把全世界都握在手中》的歌。

当我转入通往圣经学院的路时，太阳慢慢地爬上了天空。校园里洋溢着夏末的宁静。这是大学里又一个学年，学生们到来之前，他们给太阳晒得黑黑的，依依不舍地离开家之前那种特有的宁静。松树的气味很浓郁，这使人清晰地记起竹篱茅舍和烤玉米的生活。眼前这一切使我感觉好多了。我来到了一个静谧而有韵味的世界。

往右边看去，可以看到一群低矮的平屋顶建筑，那一定是二战时期建的兵营。那里面曾容纳过全校师生。现在这儿大都用作学生宿舍，标有《巴顿厅》和《埃米尔森林》等名字。还曾有过一个叫做《上帝的赐予》的杂货店。那天早上有一张手书的牌子钉在门前：“夏日不营业。”

50 年代，学院获得了一笔资金，算不上多，但也足以用来建一系列供学院用的房屋了。这些房屋整洁、和谐，自成一体。大道西边有一些有凉台的平房，用作教职员居住。前门的上方，用雪松木片烤上房主人的名字，如“爱帕寓”、“万迈斯寓”等。

70 年代进项可谓不菲。建了一座教学楼，一个体育馆及半打宿舍。这些房屋都是用煤渣砖砌成的，留有狭长的开口做窗户。像德国人建的达乔集中营似的，能源充足，丑陋，是只讲功利的结果。那些千篇一律的校园建筑，应当向校董事会解答一下原因何在。

大路西北，从公路上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上任何从利宅那驾车往西行的人都首先看得见吾尔夫河圣经学院那座新建的小教堂。它犹如鹤立鸡群般引人注目。这既是这间学院里令人惊叹的建筑，又是学院能保持传统的价值的引以自豪的建筑。它看起来像孩子玩的一种高科技玩具——是一幢巨大的片石垒成的，或许说像 30 年前那些孩子们砌的结构复杂的金属建筑物。

中心的一座大楼是八边形的，四面的建筑物呈菱形，从中心交叉成 x 形向外延伸。一切看似平常，钢梁呀、桁架呀、管道呀，还有又厚又大的混凝土水泥板、过梁等。一切都漆成原色，红、黄、蓝等色。唯有交叉处，从八边形中心升高部分却没有上漆，在阳光下电镀过的金属闪闪发光。小教堂呈黄铜色，是一座颇具革新精神的建筑。在此舒适平凡的校园里，正如一张精美的椅子摆在廉价连锁店中心一样不对劲。我倒想就近去观赏一下。

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这栋大厦有个名字。一块镶嵌在合成荧光树脂中的标记标出了去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的路。因建筑时间不久，所以教堂周围过去不可能是风景区。大堆用机器翻起来的土被阳光烤得火热坚硬。有人用扔下的混凝土板凑成一条便道。当我朝小教堂方向望去时，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朝我走来。那男的推了一张轮椅，女的推了架童车。

当他们走近时，我知道我认识那男青年。他是克里格和朱丽·伊文森的儿子马克。一见到他就有一段往事掠过我的脑际。那是在角逐政党领袖之前，克里格、朱丽、伊安和我都还年轻，尚未分帮结派。

我们这些人早在 17 年前就聚在一起了。那一年，我们党出人意外地掌了

权，组织了政府。这就是我们没预想到能获胜的那次大选。那以后的数月是令人陶醉的时期——至少男人们是这样。

起初，夫人们经常互访。那段时间经常有生日聚会共用汽车等，谈论得很多的是学前教育、免费上学和法国浸礼。没有人比朱丽更热衷于此了。她和克里格有一个孩子马克，和我的女儿梅卡一样大。他是朱丽的命根子，她整天围着孩子转：无时不在教诲孩子，挑逗孩子。一次，在开完一个令人泄气的生日会后，所有家长们均谈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孩子的夭折。朱丽当时充满激情地说：“你能想象吗？假如你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要将孩子培养成真正特殊的人才，难道就会让他一死了之？”她不屑一顾地扳起手指头数着，疾病、酒后开车、多食脂肪，都可能葬送孩子光辉的一生。

不过马克·伊文森并没有死。但比死更糟糕。事实证明了他是那么普通、平庸。及至上了高中，这就更明显了。他母亲也明白，马克是个平庸甚至更差一点的人。由于这事蹊跷、令人费解，朱丽曾经一度言语行为错乱。后来，叫大家吃惊的是，过去她这个对丈夫的政治生涯只有起码的表面上兴趣的人，居然一反常态，投身到他的事业中，去推进他的事业。这对于她的丈夫和儿子来说，就像一场飓风那样突然，她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向，从而使她的儿子和丈夫远离了生活的航道。克里格原本对后半生能担任利宅那市（加南部一城市）小花区的领导成员已经满足了的，这会儿在妻子促进下，居然想当下任省长，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第一步就是要争得党内的领袖地位。于是他在全省上下活动，在草莓社交会上发言，在年会上慷慨陈词。

朱丽的儿子的生活却是作了一个奇怪的大转弯。起初他对突然失去母亲对他的关注感到迷惑不解。后来马克就与一群吾尔夫河圣经学院的男孩子们混在一起。十六岁上，马克就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十七岁时结了婚，不久做了父亲。那年初夏，我曾有一次户外飞行器展览会上与马克和他的儿子邂逅。十九岁时马克·伊文森已长成了一个结实、相貌堂堂的男子，况且还有一个壮实、漂亮的儿子。当他告诉我他过得很幸福时，我深信不疑。

克里格和朱丽却不幸福。如果他不是全心全意地爱朱丽，对她言听计从，而是把党内领导职务让给安迪的话，我想，那会对克里格是一种解脱。那样的话他将体面地接受失败，去过他向往已久的与世无争的生活。但他是那么狂热地、无可指责地爱朱丽，而她的痛苦却在于无法控制他的前途。选举结果揭晓后好久，克里格一直为使妻子失望而忧心忡忡。

朱丽也被恶魔缠身。大选失败犹如一剂药慢慢渗入并破坏了她的大计。她见到我们这些曾为安迪竞选出过力的人就愁眉不展。但6月底，当安迪在对公众回答一个问题出了纰漏不得不道歉时，她则喜上眉梢，在6点钟的新闻播完之前，她就打电话来问我：“嗯，乔，你认为你的蓝眼睛男孩今晚表现如何？”

如今夏日即将逝去。那蓝眼睛的男孩已不在人世，站在我面前的是朱丽的男孩子，他面带喜色。

“克尔本夫人，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是说上帝爱着所有的人，欢迎你们到吾尔夫河来，不过你到这儿干什么呢？”马克说这话时，他的面孔天真无邪，犹如新生儿的面孔一般。他站在便道上，微笑着，期待着一个回答。

“我是和波尔丘克太太一块来的。你记得吗？就是安迪·波尔丘克的妻子。他们都是你父母的朋友，我想你已经听说出了什么事——”

马克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打断我的话说：“我们听说了，但我们不希

望凯里——”他仔细地拼出了“凯里”五个字母，说完将他的手搁到童车中的孩子肩上。又说：“感知出了什么意外，因此一整个早上我们一直带他出来散步。他喜欢新教堂——我想他是喜欢那明快的色彩。”

这时我才开始注意到那男孩。我盯住他的脸很难想象他对任何外界事物有什么反应。他穿戴整洁，甚至可以说是标新立异。下身穿着短裤，上身穿印有阿尔夫雷德·E·的像的T恤衫。那是MAD杂志刊在封面上的新闻人物，像下面还印着“怎么，我担心？”的字样。他本来就是漂亮的男孩。头型像爸爸，头发与他爸一样是红褐色的。但那孩子凯里的脖子显得太纤细了，头过重，垂到一边像暴风雨后的鲜花一般。他的五官端正，但无精打采，嘴巴张开，口水直流到下巴，马克俯身用口香纸将孩子的唾沫抹掉。

我托起凯里的小手朝他微笑。他却无甚反应。我挺直身子，不期正与萝利·伊文森打了个照面。她正好从她丈夫身后走了出来，不解地望着我。

“克尔本太太，我们在电视上见过你。”她说，“那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罪过！你很勇敢，救了什班什先生的命。”她的声音轻快而甜美，带有音乐的质地，像一个孩子在背诵他早已熟记的东西。萝利抱着一个婴儿，我知道那是她自己的孩子，但她有一种气质，一种不知怎么使人觉得她离开青春期不久的感觉。

那不是指她的身体，从这点来讲她已发育成熟，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着装就像我们十八岁时都想装扮成的样子。她穿着一件桃红色的夏装。脸和手臂都被太阳晒黑了。走近一点，就可以闻出她身上散发出的洗涤剂和婴儿爽身粉的味道。她齐肩的长发是暗金黄色的，在阳光下显现出一束束的线条。她的美丽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她那蓝得如同勿忘草似的双眼中却隐含着空泛。假如说眼睛就是灵魂之窗的话，萝利·伊文森的灵魂可算得上是纯洁无瑕的。

“我们真高兴你没出事，‘感谢上帝。’马克听说你没事他对我这样说。”她停顿了1秒钟，认真地看了一眼她的丈夫，看看这位能道出真言的男子汉。此后她将那不可思议的目光转而注视着我：“你总是对我们这么好。我们结婚时你又送我们两层烤架的土司炉，柯雷出生时又寄给我们250元的支票。看，这小家伙可是个宝贝？”说着她将孩子转过来让我看。那孩子长得很漂亮但很怯生。“你对我们一家真是太好了，”孩子的母亲继续说，“不知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没有？”

“不用，谢谢你，萝利。”我说。“我不过在这儿到处转悠。或许我倒想到那边的祈祷中心去看看，来宾可以去吗？”我问。

她皱起那俊俏的双眉答道：“哎呀，克尔本太太，我想是可以的。我不明白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是说我们大家都为这个小教堂而感到骄傲。它是由梭伦·伊默斯征求一个得奖的利宅那建筑师的意见后设计的。”说到这里她舒展了双眉，又说：“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有二千八百个座位，是个多用途的建筑物，带有四个辐射出去的部分：一个咖啡厅，一个体育馆，一个圣徒祈祷中心和一组现代化的办公室。”说到这里，她那双天真无邪的双眼流露出喜悦的神情，然后她又恢复到原来的神态。我看出了她那双空泛的蓝眼睛流露出的忧虑——下眼眶变红了。突然间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关注着我的身后，流露出喜色。我就此转过身去看个究竟。

穿过校园的大路上，我看见一个男人正从一辆黑色的波士捷汽车中步出。他的穿戴像个大学生——斜纹粗棉布衬衣，蓝色工装裤。不过即使是从

远处看去，很明显他已不是个孩子。他长得高个子，孩子般的修长身材，但他的双肩位置不对劲，表明这人读书时过于忧虑。他朝我们走来时，我认出了他。他看起来像歌星詹姆士·泰勒，就是安迪死后追上去安慰罗马·波尔丘克的人。这时萝利抓住我的手。

“梭伦来了。啊，克尔本太太，你一定要见见他，他是那么善良而友好。他理解一切，我是说一切。”

但那么理解一切的男人居然从我们身边走过，仅仅对萝利和马克敷衍地点了点头，根本没理睬我。萝利的脸一沉，但马上为他辩解：“克尔本太太，梭伦·伊默斯不会是这样的人，他通常总是很友好的，我想他一定还在为波尔丘克先生去世而伤心吧。”

我猜想他在安迪来看望小凯里时与安迪见过面。

萝利挺直了身子站在那儿，盯住我的脸说：“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知道的只是波尔丘克先生几乎每周必定来看望梭伦，最近来得更勤。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萝利，我想我们用不着谈论这事——甚至对波尔丘克太太也不必谈及。一个人与他的牧师谈话的时候，就像与他们的私人医生谈话那样。这里边有个信任的问题，正像誓言一样严肃庄重。”

萝利听后很泄气，我立刻出来调解：“我猜，”我说，“他是冲着凯里来的。”

马克在一边一言不发。后来他说：“我想要是你们俩继续谈这事的话，凯里和我最好还是先上圣徒餐馆去买根冰棍。萝利，我在家等你和柯雷回来吃中饭。”说完他吻过他的儿子和妻子就推着轮椅朝餐馆走去。

萝利是严肃的。她试图分析一些事情给我听，这样做违背了她的意愿。她说：“克尔本太太，请原谅，不过我想你错了。波尔丘克先生从来没有花过许多时间和凯里呆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他看起来很喜欢他，不过如此而已。你知道，波尔丘克先生一连花上几小时和凯里呆在一起——和他一起看电视，和他谈论电视节目，读书给他听，讲一些事情给他听。但波尔丘克先生——嗯，你可以这么说吧，他喜欢，爱凯里和一切，但让他和凯里呆在一起看来真太难受了。他曾经进屋来坐下，握一会儿凯里的手，但一会儿他就觉得再也不能握了。他就会吻吻他，就马上起身离去。不，克尔本太太，波尔丘克先生为凯里才到这儿来的。反正梭伦才是吾尔夫河圣经学院和所有人的精神领袖。不过他是不会喜欢谈起凯里的。那将会……”她突然发出一阵大笑，如同微风一样和谐的乐音。“嗯，当然啦，他喜欢的是马恩兹太太。她是要特别关照的一位主妇——我有时装聋作哑。”她羞涩地笑了，期待着我的赞同。

我会心地赞同了她的看法。并对她说：“那么，谢谢你，萝利，告诉我这些事，你忍受了这么多不快，真是好样的。”说完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笑了。我们都觉得这次谈话真是互不伤害，息事宁人的。末了，我们友好地道别。

我在无意中造访了梭伦·伊默斯。我婉拒了萝利·伊文森随他们到家吃饭的邀请。我顺着通往教堂的小径信步走去。走近一看，它仿佛变了样，庐山真面目显出来了。你若是不设法走近它，你是无法注意到建筑物坚固的夸张的边缘构思居然能与简单的现实——吻合得惟妙惟肖。

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是一座完美的建筑物。说它完美有两重意义：第一是它各个部分与它美丽、华贵的外观相吻合。第二是我在它洞开的前门

中发现，它是一座形式和用途结合得无懈可击的建筑物。总之，它是一座适合对上帝的膜拜的大厦。

大厦的中心部分即是八边形的小教堂，那是个美丽的房间，既无有色玻璃或交叉拱木，又无丝质的祭坛布装饰——只是一个样样都讲求实用的房间。八面都是玻璃，八面墙也都是窗户，给房间带来充足的自然光。房间中央是一个简单的环形祭坛，上方悬挂着一个未上油漆的金属十字架。围绕着祭坛八面都是闪闪发光的教堂中特有的金属条凳，上面覆盖着帆布坐垫。坐垫的色彩很是鲜艳，有红、绿、黄、蓝等色。我经过走道，坐到条凳上。从那儿我可以看见许多管道是怎样结合成十字的。这些管道看起来很沉重但各有用场。突然，我感到浑身不适，倦怠、悲伤，以及我熟知的惊恐将我抓住。我记起生活中还有别的死亡：我的祖父母、我高中的同学、我父亲和丈夫。唯有我苟活着。当我注视着十字架上的灯光变幻时，我禁不住不寒而栗。

我或许坐了半小时，无人对我言语，也无看不见的手搁在我肩上。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好受些了——虽说尚未完全恢复体力，倒也可以活动了。

“我今天就要看个究竟。”我说，反正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我提起我的包就走。

我不知道我先听到了什么——是那个男人的声音或是呜咽。我一脚踏出教堂门，眯缝着眼望着正午强烈的阳光。这时我听到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声音来自教堂侧翼的一个房间——附加建筑的一个房间，萝利曾这样叫它们。那些由教堂中心向四周辐射出去的像轮轴从中心向四周辐射出去那样的房间。那哭声听起来很可怕。它看来像是从痛苦中喷发出来似的，那纯粹是来自个人的痛苦，我知道我无法帮助那人。

但我又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起初我听不明白那些话，当然我也不必要刻意去听懂它。那声调听起来熟悉得像我自己的声音。当我分辨出那些话时，我的心几乎跳出了胸膛。那声音说：“我认为做这件事是对的，不过现在我不知道。”接着我听不懂，随后又听到：“如果我用了子弹，可能还会更仁慈些。”声音由于极痛苦而紧张，“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去？啊，上帝，梭伦，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去？”

以后我听出的不是别的，而是血一般的歌声在我耳边萦回。我知道我听到的正是安迪的声音。

我一转身径直朝教堂侧翼的双重门走去。声音就来自那儿。我来到标有“梭伦·伊默斯办公室”字样的办公室前，没有敲门，上气不接下气，近于歇斯底里地把门打开了。

房里没什么可看的——只有一个瘦长而头发稀少的男人。他面前的一张书桌上有一台便携式录音机机械地咋喳一声，表明那磁带已到头了。我不知道我原先所预期的是什么。只觉得恶心、气愤、失望油然而生。

我走过去，把磁带从收录机内取出来。我原来对这盒磁带是百般喜爱，那是一种又小又便宜的磁带。安迪驾车时曾用它来录下他的一个想法，或是他对一次会议的印象，有时候仅仅用它来录下他晚上驾车穿越草原时的想法。

“你从哪儿弄到这个磁带的？”我问。

梭伦·伊默斯的声音那么低沉，我几乎听不出了。他说：“他把它给我的。”

“磁带中说的到底什么意思？都是关于要做的正确事、利用子弹的

事？”

梭伦·伊默斯呆呆地看着我却个回答。

我的声音在寂静的屋里尖叫着：“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有这盒磁带？这磁带究竟讲了些什么？”

“这是私人谈话。”说着他起身向我走来。他说话的声音很温和。他抓住我的手臂，领我穿过走廊和一扇门，走到外边明亮处。有好几秒钟，我们站在门坎边像一对恋人那样对视着。我不明白我们在寻找什么——或许是线索，我猜想。抑或是某种突发事件的内幕。最后，我一转身径自朝通往高速公路上的便道走去。

“克尔本太太，”他在我身后叫道，“当你做完这所有的事以后，记住这事并不是你一个人干的。还有别的人也爱着安迪。”好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他为什么要称呼我的姓。

在利宅那的公共汽车站外仅仅有一辆出租车在等候着。我弄明白了只有一位老妇人要乘车，我为这事而骄傲。瞧，它已开过来了。当出租车驶离后，我朝车后的窗子向外看，只见那老妇人站在角落里挥动她的手提包向我致意。当出租车在东湖大街的家门前停下时，时间已经是2点30分了。从安迪去世算起，还不足24小时。我家的狗满怀希望地迎接了我，我记起那天早上我还没遛狗呢。

“对不起，太太们，”我说，“现在该洗澡了，你们可以通过澡堂门大发牢骚吧。”它们就这样叫了一阵子。2点35分，我洗了澡，到了3点钟，我洗得干干净净凉快快了，换上了一件干净的棉睡衣，一头倒在床单上就进入了梦乡。

我醒来时已是近黄昏了，屋里洒满了阴影。我儿子彼得手中拿着一杯冰冻过的茶，站在我床边。他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孩，像他父亲一样有着黝黑的皮肤及爱尔兰所有克尔本家族人的端庄的仪表。他姐姐梅卡长得像我，她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亚麻色的头发，平淡无奇。”她准确地道出了要害。她说得对。不过彼得也有他自己的思想包袱。十六岁时他也像梅卡一样腼腆，而我的小儿子安格什却性格外向。由于我从事政党工作，家里常常是宾朋满座，这对彼得来说无疑是受罪。不过他毕竟步入了社交，常常毫无怨言地招待我的来客。照顾我们家养的狗，对姐姐、哥哥和我都是那么关心爱护。这会儿给我端茶来了，这也是他乐意做的事。

他在我床边坐了下来，说：“梅卡已下厨房做饭，看来是粗手笨脚的，不过闻起来还很香。”

“她煮什么？”

“剁碎肉和奶油冻。”

“唔。”

他笑了，并说：“正好，安格什和我为你租了一部影片回来。是讲罗宾·威廉斯的。在七一一的家伙说这是一部吵闹的影片。还有好几个电话找你，安格什已帮你作了记录，你可能得等待他们回头再打过来。反正记录都在这上面。他笑着递给我一些纸条，“电视台那家伙——被你那天打晕过去的家伙是叫瑞克·什班什吗？”

我听说后，全身不寒不栗。

“对，就是他叫人送了一些鲜花来。”他说着做了个翘大拇指的动作，随即将门关上了。我没提到“谋杀”两个字。多亏他想得周到，我打心里感谢他。我坐在床上，呷了一口茶，浏览起安格什作的电话记录来。

有两件事是意想不到的：伊芙·波尔丘克和俊伦·伊默斯曾打过电话来。我先给伊芙回话。听起来她很镇定，并邀请我和她一道去参加安迪的葬礼。她说她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人可以邀请去。她和罗玛·波尔丘克即安迪的母亲已多年没说过话了。“那么此外，”她无力地说，“就剩下凯里，当然还有你乔了。”她对“当然”两字没作任何解释。我说我愿意和她一块去。她告诉我她将回来接我。

俊伦·伊默斯的声音听起来犹豫不决但却很友好。他说他打电话来是想确定一下我是否安全到家了。我向他道了谢并告诉他，如果下次他到我们城里来时给我打电话，我将会很高兴。我就此挂断了电话，并肯定他还会打电话来。我早上碰上的事情三件就有两件办好了，情况肯定有了转机。

市里警察局的米勒·米勒德警长打过电话来，他这会不在局里，但他将与取得联系，一个叫伊朗斯达的年轻女人对我说。并且告诉我她曾听过我丈夫有一年冬天在大学里讲授的人权平等课。

还有一些朋友打来的电话。阿丽·苏德兰，曾是我的私人医生和朋友，在得知伊安去世时，曾打电话来致意并对安迪的死表示哀悼。还有收到两张请我赴宴的请柬，那是豪沃德发出的。在这个世上，他们可以说是我的莫逆之交。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的邀请，我是欣然接受的。不过，今天我全都谢绝了。因为在会面时他们一定会谈起安迪的死，这正是我目前所不能正视的。那天晚上再也没有比穿上我的棉睡衣，坐在厨房里吃着梅卡烧的剁碎肉和冰冻奶油，然后蜷缩在床上，看那部七一一的人说的热闹的电影更舒心的事了。因为在自己家里我有安全感，我可以避开“谋杀”两字。

当我穿上睡衣、光着脚拖着步子走下楼的时候，我感到轻松自如，所有的电话都回复了——我感到饥饿。梅卡做的菜带有姜和大蒜味。我走进厨房时看到她正把一块酸面包放入烤箱去加温。安格什在切蔬菜。梅卡要我给自己准备一份饮料，再看看饭厅的餐桌是否摆好，我一直跑来跑去。

餐桌上已摆好了刀叉——又是安格什做的。在桌子中央摆着一个水晶的大花瓶，从它精美的雕刻我一眼就看出它是来自爱尔兰窝特福的精品。里面插满了非洲雏菊。一半是充满生气的粉红色，我们以前管它叫美国美人，还有的呈玫瑰和橘黄色的。夏末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把花瓶的水晶刻面染成了火样的红色。那是一次在范·高特野餐会上的中心装饰物。靠在玻璃花瓶边上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用宾馆信笺写的便条，那是瑞克·什班什写的。上面写着：1963年11月22日，阿尔道斯赫胥黎去世，他的死将永远只不过是肯尼迪遇刺的一个注脚。谢谢你，克尔本夫人，是你阻止我成为安迪死的一个注脚。我从来不喜欢看到我的名字用小写字体印刷。它的签名是用RS两个大写字母。我给宾馆打了电话，并留言向他致谢。

无论怎么想，那是个愉快的晚上。梅卡的晚餐做得棒极了。吃完饭后我为自己倒了杜松子酒和补汁，插上电扇，我们全家便坐下来看电影。七一一那家伙说得对，影片可逗了，安格什倒在长沙发上睡着了。影片一放完，我就为他拿来了毯子和枕头，用毯子将他包上，吻过他，就上床歇息了。

床头柜上那盏小小的黄铜灯发出的光在黑暗中成了一池温馨。在灯光下，一摞有惹眼的封皮的小说没人去读，唤起人们读书的欲望。床上的铺盖

被折了过来，枕头被错靠在档头的床板上。又是彼得干的好事。虽然他今天已争得圣徒身份，我也投了他一票。

我走进洗澡间去刷牙，我注意到窗户边椅子上散乱地堆放着我野餐那天穿的连衣裙。我将它拾起扔进了洗衣房的筐子内。衣服下面是安迪那个蓝色的皮文件夹。封面烫金的黑体字印着：“每一个乌克兰母亲的梦”。那是德夫和我在圣诞节送给他的，那时他已经宣布他将角逐党的领袖。

我打开文件夹，想看看他最后的发言稿。我看到的并不是空两行打印在牛皮纸上我写的稿子，只见一张灰鸽色的昂贵的纸，第三行用娟秀的手书写下了八行诗：

啊，玫瑰，你病了。  
是那看不见的蛀虫，  
在夜里飞来，  
在呼啸的风暴中，  
找到你做温床，  
找到了绯红的欢乐。  
是他那黑暗隐秘的爱，  
将你的生命葬送。

在这页的顶端，有人写下了A和E两个字母。但不是分开写的，是用结婚请柬上那种有小小卷曲花朵的方式联起来写的。

“是他那黑暗隐秘的爱，将你的生命葬送。”这就是安迪死前读过的最后的诗句。这最后一个意象就永远留在了他的眼里。我这温馨、熟悉的房间立时变得陌生起来，与世隔绝。我的双手一松，文件夹即从我膝上滑到了地板上。

那一夜我梦见了玫瑰和干的血色，以及那些不连贯的烫金的黑体字。我醒来时顿觉口干心跳。

“是谁杀害了你，安迪？”我在黑暗中悄声说，“是谁扼杀了每个乌克兰母亲的梦？”

米勒·米勒德警长尽一切可能将他的办公室布置得富有人情味。头顶上的荧光灯被剪断了线，房里仅由书桌上的一盏台灯和墙角的一盏旧式的灯照明。沿墙一边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一些书，从书脊上的名字看它们是有趣的，标着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以及C·P·斯诺等作家的名字。靠窗的矮圆桌每边有两张椅子。那是真正的填满得满满的，叫人看了就舒服的椅子。桌子的中央更令人吃惊地具有家庭风味——摆着一个肥大的黄色陶茶壶。

在一张椅子前的桌面上放着一个文件夹。警长示意我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

“你喜欢喝茶吗，克尔本太太？要不我叫人去弄咖啡，要是你喜欢的。”

“喝茶好了。”我说着坐进了椅子中。

书架的底层有十几个咖啡杯，每个均有橘黄色的《早上好！加拿大》电视栏印的标牌。那是一种给参加拍摄节目人的纪念品。我从桌面看过去，那人正在倒茶。我想，我一定看过他赢来这样的杯子了。或许还有更多呢。他的面容疲倦而正经，早在电视屏幕上闪过二十个春秋了。看到他在我对面坐下，使我感到慰藉。

他是个高大有礼貌的男人，有着白头发和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他穿的是成衣：轻巧的裤子，虽然不贵但挺好，上身穿着白色的高尔夫球衣。当他将茶递过来给我时，我注意到他有两个指头没有了。“茶味道很好。”我这样告诉他。

“是鄂尔·格雷牌的。”他说，“我白天改喝混合茶，早上喜欢喝鄂尔·格雷牌的——它是一种一点不掺假的好茶。”

“是的，”我说，然后我们便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中。

“嗯，”他最后说，并拿起了文件夹，“当然是为了这事才请你来的。”横跨卷宗用蓝色的标记标出“波尔丘克”的名字。“我要你给我提供些情况。为什么你不从你认为有用的那点讲起呢？我跟着你的思路，如果我需要你的帮助的话，我会打断你的话的。我抽烟你不生气吧？”

“不，当然不会，我自己以前也抽烟。”

“现在并不是人人都抽烟，除了我。”他不高兴地说。

说着打开了一包库珀牌香烟，又说：“你戒烟该表扬。”

“谢谢，”我说，“我戒烟不久。”我想假如市警察局要训练出好警官的话，那么米勒·米勒德一定会是好警官的样板。

两个小时后我了解到他也是精明警官的样板。我已向他描述了安迪去世那天每小时乃至每分钟的情况。我从那天德夫·迈克里约翰最初到我家来接我，然后去安迪在市里的下榻处即学院大街的公寓接他说起，又叙述了我们中途在银河街停车吃了冰淇淋。还有去野餐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谁，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总之是点滴不漏。米勒·米勒德一直很温和，鼓励我往下说。在他为我们沏好的第一壶茶约1小时后，又拿出一盒皮克·菲林士牌饼干，在请我吃之前他把它们仔细地放在一个盘子里。我不那么紧张了，我和他已经成为朋友。两个聪明人一起来解开一道难题。至少，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同时也是为什么后来发生的事居然会如此令人震惊的原因。

我觉得追述安迪的末日是痛苦的，不过我一直忍受着这痛苦，直到安迪穿过讲台走向讲坛的那一刻。当我回忆起安迪在最后那几分钟还是那么快活和自信时，我觉得我的喉咙哽住了。

我不得不把目光移向窗外，以防自己在谈到安迪生命的最后几分钟的经历时，会突然出现情绪大波动。说完后，我把目光从窗外移回来，盯住我的新朋友米勒·米勒德的脸。我想我那会儿准是期望得到他某种赞扬。毕竟，刚才我因为戒烟已经得过他的称赞了。这次讲得更糟，但我还是给他透彻地、有节制地讲述了讲台上那可怕的最后几分钟。我值得表扬。

但我没得到表扬。

米勒警长使劲地抽烟。他变了，他已经与刚才判若两人了。我不再是协助警察调查案件的人，我成了别的什么人。米勒的目光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温情。他俯身朝着我：

“还有两个问题，克尔本太太，我要的是回答。首先，你怎么知道安迪在讲坛上喝的水中有毒？”

我被弄得乱了套。我喋喋不休地讲起了一个又长又漫无边际的故事：那是在佛罗里达时，我的孩子们还很小，有一天我女儿在海滩上本能地从一个有毒的水母旁退缩，尽管它湛蓝得像珠宝。仿佛梅卡就知道那东西会置人于死地。我无可奈何地讲完了。又补充说：“当我俯身去给安迪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时，我得知他嘴唇发出可怕的气味。我就知道不能让瑞克·什班什再喝安迪喝过的玻璃杯中的水。我把这种本能叫做返祖，如果你会……”

“啊，我会的，克尔本太太。”他干巴巴地说，“我会在我的报告中注明，你在阻止瑞克·什班什时完全是出于一种原始的反应。”他取出香烟使劲瞪了我一眼，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暂时撇开这个话题来看看你那天行为的另一个可疑方面呢？”他的灰色的眼睛带着敌意，就像3月的天空般咄咄逼人。

“警察到达出事地点以前，你从讲坛上拾起的是什么？我提醒你一下，当时是有很多目击者的。即使是不愿作证的人，都愿意证实他们看见你在凶案现场拿走了什么东西。”

“我相信他们把那地方叫做发案现场。”我笑着说。

“我相信他们会证实的。”他说，根本没笑。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伸手到我的包中，抽出了安迪的发言稿夹，并把他递给了米勒警长。“这，”我说，“就是我从发案现场拿走的。”他大声地读出了封面的话：“‘乌克兰母亲的梦’，克尔本太太，这点我不明白，是不是开玩笑呢？”

“是，”我说。“那正好是——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笑话。那是安迪的文件夹，那署名是他个人的笑话。”

他的目光寒气逼人，说：“谁和谁之间的隐私？”

“安迪与他的工作班底之间的私事。那个文件夹是去年圣诞节我和德夫给他的礼物。省里一家乌克兰文报纸曾刊载过安迪的一张照片，并用‘乌克兰母亲的梦’作图片的标题。”我犹豫不决地往下说：“那时这事看来真有点滑稽……”

他又点着了一支库珀香烟，用手揉眼眶周围的地方，说：“我想是这样。当涉及到谋杀的时候，这种反常行为看起来总是有点名堂的。”

“你比我经验丰富，警长。”我说。

他无精打采地看着我说：“克尔本太太，我们不谈这些鬼事算了。你说那天你为什么要把文件夹从台上拿走？你是个明白人，你知道的远比这些多。”

“我想那时我根本没仔细想过。如果你想把我当作笨蛋或是歇斯底里的人赶走的话，那么只管赶好了。反正我拿那个文件夹不是出于别有用心。是我原来给安迪的，里面装有我为他撰写的最后一篇发言稿。他死了。那时或许我想的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克尔本太太，你这样说可叫我吃了一惊。”他说着伤心地摇了摇头，“那就让我们看看这最后的发言稿吧。”他打开了文件夹，那首诗依然在里面。他无动于衷地读了一遍，读完抬头看着我。“是威廉·布莱克写的，”他说，“题目是‘病玫瑰’。”

“对，我知道。”

“这首诗放在这里面做什么用？”

我火了，拿起手提袋站了起来，说：“我想那是你该去弄明白的事，警长。谢谢你的茶。”说完我起身朝门走去。我料想他会制止我，但他没有这样做。

但当我打开门时，他却十分平静地对我说：“无论何时，克尔本太太，我肯定我都没有必要告诉你原因。不过，如果你能不离开这座城市的话，我们很感谢你。”

他话里特别加强了“我们”两字激怒了我。于是我答道：“你看来太健忘了，警长，我得去参加一个葬礼，我不是那种丢下朋友独自哀伤的女人。”

我的话并未说到点子上，但那一刻这话就是我脱身之计。

警察局内装有空调，当我走到停着我那辆沃尔沃牌汽车的街上时，我已是汗流浹背。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停车票。不知怎么的，我竟不感到意外。当我伸手进提袋中取车钥匙时，抽出了一张橘黄色的纸——一张安格什上八年级之前所需学习用品的单子。那也没让我感到意外。我需要洗个淋浴，一杯带杜松子酒的冷饮，还有一本讲述一位警长先遭羞辱后被杀害的小说。但我并非无牵无挂，我是安格什的母亲。我把那张停车票从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撕了下来，往计费仪中投下了25加分，越过马路，走进了“贝”这家商店。

我喜欢商店里夏末的景象：一叠叠新到的笔记本，闪闪发光的卷成三圈的捆东西用的尼龙绳，削成尖尖的各种彩色粉笔等。我还喜欢“欢迎返校”的标记——用硬皮纸剪成的鲜红的苹果以及纸板做的悬挂在文具用品上方的蛀书虫。还有那用厚厚的纤维布剪成的、深色发亮的“欢迎返校”横幅，再一次提醒我们，经过了一个轻松的，用冰淇淋画的夏天，学校生活又要认认真真地开始了。这是个充满了希望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将一切置之度外，照着安格什的购物单，一一将他要的文具给买下了，我能感知我的精神大振。

我是偶然看到她的。当时我正走在去男生公寓的路上，碰巧一抬头就看到一排不同牌号不同大小的电视机。每台机子屏幕上都显出伊芙·波尔丘克的面孔。二十个伊芙用二十双无法理解的眼睛朝外看着我。

我走过去将其中一台电视机的声音开大些，只见她惊恐万状的样子——没有别的词可以描述她的样子。她由于丈夫被谋杀而上了电视，不过她因此也公开了她的脆弱和私人的世界，让公众去仔细评说。她穿着式样简单的蓝色棉布连衣裙，俊俏的面孔被太阳晒得黝黑，正在屏幕上俯身向前告诉采访记者说她要将她丈夫的葬礼办得隆重，让人们一辈子记得这个场合。摄像机

凑近给她来了个特写镜头。就是在那家“贝”商店中出售电器的大柜台，伊芙正在阐述她那“最殷切的期望”，就是让她丈夫的遗体安葬在省议会圆形的大厦内。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二十个伊芙冷冷地驳斥了那位采访者考虑不周到的提醒：葬于省议会中是给省长和副省长的一种荣誉。

“这么多人热爱安迪，”所有的伊芙都这么说。“我相信省长不至于权大到否定人民进城来与安迪道别吧。”她一口气说了下去。7年前省长的党将我们的党一脚踢出了议会办公室。如今是伊芙使他狼狈不堪。我也为那个长着孩子般面孔的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前省长而难过。

后来证明她也使我们所有的人狼狈不堪。当我走进我们家的前门时，安格什大叫一声，一头扎进我怀里。他正要去打棒球。我让他进屋来检查一下我为他买回的学习用品。

“讨厌，”他板着面孔说。走到走廊当中，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妈，迈克里约翰先生起码打了八十三次电话来，听他说话的声音好像要哭了。”

我拿起话筒拨通了德夫的电话，正巧他就在那儿等着。对这种巧合，我们谁也顾不上说一句话。也没有寒暄和问候。他这个以小事料理得体面而引以为自豪的人，居然给弄垮了。他别的什么也不说，只是说：“乔，我要谈的还是有关伊芙的事。我原以为她会让我去料理一切后事，谁知今早上我还没来得及洗刷，她就打来了电话，对安迪的葬礼指指点点，对我发号施令。从抬棺人选到食品到接待，事事加以粗暴干涉。‘不能要这种菜，不能吃卷心菜。’她是这么说的。你能想象她的专横跋扈吗？你看了今早上她在电视上的言行没有？她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中的那种女人。”

“不到关键时候不识人的庐山真面目。”我说，“连安格什也将这句话记在了他的笔记本上。”

“那是孩子说的，”德夫说，“反正你说拿伊芙怎么办？”他问。

“我认为她是要向我们表明她也能把事情办好。她还向我们表明我们过去低估了她的能力，因为她原来就是不属于我们这个小社交圈内的人。别忘了，她现在很难过。”

“亲爱的，我们大家都难过。只不过是事业，我们知道如何去正确处理这些事罢了。我认为我们本来就不该为了让伊芙建立自信心而重新策划安迪的葬礼。不过，我又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不知道她脑子里有什么框框——谁知道她想干什么。我想听听你的指教，乔。”

“这样的话，我的意见是和她一道去准备，让她把总体设想告诉我们，然后告诉她我们将拿出方案来，我们还有组织帮忙，这点你明白。”

我听见德夫在电话的另一端洋洋得意起来，他有权利这样做。

在安迪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将他的政党组建成省里从未见过的最好的政党，这里面大部分工作应归功于德夫。我们相互间很了解，我们也了解安迪。我们热爱他的实干精神，我们同时也了解他的缺点，我们同心协力是要确保没有别的人能与我们匹敌。我们各自都有要为安迪效力的理由，我们各自也都有显山露水的地方。但我们工作的活力都属于同一个愿望：要使我们党的人高人一筹。这种愿望的动力是那么的强烈，无论是安迪的死或是伊芙的发号施令都不能阻止我们。在安迪葬礼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为确使我们党的人显得高明些，我们不断地到地方议会办公室去，不停地筹划。德夫伤心地说：“人想出办法，上帝就会笑。”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坚持不懈地干。

在大庭广众当中，我们事事策划得好的话，就是对某些人嗤之以鼻。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有人将一个能干的、正派的人在站起来演讲的时候杀害了。所以德夫虽然还有别的事务缠身，作为安迪的马前卒，一手促成葬礼——确保了从地方议会到大教堂一路上将有群众列队夹道送葬，但又要做到不那么拥挤，这样大教堂就能对过多的人疏导开；还要确保做中饭的妇女们能有炉子煮热饭热菜，有冰箱来储存冷饮——一句话，他要确保安迪一生中在公众中进行的最后一件事，不会在我们大家面前当众出丑。

开利·苏伯丘克负责安排葬礼当天我们所有人的活动日程。洛林·贝勒加负责通讯。保持了联络通畅，使成千上万宗捐赠、送鲜花、书信得以顺利送抵办公室。詹妮斯·沙莫什，曾任安迪多年来的主要秘书，她确保了省内省外来参加葬礼的政界要人有宾馆下榻；为他们安排活动和车辆。我们当中还有十个八个人齐心协力将另外六七方面的事办得高效妥帖，使葬礼凄惨肃穆。

在葬礼当中，不时地爆发出一种凄惨的幽默。在葬礼前的一个暑气蒸腾的下午，大约5点钟，我步入官方反对党的办公室，只见一瓶打开的皇冠酒放在办公桌上，另一只空瓶子扔在废物筐内。大约有五个我们的人聚在一起听洛林、贝勒加念收到的邮件。一个叫伊士纳的男人答应，只要我们将安迪穿过的衣服寄些给他，他在下次竞选中将为我们党分发三万张选票到选民中。他说：“因为他已不再需要这些衣服了，而我与他穿的衣服尺寸完全一样。”一位叫斯图特·沃利的妇女用法兰绒为安迪缝了一双穿拖鞋时穿的短统袜。她制作这双袜子，她说：“是给所有与我诀别的人，因为我不愿想他们光着脚走过生命的尽期。直说了吧，用不着再花钱为他买鞋了。”两位在电视上见过伊芙的男人建议她再结婚。一位居住本省西南的女美容师告诉伊芙，要是她把头发剪成短式束发，染成暗蜂蜜色，她会显得年轻十岁。并且，那妇女还将一束短头发——如同一把油漆刷子——附在信笺上。

我喝了一杯饮料就进入大楼的热气当中。好像打不起精神来进入工作状态。因为再也没有演讲稿要我写了。不过我也无法预见安迪葬礼以后的日子，或许，我也不想去想。

我的生活在安迪遇害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到星期五早晨举行他的葬礼期间，都是处于一种无规律、无章可循的状态。

“我到处转来转去，做的却是没有一件看来切实际的事。”一天闷热的早上我在议会大厦门外遇见德夫时对他说了。

“给你，”他说着塞了一张五元的纸币到我手中。“你要体验一下干实事的滋味？乔、亲爱的，你就到商业区去买一双女用连袜裤给伊芙参加葬礼时穿——要灰褐色全尼龙的，不要斯潘得克斯弹性纤维的，或棉裤衩，要大号的——不要……你知道，因为我们的伊芙很胖，又高。”他拿我开玩笑，但我还是去办了。即使你不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你也看得出来他忙得快要发疯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家的生活也毫无规律。男孩们直到劳动节以后才返回学校，梅卡在9月中旬即将开始她在萨斯克顿的大学生活。所以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不正常，无计划，如同一帮被机场罢工或是坏天气滞留在陌生地方的旅客的生活那样。

我知道，对这段时间生活的陌生感部分是源自星期二，也即是安迪遇害两天后，孩子们和我搬入了奶奶公寓居住。那是彼得的主意——是个让我们

全家避开暑热的办法。

我们在东湖大街的房子始建于 1911 年。像所有的旧房子一样，也有好几十处裂缝，无论冬夏，均可通风，装空调不过是一种浪费。奶奶公寓却是另一码事。我们屋后有一个向外伸延的双层车库，从前的房东在车库上建了一套公寓式房子给他母亲住。那是一个带厨房、洗澡间的大房间。老妇人患有过敏症，所以房间封得严严实实，如同坟墓。只需轻轻一按电钮，房间要么就凉得可以冻好牛肉，要么热得用不着叫你赶快煮牛肉。

奶奶公寓还曾是伊安准备他的人权课的地方。不止一个悠闲的下午，我们还曾在那儿做爱。他死后，我将我的书和笔记本搬了进来写我的论文。现在它成了我的办公室，而且还远不只是办公室。奶奶公寓还是我能坐下来望天想心事，为死者哀悼的地方。在那儿我用不着担心孩子们，或是担心被别人看成傻瓜。

当伊安在那儿办公的时候，他已经将墙用多节松木镶嵌好了，又沿一边墙建了一溜书架，安放了书桌，给桌子配了张上好的皮椅子，一张看书用的靠椅，一张褐色灯芯绒的长椅同时还可用作活动床，就是这么个地方。房间的装饰是按 50 年代一份《居室》杂志去做的，但房间具有的那种农舍风味我倒也喜欢。

伊安去世前的那个圣诞节，我从魁北克订制了一张碎呢拼结成的挂毯，作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让它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洒下一抹欢乐的光辉。那幅挂毯和一面墙上贴满了他被害后他母亲寄给我的照片，是我以后对这间房的改变。那些照片是伊安和他弟弟杰克成长的编年史。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站在这些照片面前，我不知道一位节哀顾问会说些什么，不过这些时间并未白花。从他们兄弟年轻的生命美好和必然的成长过程当中，蕴含着某些东西能安慰我：从他们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的婴儿时期的照片，到能挺直腰坐着，然后会走路；从搂着狗和打棒球骑自行车的少年，到成长为青年，他们的面孔在剪得奇特的发型下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手臂中还挽着穿大波浪连衣裙的女孩子；还有他们成了研究生，并获得奖励的照片。

我不明白当彼得建议我们带上睡袋搬进凉爽宁静的奶奶公寓，一直住到安迪下葬的时候，他是否相信我们全家看了那墙上的照片，都需要一种使心上的创口愈合的能力。无论什么理由，反正我们是搬进去了。在安迪葬礼之前的那些宁静、炎热的夜晚，我们开了空调，吃着从白脱路西买来的冰淇淋，夜夜无事。男孩子们用便携式电视机收看棒球赛，他们又买了放像机，没有球赛时，他们就看电影。梅卡和我则读完了一大叠旧的妇女杂志，那是从一次书库贱卖中买来的。

看来在这个凉爽的公寓里，我们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将自己封闭起来，与外面炎热、令人痛苦和发狂的周围世界暂时隔离。正是在这些房间里，我决定要为安迪撰写一本传记。

这是一个几乎叫我丧命的决定。

我是在收到塔布玉米的那个早上开始执笔的。大约 7 点钟，有人使劲敲门，我把门打开，只见豪沃德站在门外，肩上扛了一个如同圣诞老人用的黄麻袋，装满了一袋玉米。

“基督呀，乔，我以为你们全家都死绝了呢，我差一点没把你们家的前门推倒，后来我才想起你们在这儿还有个家。你们都搬到这儿来干吗？”他说。

“这儿凉快好睡觉呀。”

“哎呀，我们打开门站在这儿能谈多久呢，难道你不打算请我进屋吗？”

“豪沃德，你进来好吗？”

“好，我这就来了，我想喝咖啡。瞧，我带来了玉米做早餐。有个人在都德尼的一个加油站外边设了一个摊点，他今早才从阿尔伯特驾车进城来——这是他捎来的这个季节收获的第一批塔布玉米。弄点水来煮吧，我饿坏了，彼得，你到屋里拿口锅来，安格什和我着手来剥玉米，快来、快来，让我们大家齐动手。”

我们有说有笑活跃起来了。孩子们一贯喜欢豪沃德，尤其是伊安死后，他们似乎更珍惜豪沃德这种粗犷的爱。他们喜欢和他呆在一块儿。我也不例外。

我煮咖啡，豪沃德煮玉米，煮得好极了，味道说不出的美，甜滋滋的。梅卡找出了藏得很隐蔽的半加仑桃味冰淇淋，还有她自制的冰冻奶酪饼，那是一顿风味独特的早餐。豪沃德离开去议会楼后，我为自己又倒了一杯咖啡，仰靠在靠椅上。

房间里充满了阳光和玉米及黄油的甜味。男孩子们玩着加纳斯塔牌——除了这种牌，那个假期他们对什么牌戏都厌倦了。梅卡光着脚，穿着睡衣，坐在窗口的座位上，身边放着一大叠《女士家庭》和《女主人》杂志。那一刻真是少有的平静。

梅卡的眼镜好端端地架在鼻梁上。突然，她透过眼镜看着我说：

“妈，你知道玛格丽特·杜丢的婚礼服是她自己做的吗？”

“老天，梅卡，那本杂志有多老了？”

她啪地关上杂志，看看封面，说：“1971年——我出生前5个月出版的。”

“对，我记得你出生的时候，我也记得杂志上那件衣服，那是一件中东束腰长袖长袍。是白色的。当然，我记得西装上衣翻领上还有一朵玫瑰花。她是那么美丽。李威·斯考贝当时是我们下议院的议员，曾告诉我说玛格丽特跑遍了渥太华，逢人便说她是如何为自己缝制衣服的。说她将所有的缝边钩拢，将衣服的褶边折下。李威说当时没人有胆量说什么。玛格丽特当时是那么年轻漂亮。当然，据李威说当时人人都为她嫁给‘那男人’而惋惜。你知道，多年来他们一直住在渥太华，李威从来不敢说出那男人的名字来。”

“啊，妈妈，你们那些人真可怕！”

“可怕的不是我。我想他才是最可怕的。他太可怕了。至少，他可怕得怪有趣的。我想现在你已经长大了，要上大学了，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了。我第一次投票时，我就投了他的赞成票。”

梅卡用手捻了捻她的眼镜，露齿笑了。“啊，不谈这些，我原来一直指望我们党重新当政后，你能为我找一份轻松舒适的工作。但现在你不知在搞些什么秘密工作，我不知……当然啦，你确实有许多身居要职的朋友。”她说。

“对这事我现在没有把握，梅卡。根本没有把握。”一时间这充满金色阳光的早晨居然投下了阴影，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说：“把你的那些杂志扔一本过来给我，好吗？”

但她不扔，她带了一本杂志过来，并拥抱了我。“你快恢复正常了吧？”她问道。我回抱她，但却无言以对，我不信任自己的声音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此外，我也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她拿过来给我的杂志封面有一张纳太利·武德很年轻时的照片，里面刊载了约翰逊、肯尼迪的传记。封面上的日期是1964年2月。那是在事实使天堂成为残酷的回忆之前。那篇文章没带批评性质，却比较感情用事。我读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回忆：11月里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在多伦多市，我下了政治课刚从悉尼·史密斯大楼内走出来，有人告诉我肯尼迪遇刺，还有人说他们还要枪杀约翰逊。听后，我感到全身麻木——与我班上的一位男孩信步穿过了皇后公园，两人都嚎啕大哭。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潮湿的树叶上走过，地上的旧报纸轻轻地扫过我们的脚踝骨。后来我们来到了永奇大街的一家小酒店前，里面飘出一股酒味。但由于店主不仔细核查我们的身份证，我们便走了进去，在后面靠电视机的一张桌子边坐下，喝呀，喝呀，喝了个够，只是没有酩酊大醉而已。那以后，在一个周末我们又从我祖母地下室里那台黑白电视机上看到了许多影像。那部电视机的位置倒置了，所以所有的图像都是颠倒的，上半截画面在下，下半截画面在上。不过，这倒像却是教会了我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以后几天发生的事。后来，又遭受了一次损失，那时我还不到十八岁呢。

应该说那天下午我在奶奶公寓内读了肯尼迪的传记是件好事，它鼓舞了我去写安迪传记。是件好事，但却难以成事，因为决定要写安迪生与死出自一种比怀旧更刺痛人心、更复杂的需要。我做这事有危险，我明白这一点。假如我能重新处于安全之中，我得证明无论如何，生活，并非一般人的生活，是一个连贯的有始有终的过程。不知怎么的，我使自己相信，只要我理解安迪的生活，我就能写出他死的意义。我已失去了丈夫，他被送往地狱。我不能又失去安迪。这里面总得有个逻辑——原因和结果。否则将不可思议。因此，即使是我朋友下葬之前，我对他的一生还是迷惑不解。

安迪的葬礼定在 9 月 2 日星期五早上，以便让人们能摆脱事务来度过加拿大劳动节周末。“下午把人们拽出来就没意思了，”德夫说。“下个星期他们就会把哀痛一股脑儿扔到脑后，只记得安迪的葬礼毁了他们这个夏天最后一个长周末。”他说得对，理所当然我们都同意在早上举行葬礼。不过，那天早上当我奶奶公寓里的电话铃响时，我简直摸头不知脑。因为那时天还是漆黑的。我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来，一把抓过听筒，就听出是德夫在电话那一端。

“醒醒，亲爱的，该洗淋浴啦！”

我朝窗外望了望，说：“德夫，三更半夜的，外边黑糊糊的呢。”

“再看看表吧，已是早上 7 点钟了，你看见的只是一片乌云，暴风雨就要来了。”

我一边与德夫说话，一边起身，拿起听筒走到窗边。只见天空呈蜡色，瓢泼大雨真个下起来了。后院里早已积了一泓水，我难过的是，那刚刚长出来的西红柿秧苗早已被雨水淋坏了。

“德夫，天好像下崩了，我们怎么办呀？”

“唉，管它的，当决定葬礼后，叫人改期或是取消是万万不可能的。凯利向你传达了仪程没有？你知道你要去的时间和列队的位置没有？”

“这些东西都放在我要穿的那件上衣里面，别担心，我会准备好的。德夫，完事后我将请你喝一杯。”

他的声音听起来又苍老又遥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足够的烈酒能消愁解恨。去他的，乔，我倒希望他……”

他把电话咔嗒一声放下了。我站在这个宁静的房间里倾听着我的孩子们的呼吸声。我插上咖啡炉的电插头，步入洗澡间，站到了淋浴龙头下。一个半小时之后省议会的前门将对公众关闭。那以后 20 分钟，一辆豪华小轿车将来接我，带上伊芙和我到议会大厦去，与她丈夫最后道别。为什么伊芙偏偏选中我来完成这一既痛苦又是心腹的使命，倒是一个谜，不过伊芙本身就是个谜样的人物。既然她向我提出请求，我就同意了。于是我们这两个寡妇将从省议会大厦护送安迪的灵柩到小花大教堂去做葬礼弥撒，然后送至教友大厅，在那儿举行招待会。（凯利给我的仪程表已提到过了，届时将由圣·巴塞爾什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女士们设宴招待——这是做给伊芙看的。）最后将灵柩护送至吾尔夫河，由安迪的家人下葬。

我裹着浴巾出了浴室，穿上长袍，倒了一杯咖啡，然后透过雨幕，我打量着通往我们家庭院的路。从这个角度看，那个家总是显得又大又陌生。楼上我的床上放着我的外衣，“丧服。”当我给梅卡看时她微笑着说。但她称赞那衣服。那是一套奶油色丝质阿尔伏里德·宋西装，是我在卓奇士商店里“清仓减价部”买的。我还买了一个耀眼的、奶油色的意大利草编袋和一双浅口无边的皮舞鞋。真是无奇不有，这些东西都正好是同一色道，又是廉价品。赴会的前一个晚上，我试把一切都穿戴整齐，发现自己这身打扮居然是配得绝好，我真高兴。然而今天，要穿戴好，甚至离开奶奶公寓的念头却使我充满了倦意，我真想一头扎进睡袋与孩子们一道进入梦乡。我对于身负重任已经厌倦了，甚至对做个成人也厌倦了。我想从这些事中超脱出来。雨下个不停，我脚下的庭院一定满是泥泞。但，我又思忖，即使不完全是成人，

也要知晓，在大多数时间里，人是身不由己的。我把长袍拉紧，对彼得耳语，要他记得照料咱们家的狗，然后走下楼梯，步入雨中充满痛苦的世界。

当那辆从殡仪馆来的豪华轿车在我家门外停下时，我早已在等候。办事的人是个愁容满面的年轻人。穿着鲜艳的毛料西服。他见了我立刻撑开一把大黑伞，跑上台阶来接我。当我坐进车内时，身上那套阿尔伏里德·宋西装依然崭新悦目。伊芙早已在车里，叫我吃了一惊，她居然穿了套绿色西服。那西服裁剪得如此之好，使它宛若一片新叶。

她若有所思地打量了我的外衣。“或许穿白色更好些。”她说。“不过绿色引起的激情则被认为能压倒痛苦。”她佯装笑容。“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我说。后来，她不再言语，俯身向前，拍拍司机的肩膀，告诉他开车。

雨拍打着车窗，我所能见到的仅仅是微弱的丝状的路灯灯光，尽管快9点钟了，路灯依然亮着。那辆豪华小轿车在行驶中又平稳又安静，如同做忏悔时一般。

“我喜欢雨，”伊芙说，我想这话对她和对我来说都一样。“我结婚那天也下雨。你知道我婆婆说什么来着？”她改用一种东欧的口音说：“下雨好，意味着有许多孩子，给安迪生许多孩子。”“啊，上帝呀！”伊芙说着大笑起来。后来她被呛了一下，又说：“许多孩子。”

“伊芙，”我说着伸出手去拉她，但她把手缩了回去，把脸贴在车窗上。

我们的车驶入了议会前边的环形车道。我们前边是早已到来接安迪遗体的灵车。一排特别明亮的灯光将议会大厦的入口处照得通明，使灵车闪着耀眼的白光。

雨中除了那辆灰色的灵车和空空如也的台阶并没有别的人。一整个星期来，从一大早到午夜，台阶上一直挤满了来吊唁的人。人们站成的长队望不到头，一直伸延到议会大厦前的环形车道，经过那一排排万寿菊和百日草堤，一直延伸到阿尔伯特大街上，渐渐消失在灼热的暑气中。人们耐心地站在那儿。每次我去议会办公室，都从这些人流边经过。我吃惊地想知道究竟我能认出多少熟悉的面孔来。看看我能不能认出那些我曾在党的投票站或是群众集会或是野餐会上见过面的人们——那些年复一年缴纳党费，带着自制的黄色烙饼来开会或全部带上卷心菜筒来参加舞会的人。他们与党血肉相连，绝不亚于省里官员。他们捍卫党如同捍卫邻居。搞政治的人常常称他们为基本队伍。今天，这支基本队伍正在家中准备来参加葬礼。唯有我和伊芙将伴随着我们的领袖。

我凝视着那空荡荡的石台阶，感到一阵抽搐般的痛苦，如同有人用拳头猛击了我一下似的。我想起过去无论何时每次见到安迪时，他总是习惯地拉拉夹克衫，跳着走上石级，到议会去。然而现在他静静地躺在大厦内的棺木中。一切都结束了。我再也不可能见到他。想到这里，我竟然抬不起脚步来，坐在车里，让那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后的痛感冲击着我的全身。

当那位从灵堂来的人暗示地敲着我的车窗时，伊芙早已爬出车外。走上台阶的路上，从灵堂来的那人和他的同事们分散在我和伊芙周围撑着黑雨伞为我们遮雨。

我们打开门，步入温和的大厦，一切都是那么肃穆宁静。为满足伊芙对现场进行电视直播的要求，省长已准许大厦所有工作人员这天休假。没有成群结队的旅游者和他们的鞋后跟敲击大理石地板发出的咯咯声，大厦显得那么陌生，像是一家人度了个长假刚回来的屋子。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大

厦对于我真有几分家的含义。

安迪的遗体安放在圆形大厅内。由远处墙脚摆着的一盆盆金盏花和菊花拦着。花散发出泥土味和苦味。这味儿我肯定熟悉——我知道我在这潮湿的9月天回到了家里。除一位穿制服的门警在读报外，安迪孤零零地躺在这里。他的棺材是橡木的，像周围的木器一样，发出温和的金光。上半部由省旗覆盖着。旗子两边是耀眼的黄色和绿色，中央是橙黄色的盛开的草原百合花，棺材的脚底是一枝草原百合花。3年前，当伊安死的时候，我靠数他棺材后面祭坛上的教徒数目，暂时逃避现实。但现在我不知朝什么地方看才能有安全感。左边的楼梯平台通往反对党的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右边的一间就是我们选区内学校的孩子们来会见他们的领袖时，安迪和他们一道坐下来看图片的地方。他通常与他们共度美好时光；看过图片吃过点心后，他把他们领到屋外，教他们如何用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把埋在议会大厦石灰石墙壁中的化石摹拓出来。在孩子们的眼中，他是个好人。

他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完人。他不愿生气、不愿树敌，也不愿做丑人。常常是，当一个强硬的决策制定好后，我们当中就得留下一个人来强制执行，他在这方面就不够得力。这在一个人来说是严重的缺陷，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就更糟了。但死亡往往会给一个行动带来严峻的思考——至少有那么一会儿会。我坐在那儿凝视着棺材在柔和的灯光下发出单调的闪光。过了一会儿，一阵可怕的呜咽划破了沉寂。我吃惊地意识到那哭声就是我自己发出来的。

对我来说安迪有两个葬礼：一个是我与他的家属伊芙和她的儿子——凯里一道参加的。那是一次感情上很痛苦的事件。它将永远存在我的脑海里，不时会出人意外地刺痛我，闪现在我的记忆中。这次葬礼的录像带我在电视上曾看过多次。那是一次有始有终的仪式，我们所有的人都以一种冷峻的镇定担当起自己的角色。

也就是那一天，我觉得比平常大多数时候更突出地表现出感知与现实的差距——对我来说，这件事情那时在我眼里似乎与他们从前是大相径庭。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我看过的景象的再现。摄像机首先摄下的是沉闷的天空下除了停在北马路的警车，就剩下空荡荡的街道。白色的灵车在雨中闪光，还有吊唁的人的小汽车也是白色的，来到了大教堂。从殡仪馆请来的人抬着棺材走上那没有尽头的台阶。伊芙和我跟在后面。一个穿着白色衣服，另一个穿着绿色衣服。只有两位妇女。很不合适的是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却铺着地毯。它们都吸饱了雨水。那些荣誉抬棺人在室内不受风吹雨淋，而执行抬棺的人却要抬起沉重的棺材去爬那些滑溜溜满是雨水、没完没了的台阶。我可以听见他们喘着粗气的对话。

“哎，我差点要摔倒了。”

“当心那个。”

“你找到他没有？”

后来，我得知，他们并不是殡仪馆的，而是市里的警察。伊芙和我紧跟在他们身后。我们走动时鞋底下的雨水发出吱吱的声音，摄像机无法表现出这一幕。

当厅厅的门打开时，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风把我们卷了进去。罗玛·波尔丘克早已在那儿，当然是全身穿着黑色的丧服，和她呆在一块的是一位更年长些的男人。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她的一位远房兄弟。她和她的女婿一

言不发。棺材就放在棺材架上。我们就站在它后边等着。这些未摄入镜头，而摄影师选择了牧师和其他宗教人员到走廊中央来迎接我们的镜头。我认出了尤里西斯·米棋·泰利神父和他的朋友们。我很高兴他居然是主持仪式的人。多年来他从未投过我们的赞成票，但安迪喜欢他，我也喜欢他。在棺材对面，米棋·泰利朝我微笑。仪式开始，他口中念念有词：“愿我主上帝的恩宠和平静降临，愿耶稣基督伴随着您。”

灵柩被洒上了圣水。米棋·泰利的声音很美，似演员发出的那种轻松自如的声音。“我祈祷安迪的沐浴过圣水的遗体永远牢记这次洗礼。”他又说。在电视上伊芙显得高雅矜持：翘起下巴，灰色的头发在脑后盘起在纱巾下，腰挺得直直的，戴着手套的双手优雅地搁在身旁。总之，这位遗孀的每一英寸镜头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优雅的。但在特写镜头中，我注意到她那运动员般的肌肉微微地有些紧张。当柩衣覆盖在棺材上时，伊芙开始颤抖。

“还我意识，还我力量。”她喘着气祈祷。

最后米棋·泰利转过身去，我和伊芙便跟着他和棺材走到教堂中间的走廊去。我们走着，我还听到身后发出模模糊糊的沙沙声。原来是马克·伊文森推着凯里在我们身后走。这至少叫我吃了一惊。走到走廊一半路的地方，凯里哭了起来。我一转身，看见马克停下脚步拥抱他，安慰他。唯有伊芙大踏步，高昂着头迈向前。

复活弥撒在缓缓地进行着——忏悔，祈祷。伊芙在我身旁用结实的手指咚咚有声地敲击着祈祷用的《圣经》。她双腿交叉，穿着黑色轻便舞鞋靠在跪垫上，摇晃着一只脚的大脚趾，发出轻微的得得声。不时地，她还深深地吸一口气，发出听得见的唏嘘声。在我们身后，凯里唠叨着，马克·伊文森对他小声耳语安慰他。

仪式中从《圣经》中选出了三篇来念。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诵读者。德夫突然显得苍老了。他严肃地诵读了《旧约全书》中的《约耳书》（即“你的老人们将梦他们所梦，你的年轻人将会见他们想见的东西”）。一个罗马天主教学院来的学生读经人用沙哑的声音诵读了《圣经》中的《使徒书》。米棋·泰利神父念得感人而动听，他诵的是《新约全书》之《福音书》中的一段：“任何活着的人和信仰我的人从不会死。”当豪沃德走到诵经台上去分发对安迪的颂词时，他一鞠躬，站立了相当长的时间，仿佛心脏停止了跳动似的，末了，他抬起头，注视着全体教民。在半明半暗的教堂中，他那张长着深邃的双眼的呆钝的鹰脸看起来差不多像是东方人的样子。后来在灯光下他拥抱了我。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昂贵的科隆香水味和苏格兰威士忌酒味。近看他眼睛潮湿而带红色，是由于啜泣抑或是饮酒的结果，抑或是二者兼有，不得而知。不过在电视上，这些都无法看出来。当他发言时他的声音是那么深沉而充满自信——那是一位男子汉惯常让人听见的声音，也是一个男子汉的值得聆听的声音。

豪沃德对安迪的记忆是温馨和亲切的——有过在法律学校师生共处的旧事；有过零下40度时风雨同舟的大竞选轶闻；有过乘小型私人飞机穿越风暴去赴仅有六人参加的高级领导成员会议的共同经历。他向人们叙述着这逝去的一幕幕。

在豪沃德的故事里，安迪是活生生的，使人们听后似乎忘了他们现在在哪儿，一时间大教堂竟充满了欢声笑语。他讲完之后，站在他位置上发言的是位来自斯威特格拉斯保留地安迪选区内的一位老头。他头戴棒球帽，身穿

格子衬衣和工作裤，看起来像吉米·丢伦特。他脱下眼镜，干咳了几声，闭上双眼，用北美印第安克里语唱起了一首赞歌。他的声音清纯有力——竟然是一副男青年的嗓子。这时伊芙似乎才第一次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她的身子从条凳上向前倾，在那老头唱完走回自己位置时，她转过身来，纯粹是好奇地注视着他。

那人走了。伊芙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前面，我几乎可以觉察出她被摧垮了。当然，电视上丝毫也没表现这些。她的仪态凛然。当她转过身去拥抱儿子，给他平静的一吻时，她似乎显得自信和专注。不过她却两者皆不是。当有人将面包和葡萄酒送到她面前时，伊芙已陷入昏睡状态。

当祭坛和灵柩被用香来熏过后，伊芙偷偷地笑了。她没有出席圣餐会。米棋·泰利做完圣餐后的祈祷时，他念念有词地说：“啊，万能的上帝呀，愿这祭祀能纯洁你的仆人安迪的灵魂。”伊芙敲着手指，用脚轻踏地面。当泰利神父说出“赦免他的罪过，安迪将被赦免而永远安息”时，伊芙俯身向前，头几乎碰到了她那双戴着手套的、紧紧抓住我们前面的木栏杆的手。当我也俯身向前时，我可以听见她一个劲地重复她的祈祷词：“给我知觉，还我力量。给我知觉，还我力量。”

最后，仪式结束了。我们这一小群来吊唁的人尾随着安迪的灵柩，沿着小花大教堂的中心的过道，步入了门厅。我们默默地念着：“愿天使带领你进入天堂。”我们这帮人在电视中的活动结束了。摄影机从我们身边移开，聚到了教堂中那些人的脸部。

不过，摄像机却错过了那最精彩的一幕。起初一切顺利进行。抬棺材的人配合得很好，将灵柩抬至门边等候着。罗玛·波尔丘克和她的堂兄守候在灵柩旁。马克·伊文森手握凯里的轮椅站在罗玛旁边，面带基督徒甜美的微笑。他在等候着主的主宰。伊芙和我站在右边稍远处的一堆小册子旁。这些小册子来自色瑞纳和耐什·哥伦布两地。在等候中，我想到了我们该感谢泰利神父。我回过头去，却不见伊芙。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她随着灵柩过去了。她的儿子及婆婆，也不声不响地走出了门外。马克和我紧跟着她走出门来，只见伊芙正朝大街走去。外面的大雨已转为雾蒙蒙的丝丝小雨——那是一种绵绵的细雨。我们看见伊芙已经脱了鞋站在大教堂外石阶的中间。我想，10分钟前，她的头发已改变成一种优美的法国马尾辫，脸上刻画出悲痛，成了一个优雅受苦受难的样板。

但“样板”保持不了多久。她摘下了束发的纱巾，原来那个优美的马尾散乱了。她想把纱巾装进她的钱包，但钱包关不上，纱巾中的丝带从钱包上露了出来。她伸开双臂，每只手的中指上勾着一只时髦的皮舞鞋，脚上穿着长统袜站在那儿，对马克大叫着什么。

“马克，对不起，我不能……请把凯里带到吾尔夫河来，我会在公墓那儿迎接你们。”她叫道。然后她扭头跑下台阶，沿十三大街跑去。我赶紧环视一下看看是否有新闻界人士在场窥见她的狼狈样。仅此一次，我们算走运，他们还在屋里收拾东西，作摘记，统计到会人数什么的。不过马克和我并不孤单。

大教堂有十三道门通往楼梯平台，楼梯平台很宽敞——我估计横向距离约有50英尺。马克和我是从西门走出来的。我们当时正站在最上面的一级台阶的西边栏杆的地方，这时有一位妇女从东门走出来。

我记得那天在野餐会上她穿着玉米花色的女装。她今天没穿蓝色的衣

服，或许沉浸在哀思中。从头到脚穿着昂贵的黑色丧服。我没认错人。她那沉静标致的侧面像和红褐色的头发我肯定见过。她就是那天我们抬安迪的担架时和我们走在一块儿的人。就是那个力图去安慰罗玛而被罗玛啐了一口唾沫，然后跑开了的老妇人。她站在绵绵的雾状的雨中，环顾四周而不知所措。一位男子保护性地将手臂搂住她的肩膀，然后他们一道走下台阶，消失在街角处。马克站在我身旁，像孩子般好奇地注视着眼前这一幕。

“那位女士不知是谁？”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那天野餐会上安迪——波尔丘克先生死的时候她也在场。后来所有报章都刊登了她的照片，可我还不知道她究竟是谁。不过我倒是认识那位男人。他是德夫。你父母从政后结识了他。他是波尔丘克先生的挚友之一。”

正当我和马克站在那儿注视着德夫和那位神秘的女士消失在停车场中之时，摄制组人员及报界人士都从教堂出来了。我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向我挥手致意，微笑或是致歉。他们是够好的一群人了。不过，他们毕竟年轻，安迪的葬礼，对他们不过是今天发生的许多不幸中的一次。是到会议中心去采访从各地来的代表的时候了，或是去教师俱乐部收集一篇特写的素材，看看老师们对星期二开学反应如何的时候了。报界人士以为这场戏已经演完了，但他们错了。第二幕好戏快要开场了。

由于被用作向四周扩展的内城教区的大教堂，小花教堂的大厅比大多数教堂的要大一些。除此之外，它看起来与别的所有教堂大厅没有什么差别，有一个如同体育馆那么大的房间，房里与别的地方也差不多暖和，排列着许多椅子和笨重的、脚快要垮下来的桌子。那是一种易于安放、用来设宴或聚餐的桌子。大厅的一头是一个舞台，是供大厅用作开放式正餐用式样的。有一个衣帽间，衣帽间不远就是盥洗室。据说大厅过去是用来举行小型婚礼舞会和教民 50 周年金婚纪念或是类似活动的地方。唯有我不相信曾有过这类活动在此举行。

用她们的话来说，圣·贝什尔斯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女士们“参与了”小花教堂的女士们为安迪葬礼那天准备的午餐。他们原先准备的五百个人享用的流水席，可后来居然来了三倍那么多人，而且人们一旦来了，就没有离开。他们在那儿呆着、呆着、老呆着。做饭的女士们可尽了最大努力。她们端着装满白菜卷或是别的什么菜或是火鸡或是在厨房里已经切好的火腿的黑色搪瓷煎锅，在人群里穿梭般的上菜。还送上一个个有柄砂锅盛着的切成扇贝状的西红柿、辣椒、意大利通心面条和奶酪。但只要女士们将食物一献上，就被马上吃个精光。最后，我注意到一些铁容器内装满了准是刚炸好的鸡肉。

我正排在队伍的尾部等着要一杯茶喝。恰巧豪沃德就站在我身后。

“我要给自己放两小时的假去喝一杯。”他说。

我靠近他，悄悄地说：“我要给你放两个小时的假去喝上一杯。”

“乔，你嘴巴真厉害。”他说着笑了。

“唉，这样给你打打气嘛。”我说，“瞧，馅饼大王来了。”我指着角落里坐着的男人说。那人身穿红色开领衬衫，一条过于宽大的裤子用吊带牵引着。他已经毫不客气地吃掉了堆得高高的一盘馅饼。“女士们对他此举已有微词，她们说他不到半小时就吃掉了三个完整的馅饼。现在他一定是吃第四个了。”

豪沃德转身去看那个人，并问：“我怎么对女士们说呢？”

“我告诉她们，她们做的馅饼一定比圣·琼斯的娜威馅饼更好吃，因为这个馅饼大王在那里一次只吃了两个馅饼，况且第二个还剩下相当多呢。”

“你的回答很策略。你肯定你不会去坐伊安的席位吗？”

“肯定。你知道，豪沃德，他在这儿我有点高兴。我是指馅饼大王。凡有关安迪的活动他都参加，你认为他会投我们的票吗？”

“当然会。所有稍微倾向我们的人都会投我们的票。当我们执政时，他们都来向我们要工作要公道。说到公道，刚才你可曾注意到所有穿灰色防风外衣做出不想让别人注意的那帮家伙没有？我的上帝呀！这儿到处是警察，我刚走过来时与他们的头儿谈过了。举行葬礼时他们将每条长凳上安插了两个警察坐下。在唱诗班的楼厢里还有警察在拍照。这正是修道院来的修女们在唱圣歌的低声部时，发出怨声的原因。而且外面还有一辆未做标记的警车在拍摄那些来的人和……”

他没讲完这句话。一位在上次大选中丧失了席位的省里官员走上前来向他问候。豪沃德将他送至甜品桌边，并告诉他他要过两分钟才能与他谈话。然后他又转过身来朝着我。

“乔，我希望我能找出宁静的 1 分钟来告诉你这件事。但我没那么幸运，

我今晚要出发去多伦多几天。有事情要处理。星期三以前我是不会回来的——而且是乘末班飞机回来。”

“这样的话，我就一定会想念您啦。为什么不让我星期三夜里驾车到机场接你回来吃晚饭呢？我会做一锅鱼或蛤加洋葱猪肉杂烩等你。我们可以开它一瓶瑞士林酒享用，还来得及听听新闻呢。只是那天晚上我们不能耽搁得太晚。我打算星期四带梅卡到萨斯克顿去，把她安顿好在学校。”豪沃德转身走开了1分钟去问候一位穿着豪华的男人。在这个破旧的教堂大厅里，他显得格格不入。我的私人牙医豪沃德向我介绍说，“这人是够好的，只是有点华而不实，瞧他这一套西服，我敢打赌要花他五百美元。对于下周我有个设想，反正我将来某个时候也得去萨斯克顿做政治工作，我又有了一辆货车，为什么不让我驾车送你和梅卡去呢？我们可以把她先安顿好，然后我们俩到什么地方吃牛排去。我来请客，然后你便可以把我带到河边，让我在月光下伴你一程。”

“你的设想听起来很好。”我说，“特别是在月光下漫步以前那部分安排。”

他露齿一笑，不自然地拥抱了我，就走开去找那位前省里官员了。

当有人走过来摸摸我的手肘时我仍没收敛笑容。我转身一看，只见梭伦·伊默斯站在我面前。他全身穿着黑色的丧服。但穿着圆翻领的上衣和裁剪得十分优美的宽松运动裤。不过他这身打扮看起来更像演员而不像来吊丧的。我以前从来未注意到他竟然是个美男子。但正如每个人的祖母说的那样：“中看不如中用。”那一刻，潇洒的打扮并未给他添加多少风采，因为他一副病容。

“克尔本太太，我需要你的帮助。”伊默斯说，“马克·伊文森和我刚才在衣帽间正要帮凯里穿外衣，这时马克的母亲进来了。她要马克他们一道回家。她说让这里的每个人都看见他们是一家人，这是很重要的。请原谅，但我想她考虑更多的恐怕是出于政治上的因素，而并非个人因素。”我可以看清楚他喉咙上的青筋在搏动。他吸了一口气又往下说：“反正，不管她的理由是什么，马克不想跟她一道回家去。当然，她是不会听马克的。我无法去说服她，她对我很反感。我一见到你，心想她可能听你的，因为你是——”

“一个女人是不是？”我问他。

“不对，”他说，“我认为她可能会听你的是因为如今安迪已故，克里格·伊文森又会角逐领袖，你对他的好印象分量会很重的。”

“对于一个不涉足政治的人，伊默斯先生，你知道的已经很多了。”

“我有个好老师。”他轻声说。

他的表情，看起来像我感觉那么凄惨。

“好。”我说，“我去试试看。”

朱丽背对着门，所以我走进衣帽间时她并未看见。她对儿子是那么严厉，我认为要真是那样，恐怕还会适得其反。她总是显得纯洁无瑕、毋庸置疑。她穿着一身自己缝制的女装，那是一件黑底有淡绿色叶子和白玫瑰花图案的长裙。当她一个劲劝儿子时，她衣服上的玫瑰花仿佛处在暴风雨中似的抖动，但她那一头淡金色的头发却总是完美成型——总是这样的。

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却很有力。她不想让别人看见这一幕。“马克，请让我再试做一次，慢慢来。有人要进屋来找饮料喝，我们如果在那边招呼人们的话，这对爸爸会有帮助。只用几小时，但若你去了就举足轻重。像这

样的场合，我们全家人不在一起，别人会有闲话的。”

马克默默地听着，他的手搁在凯里的轮椅上。他看上去很为难，仿佛心中正在盘算去的可能性似的。

最后他说：“我倒是想帮助父亲，但我有我的工作，我得保证凯里的一切好，我对他负有责任。”

当她最生气的时候，也就是她最逗人爱的时候。朱丽·伊文森有个小小的戏法，那就是大笑一场。我永远不能肯定她的笑声是旨在使她的话不至于刺伤人，或是暗示了她对人的轻蔑。在她嘲笑她儿子的那一刻，毋庸置疑，她是用笑来表明她对他和他生命的轻蔑。那笑声是难听的。

“马克，你没有工作，你只不过是孩子的一个保姆。”朱丽很快地扫了凯里一眼说，“你是这个白痴的保姆，你今天走过教堂中央过道时毫无生气，你知道我觉得有多丢人吗？我们认识的所有的人都在那儿，难道你不想就此事对我补偿一下吗？真见鬼，我们是你的家长，你欠下我们什么，难道不是吗？”

马克默默无言地听着，然后说：“不，夫人，我很抱歉，就连我自己也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我有我的责任。很对不起，我叫你失望了。”说完他弯下腰轻轻地帮凯里拉上雨衣拉链。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马克？”我问，就连我自己听起来也觉得我的声音很不自然。

朱丽将轮椅转过去看着我。然后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走进大厅去了。我知道，在朱丽·伊文森的仇人名单上又添了我一个。

但当我看着朱丽的儿子静静地满怀希望地站在那儿时，我知道没有时间来担忧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递过一个笑脸，机灵地说：“那么，马克，你需要帮助吗？”

再度绽开的笑脸使他的脸上生辉。“不用，我们这不是很好吗？谢谢你了，克尔本太太。”他想了一会儿又说：“不过，实际上，你只能帮我们做一件事。”他俯身向前悄声地透露：“你能帮我们找到梭伦，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找到了梭伦。在后来看来值得回顾的那些短暂的片刻中的一刻，我看到了瑞克·什班什。

他正背对舞台站着和一位老妇人谈话。那老太太红色的头发剪得很难看，紫红色的唇膏像一道斑纹似的从她脸上穿过。她叫海达·麦考特，是安迪高中时的英语老师。安迪在野餐会上曾介绍过我和她认识。在赞扬安迪的那部分节目中，她曾作过简短的讲话。她讲的不是通常“我知道他的伟大值得纪念”之类的俗套，她向听众阐明了安迪作为一个学生的长处和弱点。她的讲话很精辟而有水平，博得我们的欢心。

我走过去加入他们的谈话：“麦考特小姐，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不过——”

她打断我的话说：“我的记忆力好极了，克尔本太太。因为我现在正在向什班什先生解释，我在过去什么时候与他见过面，他坚持说我弄错了。”

“你知道，麦考特小姐，传媒人员经常在我们的起居室内活动，他们的确看起来像熟人。”从她的表情，我知道我谈话失策，但我错上加错又说：“有好几次，我上前去见我肯定认识的某个人，后来我弄清楚了她只不过是我在电视上见过的某个人。”

海达·麦考特棕色的眼睛因为气愤而明亮起来。她说：“克尔本太太，如果你的思路混乱了的话，我同情你。我的思路可没乱。以后得当心点别诱过于人。如果我能找到更意气相投的同伴，我希望你和什班什先生原谅我告辞了。”说完，她穿着很高的高跟鞋，一溜烟走掉了，剩下我和瑞克·什班什面面相觑地呆在那儿。

令我吃惊的是他那天是多么引人注目。毋庸置疑，他长得很高大。就连那件裁剪合身的米色亚麻西服也隐瞒不住这一点。我从难得的经历中得知，电视对那些相貌不端的人们是从来不发善心的。但摄像机对瑞克·什班什可真是不公道。在电视上他的面孔看起来像小天使，且又温和。可是看他本人时，他的面孔既不那么稚气又更有趣。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他有四十三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他深色的金发梳理得带有男孩子的风格——把头发自然平整地梳在一边，是那种母亲们和爱威·里格学校的人爱梳的发式。他戴上一副圆的淡玳瑁色的眼镜，他的双眼在晶体后面是淡褐色的，充满了智慧。

我认识的男人们多为政治家或教授——这两种人都以不修边幅而臭名昭著——可是，我确实认为瑞克·什班什穿戴文雅得体。他身高约6英尺2英寸，体重至少有300磅。但他的衣服很合身，他风度翩翩，看见他使人开心；听他说话也叫人开心。他像那些喜欢调侃的人那样说话。甚至那天在小花大教堂的大厅里海达·麦考特的不友好的谈话还在耳边回响时，瑞克·什班什的讲话还是那么有魅力，仿佛他在他所说的话中加了味似的。

这是你在5天之内第二次救了我的命。你是我的恩人，克尔本太太。她真是一位难对付的人。

“以前安迪也总是这么说的，她是他高中时的英语老师，我认为甚至在他成为省领导人后，她对他仍有威慑力。”

“不会是因为那些甜蜜的旧事之一吧？那次这位老小姐在莎士比亚生日那天曾邀请他们全班同学去她家开了个茶话会。”

“安迪一向对她评价很高。据说他高中时有些过失是她给帮忙过了关的……对不起，什班什先生，我不该向你唠叨个没完。你身体好吗？你看来不错——手臂上没伤痕，前额上的伤看起来不怎么叫人难受了。”

“我好了。克尔本太太——乔妮——我不善于夸奖别人，所以我只是再说一次，我深谢你救了我的命。”说完，他伸出一只被太阳晒黑了的、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抚摸我的手面，然后把手缩回去，又笑着说：“现在还是让我们来听听有关海达·麦考特的闲话吧。”

“我真的什么也没听说。我只是但愿刚才说的话不会伤害她。”

“你感到内疚了？”

“有一点。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有些东西叫她不高兴了。我斟酌过要写安迪传记的事，我认为一开始就疏远海达·麦考特不是最高明的做法。我想她知道很多安迪的情况。”

瑞克扬起一边眉毛说：“你是说要写传记？”他向我靠近并从我的短上衣上掐起了什么，“是棉绒。”他说，并将它小心地放到桌子尽头一个烟灰缸里。他转过身来朝着我。但我看不出他脸上的表情。“写一部传记。”他重复道，“这主意不错。你肯定能将最后一章写得扣人心弦。如果你记忆力好的话，还可以写出一些其他的扣人心弦的章节来。早先曾经有过一幕悲剧，是不是？”

“你把我吓坏了，什班什先生。”

“我做我的老一套工作，克尔本太太。现在我问你那次事故……”他期待地望着我。

“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大约10年前，一次，伊芙驾车外出，他们全家都在车内——安迪和伊芙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女儿当场死去。凯里头部受了重伤，他将永远不可能像正常的人一样生活。安迪被摔出来时头脑还清醒。伊芙受了伤，但后来治好了。嗯，不过，我猜想一位母亲是永远不可能从那样可怕的事故中恢复过来的，不知怎么的，她竟活下来了……”

站在那个炎热的充满火鸡、咖啡、香烟和人气味的房间当中，我突然记起在一个美好的春日我坐在厨房里，打开报纸就看到了那些照片，被烧黑了的汽车金属部件，伊芙的双眼昏暗得像只动物被汽车头的灯光照得睁不开眼似的。安迪站在路边挨着两副担架。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照片的背景是要命的贝里·帕莱茵立体交叉道急弯处。

“那就是事故发生地……”我已经大声地说了出来。瑞克·什班什正好好奇地望着我。“对不起。”我说，“一个疑团的两个片断正好让我给搭上了。”

“我很高兴。”他说，“这就是说，如果你想让他们吻合的话。”

“我不知道我是否这样想过。但我想最好是了解事实真相。”我不由地想起：当那辆别克牌汽车驶上贝里·帕莱茵立体交叉处时，伊芙的双眼由于痛苦而变得迟钝。“我一直力图使自己相信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奇迹。”想到这里，在那个闷热的房间里，我突然感到不寒而栗。

“你好吗？乔妮？”瑞克·什班什把脸凑近我的脸关切地问。

“我很好，只是……我想换个话题。你打算在城里呆多久？”

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一直要呆到星期天晚上。因为是假日的周末，我一直未能买得到飞机票。接电话的年轻女人答应我说他们总是留了几个座位给那些有特殊原因要飞离的人，显然，我目前极端烦闷，一点儿也未能打动她的同情心。”他愁容满面的样子，立即使我联想起我女儿说的“木乃伊样”。

“既然如此，明晚你为什么不来和我们聚一餐呢？我已经答应为孩子们搞一次烧烤。要知道，我可是个讲究的厨师呢。”

他听后面露喜色道：“好，我接受你的邀请。不过，你答应明天请我吃饭就会花上三倍于救我的命的时间，所以倒不如我来为你做顿饭。我也是个讲究的厨师，乔妮。”说着他将一只手指举起，示意不准我反对，“你将为我帮个忙。真的，这样我也会有点事干。”

“我答应了。”我说，“你请客，我们现在就约定了。你若准备好了要去采购的话，先给我来个电话。乔·克尔本，东湖路。我去接你，带你到皮格利·威格利去。”

“哪个皮格利·威格利？”他眉毛一扬，问道。

“皮格利·威格利，”我说，“不在渥太华。”

他瞪了我一眼，露齿笑了：“你知道，猛然间，我倒也不在乎它不在渥太华了，我只盼着明天的晚宴呢，乔妮。”

“对，”我说，“我也盼着。”我说的可是心里话。

安迪的葬礼结束后，我回到家，就看到梅卡的一张纸条，说她已经带两个弟弟去理了发。我给自己烧了一壶茶，做了一盘土司，并将一砂锅为孩子们准备好的菜放到炉内，便走上楼到我的卧室。我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但我根本未听，6点钟我就睡熟了。

开始我睡得很舒坦，做了一些在我潜意识的陌生世界里自成逻辑的梦。我只记得它们中的个别片断。我梦见我正在举行婚礼，并且正在与安迪跳舞。我嗅出他呼出的杏仁膏的味儿，又梦见我告诫他别吃结婚喜饼了，我知道他身处危险之中，但他不听我的劝告。接着又梦见了瑞克·什班什和我呆在我家厨房里。他正在做杏仁糖霜鸽子。鸽子嘴上还缠着一缕缕的棉花糖。后来又梦见安迪也在那儿，其余的就记不起来了。最后，我睡得又甜又香，再也未做梦了。

一觉醒来，卧室内已见晨曦。收音机上的数字钟指着6点。我足足睡了12小时。

我下楼将狗放出来，煮了一壶咖啡，打开了收音机。听见来自公园那边那座玻璃广播大厦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内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又一个晴朗的加拿大劳动节后的周末，阳光灿烂、暖和，微风拂面——真个是去放帆、踢足球、烧烤的好时光。

我淋浴完毕，穿上一件T恤衫和全棉便裤，一头扎进彼得的房间，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一道去湖边遛遛狗。

在我的三个孩子当中，彼得是和我最能安然相处的。梅卡则脑子灵，名堂多。当你和她在一块时，不管你喜不喜欢，你肯定会卷入她那丰富的感情旋涡中去。安格什则是个凡事爱提问的孩子。他富于幻想，固执但同时又富于创造力。他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刚从教堂做星期五祈祷回来，他把一根扫帚柄折断成两根捆在一起当做枪。近黄昏时，我走进卧室，看见他站在那面全身镜子前，脑袋耷拉在一边，两只手紧抓住他胸前的十字架，见了我在镜子中的像就对我说：“这就是它该是的样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彼得点子不多，也不固执己见，为人不卑不亢。他不是去运动，就是照管动物，要么就是关心家里人。反正这三者常常被他变换着次序。那天早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能与她安静地呆上1小时更需要的了。

他下来后，我们套上狗，便朝湖边走去。那天，人们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正处在一种假日的悠闲气氛当中——车辆稀少，只见几个慢跑的人过去，处处静悄悄的。一阵微风从西南面吹来，这是好久以来破天荒一次，船坞那边的风向袋显示了生气。湖水在阳光下泛起涟漪，彼得和我沿堤岸漫步时，可以听见湖水轻轻拍打着岩石的声音。仰望长空，只见数十只天鹅正尝试着排成一个小V字队形，看到这些，我儿子和我转过身来面对面不约而同地说：“秋天来临了。”

当我们转向我们家门前的小径时，我感到身心爽快，足以开始新的一天工作了。像每周星期六惯常的那样，我们做了煎饼。然后我们一如既往去湖岸俱乐部。多年来，两个男孩可以想象进行过每一种喧闹的运动，而梅卡则已经从容易做的运动到能进行难度大的运动了。不过，唯有我的日常安排不变。每逢星期六早上，我就穿上我那件从来就不时髦的游泳衣，戴上游泳护膝去游泳。然后我洗个淋浴，穿好衣服，带孩子们上麦当劳去吃午餐，这才

是生活中的一大快事。

事实证明瑞克·什班什是一个有造诣的、考虑周到的、不说空话的厨师。他给我们做的饭即使不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也肯定是前十名。

他正好两点钟给我打电话，并要我在皮格利·威格利商场的鱼柜台那儿和他会面。10分钟后我到了那儿。一眼就看见他已经在那儿了。他那引人注目的个子穿着编织得很粗糙的棉布裤子和深肉桂色的圆领衫。他身旁有一位孕妇满腹狐疑地注视着一块厚鱼。她身穿一件印花女装绷得紧紧的，勉强遮住了她那微微突起的小而圆的腹部。这时一个穿着黄色四轮滑行鞋的男少年到柜台前买了一塑料带壳的牡蛎，就溜向商店前面去。瑞克·什班什对那两个人不屑一顾。他完全被他所指着的密封在玻璃柜台中的东西吸引住了。

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人面露愠色的女青年，她手戴着外科手套，拿着一条大鱼。

当我用手摸他的手臂时，他根本没有回头。

“好，你来了。”他说，“你觉得这条小狗鱼怎么样？这位小姐告诉我这些鱼是昨晚才捕到的，今早上才从北方空运来。”

“从鱼睁得很大的眼睛看，应该说她说的是真话。我想或许在4小时之前这些小狗鱼还游在拉克·拉·荣海湾营造它们新的秋天的洞穴呢。”

“你说什么？”他感到迷惑不解。

“我认为这鱼看来不错，瑞克。”

“啊，那太好了。”他仍然心不在焉，“我也这么想。现在我问你，你的孩子喜欢小狗鱼吗？”

“我想没有谁的孩子会喜欢小狗鱼。”

他趁此机会又提议：“我们给他们买牛排，孩子们会喜欢牛排的。”他在一个袖珍笔记本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对柜台后手里还拿着鱼的女人说：“我们就买那一条和左边数起的第三条。”

当那女人包鱼的时候，瑞克把笔记本递给我：“看看你有没有想要加上去的东西？”他问道。他列出的可是一个可观的购物单。有鸡肝、奶油、黄油、肉豆蔻、水田芹、小狗鱼、牛里脊肉、新鲜土豆、鲜时萝叶香佐料、胡桃油、乌饭树的紫黑浆果等。在单子的底下还用小字写道：“乔，有没有花园？”

“你怎么能使你的购物单应有尽有呢？”我问，并把笔记本递还给他。我告诉他：“对，我有个花园。”

打我走进那家商店以来，他直抬头看着我。他又说：“我希望你会喜欢我，乔妮。”

他说这话出自内心，倒叫我吃了一惊。我说：“当然，我肯定会……”说完我们俩尴尬地站在那里，直到瑞克灵机一动我们才摆脱困境。

“好，这就好办了，现在让我们把皮格利·威格利抛到九霄云外，到你家动手做饭吧。”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默契。当我们从汽车后部行李箱中取出一袋袋的杂货时，我顺便问他：“你喜欢孩子吗？”

他转过身来，瞪了我一眼，问：“说真心话？”

“对，要说真心话。”

“我讨厌他们。他们把我吓坏了。”

“我的孩子不会的。”

“嗯，”他说，叹了一口气，一边把两袋杂货上头的法式面包小心地平衡好。又说：“我倒宁愿被说服。”

我猜测我和他谈得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俩有两个共同的爱好：美食和政治。

瑞克买了一条围裙，那是一条宽大的红白条相间的——屠夫用的那种围裙。在他开始烹饪之前，他煞有介事地将它取下来。我们嘲笑他时，他就拿出一条复制品——但要小一些——给我。

“乔，你说过你是个讲究的厨师，所以我想也许我们能一道来做菜。”他帮我扎好围裙，然后仔细地打量起我来。他说：“我都不敢想象为什么这些原料竟然都是便宜买来的。现在让我们来喝一杯冷饮，就此开始吧！”

“冰箱里还有一些卡它·波兰卡牌白酒。”

“你想得真周到。”他说，“我真个是高兴得不得了。”

我和他在厨房里大显身手。瑞克总是把他心中构思的菜一一做出来。而我和他不用商讨就各自担当起几件事来。

另有一件怪事值得我注意。那就是，当我们站在那儿，那碗鸡肝放在我和他之间时，我注意到当时瑞克给我的那个肉末饼配方竟会是我自己的配方。不过我的配方对细节

讲得也很清楚，这是他的配方所没有的。那是我身怀梅卡时，患有贫血病，自己摸索得出来的。我们的医生当时给我开的处方总是：肝脏、肝脏、更多的肝脏。那时肉末饼就是我能想出来换换口味的办法之一。我可以闭上眼睛回想当时我站在B大街我们家那阴暗的厨房里，试验过在肉饼中加入不同的草药和香佐料，最后终于给我找到了麝香草和牙买加胡椒。我甚至还能记起，当我用伊安最后喝剩下的圣诞节柯纳克白兰地酒来调湿我的肉末饼时，他的表情还历历在目。那酒真是种绝妙的添加剂。可是，那时我们一年一度见到白兰地。所以后来我就改用了奶油和熔黄油作为我的肉饼的添加剂了，不过用这两样东西又会摄入那可恶的胆固醇。但这也成了我沿用至今做肉末饼的配方。如今，我面前这个男人几乎是陌生人，想不到居然会有我制作肉末饼的配方，况且这配方一直与我的雷同至最后用干胡椒这一步。

我用汤匙将肉末饼从搅拌碗中盛到一个小碟子中。我对瑞克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制作的拿手菜，想不到你也会做，这就使我这道菜大为失色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能一块来做它，我总是高兴的——这也是安迪喜欢吃的菜之一。”

他撕下面包的一角，涂上肉末，递给我。“这是给安迪·波尔丘克的。”他笑着说。

“你也来一块。”我说着撕下了另一角面包，涂上肉末，递给他。“安迪请，安迪请。”说着我们俩一本正经地将面包吃了。

作为不喜欢孩子的人，瑞克对我的孩子们可算是体贴而慷慨的。我们做饭时他给彼得钱去买一袋冰块和一箱饮料，买回来后他又将冰块放入架上一个旧洗涤槽中，以便使饮料在用晚餐时能保冷。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天晚饭前，安格什告诉我们，我们最多还有一个小时来吃饭就要去看棒球了，因为他上场的时间改了。这时瑞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说：“真的，乔妮，来得及，现在已经是万事俱备，只需要把煤准备好，我们五个人便可以饱餐一顿，然后高高兴兴地去棒球场休息室坐上一个小时了。”

“我想安格什的教练不至于对我们坐在休息室观战而大发雷霆。到那儿后我还可以教你一些棒球术语。你肯定不会介意我这样做吧？现在我们还可以先让孩子们吃饱，等他们走后我们再慢慢吃，你知道吗？”

“这样就会错过一段你儿子精彩的表演了。你乐意吗？当然不。让我们再来一杯勃艮弟葡萄酒再上牛排。回来后我们再用甜点心。我想渥太华的人听说我去观看了小个子联队的球赛，一定会有所反应。”他快活地说，“你知道2号周末的棒球赛可是非同寻常呢。”

于是我们坐到了棒球场露天看台中。一边喝着差劲的咖啡，一边听着球员们的母亲坐在我们周围，为她们的儿子重复着那些枯燥的话：“上，勃纳登！嗡嗡响像只蜜蜂……你去追他呀！……哼、孩子，哼……把球带进来，勃纳登，带进来！”

太阳从地平线上落下，天空被晚霞涂上了一束束粉红、桃红和紫红的光。我想起了安迪，若是他在的话，他会是多么喜欢这样的傍晚啊！他一定会走下球场，自告奋勇地做三垒的教练，为孩子们呐喊助威。想到这里，我能觉察我胸中怒火中烧，他本应在那儿，真见鬼，他不应该死。想到这里，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瑞克一言不发，只是伸手到前胸的口袋中抽出一条新手绢递给我。我抹干眼泪，擤去鼻涕。

“对不起。”我说。

“别难过，乔妮。用不着掩饰你的感情。这个星期真是倒霉透了。来，快看，这回安格什戴上头盔了，一定轮到他发球了……”

那晚的球赛在我们的沉默中得胜。最后一次轮到我儿子发球时，球发出场外，尽管如此海鸥队仍然以零比十三败北。这有点像我们在民意测验中占上风，却在大选中失利那样。我们借着月光吃着紫黑浆果馅饼。那夜瑞克和我坐在阳台上，沏了壶茶，慢慢地呷着，时光如流水般逝去。孩子们在屋内穿来穿去。梅卡走来问我有无床单和枕套让她带去，她即将去萨斯克顿开始她的大学生活。安格什出来讲到鹰的事，他问我是否知道穴居鹰比一个人的手还小。彼得却是来谢谢瑞克为他们做了一顿十分可口的晚餐。他压低声音问我是不是看到过他的打球穿的下体护身。这期间，瑞克和我坐着品茶、聊天。或者说，是我在叙说。

应该说在黑暗中与一个自己不甚了解的人坐在一起并非一件快事。正如瑞克说的那一周又是倒霉的一周。从安迪举起那个令他丧命的玻璃杯的那一分钟起，我为他做了需要做的一切。现在，安迪已被安葬在吾尔夫河外几英里的一个小小的天主教教堂的庭院里。我为他的妻儿也尽了我最大的力。我想，作为一个政党，我们必须共同来研讨，谁将会成为我们的下一位领导人的问题。一切善后事宜均已妥善安排。没有什么顾虑的了。明天，安迪辞世已告一周，时候到了，是节哀振作起来的时候了。

在瑞克面前我用不着佯装坚强、勇敢。反正我以后多半不会再见到瑞克，即使见了，他也已经知道我也不是位完人。我可以照样生活下去。于是我又谈到了安迪和我写的那本关于他的书，谈到每一点混乱的、不连贯的记忆都会给我带来一阵异样的刺痛和茫然若失的感受。但是，毕竟在安迪故去一周以后，在一位陌生人面前，有一处痛苦我是不敢触及的。那就是，我还没有准备提出一个要害问题：究竟是谁杀害了安迪·波尔丘克？

瑞克·什班什耐心地听着，直到我讲完。有好一会儿我们都不言语。我

们俩坐得很近，很近，唯有我们生命中那理性的雷池叫我们不得逾越。最后，瑞克抚摸着我的手臂，我就此转过身来朝着他。月光下，他显得那么优雅而温情脉脉。用这样的词来描绘他这样一个高大结实的男人是不恰当的。我真想他不断地抚摸我，我也真想抚摸他。自我丈夫去世以来快3年了，瑞克的手搁在我的臂膀上是那么温暖而有力，使我感受着那难忘的性欲的挑逗。然而几秒钟后，他把手拿开，尤其是他开口说话时，却一点激情也没有。

“乔妮，让我来帮助你写这本书。你认识所有有关的人，现在，你就在我眼前，但我认为，光有这些还远远不足以使你能担当起这一重任。你从事政治工作已这么久，你该知道，如果没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附在传记上面，一个草原省份的政治家的传记对他的国家会有多么深远的影响。我除了能给你的书的防尘封面上提供一个名字外，还能为你提供一些具体情况。我并不是没有素材、没有关系，没有以英尺计的档案材料。像这样写传记的事可以说容易，但也可以说难。我有办法可以使事情变得好办，请让我助你一臂之力。”

我被他的一席话惊呆了，不由得认可。最后，我问了一个他必须回答的问题。我说：“瑞克，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热衷于此事？我知道这里面也许有难言的隐衷，但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参与此事？”

他耸了耸肩膀，说：“就连我自己也不能肯定我知道个中原因。但我只是想我该做点什么来偿还一种孽债。”

对我来说，这正是确切的答案。

“瑞克，让我们再来一杯白兰地，为安迪的书、我们的书干杯！我这里还保存着一瓶真正特别的酒。那是伊安还活着的最后那个圣诞节安迪为他买的。我一直想留到一个特殊的场合来喝，我想现在就是该饮用它的时候了。来，让我们到奶奶公寓去，开怀畅饮。”

“听起来好极了。但以上帝的名义问问，什么是奶奶公寓？”

“你现在就可以看看它。就是那间车库顶上的公寓式房间。我用作办公室的。”我伸出手去拉他的手臂，并说：“来，带你去比讲给你听更容易些。”

他紧随着我，穿过漆黑的花园，走上公寓门外那通往小阳台的木楼梯间。

“我扶你过门坎好吗？”他问。

“我想用不着那样帮助。”我说着将钥匙在锁孔中转了一下。

门打开后，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我对自己生出怨情来，“糟糕，自从安迪葬礼那天起就没人到过这儿，可是空调却一直开到了最冷那一档。”

“这空调效果不错。”瑞克搓搓他的手说。

“不是那么回事，效果一般。我想因为这地方密封得很严，像是这么回事。不管怎么样，柯纳克在这儿。我看看商标。想到安迪总是那么慷慨。酒杯在这儿，我们还是把酒拿到阳台上去喝吧，这儿实在冻得很。”

瑞克斟满了酒，月光下，我们就站在那个可笑的阳台上，互相注视着。

“这一杯敬安迪·波尔丘克。”这是他那天晚上第二次这么说。

“为安迪和明智的人们干杯。”我说。我呷了一口酒，体验到柯纳克的后劲传遍了我全身的血脉。

清早，我到旅馆接他，驾车送他到机场。他却不让我下车送他，说：“机场是个令人伤心的送行地。”说着他伸出手来用手指顺着我的面颊的线条抚摸着。他最后说话时声音是干哑的，“我今晚给你打电话。”

他打了。那以后一连打了几个晚上电话给我。在我和瑞克·什班什的关系中，值得记忆的是，他不早不晚来到了我的生活中。

“甜中有苦”不是我的工作用语，但它却在我女儿准备好要去上大学那一周里仿佛拂不去的阴影般纠缠着我。自她出生以来，我就害怕梅卡有一天会离开我去上大学。但，猛然间，那个9月她离开家看来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对的。

我和我母亲的关系一直不怎么融洽，这使我担心我将来如何与女儿相处。是梅卡解除了我的担忧。从她呱呱坠地那天开始，如今她已长成一个自信的乐观向上的少女。她分担我的忧愁，更多的时候胜过分担我的责任。在伊安刚去世的那几个月里，我依仗着孩子们，因为她最大，因而也最依仗着她。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一觉醒来往往是又倦怠又伤神，唯一能做的事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眼睁睁地望着那黎明的曙光照射在糊墙纸上。又是这个敢于正视现实而又能振作起来的梅卡，总是早起送弟弟们去上学，然后端一杯咖啡给我，自己才匆匆赶公共汽车去高中学习。我并不为那段时间有她而自豪，但她功不可没。现在梅卡再也用不着去受第二遍那样的苦了。

那个9月就是她要搬进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地方，自己做饭、洗衣、上课堂，自己去幻想的时候。她打心眼里喜欢安迪。不过她毕竟还不到十九岁，他只是她生活外围的东西。他的去世使她伤心，因此对我的悲痛她也非常敏感。不过，一周之内，她生活中崭新的一页就要开始了，难怪她喜形于色。

我爱梅卡，也为她高兴。但当我站在那儿审视着我的女儿时，想想今后炉子里可没有她烤好的土司，再认真看看又没有她熨好的床单时，我的感受何止是失去了什么——不只是失去了她，而且失去了自我。

想起28年前，我是自个儿带着衣箱，走上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对面那幢房子三楼去的。就是我邀请我的那些政治科学研讨会的成员到我查尔斯大街的公寓来聚餐，至今也有四分之一世纪了。记得我们那时候吃着意大利实心面条、喝着用草编篮子装的大瓶大瓶的意大利葡萄酒。整个晚上，我们争论不休。从《马伦巴最后的年月》一书谈到阿恩·伦道的哲学。就是在那一年里，我与伊安认识。我们第一次约会时，他带我到了多伦多北部他的逻辑教授家中用午餐。我记得那位逻辑教授当时近四十岁，自命不凡。据说是聪明过人。他的妻子名叫贝芝，和我一样年仅二十一岁，但已有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她父亲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逻辑教授在她十六岁时娶了她。用他的话说是“这样他能帮助她成长”。除了孩子，贝芝还养了两只长毛垂耳的狗，她管它们叫“教授”和“夫人”。

那是一个冬日里星月交辉的夜晚，伊安和我沿着荣格大街步行数英里回家。我捉住他的臂膀，甚至透过他厚厚的冬外衣，我感受到了一种性的挑逗。那天夜里，我明白我要嫁给他。但除此之外我却不想要贝芝那样的温馨的小家庭生活，整天价泡在婴儿和狗当中，还要从那本《家庭烹饪》中去学会做砂锅菜。我们的生活一定要不同凡响。伊安和我如同双星座，是独立的、辉煌的，也是永恒的。总之，我们要不同凡响……

现在该轮到梅卡来开启她那首次私自拥有的家门了。轮到她为朋友们准备晚餐，轮到她作出自己的选择了。我知道我是多么地怀念这两者：我的女儿，还有我那年轻时的倩影。

那一周也不全是哀伤的，如同自然一样，政治憎恶空白。一连十几天，我们的党没有了领袖。搞政治你得做你非做不可的事。记得我们的党曾一度

陷入深深的经济危机当中。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葬礼，看到死者最好的朋友站在举行葬礼的教堂外，拿着一水桶的油炸鸡在为我们的党募集捐款。当时没有一个人感到吃惊。就连一位寡妇在去墓地之前，也给那人开了一张可观的支票。生活就是这么过来的。

甚至有人来请我支持克里格·伊文森，我也并不大惊小怪。早些年我儿子彼得就给了他一个雅号——窝囊废。从此，他的雅号就一直在我们家人中沿用至今。

克里格·伊文森以前确是个拖沓、窝囊的人。他身材高大、动作迟缓、身体像散了架似的。这正好与他妻子那钟表机件般紧凑的身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以前一贯喜欢克里格。往往在星期三大早，当我光着脚不施粉黛走到门边时，就看到他跪在地上，透过玻璃门和我的狗在谈话。我不记得这里的缘由。

即使是现在，至少在我眼里，克里格总是满怀希望的。他曾想要得到三样东西，我了解这点是因为多年以前当我的孩子年幼时，他本人告诉我的。这就是他常干的那种傻事。他还说过他想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亲近，想有朋友与他一道饮酒和谈法律，他甚至还想成为利宅那小花教堂的一名神职人员，在那儿服务到六十五岁，然后退休回家写回忆录。我想，他对于生活并不算苛求。

克里格的梦想本来算不得宏伟。但朱丽·伊文森却把它们全给删改了。起初她对他们儿子的爱付出了很多心血，后来又变得十分有限。这使马克迷惑不解，从此疏远了他们。她的政治野心又致使克里格与朋友们的关系不融洽。她要使克里格成为党的领袖的热望，已危及到他在小花教堂中的席位。她已经使她丈夫的名字变成了我们嘲笑的这些名词的同义词。比如：不中用的家伙，没有脊梁骨的人，怕老婆的人等。她使他成了别人的笑柄。但当我看见他在9月的阳光下，猫着腰与我的狗说着体己话时，我免不了对这位老伙计油然而生出几分同情和怜爱。

他很高兴看到我，也很感激我邀他进来喝咖啡。当我们坐在梅卡收拾行装的噪声中谈及我的孩子们，她像又回到了以往那种关系融洽的日子。我告诉他我曾花了一点时间与马克·萝利在一块，并看望了他们的儿子。一谈起这些，仿佛有人给他打开了一个开关似的：他兴致勃勃。我们谈到了马克的文质彬彬、萝利的美貌，以及他们的儿子的睿智。谈着谈着，克里格喜形于色。后来，蓦地，好像开关关上了似的，他住了嘴。

“你知道，朱丽认为马克已背叛了她。”他说。

我们尴尬地坐在沉默之中。即使提到朱丽的名字，对他来说也足以显示出将太阳光从早上收敛的威力。最后，他像只老狗似的使劲摇着身子：“不管怎么说，乔，我来这儿有一个原因，这你是知道的。我想争当领袖。如果你到别处去有使命或是你想等等看还有谁宣布竞选，那也行。我只想提请你们考虑我。”

“会考虑你的。”我说话时力图显得温和。

“但不会认真考虑，也不会考虑多久。”他泄气地说。

“克里格……”我力图找到一个借口来拒绝他的请求。“你是这么好的一位候选人——人人都说你是最好的一位。不过，你知道的，这次选举的提名有限，况且残局难以收拾，内幕不得而知。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一个……”

“更精明的人。”他为我补出了这个词。

我不好妄加评论。

“真是活见鬼，乔，这么多年来，这件事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要是安迪不举行最后一次接见选民该多好。那次差点没把朱丽气死。”

他看看表起身说：“好，我该回家了。”这位窝囊废终于要走了。“谢谢你的咖啡和与我谈心。”

我又伤心又难堪地将他送至门口，他刚要走又转过身来说：

“我不能再让她失望，乔。”

“我知道这一点，克里格。”

“她为我牺牲了一切。”他直截了当地说。说完他慢吞吞地走上小径，钻进汽车，回家去了。他和朱丽的婚姻始终是我不敢想象的。

故事还有一个尾声。第二天，我们把所有东西都装上了豪沃德的货车后，我跑进屋去拿我那副太阳镜。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本来不想去接，但又担心孩子们有什么事，或是我在萨斯克顿时雇的那位来陪伴孩子的大学生有什么事找我。我一把抓起话筒，原来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别挡他的道，乔。克里格不算厉害，我可是不好惹的。”

随后是一阵干巴巴的怪笑。电话挂断了。原来克里格把与我的谈话对朱丽说了。

当我坐进汽车时，梅卡对我说：“妈咪，你脸色苍白得像死人。”

“没事，只是刚接到了一个吓人的电话。”

“是个古怪的人打来的？”梅卡关切地问。

“不是，我的心肝。记得马克·伊文森吗？嗯，刚才打电话来的就是他的母亲朱丽。”我戴上太阳镜，说：“我想朱丽这回可要大耍泼了。”

梅卡笑了，但豪沃德却正言厉色地说：“你可要提防她，乔，这人的脾性可是野得很啊。”

“我会当心的，豪。来，上路吧，老家伙。”

梅卡是我们家的骄傲。她不想和我们一块用餐。她的新居是第九大街上的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她和她男友早在夏天时就来这儿租下的。是从一位要去都柏林学一年罗马教皇格里高里皇后事迹的妇人那里租来的。在我看来这房子真是好极了。我们花了一个下午安顿好家具。再整理好梅卡的东西，屋里就更宜人了。但我女儿却跟我不一样。她说她知道家里的一切没安顿好之前，吃饭也不香。她指的“家”是第九大街上她自己的家。所以她就此挥手与我和豪沃德道别，要我们自个乐一乐。并邀请我们第二天回利宅那市之前与她一道吃意大利实心面条。

“你就这样把一个心都快碎了的妈妈领到外面去吃饭吗？”我站在我女儿新居门前的人行道上问。

“你会喜欢这地方的。”豪沃德说。

“我敢打赌，这儿会有真皮封面的菜谱。”

豪沃德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远处，说：“你知道，我相信会有的。”

说到吃的，豪沃德没有什么猎奇心，记得多年前有一家新潮餐馆在城里刚开张，我和伊安在休会时拖他上那儿。他不声不响地与我们一道享用了一顿后，却找来菜谱，一个劲地寻找比舌鳎更实在的菜肴，他的失望是不言而喻的。自那以后，大凡与他共餐，我便让他挑选餐馆，那些出售厚块牛肉，

酒吧里有苏格兰威士忌酒的餐馆总是被我们首选。

那晚，当我们驾车来到西边时，他说：“你会喜欢这地方，乔。他们出售自己培植的蔬菜。”

“他们是不是也宰杀自己养的食用牛？”

豪沃德用鼻子哼了一声，说：“难怪梅卡晚上不想让你和她呆在一块。”

“哈什”真是一家名不虚传的餐馆。里面除了有许多精美的橡木家具和黑皮沙发外，还有一个大壁炉，在9月里清凉夜晚的烛光下，给人以舒适的感觉。侍侍者送来菜单，豪沃德点了两份带冰块的格兰费迪奇饮料。我要了带弯管的苦艾酒。当我们的饮料送来后，豪沃德从容地心满意足地拉开了他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便靠到了他的椅子上。

“嗯，告诉我，你好吗？”他说。

“我想挺好。但我现在不想谈我，我想和你谈谈安迪的事。”

“那没问题。”

“你知道，警方现在将安迪通常用来放讲稿的文件夹拿去了，就是那个蓝皮面有……”

“烫金的‘每个乌克兰母亲的梦’等字在上面那个。”豪沃德接着说完了我的话，笑了。

“米勒德警长发现了一首诗在里面。那是早就有的，我知道。因为安迪上台之前我正好检查过那个文件夹。是有人从威廉·布莱克的那首《病玫瑰》诗中摘录下来的。我想这在大多数大学一年级新生的英语课程中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不过抄这首诗的人书法倒是很漂亮。这摘录到讲稿中是否有点多余？在诗页的顶端有两个字母——或许是某人的姓名的开头两个字母，A和E。况且这两个字母用一束小圆圈联在一块。就像结婚请帖上把新郎新娘的名字首字母联起来那样。我总是忘不了那两个字母。”

豪沃德一饮而尽，把空玻璃杯小心放到餐桌上放酒瓶的带轮银盆中央。

这时侍者走过来问我们还要点什么。

豪沃德满怀希望地看着我说：“这儿的烤牛排是公认一流的，不过一碟总是够两人吃，而我总是独来独往，现在我们俩来一碟怎么样？”

“肯定好。”

“那我们就要这个和——”他指着酒类格里要一瓶波尔多葡萄酒——“要半公升装的。”

侍者离去之后，他转过身对我说：“对那两个首字母，你如何认识？”

“我想最明白不过的推测是他们俩结婚时用的姓名首字母联写——我指的是安迪和伊芙。但无论是谁将那首诗放入文件夹，谁就是杀害安迪的人。我肯定这一点。你认为伊芙·波尔丘克会是元凶吗？”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这句话。当时感到一阵不安的震颤。

我们选的餐桌靠近壁炉，那玫瑰色的火光将豪沃德的饮料染成了火红色，在他那张苍老的鹰脸上投下摇曳的阴影。他看起来倒像是一个可以与人谈谋杀的人。

“我不知道，乔。我不是那种愤世嫉俗的人中的一个，认为人人都有可能是主谋。或许那儿就有一道我们多数人不可逾越的障碍。不过伊芙这辈子算是苦命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侍者为我们端上了酒，豪沃德默许了，所以侍者为我们都斟满了酒。“你知道，乔，我很乐意我们能讨论一下这事。尽管这样叫我们很倒胃口，不过，

自从安迪死后，我咽不下饭何止几顿？你知道，要不是我，安迪永远不会与伊芙结识。”

色拉端上桌来了，豪沃德乐了。“你看，这个菜你可中意？”他问。“你要注意看看是不是样样原料菜你都认得出来。这上面有一层蒜泥佐料。这儿的人很聪明，要是你还不饿吃不下正餐时，他们会在正餐前为你端来色拉。”

“好，让我们言归正传，从头道来。这个头就得追溯到三十岁生日那天，即1963年4月17日。那一天我抵达安大略的达拉莫港口，也就是那天我见到了伊芙·罗斯考特。”

当他说起罗斯考特这个姓氏时，我像是打开了一台电子游戏机那样——看到到处都有光亮，到处都响起了铃声。这引起我的警觉，我马上问道：“你是说伊芙是罗斯考特——罗斯考特一案中罗氏家族的一员吗？我从大学生时就记得此案，但怎么会没有人告诉过我伊芙属于罗氏家族呢？”

豪沃德夹起一块西红柿，笑了：“因为，我的朋友，这事与你毫不相干。真的，乔。这事与谁都不相干。毕竟，伊芙又没犯过罪，她来到此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这事又能得到什么呢？”

“反正4月17日那天我到了达拉莫港。当时像我这样一个从印第安地区来的乌克兰男孩子，如同到了月球那边一样。两天前是瑞·路易斯从多伦多给我打了电话。他是我在萨斯克顿上法学院时的教授。他对我的专业有一点儿了解，因此他知道，我在控制精神病法律方面有专长。想想看，那是搞政治的前提条件。反正是瑞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他有个案子要办，而我真能助他一臂之力。他还说在办案过程中我也可以在东部地区扬扬名。那时这个主意对我真是求之不得。”

“反正我是乘头班机出发了。瑞亲自到机场接我，并载我到达拉莫港。要知道，乔，我对那次行程至死不忘。”

他呷了一口酒，又说：“那是4月里的一天，我们行驶在安大略的郊野。真是叫人难以置信，就是这同一个上帝居然会造成那偌大的草原，那绵延的山岭、小河流、长满野菊的沟壑，还有那些农场——”他摇摇头表示不相信那是真的，“所有那些个农场上都点缀着新上过漆的粮仓，还有那毛茸茸的羊群和用篱笆围好的一块块耕地——它们看起来简直就像你要给孩子玩的立体画玩具。那天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达拉莫港——那是个小巧可爱的地方，你可曾到过，乔？”

“有一次周末与一位学校里的朋友去过。”我说。

“嗯，后来瑞领我到旅馆去吃了午饭。就带我去罗斯考特家，满足了我盼望知道的一切。家长都德·罗斯考特那时呆在达拉莫医院里。他的脸、脖子、腹股沟周围都被严重砍伤。但他还有希望被救活。主妇梅德林奋力制止时左手失去了四个手指头。那四个指头都被砍掉了——毁了——但不到一周便可以出院。女儿南希·罗斯考特，据报纸说是曾挥舞着斧头，那时正在达拉莫港矫形中心医院的病房里，被判了差一天就两年由省监狱监禁。那里也用作押候中心。南希像臭虫般发狂，但身体没毛病。伊芙·罗斯考特是小女儿，就是她打电话给瑞，请他来处理纠纷的，我们去时她正在家等候。”

“那个家——瑞在谈起这个词的时候随便地摇了摇头，但他这样做是远未表达他的意思的。那时我已三十岁，但我还从未进过有钱人的家——上帝呀，乔，那屋里的摆设使你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拼命去追求金钱。”

我报之一笑。自从我认识豪沃德以来，他一直过得很富裕。但他总是谈

起仿佛要退了酒瓶才能付得起下顿饭钱似的。

豪沃德会意地笑了：“我懂，我懂，乔。不过你本该看看罗斯考特的家——当然我是指另一种秩序井然的情况下去看。房子本身就够漂亮了——我猜是护墙板漆成的灰色。有时候看起来呈灰色，有时候——紫色光投下的是什么色？”

“是不是淡紫色？”

“对，是淡紫色和紫丁香色。屋子的周围到处都种满了紫丁香——有白色的和紫红带粉红和……”他不由得笑了起来，“淡紫色的——有多高雅——那是一幢给高雅的人居住的高格调的房子。但一个星期以前，就在这幢房子里，那个二十五岁的女儿企图用斧头砍下她那老爹的脑袋，她精神失常了，当她母亲奋力制止她时，她砍断了她母亲的手指头。”

“啊，上帝呀，豪沃德，这太不应该了。”

“我和瑞按响了电铃，正当我们站在阳台下等候的时候，瑞·路易斯曾对我说过一些话，那也是我对自己重复过上千次的话。他说：‘孩子，不要让这些人冠冕堂皇的外表征服了你，一旦失去理智后，他们也会像我们这些人一样，干出丢人的事来。’那些话，我想是我终生难忘的。当我走进前门的路上，我认为难以相信曾经有人在这儿作过恶。”

“玛蒂和我那时候刚买下我们的第一栋房子，距离梅卡的新居约有三个街区远。靠近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当然，那是为了方便玛蒂上学。反正我们已经将房子装备好。我们觉得它还很不寻常呢。但是，就在罗斯考特家隔壁真太可悲了——真是间倒霉的房子。”

“那天，管房子的人领我们走过一个保龄球场那么长的大厅，大厅两边的墙上挂着精心摄制的那一家人的照片——我想是他们家族祖先族系的照片。当我看到穿黄色制服的警察列队在那儿警戒，并用一张大写字台和一个球状物及许多书堵住了一个房间的入口——那是老头子的办公室，我如同挨了闷棍一般，愈来愈感到不安。因为那是我们通常说的出事的现场。看房人一直带我们走到大厅的尽头，打开一扇门，我们就看见那是间日光浴室——她管它叫罗马式建筑内部的中庭，房间中央有一套柳条家具，还有一些花坐垫的椅子和一张圆桌。我们一眼就见到伊芙正坐在那儿等我们。她样子就像那些要去参加生日聚会的可爱的小姑娘。”

“我们的正餐来了。”豪沃德说。“以后还要不要我来挑餐馆呀？”他问。

“由你挑到我们死的那一天。这儿可真是个好吃饭的好地方。”

烤牛排送上来了，它的外表烤得恰到好处，里面的肉质呈粉红色，上面铺着一层用新鲜的龙蒿叶调制的佐料。侍者把牛肉切成薄片与蔬菜摆好，又不声不响地送上了椭圆形的白蜡碟子。

“你知道，无论你想要谈什么有关伊芙的事，过去多年的情况我们已谈得很多了。她是个大美人。我第一次见她那天就差点没叫我的心脏停止跳动。那时她约二十岁，头发是乌黑的，直到那次出车祸后才变灰白。她的发型有点像1963年妇女流行的那种蓬式的。那位管房子的人叫卡特莱太太——上帝呀，乔，我经常有半数时间记不得自己的汽车停在那儿，但这位25年前只见过约摸3分钟的管房子的女人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反正我只记得当时是卡特莱太太为我们端来了甜烙饼和茶。我当时见到的一切均很文明。伊芙当时很冷静沉着。她一边为我们倒茶，递过来黄油之类吃的东西，一边向我讲

述了这幢房子的历史。紧接着，她又用那平缓的声音低声地向我追述了那晚的情形。”

“她讲的时候态度怎么样？”

“她作为一个倒霉的见证人——把一切细节都向我讲了。她当时是心不惊肉不跳，也不歇斯底里，甚至还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评论。如：‘我相信我姐姐说过！’‘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很快地朝窗口走去。’反正她当时是将她知道的有限情况对我说了。她讲得并不好。用伊芙的话来说是她姐姐举出了从她还是小姑娘时，她的老父亲曾对她行为不轨——又是用伊芙的话来说——所以使她一直抬不起头来做人的。乔，当时有你帮我就好了。你知道伊芙这个人每当你快要谈及事情的要害时，她总是略略地一笑了之，不愿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所以当时她就说：‘我姐姐说如果她不能抬头挺胸做人的话，我爸也别想抬头挺胸做人。因此，她就抡起斧头朝我爸头上、身上砍去。’说完这一切伊芙笑了，并发誓无戏言。乔，她很奇怪，我们当时居然不发表意见。”

“‘反正，很清楚，当我妈起来制止我南希姐姐时，南希就砍断了我妈的手指头。’”

我咽下了剩下的酒，又给我们各人斟上了一杯。“伊芙都见到这一切了吗？”

豪沃德的脸色很阴沉，说：“虽然是伊芙目睹了这一切，但难就难在她不愿意让我们利用她提供的材料。她是这么说的：‘现在你们知道了事实真相，这就足以帮助你们去对证了。’对证——证实他们那些当时在场的人所说的一切。‘但我在这儿对你们所说的话，是不准你们传到屋外去的。’说完她就走了出去，让我们坐在那儿无所事事。”

豪沃德夹起了他最后一块牛排，侍者走过来将碟子拿走。豪沃德又要他为我们俩拿咖啡和饮料，而后，他就心满意足地靠回椅子上。

我坐到椅子边上，又问：“后来又怎么了？”

“没有多少可说的了，瑞和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伊芙始终不肯出来作证。那一对老夫妇和南希小姐都是一派胡言——他们竟然说那天的事是一次意外事故，是南希精神失常。他们都认定小南希一直是那么可爱，她的话靠不住、靠不住、靠不住。这就是他们的解释。南希后来去了美国纽约州北部的一家精神病院。美国人对这类事情可是比我们开明得多。只要你付得起钱，你就可以以精神分裂症为借口在那儿藏匿起来。那以后那对老夫妇又回到湖边的房子里悠哉游哉地过活。我不时地还在《环球》杂志上看到老罗斯考特的照片——被任命为这样或那样的董事。”说到这里豪沃德摇摇头，然后双眼向上看，“乔，你想和我分吃一块奶酪饼吗？他们每个饼里都搁了特别的佐料，你会喜欢的。”

我哼了一声，说：“豪沃德，假若我们再吃奶酪饼的话，这顿饭我们摄入的卡路里就会变成六位数了。”

“乔，别提什么卡路里了，好不好？”

“好——现在就告诉我伊芙是怎样到这儿来的？”

“她就是这样来的。审讯过后我得到了一张由伊芙·罗斯考特签发的支票。假如当时我不是因为要购置新居急需用钱的话，我就会把支票搁在那儿。不过那是一笔可观的钱，玛蒂正等着这笔钱来修后院的围篱呢。后来，反正是在律师协会召开的会议上我见过瑞·路易斯。起初的几次见面我们还总要谈

起罗斯考特家一案，后来，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见了面就各谈各的事，渐渐地罗斯考特之类的事就被抛在我脑后了。

“后来有一天，大约5年后的一天，我想一定是1968年的事，或许是那几年世界不太平静的日子里。我正穿过大学的校园，正好碰上一次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在游行的行列里伊芙·罗斯考特和安迪·波尔丘克并肩前进。他们可是难得的一对。安迪当时就像你认识他那会儿那么显得英气勃发——当然是留着长发。而1968年时的伊芙更不能与我们今天认识的她同日而语。你还记得那时孩子们常常谈起要自由自在的事吗？嗯，那一天伊芙可自在了。她再也不是瑞·路易斯和我在达拉莫港见到的被困的洋娃娃了。也不是你我认识的一个脆弱的女人了。她已摆脱家庭的羁绊，出落得益发秀丽了。

“安迪当时正在上我的犯罪法班。见了我他招招手，走过来向我介绍了伊芙。你知道伊芙总是故作吃惊的样子。我本来对他们俩的关系打算装聋作哑的，但当时伊芙冷静得令人为之高兴——立即把手伸到我手里，说：‘豪沃德和我早已见过面。事实上为了他我才到这儿来的。在经历了南希的风波后，我的确需要找个地方去避避风头。有一天我坐在那儿灵机一动，就想到了，来萨克其万了。我的意思是说在这儿谁也不会去追逐任何人了吧？’说着她面露喜色，用双手搂住安迪的腰，把头靠在安迪肩上。他们俩真个是天生的一对。不久他们便结了婚。其余的事你都知道，不用我说了。后来又出了一次车祸……”说到这里，他拿起那盏中间点了一支蜡烛的小灯，结论般地说：“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伊芙·波尔丘克确实是命苦啊。”

“我真不明白，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说。

“这个问题是由精神病医生和哲学家来回答的，我只不过是个无用的政治家。像这样的问题我无可奉告。”

我伸手过桌子挤了挤他的手。“并不是无用的。”我说。

那家餐馆做的风味特别的奶酪饼正如豪沃德夸奖的那样是举世无双的。但当他吃饼时他却不加赞誉。我们吃完后，他的身子俯过桌面，瞪着我。

“乔，我想那天凡是出席野餐会的人都是嫌疑犯，你有没有特殊的原因要多了解一下伊芙呢？”

“没有。至少没有比怀疑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有更多的理由要怀疑她。别忘了，那天出席会议的有五千人呢。我知道警方对安迪一案已有了大进展，我真希望能打开收音机，能听到他们已经逮捕了某个可怜的疯子是杀害安迪的凶手。他杀害了安迪仅仅是由于那天早上从床上起来时下床的那边不对，或是上帝告诉他那样做的。但我们总得要面对事实，已经11天了，警察们还是两手空空。如果不是因为有某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在作案该怎么办呢？如果是我们认识的某个人是凶手，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杀害了安迪又该怎么办呢？”

豪沃德摇了摇他杯中最后一点酒，就将杯子放了回去。“我不知道，乔，你还记得那天电视里的情形吧，那位警官的开场白是这样讲的：‘就会小心翼翼地，我想这就是你们所能做的，小心些。’”

梅卡，最体贴我的梅卡已经帮我打开了行装，把我的裙子和大衣挂好，以便第二天穿。她甚至已经把我的睡衣和长袍都甩在我床上了。

“我枕边的巧克力糖哪儿去了？”我问。

“你已经不需要它了。我敢打赌，你和豪沃德把什么东西都吃喝个够了。顺便问一句：他现在在哪儿？我猜他会来我们家喝茶的。”

“今晚不来，小丫头，他有点累了，明天又要起早，因为我打算去看望罗玛·波尔丘克。”

“是安迪他妈吗？”梅卡问。“嗯，别让她有机会来攻击你。”

“梅卡，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来，你根本不了解她。”

“啊，我了解她。有一天晚上，正碰上你对我的化学成绩唠唠叨叨，我就向安迪诉苦，你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反正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进行过一次有关母亲的长谈。”

我吃了一惊，忙问：“是什么时候？”

“我读十一年级那年期末的事。还记得那时你对我说如果我的化学不及格的话，以后就只有去公共汽车站洗厕所了！”

“记得，不过，你化学不是及格了吗？”

“反正只得53分。当然安迪当时是站在你一边的。你们都说对我们唠唠叨叨是出于爱心。在你们俩共同维护母亲的过程中，他说出了有关他母亲的趣事。”

“比方说是……”

“他没有举例说明。该睡觉了。你明天还要去看安迪他母亲呢。豪沃德总是说我对看到的事有偏见。但你总该明白……”她笑了，并俯身吻了我，与我道了晚安。——会有这样的母亲，她们会葬送了孩子。

罗玛·波尔丘克仍然住在西城一个叫江克切的街区里。安迪就是在那地方长大的。假如你想购置旧家具，或寻找真正的中国四川城市的格局，或是寻找 20 分钟的浪漫经历，西城区倒是个好去处。朝火车站那边，再走远一点，就是真正叫做江克切的街区。在那个居民区里有许多像洋葱般圆屋顶的教堂和店名叫什么“莫里开什”或是“费德柯斯”等夫妻开的杂货店。安迪曾说过江克切是个利于孩子成长的街区。当我沿着那个宁静的大街漫步时，看到沿街的榆树叶子已经变黄了。我一边走一边想安迪当年跑过这些人行道去上学的情景，又尽量回忆我所了解的罗玛·波尔丘克的情况。

我所能记起的情况不多。只记得他母亲四十岁时生下他。他的父亲在他出生之前或之后去世。我记不起安迪曾对我说起过他的父亲。罗玛对孩子特别溺爱。有一次我曾递给安迪一篇文章，那是讲述大量的政治领袖都是由性格坚强乃至专横跋扈的母亲培养出来的。我以为他读后会大笑，可是他竟无动于衷。

“这些母亲认为溺爱孩子是好事，你知道，她们只知道一个劲地爱。但爱必须是贯穿你的终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治家被这样断送了的原因。乔，对孩子的要求该是……”他没有把话说完。

为安迪工作的人们最感到棘手的就是对付这位老夫人。每当我们党要宣布一项政策与她的信条不符合或是与她的意见相左时，安迪总得花上几小时与她在电话里用乌克兰语交谈。我是没有必要学习乌克兰语，以便知道他向她解释什么，怎样开导她，怎样证明他的话是对的。常常是通话完后，他会羞愧得无地自容。接着便会向我们讲一则有关他自己的笑话。不过事情无论巨细他一定要请示过他母亲，与她用电话联系。有一次，不知是谁，我想可能是德夫，从萨斯克顿回来就吹嘘他如何受到了老夫人罗玛的热情欢迎。安迪笑着说：“可别惹她生气，否则的话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南萨克其万的湖底找到你被钩针刺穿心脏后的尸体。”

我笔记本中记有罗玛的地址。豪沃德曾对我说过她住所的方位，但我并不需要借助这些东西。我一眼就能认出她住的房子，因为我认出了她隔壁的一家——那是罗玛的夙敌苏丘克一家的住地，他们两家人是 60 年的邻居；但却斗了 60 年。

我曾就此事问过安迪：“为什么你们当中谁都不搬家？”

“那就使生活没意思啦，”安迪耸耸肩说，“乔，如果我母亲得到了一支新的胸针或是我的照片见了报端，我母亲的心里是不会高兴的，非要等到苏丘克太太（我母亲是这样称呼他们那一家子的）看见了她心里才痛快。我想他们那一家子也是如此。他们总是伺机报复，你看看他们的房子就明白了。”

事实上，除了外表的色彩变化，苏丘克家的房子并不惹眼。那是一幢外表整洁的长方形有凉台的木房子。整幢房子漆成蛋黄色，又用绿色勾勒出一道边。屋前的草坪倒是独具一格，可以称得上是一大片绿茵装饰。白色的塑料羊羔挖空了内脏，从羊肚内长出一簇簇红色的天竺葵；一架架木刻的飞机模型带有螺旋桨，悬在空中，风一吹过便发出嗡嗡的响声；上了漆的用多种木料雕刻成的德国小男孩栩栩如生，他们的脸是圆圆的，双颊粉红粉红的，还穿着阿尔卑斯山山民的皮短裤。还有一群木刻的鸭子，有公有母，还有小

鸭子，显然是一家子。一对多种木料雕琢成的法国北部产的那种灰毛马拉着一架马车，满载南美产的矮牵牛花。仿佛正奋蹄急驰，跑过这一幅幅微型画卷。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苏丘克的蛋黄色有绿边的有凉台的平房都是那么完美。

与苏丘克家相比，罗玛·波尔丘克的那幢房子即乔伊士街 82 号，却是那种结构较为严谨的房子。整座房子漆成白色带红边。通往前门的小径每边都有一个一半漆成白色的油桶。桶原来粗糙的边被加工成光滑的卷状，桶里栽满了艳丽的红天竺葵。

我对罗玛说过我 10 点以前会到那儿。我敲门时是 10 点过 10 分。她已经在等候了。我打电话时早告诉过她了，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安迪的书。她不但高兴，而且对此也很感兴趣。

不到两周前她唯一的孩子刚去世，我料想她必定是处在极端悲痛之中。但她那天穿着打扮却是接待客人的。她原先是个结实的小个子女人，不过并不算胖。她属于那种一辈子都精心打扮，一辈子为自己的容貌自豪的妇人。她的黑裙子裁剪得体，使她穿上后臀部的曲线变得优雅而不臃肿；在她那件镶有花边的白色罩衣领子上别了一枚瓷三色紫罗兰胸针。她的头发是淡红紫色的，盘到脑后挽成两个发髻，一个在后颈，另一个则叠在它上面。她用了有花的梳子将发髻固定好，那样使她看起来大致上像个日本妇女。当她亲吻我的时候，我感到她的双颊光滑而无皱纹。“每晚擦凡士林。”有一次安迪见我去买一种昂贵的晚霜时对我这样说：“我母亲用的就是凡士林，至今她皮肤嫩得像婴儿。当然，她去就寝时就像个去海峡游泳的人，但她 40 年来从不与人同睡一床。所以……”说到这里他耸耸肩笑了。

罗玛身上散发出来的并不是海峡游泳者的气味，而是一种男子气味，一种熟悉的气味。

“你身上的气味很好闻。”我说。

“原来的香味。”她说，“只是用来冲掉洋葱味的。我今天早上做了些烤羊肉串，你走时我给你带上点儿。”她用手势叫我到前屋去，那屋里挂着厚厚的窗帘，摆着有塑料罩的笨重的家具，光线昏暗而无生气。“你喝咖啡吧？”说完，她表示不用我帮忙，就撇下我一人在那间阴森森的房间里。

从房门望去，我可以见到厨房。那是一间洒满阳光的屋子，种着一盆盆的花草，散发出宜人的香气。要是我以前就是她的朋友，我会选择坐在她的厨房桌子边用一个厚厚的口盅来喝咖啡。她切包菜做汤或是卷面团成圈状做面包时，我会和她聊天。但我现在只是她的客人，我只能坐在这僵硬的塑料罩上，可正是有了这些罩子，才使得罗玛的套房起居室内的家具如同当初搬运工将它们搬上卡车，搬到这乔伊士大街上时那样一尘不染。当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的灯光之后，我看到房里面有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半是圣母玛丽亚的，另一半是安迪的。

大多数安迪的照片都是以前我见过的，是他成年之后才拍的。这些照片曾刊登在竞选文章或报上的文章上面，以后就被换了下来，被人们遗忘了。但罗玛却没有忘记。她将这些照片剪下来，用镜框框好，挂在她房间的墙上，与圣母玛丽亚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其中有几十张安迪童年的照片。我走到靠窗的墙边细看这些照片，这是些放大的安迪在学校对的照片。有坐着双手交叉在胸前的，还有在那灯光幽暗的教室里，他与教皇、国王与皇后以及新的皇后的合影；有他与棒球队队友的合影；照片上的他露齿笑着。在阳光下，

他的脸部几乎看不清楚，只见轮廓。还有安迪乘独木舟在北部一个不知名的湖上向岸边站在照相机后的朋友挥手的照片。

唯浊没有伊芙与安迪的照片，也没有伊芙和安迪以及他们的孩子的照片。

“你喜欢这些照片吗？我还有很多呢。”罗玛站在我身后说，她的声音变得如此高而有力，令我吃了一惊。她推过来一个有轮子的茶具台，从那上面拿了一个托盘放到桌子上，就走了。但她很快又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装有相册的盒子。最上面的一个相册封面是粉蓝色经面缎的。横过顶端用突起的黑体字写着“我的洗礼”几个大字。封面的中间用一个从边上呈锯齿状的椭圆形框住一张照片，那是一群孩子围绕着疲惫不堪的基督的照片。

“我去做点简单的午餐，你不妨在这儿看看安迪的照片，为你要写的书找找素材。”罗玛说完就把相册搁在我身边的地板上。接着她像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张有花边的台布，铺在桌子上，便着手摆上杯盘。在我翻阅相册的同时，罗玛穿梭般地从厨房到起居室忙着，先为我们拿来了一壶咖啡、奶油和糖，然后又拿来了一个上面堆得高高的面包的塑料旋转盘，瓜子、绿皮西葫芦和胡萝卜。又用另一个托盘装来了奶酪和一碟碟腌菜、果酱和果子冻。最后又用一个旋转盘装了满满一盘薄脆饼和方饼。

她给我递来了一个甜点心碟和一块色彩鲜艳的纸巾，就对我说：“无论我在哪儿款待我的客人，他们似乎最喜欢的还是在我厨房里。”她一边为我倒咖啡，一边开始讲述盒子里那些相册的故事。她讲述了那本题名为“我的洗礼”和另一本题名为“我最初的亲密教友”中照片的来历。然后又递给我四本剪贴簿，每本都标有“我的教会生活”的标签。

“这些对你要写安迪的书大有裨益，你可以抄些下来。”

“这些剪贴簿里贴满了安迪在学校时的习作，有绘画，有诗歌，还有像贞洁、恭顺、虔诚等方面题材的论文。尤其是论贞洁的最多。”

“这儿，”罗玛说，“这张照片可用作你那本书的封面。是安迪和主教一块照的。这张照片是安迪被圣·阿它那修斯主教认可入教会学校时拍的。那位主教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可真是个好啦，尤其对孩子又好心又耐心。”

不过依我看这位主教并不好心又不耐心。他长着一个球茎状的鼻子，大腹便便的倒像个酒鬼。当然，有时照片说明不了事实。

“你只管拿这张去。”她说，“我还有许多相同的照片，将这些照片刊在你书中，来说明安迪是在教会中长大的，有人曾利用照片指责我谋害婴儿……让别人流产。”她说话时声音里带着嘲弄的口吻。“他一定是从他娶的那女人那儿学来的。”她用的还是那种鄙夷的声音说完了这件事。“在你书中要如实地反映这件事。安迪从来就不相信那些东西，不会的。”说完她把那张安迪入教会的照片塞进了我的钱包，又走进厨房去取咖啡了。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光过得够惬意的了。罗玛一心要向我谈安迪的事，我也乐意倾听。当我起身告辞时，她吻了我，并送我一个冰淇淋盒子的烤羊肉串，是给梅卡的。

当我沿着乔伊士大街走去时，那怀有故意的苏丘克便跑上来追我。

“她现在怎样了？”他是一位胸脯宽厚、有着铁灰色头发、声如洪钟的男人。他站在阳光下眨眨眼，又问：“你从她那儿打听到什么了吗？”

“那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我说。

他眼里闪着嫉恨的光，说：“我猜既然那位名人被除掉了，她一定气得

发了狂。”他那呼哧喘着粗气的笑声触动了我的神经，令我感到很不是滋味。

于是我对他说：“苏丘克先生，我希望你永远都不会倒霉透顶失去自己的儿子——尤其是你的独生子。”

他的脸由于故意而表情激动。我马上意识到我中了苏丘克的圈套。他在回答我的话之前用一块大手绢擦了擦嘴。

“她是这样对你说的么？那个大名鼎鼎的儿子就是她唯一的孩子？下次你见了她问问她那个女孩——她丢弃女孩的事。”

蓦地，他的兴趣似乎不再是眼前的话题，他说话心不在焉，仿佛他思考的焦点已转到他心灵深处某个地方。他念念有词地说：“或许现在那女孩已死去了，或许更糟糕。那是个漂亮的女孩子。老头子——她父亲是很宠爱她的。每一年他带她到外面溜冰场溜冰回来，他都要一连花上几个小时，站在寒风中，为她拿着水管来浇冰面，这样冰面上就光滑些，让她玩个开心。她溜呀、溜呀，一个劲地玩。这时我妻子往往喜欢站在厨房的窗口看她溜冰。她说过看这孩子溜冰比看雪景还要好。她如今也去了——我的妻子故去了。”嫉恨使苏丘克先生怒火中烧，现在他仿佛被这怒火燃尽了，在我面前显得个子又小又苍老。

“苏丘克先生，”我说，“可是我已经失去了他，他过去曾经与他的妻子一道站在厨房窗边看邻居的女儿溜冰。”

“苏丘克先生，”我又说。

他看看我，猛然间他的双眼变得如同这9月的天空般湛蓝而洁净。“爱琳娜。”他说，“这就是那位波尔丘克家女孩子的名字。”说完他转过身不再说话，离去了。走向他那美丽的院落和空荡荡的房子。

在我等公共汽车的当儿，我心中感到非常疑惑不解，心理不能平衡。可以说我对安迪是了解得很透彻的，而现在我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有个姐姐，可能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会对我提起过的。他不可能知道此事。

但他又怎么能不知道这事呢？

这时，我身后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甜美的声音吟颂着一首街上流行的赞美诗：

我是一个可爱的荷兰小姑娘，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所有乔伊士街上的男孩子，  
都痴心地爱着我。  
我的男友名叫董尼，  
他住在法国巴黎。  
所有乔伊士街上的男孩子，  
都注视着我和董尼翩翩起舞。

梅卡的意大利实心面条，调料比我的要淡些，但满是新鲜的罗勒，味道很好。她的男友格里格和我们一同用了餐。他对豪沃德很恭敬，对我很客气，对梅卡满心喜欢。这样的聚会真不错。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很客气，很文明。但正因为这样，梅卡和格里格才明确表示他们俩想单独呆在一起。晚饭后，我就觉察出有人有强烈的性的要求，当然不是出自我们这边桌子。当我说明豪沃德和我一洗完碗碟就走时，格里格急忙起身一只手麻利地将碗碟放入洗碗槽，另一只手则帮我穿上大衣。

豪沃德和我驾车驶入了环形车道，出了城。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居然没对女儿说些体己话，开导一下她，这是我已在心中策划了19年的事。车一开上高速公路，我就抽泣了一会，豪沃德不解地望着我问：“你怎么啦，乔？”

“没事。只是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我想我失去了我的心肝宝贝，豪沃德……我会很想念她的。我不敢想象当我回到家里时没有了梅卡。”说到这里我能觉察出自己的喉头咽住了，泪水盈眶。往后，这样的情形还多着呢。城市的轮廓渐渐消逝在我们身后。在公路前面的是黑暗中的一条丝带。豪沃德随手打开了收音机。我们听了半小时的有关多伦多市商业区的交通堵塞问题。

当大卫宋城的万家灯火从地平线上隐现时，我喘了一口气。去年冬天安迪和我去过那儿看一次冰上溜石比赛。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冰上作溜石饼游戏，我倒很喜欢。安迪那天穿着一件过于宽大的溜石饼时穿的毛衣，自告奋勇地跳到了我们场中。他站在溜冰场的边上为鼓励我们而呐喊。当我们的滚石从他面前经过、掉进围栏或是不知怎么的在途中停下时，他就沮丧地苦笑。他真够朋友。

可是这么个好人就有人把他杀害了。是谁杀害了他呢？难道会是她的妻子？有小说说到毒药是女人的武器。还有布莱克那首诗已暗示了某种内在的危机。（伊芙曾在安迪被害的第二天出现在圣徒餐馆门口，并说过‘你们谁对安迪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的话。）最令人生奇的是，摘录那首诗时的签名用了E和A两个字母，如同新郎新娘在结婚请柬上的姓名首字母联写，两个字母向内卷成小圈状。

我们途经一个加油站，从豪沃德的侧面我已看出他舒了一口气。而我却头晕目眩，脑中萦绕着豪沃德讲述的那个关于伊芙·罗斯考特和她不幸的一家的故事。正如我的一个儿子说过那样“那天真够受”的了，我已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从车窗往外望去，只见两个城市之间的天空只是漆黑一片，并无星月，连一个农家院落也看不见。豪沃德关上了收音机。我们默默地赶路。最后，他转过脸来看着我：

“你想听新闻吗，乔？”

“不用了。”

他笑着伸手过来拉我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妇人。直说了吧，反正用不着兜圈子，我要离开一阵子。上周在多伦多时，我曾向你提到过的一位我在法律学校的老相识，邀请我到奥斯古德大厅去教授一期犯罪法课程。这本来算不了正式聘任，只是出于给朋友帮忙上上课、解解围而已。他们原来请了一位蒙特利尔的大牌律师，但临来之前那人却有个机会为电视台的法律讲

座作解说，所以他的差使就稀里糊涂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反正我已接受了邀请。”

“这可是件好事，对你来说是可换换口味呀。”

“是的。我想离开利宅那市，主要原因是安迪已经不在世了。没有他，我们党竞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就不大，我就不会受到激励。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

“我想会有更多的原因，”我说，“是不是因为玛蒂的缘故？”两年前，豪沃德的妻子离开了他，搬到多伦多居住。他从不提此事——至少对我如此。不过我倒听到过一些谣传——那些往往漂浮在不幸后边似是而非的东西。

“对，”他说，“是为了玛蒂的缘故。她是个好天主教徒，但我却是个有罪过的教徒。”

“你还爱着她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爱情是否与我们还有缘分。但不知怎么的，我总不好把30年夫妻的情分撇在一边，却对她说：‘啊，多谢你啦，我已另有打算。’”

“那玛蒂又是怎么想的呢？”

“她说她有个理想的工作，有朋友圈子，还说从事政治活动使丈夫不热衷于家庭生活。她还说如果我不改弦易辙，休想重归于好之类的话，但归纳起来，她说的只有一句话——她认为我和她的关系完结了。”

“那你不这么认为啰？”

“我也说不清。我想我是改不了啦，但政治只不过是个借口，你看你和伊安不就是绝好的政治佳偶吗？”

“事情就是这样的，”豪沃德温和地说，“你知道，乔，表象和实质总是不一致的。”

“但一开始事情却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开始的呢？多年来我一直都了解你和伊安，我认为你们俩总是合为一体的——克尔本一家。或许玛蒂对我的看法是对的。我这个人生来就愚钝。”

“在谈及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内幕时，你不会比我们其余的人笨。你说得对，伊安和我就是一体，这也正是我们——我不打算成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的原因。你读过戴·赫·劳伦斯 的小说吗？”

“很久以前读过。”

“嗯，那好，伊安和我就是要做劳伦斯笔下所描绘的如火的双星，既独立又灿烂辉煌，后来……”

“后来伊安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豪沃德说完了我的话。

“我怀孕了，就灭掉了一颗星星。第一次参加大选时，我们已经二十九岁。梅卡就是选举那天出生的，记得吗？”

豪沃德爽朗地笑出声来了。

“肯定记得。我总是对梅卡说，她的降生真是太明智了，因为这以前我们一直在盼望着建立起一个人间天堂。”

“在我看来倒不像是人间天堂。我唐突地做了母亲，我的丈夫是一位二十八岁的省里的大法官，而且是一位毫无经验来主持大法官办事处的大法

官。”

“乔，我们中谁对任何事都不会事先有经验。当初我们拉的那帮年轻候选人——我们估计他们会对我们首次竞选运动失去信心，直到下次选举，嗯，也许我们该结束这件事。然后，嗯……”说到这里他伸手过来拍拍我的膝盖，感到很是尴尬。“你还记得那晚揭晓的选举结果吗？他们是不是在你的分票房中安置了一台电视机？”

“豪沃德！”我呻吟起来。

“我猜想他们没有。反正当我那晚收看结果时，我简直喜出望外，我的上帝呀！首先得知我们竞选大获全胜！后来得知，获胜就是要由我们的人组成政府。”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伊安总是那么好，乔，在他任大法官时出的差错屈指可数，况且他是那么精明强干，能使选区的工作顺利进行，只是——”他很快地扫了我一眼，又说：“——那是因为有你在那儿，对不对？对不起，乔，我早该了解这一点。”

“豪沃德，用不着为好久以前的事抱歉，事情早就过去了，我老了，用不着去计较这些事了。想当初，我开始政治生涯也是始料不及的，但后来我喜欢上它了。还有一点——举足轻重的是，我认识到政治工作是重要的工作。不过，豪沃德，玛蒂也会认识到这点的，她真正意识到了。无论她现在怎么说。我们本身也都是修正主义者，当新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我们也会改变观点的。”

“告诉我，乔，”他说这话是那么平静、低声，几乎让汽车发动机的嗡嗡作响和计程表走动的沙沙声所淹没。“告诉我以前玛蒂是个什么样的人。”

“让我想想看。我想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大选几周后。那是梅卡去世后我第一次去郊游。我理所当然带她一同去。你还记得吗？是有人提出这个好主意的。他们认为我们这帮人该到乡下去显示一下我们的新阵容。那次我们当中好些人都去了乡下……”

“是去那个叫麦克科李斯特的河谷。”他说，“那是值得记忆的一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年雨水真多，一直下到圣诞节前夕。我从未见过那样多雨水的年份。当然反对党也利用这点大做文章。那时查理·帕特还是党的领袖，他在议会里作了一次很糟糕的演说，那次演说证明了上帝的愤怒，因为人心对这个党的向背已经是明确了。他还讲到查理和他的那帮人本来要造一艘方舟来拯救省里——当然是比喻说法。那个老混蛋……”说到这里他大笑。

“反正无论怎么说，”我说，“你和玛蒂是见过城里的大场面的，她至今仍还是那么正统。”

“我还记得那次——”豪沃德在追忆以前的情景时面部表情变得温和起来。“那天就在我们到达麦克科李斯特河谷前，我们的汽车被陷进了强粘土当中。玛蒂脱下了她的鞋和长统袜，将两只鞋分别插进两边的大衣口袋中，光着脚走过了泥泞地段。”

“那时伊安和我正在大厅里等你们，”我接过他的话头说，“这时有人叫了起来：‘省长来了！’我当时从未见过你，听见这叫声，我的心都快要停止跳动了。我就要见到我们的省长和夫人！他们推开了爱尔克什大厅的门，我一眼就看到了你，还有玛蒂。她穿着晚装长袍，下部卷起大腿部位，膝盖以下全是泥巴，但她却是笑容满面的。”

说到这里，我们俩都笑了。豪沃德揉了揉眼睛说：“你该听说过她在回

家途中在车里的情况了吧？连吃正餐时她都不吭气，在大庭广众当中，她总是举止最优雅的女士，不像……”

“不像伊芙。”我说。

“对，不像伊芙。”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为我们所熟知的激昂。

我们花了好一会来回忆从前的时光。后来豪沃德又打开了收音机。我们一边听，一边漫无边际地闲聊，直至豪沃德将车子在我东湖路的屋前停下为止。那地方依然故我，我舒了一口气。终于到家了。

“在乔的天地里一切都好吧？”豪沃德问。

“不对，”我说，“不过我将活下去。明天你将乘哪一班机走？”

“乘1点30分的——到多伦多时正赶上401车道上的车辆高峰期——那是玛蒂最爱讲的都市生活的魅力所在。”

“要不要我开车载你到机场？”我问。

“好呀，”豪沃德说，“那就太好了。”

“那就这样吧。”我说。

“好，”他稍带玩笑的口吻说。

“就这样说定了。”我说，“我得赶紧进屋去，以免孩子们会打开门廊的灯一闪一闪地射向我们。”

豪沃德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月光下，他的脸呈银灰色——宛如黑白电视屏幕上的一尊人像。他对我说：“我真会想念你的，伊安有你这么好的伴侣真幸运。”

我俯身过去吻了他的面颊。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是那么熟悉和让人感到舒服——那是男人刮脸后散发出来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和柠檬味儿。我说：“我同样会想念你的。玛蒂也是个幸运的女人。真讨厌，人人都要撇下我，离我而去。”说完，一把抓起我的手提袋就跑上了台阶，生怕让他看到我流泪。

我的两个儿子把家料理得不错。屋子收拾得够干净的。我原来为他们做了一砂锅的金枪鱼头天晚餐吃的，他们把它放进了冰箱中，放在我为他们准备第二天吃的干辣椒旁边。垃圾箱内扔下了两个比萨饼盒子和半打“大湾”牌饮料纸杯。孩子们已洗过淋浴，正在床上看反映美国50年代在朝鲜战场时的喜剧节目重播，兄弟俩亲亲热热的。我看到后暗自庆幸，感到宽慰。我在彼得床边坐下，与他们一道看完了节目的后半部分。节目结束后，我向他们谈了梅卡新居的情况，然后洗个淋浴，穿上我的睡袍。当我走过梅卡的房间时，我有意识地把目光移到别处。随即我走下楼，将茶壶放到炉上准备煮茶，蓦然间又改变了主意，拿出一个柠檬和一些蜂蜜来，为自己配制了一杯热柠檬朗姆酒，把它倒进一个口盅。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想会是梅卡或是豪沃德打来的，他们一定知道我这会儿好孤寂。但却不是他们俩的声音。那是一个男人的，我熟悉的声音，但我就是分辨不出是谁。

“乔妮，你吃奶油冻时放不放熏的或是烤的大马哈鱼？”

“要看哪种便宜一些。”

“好精打细算的妇人啊。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打扰你，因为我明天有人来吃早饭，我又不惯于早起，所以只好这时给你打电话了。”我依然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只好又和他聊下去。

“做那道菜要烤上两个小时，那你今晚不睡觉啰。”

“我已拨好了闹钟，所以只要钟一响，我就会从床上爬起来，把它从烤

炉中取出来。尽管做这道菜很麻烦，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要给那位自鸣得意的部长做。”

那疲倦的、熟悉的声音，往往充满感情的将字句卷过——啊，我明白了。“瑞克，瑞克·什班什，真对不起，我有好一会听不出是你的声音。”

“乔妮，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去它的，我最讨厌那些认为你认识他们的人。请原谅我这个糊涂虫。现在我们来谈点别的，你今天过得好吗？”

“我们如果谈煮鱼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了。不过我的一天过得很糟糕。我刚刚与我那可爱的小姑娘告别，让她与她的新同伴，也就是她的男友呆在一起。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豪沃德就是我最要好的男友了。不过他刚刚告诉我他要搬去多伦多的奥斯古德讲堂去上课。”

电话另一端的那个声音立刻变得警觉而又机灵起来。他问：“那是讲给公众听的课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讲。本周开始上课。他明天就走。他一去我感到自己倒成了小孤女安妮了。”

“那么我为我这时候给你打电话而高兴。我不敢想自己能取代梅卡的位置，但你可曾想过，我能暂时做你最好的男友没有？”

我听后笑了：“不过，我的男友们并不是正在这儿排好队等着我呢。”

“我正要告诉你，乔妮，我对我自己作为你的一个朋友所负有的责任是认真对待的。”

我相信瑞克的话。自上次我与他倾心长谈以来，凡事我都与他商量，未了，我说：“上次我们了解到安迪还有个姐姐的事的确叫我吃了一惊。了解人们的秘密是可怕的。这对别人是一种冒犯。如果你不想卷入，我也可以理解。”

“不，不，肯定不是这么回事。”他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是这个意思。“乔妮，要是我这会儿在你那儿的话，我会像亲兄弟一样待你，可是我是在渥太华，我要做议员们做的事。我要起誓去完成我们的使命。”

我们俩不由得都笑了，关系已重趋融洽。“我想，掌权的会是罗马教派的议员们，不会是我们的人。”

“嗯，管它是谁支持什么，我，瑞克·什班什，庄严宣誓，要做乔妮·克尔本的朋友。”

“到死才分离？”我笑着问。

“到死才分离，”他重复我的话，但听起来却不像是在笑。

接下来的三周是在糊里糊涂的事务中度过的。安格什一看见他的那位八年级老师就讨厌，但我们商讨后认为，与她打交道反倒可以锻炼性格的形成。彼得参加了足球队，我着手安迪自传的研究。

不过我们大家都思念着梅卡。

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似以往那样：牵狗出门早跑，吃早餐，孩子们上学，早些吃晚餐、打球，孩子们做家庭作业，然后就寝。星期六早上我们上湖畔俱乐部去。因为梅卡不可能再与我在更衣室闲聊了，所以我便给自己增加了15分钟在游泳池中的活动，让波浪拍打我的身体，有多惬意。

光阴荏苒。

10月的第一个清晨，我睁开眼睛之前就知道外面在下雨。因为从我卧室窗口吹进来的风带有潮湿的树叶味和寒意。我顺手打开了床头的灯，顿时，屋里洒下了舒适的淡黄色的光圈。我拧开收音机，一个女人用造作的管家婆似的、严肃的声音报道了利宅那和萨斯克顿正在下倾盆大雨。梅卡和我一同领受着上天的甘霖——看来是个好兆头。我大声叫醒两个男孩子去淋浴，然后下楼去。夜里厨房门被吹开了，我光脚踏在又湿又冷的地板上。我把狗撵出去雨中跑跑，把咖啡炉打开，便拿起了电话。正好是早上7点，如果我马上打电话，还会在他家里找到德夫。电话铃响了第一声他就来接了。

“德夫，你吃早餐没有？”我问。

“还没有，我正准备放一个鸡蛋下去煮呢。”

“那就别煮了，等我叫孩子们吃饱上学后，带你到外边吃早餐。”

“乔，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我们去三泊地那家俱乐部餐厅怎么样？不到半小时路程。今天那里连个鬼影子都不会有。他们的肉桂小圆面包做得棒极了。”

“听起来倒不错，不过还是1小时内去的好。”我说，但他已挂断了，德夫不喜欢打电话。

三泊地俱乐部餐厅是城南最隐秘的去处。那是一幢外观奇特的六边形建筑，有许多玻璃窗，坐在里面用餐，给人一种如同坐在绿地上的感觉。那是一家夫妻店。在大楼的一边，女主人收费为人修指甲和负责俱乐部的租赁；在另一边，男主人经营着一家小餐馆，出售早餐和三明治。夫妻两的姓氏分别为爱尔和埃迪斯，他们两人系着相同的皮带像牛仔式的挽至背后，上面烤上了他们的姓氏。我是从这儿得知的。至于为什么他们会在三泊地买下这么个俱乐部却无从得知。他们并不靠大肆宣扬来吸引顾客。然而，经埃迪斯修过的指甲总是完美无缺，正如她自己那椭圆形紫红色的指甲那样无可挑剔；爱尔的烤面包技术也是城里最高明的。他们以此为荣。

当我将汽车停在俱乐部餐厅后边时，看见德夫那辆像万圣节红苹果般闪闪发光的布朗尼克牌汽车早已停在那儿了。他的车还是停车场里唯一的一辆车。从玻璃窗看去，我可以看见德夫在柜台后边正在倒咖啡。他和爱尔和埃迪斯夫妇一见如故，这一点并没叫我吃惊。德夫也是很讲究的。我一走进屋，他就为我递上了一杯咖啡。

“我看见你来了，乔。我想你可以在此暖和一下。”说着他将双手放在我的肩上，倒退回去，认真地打量起我来。“你显得很疲倦。”

“德夫，你对我们所有人都这么说——说真的我很好。”

德夫指了指一张靠窗的桌子，窗户开着，桌上是湿漉漉的雨水，不过空气却很清新，我也就让它开着。从那空荡荡的高尔夫球场飘过来的雨点溅在桌面上。天空是灰色的，布满了乌云。不过我们坐在那儿暖融融的，感到很舒服。

我们一边吃着肉桂小圆面包，一边闲扯——从我的孩子谈到定于12月份召开的党内领导会议。克里格·伊文森前天已宣布参加竞选，不过已经是有争议的候选人。显然安迪曾预言人们会记得他对克里格作为竞选候选人的抨击，安迪说得对。我们吃完早餐，德夫又从柜台拿来了咖啡壶，为我们斟满咖啡，把壶送回去，重新坐下，两眼瞪着我。

“乔，我能为你干点什么吗？”

“我想我的要求不高，德夫，我只想要你提供一些情况。就是有关那个红褐色头发老妇人的情况。那天为安迪举行葬礼后，你曾与她交谈——你知道，就是安迪去世那天报纸刊登了她的特写镜头的神秘的妇人。”

德夫把视线移向窗口，说：“乔，看见外边停车场上那只小鸟吗？你能说出它是从哪儿飞来的吗？看起来像只匈牙利鹧鸪，不过被雨淋湿了很难分辨。”

我一言不发地听着。

德夫没有看我，他的目光一直集中在停车场上，那只鸟儿正从我汽车不远处跳着，扑棱着穿过一滩积水。

有好几分钟，我们默默相对而坐呷着各自的咖啡，观望着，等待着。最后，他耸耸肩，仿佛对什么事已经作出了决断似的，说：“我想既然安迪已经死了，说出来和不说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我永远也不理解这也会成为一个谜。那老妇人名叫兰·埃帕里贝，她丈夫叫查理·埃帕里贝。他们是温尼皮格人，至少查理是温尼皮格人。他于几年前去世，留下大宗值钱的房地产。不过，我想，人们是从曲棍球比赛中得知他的名字的。他曾为蒙特利尔皇家队效力，退役后，他去了马尼特贝，组织了一帮人，并买下了温尼皮格队。他投入了约一百万加元，为球员们购置了非常漂亮的制服，为球队取了个新名字。”

“红河皇家队。”我说。

他抬头惊讶地看着我。

“我不可能做他的帮手，德夫，但我是加拿大人，这些事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笑了：“你真不愧是加拿大人。对不起，乔，还得让我来为你讲完这个故事。”

“事实上没有多少值得说的。事情始于1970年，我党首次大选时，豪沃德那时是党的领袖，安迪第一次被提名为我党的候选人。豪沃德给我打电话说他那儿有些钱是给安迪竞选用的。你知道所有超过一定数目的捐款都得写下捐赠人的姓名，对吗？所以我记得此事，但我记不起具体的数目了。当然为数一定超出了规定要记名的捐赠数。我猜钱是豪沃德的。安迪曾是他的学生，真正是他给安迪施加压力要他去参加政党领袖的角逐的。我们这样认为就比较合理：豪沃德为安迪竞选出资，却又不想让别人认为对安迪施予恩惠。”

“我以我的名义捐赠了那笔钱，选举后我从安迪那儿得到了一封感谢信，而且是亲笔手书的。这事很有趣，但我想，我和安迪的友谊并非是从捐

款开始的。不过我每年都是如此，即使在那些没有大选的年份里，我也将款子交给安迪的选民协会。在选举年里，我为他的竞选运动捐赠的款项会达到法定限度。时间一年年地逝去，我和安迪因而也成了朋友。我除了对他说‘你不用谢——希望这些钱会对你有帮助’，很难对他说别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去年豪沃德从党内领导职务上退下来时为止，角逐又开始了。”

“豪沃德辞职后便到了省议会办公室，他得了一大笔现金——总是现金。这时豪沃德来见我，他不是拿来了钱，而是来向我解释的。他说该是让我知道比赛比分的时候了，还说如果我相信他赞成安迪而不是其他候选人成为党的领袖，我就可能感到他们和解了。接着豪沃德又对我说了兰·埃帕里贝的故事。那天早上豪沃德在我的办公室里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更为激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兰给安迪捐款的做法就是很奇特的，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真正是源源不断地将钱送给安迪，这种做法少见。”

“事情始于安迪还在豪沃德教的班里学习时。开学约有两个月，豪沃德说他接到了一位老朋友从温尼皮格打来的电话。那人是查理·埃帕里贝的律师。他说查理听说过有关安迪的一些了不起的事。这事叫豪沃德也心存疑虑。因为，据豪沃德说，安迪是个踏实的但却不是很突出的学生。反正不知怎么回事，查理想知道他能否资助安迪上学，而且以匿名的方式。当然，也许是通过授予安迪奖学金来资助他。嗯，你也知道，要办这类事得经过各种官方渠道，但这根本不是埃帕里贝的律师想要做的。因此，当时豪沃德想帮助一个有发展前途的乌克兰孩子，想到接受这笔钱没有什么不对之处，何况又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束缚，所以他同意建立起几个继续研究项目，让安迪参加，做他的助手——当然是有回报的，即给安迪奖学金。”说到这里德夫饶有兴致地摇了摇头。又继续说：“只有搞学术研究才好提给安迪奖学金的事。”

“这只是开头，后来，豪沃德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渠道，保证了埃帕里贝的钱能送到安迪手中，直至安迪去世那天为止。事实上，在安迪被害前约20分钟，兰·埃帕里贝还交给我一个信封装的现金作为安迪竞选用。这就是在安迪葬礼完毕后，我与那老妇人谈话的原因。她不肯将钱拿回去。”

“那么埃帕里贝夫妇得到什么回报呢？”

“那我真不知道。乔，我坐在这儿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时不时地还有所警觉，不过渐渐地我对他们捐款的事忘了警惕了，但安迪对这事是从来不知道。我敢向你保证这一点。埃帕里贝夫妇从来未从捐款中索取任何特别的回报。无论是从安迪那儿或是豪沃德那儿和我这儿都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我想；乔，我已经把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我劝你别再纠缠在挖掘旧事中，你再也不会有所得的了。”

“我不会就此罢休，德夫，因为这是一桩谋杀案。我们的朋友遇害了，我们怎能熟视无睹？说不定兰·埃帕里贝会提供什么线索，帮助我们去找杀害安迪的凶手呢？我要去见兰，德夫，如果我要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话，我还需要会见许多人。”

他显得苍老和无力。“难道警方讯问了安迪的一切还不够么？乔，他们来找了我六次，向我查问了安迪从财政情况乃至上厕所的习惯等一系列的事，难道他们这样做对安迪的私生活还侵犯得不够吗？我们作为他的朋友，难道就不能让他在地下安息？”

“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德夫，请……”

但他根本不听我的话，他抽出一支笔和一个小日记本，在一张餐巾纸上

潦潦草草地写下了什么。

“给你，乔，”他把那张餐巾纸递给我，他的脸色表明他内心说不出的哀伤。“我有一种预感，如果你着手调查这事，你会感到遗憾的。但愿我的预感是错误的。今天的早餐我付账。”

我伤了他的感情，但却不知道缘由。但当我看到他灵活的身影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雨幕向他那辆布朗尼克车走去时，我感到喉咙哽住了。当他那辆红色的轿车驶离停车场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坐在桌边，凝视着窗外，直到爱尔得意地走过来擦桌子以便准备中餐，我才马上抓起那张餐巾纸。一看，德夫用他那整洁的、教师般的书法写下了兰·埃帕里贝的地址：温尼皮格市曼区土克西多公园路 824 号。

还有两个电话号码。在第二个电话号码后，他写下：“这是她不公开的电话号码——给你最好的机会。”

那天我和德夫谈话后便驾车到了吾尔夫河。前一天晚上，我已经为自己在奶奶公寓建好了一个办公室。我和两个儿子共进晚餐，然后安静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削削铅笔，将采访记录本贴上标签什么的。还打了几个电话。首先是打给阿丽·苏德兰。自从安迪死后我就一直未与她交谈过。在我看到兰·埃帕里贝的地址时，我一直联想到阿丽曾公开邀请我到温尼皮格去拜访她。还有十来天就是感恩节了。所以我决定先打个电话给她，看看我们是否会受欢迎。在电话的另一端，她的声音热情而又惊喜。她说：“啊，乔，这是我祈祷的事——过一个真正的感恩节，有好吃的，还能和家人团聚。啊，上帝，你听了我的话一定以为我是迪斯尼电影中的沃尔特那么天真。我们原来是计划从熟食店买外卖菜叫他们送过来的。不知他们平时卖的招待一般朋友的菜，能不能有在假日里全家人聚会吃的那么好，你看呢？”

即使是在伊安去世以后那几个黑暗的月份里，阿丽也是能使我微笑的人。

“我不能想象你们夫妻俩没有朋友，”我说。

“相信我，今年夏天会不一样，莫特已经忙开了。我想我要招待一半南温尼皮格的人。老天，我老在这儿发牢骚你又不来，你先安排一下菜单再给我打电后。乔，我好让莫特去采购。到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我来打下手，做剁肉之类的事，反正不论做什么菜都行，只要有一道菜是你喜欢的。大马哈鱼奶油冻就行了。你就指点指点行了。就像我们从前聚会那样——太好了！总之，我提醒你——列个菜单再给我打电话来。多多保重，乔。”

我几乎不能打通给兰·埃帕里贝的电话。她的管家像哥特恐怖小说中的管家一样守护着主人。她总是说，埃帕里贝太太正在休息，不宜打扰。我看看表在温尼皮格刚好是晚上 7 点钟。“请告诉她我是乔妮·克尔本，是来谈有关安迪·波尔丘克的事的。”我这样一说，兰·埃帕里贝立即就拿起了话筒，不过听起来她是不应该受到惊扰的。她的话语无伦次，似乎不连贯，听起来像是服了药或是喝醉了似的。不错，她知道我是谁。她已经答应了在感恩节那天见我。我重复地说了四次，我将去温尼皮格的日期，证实一下他们是否将我和兰的约会登记下来。

我将电话挂上，很怀疑到第二天早上兰是不是会记得我曾给她打过电话，但我总得要向她问我要问的问题。现在我倒要看看要问她些什么了。为此我必须找出那个了解兰·埃帕里贝的人来，着手的地点就是吾尔夫河。

也是该再看看伊芙的时候了。我需要找出答案，我的感觉告诉我，伊芙

知道答案，有必要给她打个电话。

我还想给梭伦·伊默斯打电话，他或许会知道，为什么兰·埃帕里贝决定为那个位于选区中间的小教堂捐赠数百万元，那个地方正是安迪·波尔丘克的家所在地，也是他的政治基地。

我打电话给伊芙时，发现她心不在焉。当然，我可以去拜访她。她会整天呆在她的陶器收藏室内，那倒也不要紧，不过，我去后，她会摔那些陶罐——谁也不会要的罐子。

我用不着给梭伦·伊默斯打电话，他打来了。他的声音带孩子气而激动。他说他原来早想给我打电话来道歉，但那段时间他的确很难过，只好作罢。我想我能否早些去让他带领我到那所学院到处看看？如果这样对我更好的话他会开车进城来接我去。当我说我第二天中饭后开车去见他时，他似乎如释重负。从他那挂断电话之前说的话，使我想到了，或许他这次来的电话并非一般的社交电话。他说：“你的来访对我意义重大，克尔本太太——乔妮，我很感激你——非常感激。”

我翻看了工作日记中下几周的安排，除了三个要拜访的重要人物——伊芙·波尔丘克、梭伦·伊默斯和兰·埃帕里贝外，我还用铅笔画出了与省档案馆馆员的约会。是与安迪选区的议长和曾与安迪在政府内一同任职的八位同事一道去的。计划已定，我灵机一动，抓起了电话听筒，给渥太华打了电话。瑞克·什班什马上回了电话。四件事情都办得顺利，可以说那晚我算得上幸运。

“瑞克，你好，你的那位内阁部长朋友喜不喜欢你做的大马哈鱼奶油冻呀？”

“他狼吞虎咽地将它吃光，什么没说，倒是给我留下了几句我听过的谣言——说我浪费了你的好配方和十二块钱去买涅夫考兹·诺瓦出产的熏大马哈鱼呢。乔妮，听到你明智的声音真是太好了。”

“听起来你很烦恼。”

“我本来就很烦恼。这地方像蒸笼，已达到你可能没听说过的10月份创纪录的高温，湿度也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坏天气加上有人打来的有关选举谣传的电话，真叫人快烦死了。上帝，乔，为什么偏偏叫我们卷入了这类事？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文明的人们正在倾听着拉芙的四重奏和谈论着普鲁斯特这个作家。唯有我总是开着汽车在这座城市里到处跑，在这酷热当中去追查某人的笨蛋妹妹是否认识某个为广告代理商工作的人，因为那人曾说过政府已禁止将10月份和11月份的广播时间预定作广告用，还说命令随时会下达。上帝呀，人人都变得这么忙乱。政治家们正在那儿怒气冲冲地等待着议员号召总督行动，我们也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任何事情的发生，最后我们好有些闲谈资料。对不起，乔——这是渥太华的通病——狂热病。啊，上帝，这儿真热死人了，你一切好吗？书写得怎么样了？”

“我挺好。很凉爽而有秩序——正坐在奶奶公寓里，有空调机嗡嗡的响声伴随着我，还有一书架满满的原始资料，一箱尚未用的稿纸，一筒削尖了的铅笔——正准备动手呢。”

“没有文字处理机，没有个人电脑——乔，谁会想到你会和恐龙一样原始？”

“谁也没有见过我摆弄一个有两个以上移动部件的装置。是不是恐龙不要紧，反正我认为我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德夫为我提供了一些材料，表明安

迪和兰·埃帕里贝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就是那天安迪被搬上救护车时，以后他又……照片上的那位神秘的妇人。你知道的，以后……豪沃德对我说埃帕里贝夫妇从安迪的大学时代起就资助他，这些事对我来说可算是个重大线索。今晚我已打过电话到温尼皮格，兰·埃帕里贝同意在感恩节周末见我。”

“感恩节见你？乔妮，这就是永远不见了。”

“那是对美国人而言，这儿是加拿大，记得吗？我们会在藤上的果实结冰之前庆祝感恩节的。从星期一算起是一周之后，我的朋友，那是10月10日，我想日子对我们来说过得太快了。反正从现在起，我要弄明白埃帕里贝和波尔丘克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要向她提出一些该问的问题。明天我将去看伊芙。”

他的话直截了当：“她好吗？”

“嗯，老实说吧，电话里听起来她有点心不在焉，不过就连在最高兴的时候，伊芙也总是心不在焉的。”

“当然，现在不是她高兴的时候。”

“对，他们大多数人肯定会不高兴。我猜任何人也不会高兴。今晚我接到梭伦·伊默斯一个电话，还记得他吗？就是那个神秘的牧师。当我同意去看望他时，他刚好很沮丧，我不知为什么。”

“他长得怎么样？你觉得他如何？”

“嗯，我见到他那几次他都非常地不安。我记不清了，不过我想我在野餐会那天在救护车旁曾见过一下他。救护车开走后他在照顾罗玛。第二天，我又曾在吾尔夫河他的办公室里见过他。在安迪葬礼结束后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和他简短地谈过。我几次都是在他感情受到冲击时见到他的，但即使是那时他也是相当有趣的一个人。”

“相当什么？我没听到你后面的那个形容词，乔妮。”“相当有趣。他的外表——他是那种不容忽视的人，可以说他是你会感到他在房间里存在的那种人。你知道，他长得很漂亮，很像歌唱家詹姆士·泰勒——很高，瘦而黑。有戏剧演员的风度。他全身穿着黑色的衣服。总之，他是一个惹人注目的男人——很性感。”

电话另一端的人没说话，我怀疑我们的通话是否被切断了。

“瑞克，你还在听我说话吗？”我立刻问。

“对，我在听。对不起，我得走了，我明晚再给你打电话。”他说话时声音有些紧张。我想到他突然感到尴尬就好笑。或许是出于嫉妒——我刚才对他谈梭伦·伊默斯有点过火了，高瘦、黑而性感，又很漂亮，正如我们在高中时那样喜欢夸大其词，未免对伊默斯过于褒奖了。瑞克不会喜欢，因为——想到这儿我就全身发热——因为瑞克对我很感兴趣。

自从我与一位男士有罗曼蒂克史以来已经很长时间了。使我甚至忘却了自己的空虚和脆弱。

我说：“瑞克，明天能再与你通话太好了——什么时间都是好的。”

“晚安，乔妮，谢谢你。”电话中断了，我独自坐在奶奶公寓里回忆着瑞克声音中的热情，我笑了……

当我驾车沿横贯加拿大的高速公路往吾尔夫河驶去的途中，我力图回忆《致秋天》那首诗的第二行。我记得是“多雾季节瓜果成熟”，接下来是一些描写炙热的太阳的诗句。

我望着车窗外被太阳烤焦了的田野和长势并不好的庄稼，想到我们省里

今年不会有许多农民去为今秋火辣辣的太阳唱颂歌的。安迪的葬礼后断断续续地下过一周的雨，但早已被大地吮吸得一点踪迹也不留。雨降迟了，土地一直干旱，不过，英国诗人济慈对这样的早晨也能诗兴大发——歌颂灿烂的阳光，高高的苍穹，蓝天映衬着大地。当我缓慢地、安全地驶过贝里·帕莱茵立交桥时，我意识到那是一个快活的日子。

我将车驶入伊芙家旁的车道，停在她用来放陶器的小屋前。时间是9点刚过。那幢整洁的、有三间卧室的平房，曾经是伊芙和安迪·波尔丘克不幸的家。我驾车驶过时就已经注意到了是那么洁净有序。风雨窗在阳光下反射出强烈的光，屋边的矮树丛被用麻袋布裹好，花圃已被翻过。那是一个已限定了死期的人对这间屋子的照料。不过按伊芙自己来定调，事情又会完全不一样。屋外的草地没有修剪，开始枯黄，到处是种花的陶瓷盆。有的瓦罐和花盆用支架盖着，一群猫在枯萎的草地上的花盆中的植物茎中窜来窜去。就连我这双未经训练的眼睛就看得出来，所有这些不出售，也没有销路的东西都说明了它们处于一种反常的状态。

当我眯着眼睛望太阳时，伊芙从一个有靠架的花盆后走了出来。她看来紧张但很漂亮。她长长的灰色头发从头中间分开，结成两条粗辫子垂到双肩。她没穿鞋袜，穿着蓝色的工装裤和斜纹粗棉布的工作衬衫，况且那衬衫退色到快成白色了。她拿着两大块用干净的厚塑料包好的刚挖出来的粘土，那两块粘土已被圈扎好作手提之用。

她的衣袖卷到后边，可以看见她手臂的肌肉由于拿着粘土而绷得紧紧的。她把粘土块扔在我的面前。

“乔，帮我拿进来好吗？我还要去搬几块来。”我把手伸到塑料圈里将粘土提起，不过粘土没有移动一厘米，但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脊椎骨快要断了。第二天我就满四十六岁，我可不想在庆祝生日时上夹板。

我将粘土放在我面前的地上，说：“对不起，伊芙——我帮你开门，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啊，乔，这东西一块不会超过40磅重。”说着她将手伸进那个塑料圈，提起粘土就往工作室走，我像木偶般跟在她身后也走了进去。

伊芙的工作室令人意外地感到舒适而适用。那是一间正方形的，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凉爽的屋子，四周都有高高的窗户。秋天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将屋里的尘埃变成了团团黄色的迷雾。靠窗口下边是许多放满了陶器的架子，这些陶器刚完工，还没有经过煅烧。屋子的中央有两张工作台和一个加工陶器用的轮子。沿一边的墙角有一张放满杂物的长桌子，上面堆满了诸如装着海绵的退了色的塑料瓶子，装满刀具的一加仑的冰淇淋桶、大蒜压模之类，还有别的杂物。总之，这些东西足以用来在湿的粘土罐上压出装饰画来。屋角还有一个灼热的盘子和一个老式的水槽。

伊芙弯腰从刨陶器的轮子上捡起一团粘土——那是一小团尚未成型的粘土。“这叫做回收，”她说。但我注意到她那双总是很灵巧的手，在挤粘土时颤抖了。“见鬼，”她说，“对不起，乔，今天我做事老不顺心。”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不用，都是老一套，”她含糊地答道，“除非……乔，我有时稍稍锻炼一下，倒能使我镇定下来，跟我一块做吧。”

我感到不安，因为伊芙从来都是善于观言察色的。“你担心和傻瓜打交道会使你变傻吗？我保证不会对你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来，乔，跟我做做或

许会给你带来好处呢。”

她从一个磁带的箱子里乱翻，并以迅速决断性的动作将我们进屋时正在放的那盒磁带取出来，换上一盒听起来像在牙医办公室内放的那种轻松的音乐——有长笛和波浪拍岸的声音。然后，她拉过两张椅子，并排放好，说：“现在坐下来听，把一切排除在外，只听我的声音和音乐声。”

“作深呼吸，清理性的呼吸——好——现在将你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感受一下它们周围有风。”

磁带传出来的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和海鸥嘎嘎的叫声。伊芙说：“闭上你的眼睛……想想你熟悉的人的双手。”（盖过海浪声是长笛悠扬而哀伤的调子，在《旧约全书》中长笛声是死亡的象征。）“想想那些你忘不了的人的双手……你父亲的双手……母亲的双手……奶奶的双手。”伊芙又说。（我想起了伊安抚摸我的温暖的双手，还有梅卡还是婴孩时小手绕在我的手指上……彼得的手是那么的健壮，他抓住我的手领我走过圣·安西门教堂的走道去参加他父亲的葬礼。）伊芙又对我说：“现在想想你自己的手……想想你这双手所做过的事……想想你的手是如何学会拿勺的，如何抓铅笔，如何系鞋带……总之是你的双手做过的一切事。”（现在传来的是长笛声，还有鲸鱼的吟唱。）伊芙又说：“想想你在工作，玩耍和做爱。”

“摸摸我的手，乔，”她又说。（她的手大而壮实，指尖因为有干粘土而变得粗糙。）她又说：“手是你心灵的伸延……摸摸我的手，握紧……现在松开……触觉消失了，但留下的印象却是永恒的。”（传来的是海鸥声、笛声，还有鲸鱼吟唱着死亡的悲歌。）“这些永远留在你心中。”伊芙说。

我们并排坐着谁也没有说话，直至磁带放完。伊芙显得很沉着，一只手包在另一只手中，手心向上，放在膝上。她的胸脯平稳地起伏，半闭着眼。我感到很难堪。我好像从来不能像别人那样进入状态。在60年代，我对于沉迷术就学不会——那种具有魔力的神秘的梦游与我无缘。但练这种功却改变了伊芙。当她转身来朝着我时，她脸上痛苦的表情一扫而光，只是那双绿色的眼睛看起来稍稍有点走神。我不是第一次想知道她年轻时不知做过多少这类的功夫。她说话时，声音轻而带有梦幻感。“你知道，我心中很平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现在可以睡着……啊，你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我觉得很可笑。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但我还得顺她的意。她至少要让我有个机会说话。“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伊芙，你认识一位叫兰·埃帕里贝的女人吗？”

“我想不认识。”

“伊芙，你该记得她，她就是那个……”我看着她的脸，她沉静得很。我不能说完我的话，我不能用这些刺激性的话去打破她的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种脆弱的安宁。——我不能向她提起那位曾经走过来和我们一道将安迪抬上救护车的妇人，那位一动不动站在伊芙婆婆身边，被啐了一口唾沫的女人，那位给伊芙儿子所在的教堂捐款的女人。安迪的无能的儿子就是在这所教堂中开始了他毫无希望的一生。

“那个什么人，乔？”这时伊芙问我。

我用手搂住她的双肩，说：“没什么，伊芙，来，让我扶你到卧室去。”

当我随她步入她那堂皇而空荡荡的屋内，我琢磨着所有没能问她的问题，但至少有一个问题是已经回答了。我不能将答案在法庭上证实，米勒·米勒德警长也不会赞同我是通过自己的调查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我可以肯定

伊芙·波尔丘克不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

我已经告诉了梭伦·伊默斯我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将去看他。我离开伊芙时才 10 点 1 刻，使我既没有足够的时间驾车回城，又有过多的时间在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周围闲逛。这个早上的时间真是无法充分利用。

于是我决定驶往吾尔夫河圣经学院，去看看能否找到萝利和马克·伊文森。伊芙让我担心，她的打坐什么的只能给她暂时的功效，世界上恐怕没有一种能使人轻松的技巧适合于伊芙的厄运。我知道如果我请求他们的话，马克和萝利会关照她。他们是受限制的孩子，但他们还是正派和可靠的。最重要的是马克与凯里·波尔丘克之间有联系，所以他们经常去看望伊芙。在他们的关怀下，伊芙不会感到孤寂。

当我驶入学院大门时，我感到进入了古老的米切——哥尔敦——梅尔电影公司拍的音乐片。学生们都已返校，校园里随处可见。按某些人的标准，他们是一群有吸引力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留着剃须刀剪的头发，衬衣的口子扣得很下，穿着色彩艳丽的灯芯绒裤子；女孩子们头发锃亮，仔细地化了妆，穿着与秋天很相称的色道的裙子、毛衣。配得好极了……不过，在这个闷热的 10 月天里，即使他们穿着得体也不能给人以愉快的感受。他们给人以一种由某个人精心设计的、不真实的学生的形象。我记得，在吾尔夫河曾有过一种着装模式，但这些学生精心设计的穿着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模式。我由此想起了我的那些学生来。他们穿着工装裤，或是剪了裤脚边的裤子或是灯芯绒裤，或束腰长裤。他们的发式可能是尖型，平头装或是鬃发或漂染过或干脆剃光头。尽管难以捉摸，但他们都有个性。记得彼得有一句话既可为他们作了结论又可以说到点子上：“他们看起来像是他们的母亲为他们装扮起来的。”圣经学院的孩子们看上去仿佛是由他们的母亲为他们装扮起来的，这有点令人伤心。

要找萝利·伊文森并不困难，我请一位穿着整齐的男生指引我，他马上就为我找到了她。他告诉我萝利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给人们指点方向。她那会儿正在 CAP 中心工作。我听后感到茫然不解。她笑着向我解释：“就是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可怜的查理中心——花掉了所有人捐赠的款项，现在却成了一个三个字母的首字母缩略词。

萝利正坐在中心的接待处桌子旁。桌上堆得高高的是学生们的手册。桌上还有一个牌子写着“请只管问我”。旁边还有一幅动画乌龟，面带微笑，在乌龟壳上还有一颗扣子，上面画有一张笑脸。

她一看见我就面露高兴的神色。她说：“啊，克尔本太太，你正是我盼着要见的人，现在终于来了。上帝总是聆听我们的声音的。”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看着我说了实话。我已经忘了她那迷人的快活的歌唱般的嗓音是怎么样的了。

萝利·伊文森是个迷人的年轻女人。在一幕音乐电影中，如果其余的学生像是多余的，萝利就是唯一的女皇。她那深色的金发披到脑后结成一根粗辫子，如同学院大钟的钟摆一样垂在她的双肩后。辫子用一束丝带扎好，丝带也和她的安哥拉毛呢开衫一样，都是黄褐带红色的。她穿的有条纹的格子呢裙子也是同一色的。她的脸和脖子被夏天的太阳晒过，在她那件白色的有眼孔的衬衫映衬下发出杏黄色的光彩。她实在美。特别是这次我与她的谈话快结束时尤其如此。

“我有一个吃营养餐的工间休息在——”她仔细地看了看表，“怎么，我的工间休息就是现在，”她声音中流露出幸运。“让我们一道去圣徒餐馆——有请，克尔本太太，让我为你买些馅饼。”

于是我和她一同走过那树叶繁茂的街道。我们走得很慢，每走几步萝利都停下来欢迎一些刚返校的学生或是主动向我介绍马克和凯里的新情况。她告诉我他们是如何为他们的儿子取名字的。“你知道，基督就像是陶工，我们是粘土，我们是由他制作出来的。”她如实地说。

萝利·伊文森似乎总是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她总是高高兴兴的。当她看到女友有一个漂亮的新书包时，简直会高兴得如同听到一个瘦削的男孩告诉她，自6月份以来他的癌症已经好转那样。如果那天圣徒餐馆的馅饼是用深碟盛的青苹果做的，她也会喜出望外。

当我们在餐馆的小包厢里靠窗口坐下后，她从桌面上伸手过来紧紧抓住我的双手，说：“我希望得到指教，现在你已经来了，真太好了。”

蓦地，我感到全身发冷又不耐烦。我说：“萝利，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那双纯洁无瑕的双眼却仍然盯住我的双眼，说：“有些事我得请教你，我已祈祷过，我要说的话是该说的。”

“萝利，你要问什么就只管问好了，只要我能回答的，一定会回答。”

“嗯哪……”她那悦耳的轻快的声音如同孩子背诵一首歌那样。“你会支持我的公公克里格·伊文森竞选党的领袖吗？”

我听后大吃一惊。我一直未能从安迪的死亡阴影中解脱出来，对党内领袖地位的角逐，似乎不是我的事。桌子对面萝利·伊文森用她那双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我，期待着我的回答。我不禁怒火中烧，想不到朱丽竟然让她的儿媳妇来对我谈这事。我于是说：“去它的，萝利，不，我曾告诉你的婆婆说我不会这么做，我也曾对你的公公说过我不会这么做，现在我还要对你说我不会这么做。绝不！我不会支持克里格·伊文森去竞选我们党的领袖的。他们究竟还要我再说几遍‘不’字？”

眼见萝利眼中涌出了泪水。我清楚地看到她的双眼青绿色的虹膜被一层隐形眼镜般的东西围绕着。她把发辫从身后拉到前面，用嘴唇去咬着辫子的尾部，以阻止自己不要哭出声来。我感到自己像是踢了一下一个木偶。

“啊，克尔本太太，真对不起，是我的不是，马克的妈妈是对的。我太愚蠢了。不过我是想给她帮忙，她早说了要我问问你，现在我把事情弄糟了，真对不起。请别生她的气，是我的不是，我知道，我不该问你这事，你能原谅我吗？克尔本太太？”她哭出声来了。餐馆里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我们。这倒好像我是到餐馆里来亮相的。

“萝利，请叫我乔妮好了……如果你能原谅我，我当然能原谅你。”她使劲点头称是。于是我又往下说：“我认为你婆婆叫你这样对我说是卑劣的。萝利，看着我，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干嘛不对她说你不干呢？”

她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泪水，俯身向前解释说：“因为我得让别人来为我拿主意。你知道，克尔本太太，我这个人不够聪明。梭伦说过大多数时候我能自己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要感到难以分辨是非时，嗯，那我就得依靠周围的人帮我拿主意了。”

“你依靠谁？萝利。”

“像马克和他妈他爸和学院里的老师们，当然，我必须信任梭伦。”

“梭伦是个好人吗？”

她脸上立刻流露出高兴的神色，说：“仅次于马克，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男人。”

“他到底具体干些什么事？是会长或是教堂的负责人？”

“他很热爱我们，克尔本太太，他为我们做一切。他布道，还帮助那些辅导员们，他要确信每个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还为我们筹款。他来之之前，这所圣经学院不过是一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可是梭伦·伊默斯很有远见。”（你可以听见萝利小提琴声般的声音在讲到这儿时提高了嗓门。）“梭伦的确已经使学院大改观。他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那些吸毒或是逃学的孩子尤其如此。不过真正是改变了这儿每个人的生活，他能做到这点。”她羞涩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萝利，现在我们来谈谈钱的事，是梭伦筹集所有这儿的资金吗？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还有一座中心教堂？”

“就是这一所，克尔本太太，梭伦常到世界各地去为我们筹款。”

“他怎么筹法？”

没想到我这一问，她竟伏在桌上咯咯地笑了起来。她说：“马克告诉我的，梭伦是这样为我们弄钱的——”她对我耳语：“缠住一些有钱的寡妇。”

“这么说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一定已经缠住了好些寡妇啰？”

“啊，克尔本太太，”她轻声地笑着说，“我们好不光彩？”她看了看表，又说：“啊，看我胡说了些什么么，我要迟到了，谢谢你这么体谅我，这次我请客。”

“萝利，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你和马克能不能帮忙留意一下波尔丘克太太？她现在很伤心。”萝利又一个劲地点头。“如果她过于伤心或是……请告诉我。”我想说的后半句是：“或是她精神失常的话。”但我没说完。

萝利看来非常领会我的用意，“有改变的话，”她说着认真地点点头，“如果她有什么变化，我会告诉你的。”

“好，”我说。有变化，这就是萝利的话。

当梭伦·伊默斯从他办公室走出来迎接我时，他看起来真像那种有钱的寡妇愿意付钱与他拥抱的男人。

“地道的爱尔兰人，”当我第一次将伊安带进我祖母在尤维尔大街上狭窄的屋子时她这样说，“皮肤白如牛奶，鼻子长得像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一双忧郁的眼睛，你可以随时在人群中认出他们。他们热情奔放，但常常神经质。”祖母说的有关伊安是对的。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梭伦·伊默斯有着我丈夫、儿子那样英俊黝黑的面孔。

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去仔细观察一下梭伦·伊默斯。他比我记忆中的他显得苍老，开始秃顶了，眼眶周围已有细细的皱纹，况且他也大瘦。不过，他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浪漫，这正是他吸引人之处。

他把自己天生的浪漫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把两个袖子卷过手腕，露出他那双白皙、细嫩、修长、手指尖尖的双手，那是艺术家的双手。

他朝我微笑着伸出手来，说：“让我们在这儿走走。”我本想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知道，他会领着我走过那些拥挤的教室，大小的学生宿舍，然后会提出要我为他们捐款——这是无数寡妇经历过的。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带我走出了校门，走到了祈祷中心的后面，走过碎石堆，朝小山走去。我们向山顶爬去，太阳火辣辣的，空气是那么燥热，飘来了农民们焚

烧橡胶和麦茬的味儿。山顶上有一道小小的防风林，防风林的前面有块又光滑又古老的巨石。梭伦·伊默斯用手势示意我坐下，接着他就坐在我身边。

往下看可以看见吾尔夫河圣经学院的全景。那一排排整洁的房屋和那一行行黄色的白杨树，从远处看去，宛如那些学龄前儿童玩具模型般不真实而富有戏剧性。我身旁，梭伦·伊默斯的侧影在迷茫中显得轮廓突出而年轻，他正在注视着已实现梦想。

眼前这一切已足以使我发狂，那些喜欢出头露面的人早已让我空耗了许多时间围着他们转。

“真太美了。”我说。

“美是美，只怕不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伊默斯说，我听出他的声音有点颤抖，吃了一惊。通常，好景致会打动我的心，但今天却不会。因为我心中还有许多疑团尚未解开。

“学院的布局很好，萝利·伊文森告诉我是你筹款建起了大部分的新房屋。你一定筹集了上百万元吧？”

“更多些。”他平淡地回答。

“尤其是那座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我说，“过去的几个月中，安迪曾催促我花上20分钟从高速公路上驶过来看看。他认为那真正是座了不起的建筑物。”

伊默斯没有回答。我看得见他喉咙处血管在搏动。他咽了一下口水。我并不打算把话题岔开，便接着问：“你是怎么认识查理·埃帕里贝的？”

“我并不认识他，是他妻子有一天出现在我面前。”

“后来呢？”

“没什么，她来了，我便对她说我们需要些什么，她说：‘照办吧，我给你开支票。’”

“就这么简单？这真算得上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慈善行为。伊默斯先生，一位陌生人从街上走到你这儿，大笔一挥，签张支票就满足了你的愿望。难道这事看来不是有点——我不知怎么说——对你有点像天方夜谭吗？”

“寡妇们，尤其是在刚刚丧夫的几个月中，通常总是有点反常的，克尔本太太。你应当像我一样接受这一事实。祈祷中心的建立对兰·埃帕里贝是件好事。她对这儿很感兴趣——自建立以来她在吾尔夫河度过了许多个周末，成了学院的朋友。至于有关她的别的情况，我就不打算对你说了。”听起来他的声音有些哀伤。

沉默重又回到了我们中间，我可不喜欢这样下去。我知道在安迪的生活当中有一段空白是在吾尔夫河度过的，我琢磨不透我正在寻找的这段空白的内容，但我十分明白，我一定得让梭伦·伊默斯开口说话才行。

“不管怎么说，学院算得上一大成就。”我答讪着。

“但你却对这成就的价值产生了疑问。”他轻声地说。

我转过脸来看着他。一个近四十岁的男人，在耀眼的阳光下显露出种种生活留下的痕迹，但他脸上有一种难堪或是别的什么——恐惧？希望？我猜不透。

我猛然间意识到他可能和我一样对这种漫无目的的兜圈子会感到厌烦。毕竟是他打电话约我来的，他肯定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如果我们不坦诚相见，我和他谁也别想得到什么。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切入了正题。

“好，伊默斯先生。”

“叫我梭伦。”他小声更正我的话。

“不过，梭伦，我感到迷惑不解，不知道自己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身为寡妇，却不是你感兴趣的那类寡妇。我并不富有，不能为你的学校开支票或捐赠款项。”他有点畏缩，但我并未停嘴。“我不明白我此行是来做什么的，我对这一切的思索会给你带来什么可能的差异？”

说完我盯住他的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就是吾尔夫河创造奇迹的人。曾经是那么一位信心十足、具有超凡魅力的角色，在我面前居然变得不堪一击，仿佛成了从月球上来的另一位陌生人，很想向我吐露真情。他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但我没有误解他的话。

“我希望你能把我看成一个人，乔妮，我想……”他的嗓音有点沙哑。“真对不起，这事我说不清，对不起，我只想要你不要看不起我，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往回走了。”我们下山时周围的气氛有说不出的尴尬，如同一对争吵过的恋人，我们默默地走着。

当我将车停在东湖路的宅第前时，有一个妇女走上我家的便道，送来一份急件。我填了表，取回一个有条纹的大信封就进了屋。我们整理过屋内不久，起居室不很乱，但也不算很整洁。两个男孩子在电视机前吃完了中饭，他们已将碗碟清理掉，但咖啡桌上却掉了一些三明治碎屑，还留下了他们喝牛奶时杯子的一圈圈痕迹。在后来吃晚饭时我得知，“世界棒球系列”节目正开播。安格什重新取得了他在棒球俱乐部的会员卡。

下午的阳光从窗口射入室内，将瑞克送我的水晶花瓶变成了火一般红色。我上星期插进瓶中的雏菊已经凋谢，桌上满是落英。

孩子们回家前我还有两小时可以收拾屋子。如果我立即动手，到晚饭时一切都会收拾停当，要么我也可以烧上一壶茶，驾车去奶奶公寓，坐在那凉爽的室内，读瑞克寄来的急件。

距我的生日只还有一天，也是我四十五岁的最后一天。我一边煮茶，一边将雏菊的残枝倒掉，拿一把剪子走入后院，剪了一大束万寿菊拿回屋里，插入花瓶，灌上清水，把花枝整理一番。花儿浓郁的、具有秋天气息的香味充溢室内，使我记起了孩子们小时候的秋天，他们往往会用蜡纸包上一束束万寿菊带到学校送给老师。在那一刻要解开安迪一生的谜，似乎成了我现实生活中的一剂解毒剂。我煮好一壶茶，倒上一杯，一饮而尽，拿上那封急件就直奔奶奶公寓。

经过整理后的公寓开始变得舒适而井然有序。我将写字台移到窗口，可以将花园一览无余。我能看见那间大房子和孩子们时不时从窗前经过的身影，这使我能更好地工作。9月里降下了充裕的雨水，使栽下的紫苑、百日草和万寿菊生机勃勃，花园美不胜收，但我却闻不到花香；奶奶公寓的窗户虽然是阳光充足、令人满意，但由于密封得好，把灰尘和夏末的气息一块儿隔绝在外了。

我建立了一种任何专业研究人员都会嘲笑的档案制度，但我认为对自己行之有效。我将安迪的每一年的生活竖式档案都贴上标签，对特殊年份，我要翻腾个水落石出，不仅要弄清安迪的所作所为，而且还要弄清他周围的人的言行，了解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当我把我的做法对瑞克·什班什说了之后，他一言不发。因为他原来想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用电脑编程序，用拜占庭系统使参考资料能交叉利用，但我喜欢我的一套。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我的竖式档案制就是从这点来考虑的。

找资料不难，省议会办公室里有几大盒已经分类归档的安迪的政治生涯材料。所以当我打开信封，看到一大叠有伊芙·波尔丘克资料时，我就抽出了有关她的家庭情况的一页。我特别细读了1965年的情况记录，关于都德·罗斯考特的剪辑材料有半英寸厚一叠，我迅速地浏览了一遍。有伊芙的父亲在公开场合被任命为某公司董事的得意洋洋的头像，或是领导一次慈善运动的照片，还有罗斯考特有限公司商业成就的记录——倒是一些实实在在不引人注目的东西，但公司所拥有的金矿和镍矿数目却是惊人的。老都德可是位会敛财的人。接着他就大走鸿运——《周报》载文记述了他的发家史。就在他家发生凶案前不到一周，《周报》由于把他的故事编得离奇，而捞了好多钱。以后就是《有关罗斯考特一案——一位名人的家庭内幕》等报道。这里面并没比豪沃德很久前在萨斯克顿告诉我的东西能提供更多的情况。倒是《周报》上有一篇文章刊载了一幅照片，那是一张彩色照片摄于达莫斯港他们家中的起居室内——那是一间漂亮的房间，所有的装饰均呈柠檬黄和象牙色，壁炉上方映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光芒，玻璃的咖啡桌上陈列着一个好看的花盆，盛着蝴蝶花、郁金香和黄色的银莲花。照片的前排是罗斯考特家的三位妇女坐在咖啡桌和鲜花后面有弦罩罩着的漂亮沙发上。马德林·罗斯考特那时像伊芙现在这般年纪，已经微微发胖，但仍是黑头发。她面带愁容。她的两边坐着她的两个女儿。两位小姐苗条又年轻，穿着光亮的无袖A型的长裙和与之相配的轻便舞鞋。伊芙的衣服是玉米花色的，南希的是新绿色的。她们的头发都像妈妈是黑色的，松散地像一般女孩子一样披落齐肩。他们身后是老都德·罗斯考特。他靠在长沙发上，每一手指粗壮的手搁在一个女儿的肩膀上。他的下巴已啃在他妻子的头发上，他的表情是沾沾自喜的，仿佛在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都德·罗斯考特就是这片领地的老爷，是令人羡慕的人。

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张已有绒毛的灰白色的旧照片。这些报纸毋庸改变地记录了他们家一案罪行和受到的惩罚：犯罪现场、逮捕过程，审讯等一系列我们熟悉的场面，就像我们的父母熟悉女演员雪丽·坦波和丁娜·德冰的照片那样。只不过这是伊芙·波尔丘克家的照片而已。担架上躺着的是伊芙的父母，他们正被送上救护车。照片上那个太阳晒黑了的、敏捷的姑娘，穿着白色的圆领毛衣和山羊式紧身女裤，神情失常，就是伊芙的姐姐南希。照片上那个目光呆滞，举起一只手挡住照相机，就像是要挡住一击似的女孩是伊芙。

对他们家一案的审讯记录可以说是非常审慎的。甚至在一座城市里有两家晚报为争取各自的发行量而开展一场大战的时候，记者从这次谁都一言不发的谋杀未遂案中捞不到什么油水。

但档案中毕竟还有一些图片和片头说明：一张照片上有嫌疑的作案凶器——一把短木柄的小斧，斧刃是闪闪发光的如同剃刀一样锋利。还有一张老都德·罗斯考特的特写镜头，他全身血淋淋的，正被送往医院。（他究竟像个什么样子？《观察家》报的记者问。“他看起来，”可靠消息来源说，“好像有人试图砍掉他的脑袋和身体的其余部位。”）

关于此案的判决只有简要记录：法官判处南希·罗斯考特处以对精神分裂症者罪犯男女混合监狱监禁。（后来这一判决被改为在一家私人精神病疗养院不定期的治疗。）不过，关于审讯本身，除了在公诉人和辩护律师之间干巴巴的交叉背诵法律条款，并无更多记录。有的不过是专家取证和每天罗

斯考特家的几位妇女轮流到法庭作解释而已。

当然，还有许多伊芙的照片——这位出事后那几周内唯一容易接近的罗斯考特家的成员。有一张照片是伊芙在维多利亚大厅前从她的汽车中走出来，还有一张是伊芙到医院探望她正在康复的双亲的，甚至还有一张是伊芙从她的牙医办公室出来的照片。照片上伊芙总是双眼呆滞，微笑着。

1963年伊芙·罗斯考特已二十六岁了。她遭受的精神创伤已够折磨她一辈子了，但这并不是她遭受的最后一次创伤。如果你相信南希在服刑期间请的心理医生推断的话，伊芙这次遭受的精神创伤也不是第一次。

可怜的伊芙，可怜、可怜的伊芙。

正当我力图去了解这位有着灰色小脸蛋的报纸照片上的伊芙时，电话铃响了。是梭伦·伊默斯打来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怕。上次他傲气十足地将我领下小山来，对我欲言又止，未能吐露真情，这次可是傲气一扫而光，连客套的开场白都没有，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乔妮，我想马上见你。”

我尚未来得及答话，他马上道歉说：

“我很遗憾在吾尔夫河发生的事，这些日子来我做了许多使我自己苦恼的事。”他的声音小下来，停了一会，电话的另一端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又开口时，他的声音好些了——如果算不上有力也可以说至少自信和控制住感情了。他继续说：“乔妮，我现在正处在一条违反现实生活的轨道上，我需要与你谈谈心，我1小时就可以到你那儿，今晚或明天都行，你看什么时候合适？”

他的话用了一连串的“我”开头，说他处在一条违反现实生活的轨道上——这些隐语和他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方法使我大惑不解。记得我小的时候在生日晚会上会做一种游戏，每个孩子给五颗豆子，每次我们说话以“我”字开头，往往被迫会丧失一粒豆子。因为说到“我”字开头，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梭伦·伊默斯这位男子汉很快会失去一粒豆子，这使我大为震惊。

无论他有什么理由，我的回答都是不行。下一个钟头不行，第二天也不行，我不能马上见他。在过去的一个黑暗的月份以后，我想过一个阳光明媚的、并不复杂化的生日。我如实对他说了。我同意见他，但得等一下。我们最后商定在我生日后的第二天早上9点钟见面，在谁家中都行。我并不盼望这天来临。

---

五颗豆子的游戏：是一种不让孩子表现自己的游戏，避免说话时用“我”开头。

近黄昏的阳光经过我奶奶公寓窗外的加拿大杨树的叶子的过滤，照射到我的书桌上，成了一种明和暗变幻的游戏，留下了不同形状的阴影。这时我想到，在我和梭伦·伊默斯见面之前，能多了解一下这位吾尔夫河奇迹创造者的情况会是明智的。那是渥太华时间早上6点钟，瑞克·什班什会在他大河街的寓所内，正倒上一杯饮料。能和这么个快活的人谈谈倒是件快事。

听得出来瑞克接到我的电话是很高兴的。他为人开朗。天气又那么好，渥太华的气温已下降，当天下午晴朗而充满生机，这对一位为竞选运动而四处奔波的人来说，也会感觉好多了。看来也不会有联邦选举的电话了。省政府的民意测验在下降，就在瑞克那天离开办公室之前，一位助理厅长打电话来说政府将维持至春天。瑞克那天有意要庆祝一下。他笑着说：“为了我们的朋友安迪·波尔丘克。”回家路上，他在市场逗留了好一会，买了一罐切成成长条的甜菜根——一种德国蔬菜。

当我在电话里向瑞克提起梭伦·伊默斯的时候，他顿了一下，我问他不是找伊默斯的有关材料有困难时，他闷闷的，不做声。

“我认为不必要这么兴师动众，我已经请我们的一位研究人员查了，她不过找出了一页纸的关于伊默斯生活的小结——很凄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如果你坚持还要找这方面的资料，我就叫她再查查看。”

“对，我想再查查。”我笑着说。

“那就这样吧，”他针锋相对地回答。

无论他对梭伦·伊默斯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心理，这会儿瑞克那种记者好打探的本能不会消失。当我提到伊默斯曾给我打电话时，电话线立即传来噼啪的响声，表明了他对此事有兴趣。他究竟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我对这次通话的印象如何？他先祝贺我作出这样的决定，即把与梭伦的会晤推迟到我的生日以后。他说：“为一个骗子而浪费时间是不值得的，乔妮。”——这是他的口头禅，不过这次他说这话时声音里却隐藏着不安，我想我知道其中的原因。

甚至在小时候，我就不善于做男女孩子共玩的游戏。这种游戏的宗旨是让男孩子帮助脆弱的女孩子。往往脆弱的不是我，而是别的女孩子。

“听着，瑞克，我要再见梭伦·伊默斯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一些互相有牵连的事情。”

他的回答很小声：“晚安，乔妮，我明天晚上睡觉前会给你打电话。即你那儿的时间10点，我在这儿是午夜。到那时他们还会用夏时制的。”他的声音很焦急。

我笑了，说：“瑞克，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都没关系，你手边有电话就打吧。”

“明晚10点，”他重复说，“乔妮，我会让那位研究人员把她找到的有关伊默斯的资料直接寄给你。祝你明天过得好。”

我四十六岁生日那天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电话铃声，接着是我女儿的笑声。她把我在她小时候为她作的一首生日歌胡乱地唱给我听，全唱走调了。以前我一唱这首歌，孩子们就会尖叫起来，但它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庆祝生日

的一项活动，正像那挂满了豆形胶质软糖的难看的塑料树是生日活动的中心一样。他们还扮成画着鸚鵡的鬼脸，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歌。这些都是孩子们生日那天他们房中可以看到，但我的生日却迥然不同。梅卡对我唱那支歌是表明我们母女间的关系已有变化。她唱歌后大笑，我却大哭起来。我说：

“啊，梅卡，唱得真好。”

她却说：“妈妈，这支歌差劲儿。”

“不过，你给我打电话又为我唱歌就够好的了。是不是我唱这支歌时唱得不好呀？”

“你唱得就更糟糕了，妈，差火。”

“梅卡，听到你的声音就叫我够开心的了。”接着我们就漫无边际地谈到了她的两个弟弟，我们谈得很投机。（她说：“告诉弟弟们，我想念他们。还提醒他们，给你的生日礼物在安格什衣柜那个睡袋下面。”）还谈到她在大学里学习的课程。（她说：“教我英语的女教师很像你——上课的第一天我就想像个木偶一样，跟在她身后去她家。”）又谈到瑞克·什班什对我有兴趣使我信心大增。（我说：“嗯，为什么瑞克不会对我感兴趣呢？”）“除了听到你的歌声和你的忧愁外，你实际上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和梅卡的谈话纯粹是谈母女的事情。

最后，我不得不看看钟，说：“梅卡，很遗憾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你为此会花很大一笔电话费。待我们去温尼皮格过感恩节就会又见面，从今天算起也只剩一周时间了。我真难以相信这个秋天过得这么快。”

她没有回答。

“梅卡？”我呼唤她。

她的声音温和而坚定。“妈，我一定会去温尼皮格过感恩节。”接着她又说：“格里格的父母在爱玛湖边有间农舍，他们已邀请我和他们和格里高利一块度感恩节周末，我真想去。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妈。”

听她这么说已经是没有商量余地了。也不必商量了。她长大了，她要与她喜欢的一位男子及其家人共度周末。表面上我是那么通情达理，高高兴兴，放下话筒时我和梅卡都笑了。不过我内心却有一股无名火。我从镜子中打量着我那张毋庸辩驳的四十六岁的苍老的面孔，由此想到，与女儿的一席话竟会是我生日的开始，真太扫兴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我的情绪并无好转。两个男孩从一起床就在互相逗乐，他们为谁向我递交生日礼物而像一对六岁的孩子一样打闹不休，吃早餐时还未完全休战。彼得说他找不到他的拉丁文课本，安格什却从上幼儿园以来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不想上学。我正站在前面的走廊上，被凉风一吹，顿生寒意。看着安格什缓缓地爬上通往八年级的路，我心中有的不只是得意和平静。这时一辆黑色的波切车在我屋前停下，一个身穿黑衣的细高个子男人从驾驶座出来，我立刻感到四十六岁生日全完了，那不是别人，正是梭伦·伊默斯。

我还穿着睡袍，刚刚过牙，但还未洗澡。一点儿没有心绪去会客。要不是梭伦一眼就看见了我的话，我想我会简单地处置这件事——不开门。但现在已经为时过晚，他已从我屋前的小径朝我走来，装出一副笑脸，但却显得有点紧张。他手中拿着一个蓝色盒子——你去买一件昂贵瓷器或水晶制品时都会得到的那种盒子。

他走到走廊台阶底下时，将盒子递给了我。

“生日快乐，乔妮。”

我就地站着。

“你不打算打开它吗？”他问。

我将盒子递还给他。

“别这样，”他说，“我们进屋再说。请。你只要打开盒子看看，我想你会明白一些事情。”

他紧随我进了屋。我走进厨房，为我和他倒了两杯咖啡，便和他一起走进了起居室。

现在那个蓝色的盒子就放在我和他之间的咖啡桌上。梭伦俯身将它推过我身边。

“请收下，乔妮。”

我想那是在我撕开一层薄纸，看见那小巧的瓷像时，就认出它来了。我以前见过。事实上，那是一个火热的加拿大日周末我在一个工艺品集市上买来的。记得那个集市是在我省的西南角。那是一位当地艺人的作品，确实是件叫人喜爱的匠心独具的工艺品——一棵卷心菜从顶端像花朵般张开的叶子，有一位妇女从菜中央站起来，她的臀部和胸部有如乌克兰妇女般丰满，身着褐色农妇的长裙，头上盖着一块色彩斑斓的头巾。她的面部有着斯拉夫人的颧骨和蓝眼睛，简直是与罗玛·波尔丘克别无二致，惟妙惟肖。那妇人的双手高高举起，直指苍天，她手中擎着一个表情凝重、长得端正的男婴。这一切细节，刻画入微，栩栩如生。这件工艺品的名称叫做《乌克兰创世纪》。那年7月的一天，安迪·波尔丘克一眼看见它，就一定要据为己有。

我就把它买下了。以后安迪又要我转让给了他。你从事政治活动时，通常会去参观当地艺术家们的所有大作。只对其中的一位艺术家垂青，而冷落了其他人是不明智的。安迪对这件工艺品情有独钟。我敢发誓，自从他将它买来后，就从未离开过他的书桌，除非他将它送人。不知他以前什么时候将它送给了梭伦·伊默斯，现在梭伦又要把它送给我。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这是一件礼物，一件纪念一个特别的时刻的礼物。它曾经是一个极好的象征。”

我可以觉察到我的安全感动摇了，我当然不希望这样。我抓住了一个把柄，说：“安迪对人的友好表示多得很，他为人慷慨大度，给好多人送过东西。”

梭伦·伊默斯听后俯身到桌子上，盯住我的脸。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变了样，但他的目光却是咄咄逼人。他说：“我爱他，乔妮。”

我感到很压抑，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将我压倒似的，我不想听到他说这句话，也不想知道往后的话。

“许多人热爱安迪。”我说完就将目光移向窗外。

梭伦·伊默斯这时半站立起来向我靠过来。他的手摸到我的脸，并且将我的脸扭转过来，说：“看着我，乔妮，你是一位不简单的女人。你知道我现在在说些什么，我对安迪的爱与大多数人不同，大大地胜过人们对他的爱。他是我的恋人，我也是他的恋人。”

我担心的事终于到来了。我心中原有的那种对事物天真美好的想法全给打破了。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傻乎乎地恳请他：“谁知道这些事？你放慎重点。”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安迪已死，不能中伤一位已故的领袖。这

人一定是被悲痛摧毁了。但我对政治的本能关注和警觉尚未泯灭。对于政治明星，有过数以百计的流言和笑话，涉及他们个人的癖好。比如一位妇女的丈夫正竞选下议院议员却惨遭车祸身亡，他的政治对手就大肆渲染这起惨案对那位新寡无异于“一个大解脱”；又比如一位竞选运动的负责人要他的班底人员去宠络敬老院中所有的支持者，在高层次选举中投他们的票，以免他们的政党会失去一票。我现在面对着这位男人，不能出于怜悯之心，只想到他的悲痛，而应当联想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必须警觉他们那些人会耍的花招，无论是坏的或是好的，我都不能掉以轻心。

他的脸凑得很近，我可以看清他胡子皮肤下面的毛根，还能嗅出他那刚刮过脸后的味儿——这对我太熟悉了。

我吃惊地问：“你发出的气味像安迪，你是不是总用科隆香水？或是……”

“他死后我已改用别的牌子的了，”他说，“我真傻，我以为这样似乎就能改变一切。”他将身子缩了回去，脸上流露出的痛苦如同被匕首刺了一刀似的。

见他这样，我的想法也变了。我和他是同病相怜，不是因为他能给我什么大的启示，而是因为我已承认为安迪的死带来的改变而震惊。

“我也这样做过，”我说，“我丈夫去世后，我晚上就寝之前，总要把他平时刮过脸用的香水擦在身上，这样夜里醒过来时就会……”

“就会以为他仍在你身旁。”他帮我说完了这句话。

“有这个意思。”

我们在沉默中坐了片刻，各自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未了，还是我开了腔。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已说不清，只是……梭伦，到厨房来，我们添些咖啡再谈吧。”

他笑着站起身来，说：“请我到厨房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吗？”

“我想是的。”

“那我就欣然接受，我需要朋友。”

我们坐在厨房桌旁。开始变天了。院子里落了厚厚一层加拿大杨树的叶子，潮湿，正在腐烂。那真是个阴郁的日子。有好一阵子他的目光并未离开窗外，梭伦·伊默斯对天气其实是漠不关心。我想，他心中泛起的会是另一番景象。

他将那件工艺品拿到厨房里，坐在桌子边用手指顺着塑像的线条抚摸着，就像一个数着念珠消愁的人。

未了，他用温和而亲切的声音说：

“乔妮，但愿我们别在这儿演戏了。事情已经很明白——你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姐，我是安迪最亲近的伙伴，我们俩都为友人的死亡而悲伤，但事情远比悲伤更为复杂。我和安迪认识不久后，他就告诉我，你是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可以信赖的人。凭这一点，对我就够好的了，因为——”他使劲咽了一下口水。“我得有个信得过的人。”

他穿着一件奶油色的锃亮的飞行员的那种牛皮夹克衫。他一边说一边伸手进里面的衣袋取出一个质地很好的灰鸽色的信封来。封面上用娟秀的字迹写着“梭伦·伊默斯收”，但却没有地址。我接过后手发抖。

“是递交的吗？”我用一种清晰的、不自然的声音问。

他点点头，说：“显然是这样。这封信是有人投进我学校的信箱中的。那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你打开看看吧。”

我将信封翻转来，打开了。信封背面有两个联在一块写的字母 A 和 E。两字母绞在一块就像结婚请柬上的新郎新娘姓名首字母联写那样。我马上联想到安迪被害那天他的文件夹中有一页不知谁抄录的《病玫瑰》那首诗，那上面的签名也和这儿一样，是 A 和 E 的联写。我的手颤抖得厉害，几乎不能抽出信封中的东西来。

抽出来的东西我立即认出来了，那是一份大选前的宣传安迪的小册子，是我为他撰写的。一般的東西：安迪的自传，还有几篇老一套的宣传文章，几个调子很高的，毫无意义的口号。反正这东西是不会有人读的。但其中的照片却拍得很出色。那是由一位初夏时才混进省议会办公室的年轻人拍摄的。他的名字叫柯林·格朗特。那天他穿着廉价的跑鞋，有剪贴的牛仔褲和汗衫，脖子上吊了一架莱卡牌照相机。

我记得那天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德夫的一张“不许吸烟”的标语，说：“你们所要的只是文章的潜台词，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天我们就没有让他失望，雇用了他。他的摄影技术很高明。他能利用光来耍魔术。梭伦拿着这本小册子封面上的照片就是他的杰作之一，但只是一部分。因为要如何突出你的后选人才是重要的。

照片上安迪背对照相机，没穿大衣，摊开双手，那是表现他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投身到群众中去的情景。我们从他的侧面可以看到：人们的手朝他伸出去，有的人的手已经触摸到他，许多人还把头抬起来向着他。

这样的场面对我们所有从事政治运动的人见过何止上百次。但柯林·格朗特玩弄光线的把戏来表现出安迪穿过人群时，那种众望所归的情景。安迪背对太阳，因此当他的身影是暗的时候，他的面孔对着人群却被光照得通明，仿佛这光芒是由他的面孔发出来的。真的，安迪对听众确有如此大的感召力。但在这本梭伦·伊默斯递给我的小册子上，有人用黑色的唇膏画了一个字在安迪相片的头部和背部。那个字是“同性恋的男子”。

“我想我们得从头谈起。”我说。我的声音在继续颤抖。他确是一五一十从头道来——从那天晚上安迪和他成为同性恋者开始讲起。他用一种压低了的声音向我讲述着他的故事。不时地声音中还会流露出得意来，尤其是在提到他的恋人的名字和回忆他们俩之间那种唧唧我我的时刻更是如此。当他描述那晚他和安迪在黄昏时走上祈祷中心去时，他的声音充满了好奇感。他说：“我并不是他的第一位同性恋者，他却是我的第一位。啊，乔妮，他第一次抚摸我时，我想他的手简直叫我心花怒放——仿佛我的身体就会在他的手下开花似的。我们享受着，直至祈祷中心从黑暗中现出了曙光。我一辈子没有过这幸福的生活，但那一夜一切对我来说都变了——对我和他来说都变了。我们间不是一种随便的唧唧我我，乔，我要你了解这点，安迪也会要你了解这点。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未有过这样的恋人，而对他来说另外还有一位恋人——只是一个，但当我们堕入爱河后他就中断了与那人的关系。”

“安迪是一位那么有名望的人，那第一个晚上我们互相倾慕到非得到对方不可，但他并未对我动手，直至他与另一位男子中断了同性恋后，我们才开始相爱的。”他拾起那本小册子，又继续说：“乔妮，这种淫秽的事并未

出丑，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和他都很小心谨慎，因为我和他熟人都很多，一旦出了纰漏，会牵连很多人的。比方说你——安迪清楚你为他竞选领导职务出了多大的力，万一我和他的事捅了出去……唉，你可以想象得到后果。从我的职业来讲，当然，我会完蛋。吾尔夫河的那些善男信女认为我布道是夸张大胆的，难道他们会仅仅认为我是个快活的大祭司？”他耸耸肩，惨然一笑。又说：“不过，我们认为我们最反感的就是伊芙。她和安迪之间已经多年没有夫妻情分，不过，我相信，安迪宁愿自己受折磨也不愿让伊芙受罪。他曾对我说过，伊芙遭罪也遭够了。当然，她是不会知道我和安迪的私情的——知道安迪的同性恋人就是我。我敢肯定这一点，但我总觉得她是知道安迪有同性恋行为的，我想她会知道他的第一个同性恋男子。”

“那是谁呢？”

“你知道安迪是名人，乔，我从来不知道那第一位男子的姓名，但我确实知道他们相恋了很长一段时期——好多年。在与他断绝关系时，安迪确实很痛苦。”

梭伦看起来要垮掉了，但我还得要对他施加压力。我问：“会不会是他，梭伦？会不会是安迪的第一位同性恋人杀害了安迪？”

他没有回答，一直注视着窗外冰凉的雨水打在树叶上。末了，他转过脸来朝着我，说：

“乔，关于这事我能做什么呢？”他拍拍那本小册子，“关于这一切我能做什么？”

“我想你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你得去报警。梭伦，一切情况都是有联系的。”我指着信封上的首字母签名说。“我不是第一次看见它了，那是某个人在安迪去世的那天夹进他的文件的一首诗上的签名。”

他显得晕头转向。我知道他的感受。我想给他的冲击太大了。

我问：“梭伦，你怎么啦？”

他拿着那个瓷大白菜到亮处，轻轻转动观看，然后说：

“乔，我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两个姓名首字母签名了，我尽力回忆我从前到底是在哪儿见过它。我想起来了，那是在安迪城里寓所中，一次我和他正翻看一些旧的英语教科书，我见到过几次这个签名。”

“你还有别的要说吗？”

“我最讨厌谈到伊芙的话题。”

“那会使你确信 E 和 A 是代表伊芙和安迪吗？”

“似乎符合逻辑。还会是别人吗？这就是我不想去报告警方的原因之一。对安迪来说，伊芙受到指控总是最重大的事——我想在这事上帮他一把。同时，乔，我也不想让人们知道安迪的私生活，我不能让任何事情伤害他。”

他眼里充满了泪水，我伸手过去抚摸他的手，说：“梭伦，安迪也不愿让任何事情来伤害你的。”

他把目光移到正上方，正要开口说什么，恰巧这时电话铃响了。是阿丽·苏德兰打来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祝我生日快乐。

“我们正在盘算离感恩节的天数，”她说，“猜猜看我买了什么？上面有火鸡形的瓷器——有十处可放东西，那是为你买的生日礼物，你会喜欢的。乔，它有小盆的果木和蔬菜什么的——上帝——糟糕，不过倒也适合你庭院中小径的摆设。请等我的下一个电话——我们会有一人去火车站接你——生日快乐！”

当我挂断电话时，梭伦正将飞行服的拉链拉好。“今天我已占用了你许多时间，我几天后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是否去报警。”他用手指尖抚摸我的面颊，说：“谢谢你听我的一番话，谈到安迪的名字对我都很好，”他笑了，“乔妮，愿你交好运。”

“你也一样，”我说，我将他送至门口，目送他走下了门前的台阶。

“梭伦，我很高兴安迪有你这样的朋友。”

他蹦蹦跳跳地下了台阶，好像一个孩子。然后吻了我的面颊，回敬我一个说不出的甜甜的微笑。

“谢谢你，乔，你不会明白得到你的谅解对我有多重要。”说完他跑过了小径，跳进了那辆波切牌车，开走了。

他一转过街角，雨就变成鹅毛大雪落下来，大片的雪花重重地落在万物上。我思忖：“今晚我得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是否平安到家。”但我却没这么做。

邮差为我送来了一大把生日卡，还有伊芙用她那中学生般的不熟练的书法写来的一张便条，向我致谢；还有豪沃德为我寄来了一条漂亮的长丝围巾。（它使我记起，那个玛蒂离家出走后的圣诞节，豪沃德走到我面前说：“乔，你说要我给办公室的所有妇女买点什么礼物好？”我对她说：“这样吧，豪沃德，买条丝围巾准没错。”真的，他照办了。）所以这次我生日他也为我买来了丝巾。我的女友莱娜·拉芙给我寄来了第一版的詹姆士·皮尔德菜谱，莱娜的女儿莎利则寄给我一本由一位名叫弗雷达·卡荷罗的墨西哥艺术家写的装璜漂亮的书。我将丝围巾围到脖子上，把菜谱和书放到厨房桌子上，就坐下来细看我收到的生日卡。

然后我上楼去淋浴。我站在热水龙头下，脑子里不断地想着梭伦·伊默斯和安迪。

他们的关系我怎么会一直不知道呢？这是一直悬在我意识上方的疑团。我洗了头，用肥皂擦洗了身子。但我一直在想：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事呢？我认识安迪已有17年之久，有10年间我们非常亲近，有两年我们间的关系已达到了任何男女同事能达到的最亲密无间的程度，但我就从来未想过安迪有同性恋行为。要是我知道我会怎么想？愤怒，不止是对这种行为愤恨，而是对安迪不让我知道这类事愤恨。因为这是他对我的不信任——但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为什么应该这样对我呢？我关上了冷水龙头，一股热水源源不断地喷在我身上。我又想，为什么他应该告诉我这事呢？这事关我什么事呢？

我走进卧室找出我慢跑时穿的裤子和一件汗衫，还有旧高统运动袜，戴上帽子，下楼，拴上狗，穿上那双我为彼得买来打足球穿的运动鞋，就牵着狗往溪边走去。天仍在下雪，已经是10月份了。“走，到草地上去。”我说。这时雪下得很厚，覆盖在落叶上。公园里空无一人。于是我松开拴狗的皮带，放狗去逛逛，白雪皑皑的地上留下了它们的点点足迹。

“一个人的生活是需要别人理解的。”这是我的一位快活的朋友说的。他名叫查理·韦斯。他在重建了他继承的一幢房子内办了一个艺术画廊。他一直等到四十岁才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我唯一的一次听到他用痛苦的声音谈及的是他头40年的生活。“所有那些都是欺骗世人的。”他曾说。“我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使别人理解我的生活上，让别人能接受我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人对别人都可以说是陌生人。”

我的狗已沿河堤跑了过去，并顺流游下去——我可以看见两颗金黄色的

毛发光滑的狗头在水中破浪前行。

他出名以后，查理·韦斯确立了他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拯救受同性恋困扰的青年中心的创始人。一年里总有好几次他被医院的精神病房请去，他总会领回一个企图自杀的男孩子。他往往把男孩带回家，安排好对孩子的开导工作，为他做饭，帮助他重新步入课堂学习或是找个工，为他安个家，直到他能自食其力为止。

他常常笑着说：“我溺爱这些孩子，到老时会成为这个快活的集体中的老妈妈。但你知道，乔，这也是一种解脱。正如作家波彼说的：‘我随心所欲。’”

安迪就远远做不到这一点。他死时他的生活仍不为人们所理解，仍然保守着他个人世界中的隐秘。不知怎么的，这使人们对他的死更难忍受。

那两只狗担心我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过久，终于从河中上了岸，抖着身上的水，嗅嗅我的雨衣。我领着它们一同走过潮湿的雪地回家去。屋里又冷又黑。我开了灯，点着了炉子，用毛巾把狗的身子擦干，就在冰箱中寻找好吃的作中餐。我找到了一盒蛤肉杂烩和一条梅卡做的酸面包，把它们放进烤炉加热，就去再洗一次热水淋浴。洗完就在厨房桌边坐下，享用起中餐来。当时我穿着那件旧的法蓝绒长袍和一双我喜爱的毛茸茸的拖鞋。四十六岁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不及时行乐呢？

中饭后，我为自己煮了一杯茶，就打开一个新的草稿本，写下了两个问题：谁知道安迪的隐私和他那第一个同性恋男子？谁知道安迪与梭伦那见不得人的关系？我列出了可能的知情人。一、伊芙。要是她知道安迪的第一个同性恋人，那正好可以解释安迪死后她在圣徒餐馆中的大发作。二、豪沃德。他曾是安迪的老师和朋友，又是他们政党的领导人。安迪会不会将真情告诉他，使他能掂量出以后出事的可能性呢？他同样有机会了解梭伦。正如梭伦说的，安迪是有名望的人。他会感到有愧于豪沃德。三、德夫。他可能是最知情的人。如果这样正好解释了他在三帕大街的大发作。早年他与安迪曾同住，开始竞选以来他是安迪最老的朋友，或许也是最亲密的朋友。四、克里格·伊文森。他与安迪在法律学校同窗，后来多年里一直与安迪在立法机构共事。他会不会听过有关谣言？但如果他知情，他一定会对他老婆朱丽说，而朱丽是从来不会沉默的，因为克里格和安迪正在为党内领导职务竞争。五、×先生。那“第一位”显然知道安迪后来才有了新同性恋人，他会不会知道是梭伦·伊默斯呢？

我看了看我列出的名单——这是个好的开端。我拿起詹姆士·皮尔德著的菜谱走上楼去，蜷缩在床上，翻开他的蜂蜜南瓜甜馅饼配方，一下子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却居然没有做梦。

我醒来已是3点。我感到好多了。一位从花店来的人为我送来了十几枝奶油色的长茎玫瑰，是瑞克·什班什买来的。我的邻居巴巴拉·布瑞恩送来一个用粉红色纸包好的盒子，里面装着一件花的法兰绒睡衣，是长袖的，领子式样也适合老人穿。15年来我们每年生日那天都互赠睡衣。我记得那一年是我首先送给她的。那是件黑色的，镶有许多花边的睡衣。我们相互间祝贺生日，已经保持了15年，这真不简单。

两个男孩高高兴兴地从学校回来了，他们已在琼·梯餐馆订了晚餐，吃饱了中餐才回家。那是一家我们都喜欢的餐馆。彼得问我要不要来一杯餐前饮料，我可以回家喝。他们在餐馆吃中饭时省下了足够的餐饮费和甜点心费。

再说琼·梯的奶酪饼又是闻名的，结果我一个人回家喝了餐前饮料。

喝完我们母子三人便去餐馆吃晚餐。我们有说有笑，开怀畅饮，吃个痛快。我们回家时德夫已在门廊那儿等着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巧克力蛋糕，一瓶加利福尼亚香槟酒，脸上带着歉疚的神情。孩子们生着了火，于是我们便坐下来看一场球赛。在每一局比赛的间隙，我们谈论学校生活、篮球和政治。当然其中也会提及安迪的名字。德夫看来很容易谈起他，并对他充满了感情。生活又开始恢复了原样，我感谢上帝。

快 10 点时，电话铃响了。是瑞克·什班什在电话的另一端。能听见他的声音真好。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他兴致勃勃地问。

“比较起来算不错。你今天一定过得很好，听得出来。”

“我精神不错，我现在是问你过得怎么样？乔。”

“真不错，很快活。现在我们别谈我的生日。”于是我们谈起了我的孩子们，谈起了詹姆士·皮尔德在菜谱中热衷于用黄油；接着我用轻松的语调向他讲述了我在一本文摘上读到的一个令人发狂的故事——詹姆士·皮尔德居然还写了一本保健食品的书。瑞克喜欢我讲的故事，作为回报，他也向我讲了一个有关省长的故事，作为尾声，他还讲了一则好消息——他感恩节有空和我们一起去温尼皮格度假。

放下听筒时我感到振奋。我向德夫道了晚安，最后一次放开狗，关上灯，锁好门。这时我感到心中欣然快慰，因为良好的旧的生活细节重又编织起来成了生活的新篇章。我一边上楼一边想，这就是成熟。毕竟四十六岁不算太差。我走过梅卡的房间，推开门，讪讪地说了一声“要挺住”。这是我们之间感到日子不好过时，互相勉励开玩笑时说的话。我把梅卡卧室的房门拉上，不由得笑了。我自己寻开心，有多好。

我刚套好狗，准备带它们出去早跑，电话铃响了。正好是差一点9点钟。起初，我认为是个狂人打来的电话——足足有好几秒钟，没人说话，只听到背景有噪音。后来有一个我分辨不出的、可怕的声音说：

“乔，他们说是我杀了他。”

“你说什么？你是谁？”那几只狗在前门不安地狂叫着走来走去。每当为它们套上皮带时，就是要去溜达。为盖过这喧闹声，我朝话筒大叫道：“对不起，我听不见你的话，你是谁？”

“我是伊芙，乔，我是伊芙·波尔丘克。啊，天啦，他们说是我杀了他。”她说话时提高了嗓门，近乎歇斯底里。

“伊芙，请冷静些，你现在在哪儿？”

“在市警察局里。他们今天早上把我抓来的。我甚至还未……啊，上帝呀，乔，我受不了啦。”她说话几乎不连贯。

“伊芙，你知道你是在哪儿吗？问问看你是不是在史密斯大街。”

我听得出来，有人用手挡住话筒，所以传来的声音模糊了，但她接着又说：“对，我在史密斯大街，啊，乔，请帮帮我。”

“10分钟后我就到。”我把听筒放下，注意到我全身都在发抖，不适合驾车，我叫了一辆出租车。5分钟后，我坐进汽车的后座，还听见我的狗在家中狂吠，它们还在生气呢。

新建的警察局是全部用混凝土和玻璃造的——是“一件艺术品”，我们的地方报纸总是这么说的。我今年春天曾和安格什班上的同学一块到过，那时它刚开放不久。一位和善的年轻警官领我们参观，后来又让孩子们留下指纹，并绘声绘色地向孩子们谈到吸毒的事，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警察，当他们碰到麻烦时，要永远信赖警察。

好家伙，现在我就遇到麻烦了。前面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位圆脸、戴着老花眼镜的妇女正在等我。她的身份证上写着“特警多萝西·伊朗什达”。她为我填写了一张临时身份证，领着我穿过走廊，走进一个小房间。伊芙独自坐在一张金属方桌边。她看来几乎像得了紧张症。不过一见到我，她就立刻跑过来拥抱我。她满身是血，那股腥味令人作呕。我转过身来看着伊朗什达警官说：

“上帝呀，你们究竟拿她怎么样了？”

“我去叫警长来。”她说完就走了。

伊芙呜咽抽泣着，拥抱着我。她是个健壮的女人，我挣扎了几分钟，才让她松开我。她穿着那件安迪去世那天她穿过的、未经漂染过的全棉衣服，没穿袜子。衣服上、腿上、手上都满是大块的血斑，但我就是看不出血是从哪儿流出来的。

“伊芙，你哪儿疼？”

她只是用喉音低声哼唧，不断地叫着我的名字和说“不”、“啊”等字。后来我的老相识米勒·米勒德警长来了。

“你至少可以为她请位医生吧？”我说，“她会流血至死的。”

警长显得很疲惫不堪，他看了看我说：“已经从市立医院为她请了一名医生，她已上路。血不是从波尔丘克身上流出来的，是从他身上流出来的。”

我听后心中无名火大起，便问：“是不是这里的人全都发了狂？安迪已

死了一个月了，这怎么可能是他流出来的血呢？”

警长俯身过来安慰我，我才看清楚，这位警长是位好心人，他给我拿来了茶和饼干。他用无力而和蔼的声音对我说：“克尔本太太，这血不是来自波尔丘克太太的丈夫，看来这是另一宗谋杀案。”

我抬头向上看去，米勒·米勒德警长正注视着我，等我回答。

他说：“克尔本太太，你女友身上的血来自一位叫梭伦·伊默斯的男人，波尔丘克太太因与此谋杀案有牵连而被拘禁在此。”

听了他的话，我仿佛变成了冰人。

警长继续说：“今早上我收到了一个从——”他查了查他那有夹纸装置的书写板，接着说：“一位叫凯莉·伊文森的女孩子打来的电话。”

我本能地纠正他的话说：“是萝利·伊文森。”

他笑了笑用铅笔更正了他的记录：“今天一大早萝利·伊文森发现梭伦·伊默斯死在他吾尔夫河圣经学院的办公室内。是有人用斧子残忍地将他砍死的，我们找到了凶器。我们对凶器进行了检验，当然，这种斧子是许多人家都可以有的，是那种孩子们做‘小侦察兵’时用的。克尔本太太，你也有孩子，我敢打赌你家中时不时也会有这样的斧子。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线索。”说着他拍了拍放在桌子角上的香烟盒。

他又翻看了他的记录，说：“当萝利·伊文森今早上走进办公室时，就看见波尔丘克太太手拿斧头站在尸体旁边。”

事情顺理成章的结局，令我毛骨悚然。我的双腿不听话地颤栗起来。我不由得低头看看。这时传来了警长耐心而严肃的声音，他说了整个取物证的过程。

一个小小的穿着战壕雨衣的年轻妇人背着药箱走进来了。她径直朝我而不是朝伊芙走了过来。她用手指捏住我的手腕，把脸凑近我的脸。

“休克，”她说，仍然抓住我的手腕。接着，我感到她用棉签擦了我的手肘处，给我打了一针，我感到身子暖和起来，但很疲倦。“你很快会好起来的。你就是乔妮·克尔本，对吗？好啦，有人会给你送茶来，还会加很多糖。”她说。“就来了，乔妮。”说完她利索地走了过去，对伊芙说：“现在你需要洗个热水澡，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警长告诉过我，这儿有个地方洗淋浴。还有干净衣服，让我来帮帮你，使你冷静一下。现在我们就把脏衣服暂时脱下来放到一边。”她对伊朗什达警官示意，并说：“我们早该带伊芙去淋浴了。然后等她一边洗，我们就可以坐在外面与她谈。来，伊芙，我们去吧。”她拉起伊芙就走，她们俩平静地走出了房间，如同去参加一个睡衣晚会那样。

伊朗什达警官拿起药箱便跟在她俩身后。她显得急躁。无论她镇定下来与否，伊芙总是个令人摸不透的角色。伊朗什达警官一关上她身后的门，警长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问道：“克尔本太太，你好了吗？”

“我想是好了，对不起，刚才……”

“那是休克，我知道，常常由——特别是刺激性的气味引起的。如果情况弄清楚的话，我们早就想让伊芙有机会洗濯干净。今天我们这儿出了命案，是谋杀。”

他又插入了另一桩命案。我早已在报上读到了，一位警官在那周的早些时候遇害。葬礼就在那天早上举行。我说：“我为你们的同事遇难而悲伤，警长。”

出乎我意外的是，他笑了：“谢谢你，克尔本太太，这是一种善良的想法。”他叹了一口气，后悔告诉我这些事。又说：“我想我们得把精力集中到另一件事上。波尔丘克太太需要请一位律师，通常是他们自己请或提供一位律师的名字请我们代请。但波尔丘克太太今早上除了你以外，看来找不到更多的人帮忙了，我想知道你能否推荐一位人选。”

“克里格·伊文森，”我脱口说出后，居然不知道这建议是从哪儿来的。

“谢谢你，克尔本太太，我会给他打电话。”说完他站起身来，又说：“我已让人给你送茶来。”然后他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几分钟后，多萝西·伊朗什达拿来了一壶茶和一盘饼干，那饼干好像是自己做的。

“做饼干也会是警察的事？”我问。

“我中饭不吃饼干，”她说，“是我男友做的，很好吃的，你看来需要补充点营养了。”

我感到泪水盈眶：“真对不起，我今早上差点完蛋了。”

“喝点茶吃饼干吧。”特警伊朗什达说着对我莞尔一笑，走出了门。

接着克里格·伊文森将脑袋伸了进来，说：“我等会再来，我得先去看看伊芙。”他走了。

我边喝茶边吃饼干，那是一种有许多糖浆的姜汁饼干。伊朗什达警官的男友的确不赖。吃完我感到好多了。

几分钟后，一帮人经过我房门口大踏步走向大厅去。其中有警长、医院的医生、克里格·伊文森、伊芙等。一看见我伊芙就走了进来。她现在穿着干净的类似睡衣样的衣服。她的头发虽然是湿的，但却梳理得整整齐齐，肩上围着一条灰色的军毯。克里格和那位年轻的医生为她领路，穿过走廊，往大厅走去。伊芙还对我招了招手。

警长走了进来，和我坐在一起。“伊文森先生想与他的委托人私下里谈谈，过后我们准备将她送到感化中心。你随时可以离开这儿，假如你能等一会儿，我可以让人驾车送你回去。”仿佛已经约好了似的，十几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排着队从我面前经过。

“我感到好像自己身在侦探电影中。”我说。

警长笑着说：“我自己就常有这种感觉。不过当你有所准备时，你反正能走出银幕的。”

我看着他，就像他的声音那样又累又伤心。

“不，警长，恐怕你说错了，我认为我不能走出这场戏，我想有些事我必须让你知道。”

两小时后，一辆警车将我送至东湖路我的家。当我会见过米勒·米勒德警长后，我的双腿就一点没劲，真该谢谢他们能送我回家。

我一踏进前门，就看到彼得和安格什正在家中吃午饭。他们坐在电视机前，吃着现成食品。梭伦·伊默斯遇害的消息已经公开报道了。当我在孩子们身边的地板上坐下时，电视里正在播放那天早上我们驾车到吾尔夫河的情景。电视里伊芙和我正走过医院的停车场。我当时并未注意到电视网已将我们摄下，但现在就看到了。伊芙高大魁梧而温文尔雅，我则又矮又老成持重。两个一前一后，如同电视节目中的穆特和杰夫。还播放了别的一些片断：当然会有安迪的葬礼，还映出了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还有梭伦·伊默斯很兴奋地有声有色地介绍祈祷中心的设计。接着镜头对那些社会名流一扫而

过，他们端坐在中心前面填得严严实实的土堆上的椅子当中。省长也在场，他看起来总是那么孩子气而好动。（安格什说他是吃糖过多的缘故。）还有兰·埃帕里贝就坐在离伊芙和安迪不远处。接着又是安迪和梭伦·伊默斯一块站在麦克风前的快镜头：两个正当中年相貌堂堂的男子，在4月的早晨清冷、苍白的阳光下眯着眼。当所有镜头播放完毕后，梭伦和安迪的镜头会刊登在所有加拿大报纸的头版上。

接着又播放了安迪的尸体被抬出祈祷中心放进救护车的照片。突然，我感到不明白：又是梭伦在阳光下眨眨眼，在大谈特谈中心的建筑形式和功能。梭伦这个匿名在红毯子下的家伙，永远穿着黑色的衣服。在电视中一见到他，我的双膝便又颤抖起来。我只好关上电视，走到酒柜前，拿出一瓶亨利森酒，喝上一大口，就走进了厨房。

刚喝完第一口酒，电话铃就响了。是豪沃德从多伦多打来的。他带来的消息是可怕的。多伦多的新闻媒介已将梭伦被谋杀一案作了一整天的专题报道。他们又挖掘出罗斯考特一案，城里一家电视台还派出了一个小组到达莫斯港采访伊芙的父亲，要他谈谈他女儿遭到指控的反应。那老头在电视摄像机前垮了，将记者撵出了家门。很显然，伊芙什么也不会幸免。

豪沃德的估计是可怕的：“今年的感恩节对新闻界的头头们说来得过早。他们根本就没必要去对这个案件大肆渲染。用不着。这个案件是自己跳到他们的文字处理机上去的。”

看来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时候来提出我的问题了。“豪沃德，这儿还有更多的内情我想你应该知道。”

“更多什么样的内情，乔？”他的声音在电话的另一端突然变得谨慎起来。

“安迪是个同性恋者，他和梭伦·伊默斯是一对同性恋人。”

我听到他叹气：“耶稣呀，不可能，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对他们俩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紧追不舍：“但安迪是同性恋者你一定早就知道的。”

他没答话。

“你知道，对不对？请回答。”我听得出我的声音又尖又咄咄逼人。

后来豪沃德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声音答道：“是的，我早就知道，乔。”

“你知道这事有多久了？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从一开始，至少从他从政的时候开始。我第一次要他为我们参加竞选时，他告诉我的。”

“见鬼，豪沃德，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听得出他生气了：“因为，乔，你根本没道理要了解这类事。安迪又曾几何时去过问你和你丈夫伊安的房事？安迪告诉我是对的，这只不过是我和我的事，关别人屁事。”

“也是伊芙的事。”我说。

“对，也是伊芙的事。”

“豪沃德，你认识安迪的同性恋男子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不，我不认识——不能肯定是谁。安迪当选的第一年，我见过一个，不过只有1秒钟。”

“他长得什么样？”

“啊，看在上帝份上，乔，事隔快20年了……我想是位高瘦的男子。我

只看过一眼，他是……”

“他是什么，豪沃德？”

“赤身裸体的。乔妮，有一次我到多伦多开会，我一大早到安迪的宾馆房间找他，正当我们俩在门边谈话时，另一个家伙从洗手间走了出来，我猜想他可能是没听见我在门边与安迪谈话。”

“后来怎样了？”

“我警告安迪生活不检点，到处生事。他说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唯一的一个。他的措词很好笑，但这是他的原话。乔，对不起，我对你胡说了一大通。现在事情糟透了，你想不想叫我去一下？伊芙请好律师没有？”

“我猜他们已请了克里格·伊文森。他会对她很好的——会很耐心的。豪沃德，我本想要你来，但事实上你什么忙也帮不上，只会碍我的手脚。”

“我想我还不会运气最坏吧。”

“在大城市可把你训练得能说会道了。”

“我说的是真话。”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话，你是个大好人，豪沃德。等着，如果需要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不用等——想打就打好了。”

“好，嗨，你注意点，别挨上那些涂脂抹粉的娘儿们。”

“啊，乔，我会想念你。”然后他放下了听筒。我在原地坐了一会，思忖着。后来我走进厨房，一边喝我的那瓶亨利森酒，一边吃着孩子们剩下的晚餐。当世界变得毫无头绪的时候，有吃有喝总不是件坏事。

当电话铃重又响起的时候，我正在奶奶公寓里整理档案材料，我想找出那些安迪和梭伦有可能在一起鬼混的地方来，更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有人看见过他们混在一起。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是一位青年男子踌躇的声音：

“克尔本太太，我是马克·伊文森，我打电话来是要告诉你梭伦·伊默斯的告别仪式将于星期四早上10点钟在埃帕里贝祈祷中心举行。”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自言自语：“好，我可以穿上出席安迪葬礼的那套外衣去，不过这次去的可能会是另一帮人。”说完我重复了豪沃德刚才对我说的告别的话，便继续检索档案。

我早该预料到瑞克会去参加梭伦·伊默斯的告别仪式。这次葬礼是那个夏季里发生的悲剧高潮尾声。正如他们的新闻工作者说的那样，瑞克本身的确与这些事有着特殊的联系。因此他即将到来就成了那黑暗的一天里的一个亮点，尤其是他又将下榻我们家，这就更有意义。他不喜欢住宾馆。奶奶公寓是自己装备起来的，除了我的箱子和档案资料，实际上是空着的。尽管出了这样那样意外的事，我结束了与瑞克的通话后感到精神大振。毕竟我盼望的事和盼望有人来准备分担我的重任快要实现了。

瑞克是乘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的航班准时到达的。那天一早我醒来就感到要干点令人愉快的小事，我盼望已久要跑的差事。天空是铅灰色的，又有雾又冷，而且变幻莫测。我生日那天开始下的大雪已经停了，倒有点像是收割时节。吃过早饭我便驾车到河谷去买些夏末的蔬菜：胡萝卜、布鲁塞尔豆芽、西葫芦、土豆什么的。高速公路边就有一个摊点是出售英国、哥伦比亚水果的。我给自己买了一筐可口的苹果。在卢穆斯敦，我停了车，到我认识的一位肉商处买了一块极好的烧猪肉，然后，一时心血来潮，我又驶往感化

中心给伊芙留了一张便条。就是这样我也在距中饭前许久赶到了家。

我用糖浆做了一个很好的印第安布丁，安格什回来吃中饭时，整个屋子充满了感恩节前一周该有的味儿。上学前，安格什帮着我在奶奶公寓里铺好了一张折叠床，又将浴室打扫干净、配上干净的毛巾。

“现在还有别的事要做吗？”我环视一下周围问。

“沿篱笆那个大罐中摆上些橘黄色的花，可能他会喜欢。”于是我们娘儿俩就用伊安的白铁啤酒罐装满了中国灯笼花，并在周围铺上了一层干草。安格什说得对，这异国情调的花瑞克是会喜欢的。安格什去上学后，我把电话听筒从电话上拿下来（不让别人打电话来打扰），铺上我们那块镶花的最漂亮的桌布，摆上银餐具，做好蔬菜，赶紧到酒店去买来了瑞克喜欢喝的那种牌子的杜松子酒。然后，我又跑到花店买来了两盆长得很粗壮的、青铜色的菊花和一束奶油色的大波斯菊，插到瑞克送我的水晶花瓶中。彼得放学回来后劈好了柴，生着了壁炉。我洗了个淋浴，穿上那件黑色的紧身丝衣，使我显得苗条又迷人。后来，我又换上了毛衣和裙子，这样使我更舒适，准备停当，我便驾车往机场迎接瑞克。

我居然忘了他是位又高又大的男子。《麦克林》报曾说过他是唯一的一位看他本人比电视上更高大的电视记者。“他不会让你失望”——报上有关他的那篇文章是这样说的。说得对。那天下午他的确没让我失望。我终于在我们那个不太繁忙的新机场的行李传送带旁见到了他。

他全身穿着褐色的、粗花呢和丝的衣服。金黄带黑的头发刚理过。他伸开双臂拥抱我时，身上散发出科隆香水或是飞机上苏格兰威士忌酒和别的什么气味来。

“熟食，”他说着向我打开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食品袋，因为里面装着动物脂肪而变成深色。“你说过这儿买不到好吃的熟食，所以我买来了五香熏牛肉和意大利式蒜味咸腊肠，连同我的行李一块装在一个盒子里，但是隔开的。还有从红庞则餐馆里买来的奶酪饼。感恩节愉快，乔妮。”

那天晚上可以说自始至终我们都过得愉快极了。晚餐十分丰盛可口，饭后我们又喝了咖啡和白兰地酒，然后去泰勒足球场观看彼得他们的足球赛。在球场的灯光下，那些穿着蜡笔般鲜艳的球衣的运动员们显得富有戏剧味和不真

实。

“我感到自己成了奥康纳音乐片中的演员了。”瑞克微笑着说。他呼出的热气在那清新的冷空气中呈雾状。

“我总喜欢点评这类比赛，”我说，“我总希望自己能成为得胜的女皇和足球队长一块去参加丰收舞会。”

“你当过得胜的女皇没有？”他严厉的目光看着我。

“从来没有过，”我说，“所以也从来未与队长一起去参加庆功舞会。”

“谢谢上帝。”他说着笑了。

彼得的球队赢了，我们还将一些球员载到了我们家。他们爬进我们的小汽车时，个个都兴致勃勃。驾车驶过月光照耀下的街道，听着陌生的声音激动地谈论着球赛，的确是件乐事。一到家孩子们都去睡觉了，瑞克点燃了壁炉的火，坐在炉前，喝着茶和白兰地，与我漫无边际地扯开了：梅卡的功课啦，马格丽特·劳伦斯的小说啦，为什么政治家不多读书啦，等等。楼上静下来了，我知道孩子们已经入睡。我便将安迪与梭伦·伊默斯之间的关系告诉了瑞克。他听后有阵子没出声，后来，他平静地说：“这类事情不会

有好结果。”说完站起来又说：“该睡觉了，我的凯旋女皇。”

我随他一块走到阳台外，天空转晴了，满天的星斗，在黑夜里如同一点点闪亮的针尖。我没有关奶奶公寓的灯，现在可以看得见它们发出温暖的光芒，仿佛在院子那边向我的客人发出了邀请。瑞克抓住我的双手，俯身注视着我，说：

“谢谢你为我策划了一个极好的晚上。”说完便振振有声地穿过院子走了。我目送他爬上台阶，推了推门，耸耸肩，又转过身来朝着我说：“钥匙呢？”

“见鬼，”我说，“对不起——在窗口的小盒子里——有一个小塑料袋用带子系在旁边。”

他伸手进小袋中，然后在黑暗中举起手来，说：“胜利了。”便开门走进去，消失了。

我在屋外清新而寒气逼人的空气中站了几分钟，注视着他那高大的身影在庭院对面的正方形屋中的灯光下走动。接着我把狗叫回家，因为我觉得自身与外面的世界很融洽，所以就带着狗一块上了楼，让它们睡在我的床底下。

为梭伦·伊默斯举行告别仪式的那天天气格外的好——是一个印第安地区典型的夏末。碧空万里，秋天的阳光似乎有些朦胧——总之，天气好得叫人心醉。瑞克和我一吃过早饭就驾车直奔吾尔夫河。我们到达时，他的电视摄制组已在录制一些背景材料。他走过去道了个歉就与他们谈了起来。我穿着白色的西装正站在阳光下，身上感到暖暖的。这时米勒德警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

“克尔本太太，你好。”

“是你呀，警长，你也来了叫我吃了一惊。你原来认识梭伦·伊默斯吗？”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摇了摇头：“不认识，我不过是在这儿随便逛逛而已。”

“但你现在肯定负责监护伊芙……”我的声音小了下来。

“啊，那你从来不知道？”

“从来不知道什么呀？”

他耸耸肩膀，拔腿就走，说：“教堂见，克尔本太太。”但他又转身朝着我说：“前几天你在我办公室说过你正在写一本有关安迪·波尔丘克的书——我想你不会改变主意吧？”

“当然不会。事实上我比任何时候更投入。我认为不是伊芙·波尔丘克杀害了她的丈夫，警长。我更不认为梭伦·伊默斯是她杀的。”这是我首次高声地说出了这些话，听起来还真有理。

他使劲吸了一口烟，将它扔到地上，然后用脚将它踩灭。那支烟只燃了一半。

“克尔本太太，你能不能给你的朋友——警方帮个忙？审慎地去进行你的调查研究吧。”说完他从上衣胸前的口袋中抽出了一包库尔牌香烟，拿出一支，两眼瞪着我说：“你穿的这套西装很吸引人呀，在这种场合穿最合适了。”说完便走开了。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阳光下，穿着我那套漂亮的西装却无话可说。

我走过去想与瑞克交谈，可他正要录音，我一走过去，那帮摄影师就示意瑞克走开。他们说：“你站在那个地方光线不好，头部会摄下一个十字。”

瑞克朝我摆摆手笑了，不过他还是走开了，重新开始去干他的事。我走

到祈祷中心的入口，就听到了瑞克那严肃的、职业化的声音：

“六个月以前，梭伦·伊默斯曾以胜利者姿态站立在这里，他一个人筹集了五百五十万元，从而使建造我身后的祈祷中心成为现实。他可能不会知道——”

这时一辆建筑工地的卡车驶过，喇叭声大作。某个像是负责的人叫道：“好，就这么办，把扩音器关小，让那边的董卡牌卡车来叫我们的伙伴们安静下来好了。”

瑞克朝我微微地挥了挥手，我走过去依傍在一堆按大小和颜色精心堆好的石头上。原打算在小教堂外建一个石头公园的。就在我和他一块去爬山的那天，梭伦·伊默斯已告诉了我。

天气真暖和，我能感觉到手臂下面已经出汗了。

瑞克从头说起：“六个月前，梭伦·伊默斯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这里……”我转身步入了那座凉爽的大厦。

梭伦·伊默斯的遗体告别仪式令我心碎。学院的领导早已请了一位办丧事的顾问来协助学生办理梭伦·伊默斯的丧事。她已经建议过，如果你们有人手事前策划好这次告别仪式的话，你们将能更快地弥补遭受的损失。这个建议既合情合理又可怕。

因为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多数是学生，几乎没经历过死人的场面。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年人利用告别仪式的传统和花招来控制感情。葬礼过后，马克·伊文森那稚嫩的脸哭肿了。他告诉我：“我们想让梭伦的葬礼特别些——不像从书本上抄袭的那样。我们要用自己的声音向他最后道别。”整个告别仪式非常感人，足以使我们被巨大的悲痛压垮。棺木用一块无缝的白色缎带覆盖着。那是梭伦去年夏天从都柏林亲自带回来的。中间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本小孩用的《圣经》。学生会主席告诉我们，那是梭伦的祖父在梭伦出生那天带到医院给他的。

仪式上还有表演。学校的合唱团唱了一首梭伦生前喜欢听的歌——《福音》中的圣歌。还有，令人吃惊的是，还唱了两首《西部故事》中的插曲《某地》和由斯迪芬·桑德荷姆作的那首《当我不在身边的时候》。

在自选节目中，学生们奉献了他们对梭伦特殊时刻的回忆和诉说了他的善行。最后，还放了梭伦在号召大家为祈祷中心出力的一次演讲录音。当他那充满音乐感和希望的声音响起时，人们的抽泣和呜咽声在那个鸦雀无声的室内简直是刺人心脾，我身边的瑞克·什班什居然全身颤栗起来。

在大厅的后部，萝利·伊文森那穿着黑色丧服的小巧身影走到人群前边来，用她那甜美悦耳的声音唱了一首题为《好得惊人》的歌。

唱完，她的丈夫走过来站在她身边，很简要地说了几句话：“使徒约翰现在会来帮助我们。‘黑暗中闪烁着灯光，黑暗没有吞噬光明。’”说完葬礼就此结束。

在回城的路上瑞克和我感到没什么话可说。我只觉得肩部肌肉紧张、头疼，所以我决定到湖畔俱乐部去游泳放松一下。

我把这想法告诉瑞克，他笑着说：“看来倒是个鼓舞人心的想法。”

“是不是足以鼓励你和我一块去呢？”

他脸色吓人，说：“上帝，我不去。”看看我的脸色，他更关切地说：“你常游泳吗？”

“每周六上午一定去。我们全家都去。我们全家周末都到湖畔俱乐部去

消闲，这是我们家一成不变的惯例。”

他笑着说：“惯例能叫人舒服，对不对？”

“对，”我说，“是这样，你现在乐意我带你到何处？”

我把他送到他们电视网络在我们当地的演播室，然后就驾车直奔湖畔俱乐部。1小时后，我上了岸，尽管头发还未干，但我感到轻松多了。我于是决定到感化中心去看看伊芙。

卫兵是一位高挑个子、有着漂亮的红头发的年轻女人，从她胸前挂的身份牌，我得知她名叫特丽·莎。她告诉我伊芙一整天一言不发，不过她看起来是心事重重，所以他们对她十分关注。当我和她转过一个墙角到达医疗区时，特丽·莎对我说：“伊芙现在在手工工艺区里做些小玩意儿。我们刚才叫她做的。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透过玻璃去观察一下她。”

我看见伊芙正坐在观察窗口附近的一张桌子旁，俯下身子去拿一只纸做的火鸡头部的垂肉。桌上摆满了火鸡。那些火鸡都做得很好，一个个傲然挺立，雄姿栩栩如生，都有着明亮的、凶狠的双眼。伊芙一心一意在做手工，她灰白的头发垂下来散在额前，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清她的脸。我站在那儿观看了几分钟。临走之前，我用手轻轻敲敲玻璃，向她挥挥手。她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我，如同一位从事重大使命的妇女被一位傻瓜惊扰了似的。随即，她笑笑重又沉溺于她做的火鸡当中。根本不认识我了。

我的晚餐随便但可口。在阳台上吃晚餐是够暖和的。瑞克去铺上买啤酒，我铺上桌布，摆上一碟碟五香熏牛肉、意大利式蒜味咸腊肠、一个托盘的面包、芥子末和油腻腻的犹太教莼罗叶。红庞则餐馆的奶酪饼也像送饼来的那位人一样不会令人失望。我记得那天的一点一滴都是值得回忆的。

去温尼皮格的火车开得很早，7点钟以前就开。男孩子们早就把收拾妥当的皮箱拿下前厅来了。我们头天晚上睡得很早。

我把门锁好，朝奶奶公寓望去，只见黑暗中那正方形的屋里灯火明亮，瑞克的身影在打电话。在早上心情抑郁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人赏心悦目。

我原来很担心瑞克·什班什在阿丽·苏德兰及她丈夫莫特·李和我的一家中间会感到很隔膜，如同局外人，尽管我们一家人与他们夫妇是亲密无间的。但当我看到在温尼皮格火车站，瑞克一走过去伸出手向阿丽致意问候时，他们仿佛就一见如故，我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阿丽是位高大壮实的女人，总是穿戴时髦。她和瑞克一块站在古老的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圆屋顶下，看起来像是来自同一个高大漂亮种族的旅行者。

自瑞克推开阿丽和莫特在吐克尔德那间砖砌的平房的门那一刻起，他就没有任何陌生感。尽管瑞克的工作领域和阿丽夫妇这两位医生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个人生命之火却被共同的爱所点燃：即艺术，歌剧和对于美食的热衷。

我们到达农舍两小时后，瑞克·什班什就下厨了。他把一块正方形的黄油塞进一团长方形的生面团，用来做油酥馅饼。还一边呷着冰冻马蒂尼酒一边与莫为《珍珠渔夫》歌剧中的一首二重奏是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争得面红耳赤。总之，那天晚上可说是听到的全是妙语连珠和笑料。就连彼得也一反羞涩的常态，讲了一个名叫古贝的学生的故事。古贝在读十一年级时竟奇迹般地长得很高大。那夜我钻进前面客房软软的法兰绒被单中时，竟然大声说出：“我要永远呆在这里”的话来，我面带笑容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星期六一早，莫特·李就从餐桌边走过来说：“今早上阿丽和我打算要带彼得和安格什以及其他愿意去的人上商业区加拿大西部最大的玩具店去逛一逛。”彼得听后显出很大的热情，莫特见状用拳头捶了一下脑袋，又说：“我是说上玩具店吧？当然我的意思是要去看球员喜欢的各种玩意儿——那间商场有球员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球类和打各种球类所需要的设备而且是带卡的：篮球、足球、曲棍球明星卡，总之是应有尽有。”彼得听了乐得手舞足蹈。

瑞克在一边呷着咖啡，他插嘴说：“我不是球员是厨师，今晚我做饭好了。我已经列好菜单了。用彼得的话来说，我的菜单可是‘重磅炸弹’啊！”

我坐进阿丽那辆沃尔沃牌汽车后座时，我知道我已将那座充满快乐的屋子抛在后面了。

兰·埃帕里贝居住的吐克尔德公园路距离阿丽和莫的家仅5分钟的汽车路程。那条街宽敞，种有高大的树木，还有宽大的停车场，更主要的是，有许多可以炫耀主人富有的房屋。埃帕里贝家树木葱茏，除了有最大的停车场外，还有最为用心良苦建造的房屋。我提起大门上的门环，只见阿丽已将那辆闪闪发光的沃尔沃停在屋前。我心中一喜，由此想到：借来的荣耀总比没有荣耀好一些。我这回可是“阔”了。

来开门的是兰·埃帕里贝的管家。她是一位壮实的苏格兰人，有着淡淡的红头发和一张苍白有雀斑的脸。她见了我们不如在电话上那么热情，事实上，她根本不想掩饰不高兴见我的事实。外面天气很凉，可是她竟未请我进屋。

“埃帕里贝太太正在休息，你们最好换个更方便的时候再来。”说完她转过身，将门“砰”地关上。

我赶紧将我的钱包夹在门缝中，说：“现在就是我与她商定好的会面时间。如果你能通报一声，我肯定埃帕里贝太太会……”

“我肯定——”她把“肯定”读成了“赛丁”——“夫人肯定同意换个时间见你。”她一边说，一边执意关上门。

我赶紧把头伸进屋里，大声叫道：“兰·埃帕里贝，乔妮·克尔本来看你来了。”我立刻听见内屋传来一个干哑而急切的声音说：“进来。”我奚落了一眼那位苏格兰妇人，就从她身边闪进了前厅。我前面就是一个门厅，有我家起居室那么大，还有一个楼梯平台，顺着上旋的楼梯可达二楼。但我被领往左边，穿过餐厅，进入一间房内，房内还有一扇门通往花园。我这一辈子游历过许多地方，见过这类房间，知道它的用途——那是女士们的起居室。女士们往往在此等候着她们的男人喝足了白兰地、抽够了烟转回到这儿来。

一看就知道这房间以独特的兴味和天分来重建过。所有精工细凿的木制品都保留得完好无缺。墙壁和家具均漆成淡黄色。三张有花的精美的椅子，大小正好适合妇女们谈心时坐，面对面地摆在窗前。墙角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挂钟，在这寒冷的10月清晨，壁炉里生着火，使室内暖融融的。壁炉前是一张咖啡圆桌，桌子每边均有椅子，椅子上盖着丝质绣花的套子，上面绣着闪闪发光的奇特的鸟类。兰·埃帕里贝正坐在一张椅子中，脸朝着房门。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主人对我是欢迎的，这倒使我对管家刚才的态度迷惑不解，但当兰·埃帕里贝起身迎接我时，我方明白，女主人已喝得酩酊大醉。

她从桌子对面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然后重又坐下往后靠回椅子中。她的笑容终于使我的疑虑冰释。我本来以为她的年龄是五十五岁，但五十五岁的妇人居然这么利索，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态，红润的皮肤，化妆得体，头发也剪得好极了。她一笑起来便会使岁月留下的痕迹消失，使你看见她青春年少之时。她曾是窈窕的、有着漂亮女人常有的自信，有着那种说话的方式，不用说，我和她都知道她曾是美丽的，现在谈这些已经无用，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去欣赏一下它。

她的声音虽说干哑，但还算中听。她身边的一个烟灰缸已满，旁边还放着半包骆驼牌香烟。她的嗓音沙哑就是抽烟造成的。她提起咖啡壶，对准我的杯子，不想却溅到了桌布上，她尴尬地大笑起来。

“哎呀，你可得小心才是，”她说，接着她下意识地伸手去取身边的一瓶白兰地，毫不吝惜地为自己斟上了一大杯。这回她可是一滴也没溅出杯外。她呷了一口，重又靠到椅背上，看着我。可是她的双眼却像孩子似的游移不定，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她居然忘了我的来意。

我抓住机会开了腔：

“我是安迪·波尔丘克的朋友，乔妮·克尔本。”

我一提及安迪的名字，痛苦的表情即刻掠过她的脸庞。她又喝了一大口酒，然后站起来慎重其事地说：“克尔本太太，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想你能不能原谅我，改日再来。”说完她跌跌撞撞地朝门口走去，一条腿撞在咖啡桌边倒了下去，差点撞倒在那口挂钟上，我赶紧将她抓住。她立刻瘫倒在我身上，头搁在我肩上，如同足球队员被罚了点球似的。

“我要上楼睡觉去了。”她说，我除了遵命别无话说。

我扶着她穿过餐厅，从一个至少可以安排十六个座位的大餐桌旁经过。不知怎么的，我倒怀疑兰·埃帕里贝不会常有十六个人一同进餐。我们步入门厅，我四处张望想找女管家。

“她走了，”兰·埃帕里贝说，“去喂火鸡了。”说完她几乎全身倒在我身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呈弧形的陡峭的通往二楼的楼梯。我调整一下姿势，牢牢地托住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开始爬楼梯。这段距离真不短。沿楼梯旁的墙上是兰的照片。我们一边往上走，她一边简单地为我介绍这些照片。第一张是黑白照，她穿着很显身段的溜冰服，摆出运动员的姿势。

“1946年，”她说，“那年我遇见了查理，我在溜冰队里。不过，这张照片是假的，我并不是运动明星，只是在合唱团里……照得真不够好，不过，你看得出来，倒也逗人喜爱。”

“你现在也还逗人喜爱呀。”我说。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她用喉音笑出声来了，说：“嗯，我想他们原想解雇我，不过我先发制人……嫁给了那位老板。”我们往上走了两级，又看到另一幅照片——一张结婚照，底色很淡。我曾在报上见过上百次查理·埃帕里贝的照片，大多数时候他总是与他的曲棍球队在一起拍的。他是个身材高大、粗眉大眼的男人，比他那位小巧秀气的新娘大二十岁。不过这张结婚照中，他显得很吸引人。

所有这些照片都具有永久的吸引力。因为它们追溯到主人那种少有的、单一的爱好的。其中有兰吃力地举着斯坦雷奖杯兴高采烈的样子，一旁的查理一心想助妻子一臂之力，伸手过来扶住奖杯的照片，兰五十岁仍风韵犹存，英姿飒爽。照片中她穿着黑色的水貂皮大衣，戴着不大不小的羽毛帽子，她的迷人的微笑使她的面孔宛若影星李斯特·帕尔森那么年轻美貌。查理则满面春风。还有一张照片是兰和查理在蒙第哥湾摄的。他们的脸晒得黝黑，生气勃勃地在喝着冷饮，他们的面前堆着高高的一堆水果。还有一张照片摄于美国的佛蒙特州斯丢市。他们身着色彩艳丽的滑雪衫，侧身站立着，在蓝天的衬托下，煞是好看。

最后一张是兰一个人的，她独自坐在摄影室内，依然楚楚动人，不过显然已老些了。

“这是我独自照的最后一张，”她说，“看了令人沮丧。我要是有精力的话，就会叫人把它们全取下来。看着自己渐渐地苍老了，真令人伤心。”她转过身去，做了一个扫去的动作，差点没把我们从楼梯上拉了下去。我使劲抓住她，将她沿大厅拖至卧室。

她并没有反抗，一屁股坐在梳妆台前。我趁此机会帮她把床罩拿开，她倒在床单上，立刻睡着了。我正找样东西给她盖上，正巧发现一张照片——那是我——真认为存在于某处的一张照片，用一个椭圆形的银镜框框住。照片上有一个六七岁的女孩站在教堂的台阶上穿着白色的入教会的女装，她的头发呈螺旋状，卷成小圈。她身旁是一个主教，那人大腹便便的，长着球茎状的鼻子，一笑不笑地看着镜头。

我把一张毯子盖到熟睡的妇人身上，顺手将那张照片塞进了我的手提包内。

然后我一个人悄悄地走下楼梯，一边回顾着床上醉倒了的兰的一生，她如今是孤苦伶仃的寡妇，以前曾为人的新娘，为人妻，还曾是溜冰场上显耀的人物。我打开前门，步入了清新的空气中。我思忖着，或许回顾兰的一生从前比现在过得更好一些。

巴巴拉·布莱恩在电话铃响完第一声就拿起了听筒，说：“乔，这样感情用事与你的性格是不相符的，你是不是想了解一下你家的狗太孤单了吧？”

听见她的声音就是一种享受。我说：“我完全相信你能照顾好它们。不过，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巴勃。能否麻烦你到你隔壁的奶奶公寓去一下，那里有好些档案卷宗，其中有一张照片，你帮我取出来寄给我好吗？”

“就像对面街的那个讨厌的家伙说的那样，我的回答是‘没问题’。”

“太好了，钥匙在窗台上的小盒子中。”

“我相信你的话，乔，再明白不过了。”

“反正你会很容易找到钥匙的，我要的那张照片在标明 1950 年的档案中。那是安迪的第一张入教会的照片。你不会找不到的。”

“乔，说到奶奶公寓，今天曾有一帮人在屋外从——”电话里传来了哗啦一声接着是一声嚎叫。巴巴拉再重新说话时声音很温和而无忧无虑：“山姆刚才从他的摇木马上摔了下来。祝你感恩节愉快！山姆和我马上驾车将你要的照片送到飞机场，开开车会使他忘记刚才的伤痛。那么今天天黑以前你就可以收到了。”

“巴巴拉，谢谢你。哪天我也为你办点事。祝你感恩节愉快！”

我从机场驾车径直往兰·埃帕里贝家，我钱袋中装着两幅照片，它们使我证实了一件事：安迪去世那天，罗玛·波尔丘克曾对着兰的脸啐了一口唾沫，我当即感到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我早就知道，如果我给兰打电话，她会拒我于千里之外。而且我对她的自我膨胀又很反感。想到有两位男子无辜地死去，还有一位我认为清白无辜的、心碎了的妇女被拘留在感化中心内，事情可能还远未了结。我固然不知道目前我所做的一切有什么用，但我却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可不能放过任何细节不加以仔细推敲。

来开门的正是兰本人。这是第一个令我吃惊的事。她没有喝醉，头脑很清醒，这是第二个令我吃惊的事。

我说：“兰，我来了，我有件东西要给你。”

她一定感到很不好受，但她还是对我报之一笑后将门打开了。她领我穿过餐厅，来到她的小起居室。

壁炉里生着火，暖融融的，似在欢迎我的到来。桌子中间放着一盆鲜活的小苍兰。

“这时候该喝点什么。”她说。她脸色苍白，但很倔强。她婉转地提及那天早上对我的冒犯，并莞尔一笑，说：“我想我们几乎应有尽有，我喝茶，你是否也喜欢？”

“喝茶好了。”

她为我斟茶时手发抖，这次她却把杯子打翻了。“克尔本太太——乔妮——我想对早上的事作些解释。”

“兰，请相信，这些事我根本不放在心上。自安迪遇害后，梭伦也惨遭毒手，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我不能迫使你卷入，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知道任何有关情况的话，我想你有责任说出来给一些人知道。”说完我伸手进我的包中摸出两张照片，将它们并排摆在桌子上。两张照片的镜框都是银色的。她的照片镜框呈椭圆形，上面有小花图案；安迪那张照片的镜框却没有花，呈正方形，重一些，但两张照片所摄的教堂台阶和主教都是相同的，只是兰保存的照片中那位主教更年轻一些而已。安迪曾有一两次开玩笑地说过罗玛年龄过大，不可能是他的亲生母亲。事实上，兰出世的时候，罗玛当时本来应该还要年轻一些。

兰对照片的反应使我大吃一惊。她拿起我偷她的照片，不加评说，但我

看得出来，她看见安迪的照片时，倒抽了一口冷气。她端详着照片，壁炉里的火光照在镜框上，使它变得暖和起来。

我想，这该是我向她提问的时候了：“兰，安迪是你的弟弟，对吧？”

她惊愕地抬头向上看。这使我忆起安迪去世后那天我和伊芙在圣徒餐馆用餐时，她曾对我说过我连安迪最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当时她脸上的表情就是异乎寻常的。而兰在这一刹那间的表情居然会与伊芙那天的表情别无二致。兰将身子向我靠来，我可以闻到她身上的烟味和香水味。她用沙哑的声音道出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秘密：“我想你弄错了，安迪·波尔丘克是我的儿子。”

兰叙说的的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当年那位漂亮的小妞和她喜欢的舅舅——罗马的弟弟有过一段罗曼史。“我原以为，”兰说，“当罗马发现此事时会站在我一边，会杀了她弟弟，但事情正好相反，她要杀的却是我。”说到这里，她提高了嗓门，模仿着罗马的声调说：“放荡女人，娼妇，全是她的错，爱林娜，我弟弟西得是个正经男人，是她找上门来的，她这个臭娘们，婊子。”说到这儿兰带着喉音笑出声来了。“出于母爱，当然，最后她将我生下的婴儿抱走了。我那无辜的孩子啊，但愿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生母是谁，是娼妇。好，现在你心中该明白这一切了吧。”

她点燃了一支骆驼牌香烟，使劲吸了一口，又往下说：“我们结婚后许多年，查理才知道这些事。啊，上帝呀，快别说我有多么内疚了。最后我还是对他和盘托出，他倒是很理智，问我：“那么，兰，你想该怎么办呢？”

“我从贝蒂·大卫斯的电影中得到启示，想出了个极好的主意。我本想跑去见安迪，告诉他他不是被人遗弃在铁路边的孩子，他是兰和查理·埃帕里贝的孩子。他的父母是有钱人，能为他办到他想办的任何事。当然啦，他听后一定为这个意外的消息而吃惊得跪下来。”说到这儿她禁不住哈哈大笑。“以后罗马就会认识到她以前的错误做法，并为之悔恨，甚至她还会去死。无论结局是哪样，我们往后都生活得很幸福。”

烟灰从她手上落到了那高级地毯上。她仍然抓住机会解释说：“但我错在问了查理他对我的做法怎么想，”说到这里她的眼里流露出梦幻般的神情。又说：“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兰，我亲爱的，还是让他归他，你归你吧。如果你想给些钱给他的话，我们可以设法用假名，顺顺当地给他足够的钱，又不至于使真情败露。’查理认为这样最好，他——我们后来也正是这么做了。查理的律师认识豪沃德，从安迪十八岁起就是由他来办理此事的。况且总是——”她惨然一笑，又说下去：“——总是匿名的。”

“但你见过安迪，”我说，“野餐会那天你来了，在吾尔夫河祈祷中心捐赠仪式上你也到了，我在录像带中认出了你。”

“查理去世后我离不开安迪，我已经没有最亲近的人。我将我的苦衷告诉了豪沃德，他建议我为松树园做点什么，因为安迪的小儿子居住在那儿。他说那样就会给我一个合法接近安迪的机会。我不知道豪沃德心中是如何想的，但我毕竟老了，不想去哄小孩子，所以我就问梭伦·伊默斯我能为圣经学院做点什么。”

“于是就有了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我说。

“查理·埃帕里贝祈祷中心就诞生了。”她温和地纠正我的话。“这就是我参与的事。”她的香烟仍在烟灰缸中燃烧，可她又点燃了一支。“现在，”她说，“我有一个问题让你回答。”她的嗓子像破锣。“这些事情都是谁干

的？不会是伊芙。我可以肯定这一点，就像我肯定自己永远不会是巴巴拉·安·斯各特一样。究竟是什么样的魔鬼在作祟。”

当我将汽车停在吐克尔德公园路那栋平房整洁的门前时，只见彼得和安格什正和莫特·李在屋前的草坪上踢足球。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准备已够得上进入本赛季的一支劲旅。莫特算得上是个毫不吝啬的购物者。

时令已是深秋，阳光突然收敛。暮色苍茫之中气温骤然下降，寒气逼人。这会儿有家可归，叫我多么高兴啊。我一打开门，一股烤牛肉和馅饼的味儿迎面扑来。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歌星杰西·贝亚宁的歌声。只见瑞克大步流星地走到大厅里。他身上围着一块屠夫用的大围裙，看起来情绪高昂。

“见鬼，我还以为你是莫特呢，”但他马上意识到所说的话不对劲，立即改口说，“乔，真对不起，只不过是……”

“你想叫他来听歌剧《珍珠渔夫》中的贝亚宁和米瑞那首二重奏吗？我也有这盒录音带，去叫他来吧。”莫来了，由于运动和冻，脸红扑扑的。于是我们三人就在那儿欣赏起那首《在圣庙前》来。我思忖：或许瑞克是对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接着我们便举杯畅饮，一边吃着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然后莫特又放了法国作曲家拉维尔的F调四重奏。我们争议着，但一致认为《珍珠渔夫》中的插曲是最动听的。不过……

在这间充满文明气息的屋子里，很容易使我们忘却了呆在狱中的医院里的伊芙，她坐在桌旁，剪着眼露凶光的火鸡；我们还会忘却兰·埃帕里贝用她修剪得很漂亮的指甲去抚摸她那已故的儿子的照片的镜框；可能甚至还会忘记一时猖獗的恶魔正在倘佯徘徊伺机作恶。

那个星期天下雨，但感恩节却是秋高气爽。

“这是上动物园去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莫说，“如果下周去就太冷了。乔，快把你准备好的大马哈鱼奶油冻扔到炉子里，我们走吧。我们要是吃掉这儿煮的东西的一半，就得干点事消耗掉几个卡路里的热量才行。”

公园里，瑞克、莫特和孩子们走在头里，阿丽和我随后闲聊。我根本没想到瑞克的远足原来是这样的。事实上，我曾怀疑过他会不会来呢。但他毕竟还是来了。他穿着一件厚厚的阿兰·爱尔牌毛衣，显得更高大。他像我见到他时那么快活。他知识渊博而又风趣，居然把动物园中各种动物与政治家们联系起来：一个大的忧伤的母狒狒被他称为我们前能源厅长，一个睡眼惺忪的老掉牙的狮子，在笼中转来转去，当有人掷卵石过去时，它使劲向上跳，瑞克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位就是你们的前省长豪沃德·道汉尤克。”

“那它们又是什么呢？”安格什指着在一片开阔地中互相追逐嬉戏的斑马问道。

“问得好，”瑞克说，“他们是一群记者。在渥太华，他们如同这些园中的斑马一样，年轻的雄斑马还不够成熟，也还不具备足够的攻击力，所以并无自己的下属，或是成为一群单身公斑马的头领。”我们听后捧腹大笑之时，他又煞有介事地补充了一句：“狮子是他们的大敌。”

晚餐丰盛，满桌都是美味佳肴。莫特简直成了一位来自法国莫塞尔的地道的做大马哈鱼奶油冻的拿手厨师。从烤火鸡到南瓜馅饼都是又具传统风味又可口。席间，大家亲密得如同一家人。当莫特驾车送瑞克至机场乘飞机飞回渥太华时，我们免不了怅然若失，仿佛这个社交圈垮了似的。

阿丽和我走进厨房，将橡木餐桌清理出一块地方，倒上咖啡，分食着最后一个南瓜馅饼。我们一边吃一边回忆往昔。他们昔日生活得并不快乐，尤

其是刚成婚那阵子。后来有了阿丽的支持和爱的力量，他们生活大有好转。纵观我的一生，我想我算得上是个幸福的女人。阿丽与我坐在她布置得很漂亮的厨房中，抚今追昔，畅谈人生，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可是我们还沉浸在节日里晚餐乐融融的气氛之中。

她看着我时，面部表情很严肃。她说：“你知道吗，乔，我想到现在你已从悲痛中振作起来了。当我听说安迪遇害时，我一直担心你不够坚强，挺不住这又一次心灵的创伤。瞧，现在你坐在这儿，好端端的，生气勃勃的，只把安迪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留在他的照片中。作为你的医生，我为此感到骄傲。作为你的朋友，我为你高兴。”说着，她伸手到桌子对面捏了捏我的手。“你是特殊材料造的，夫人，真正好材料造就的。”

在回利宅那的一路上，我重温着阿丽的话，心里乐滋滋的。

第二天早晨我在自己东湖路的家中醒来，睁开双眼，便看见屋里已经通明。我躺着，倾听着远处天鹅群悲怆的叫声。它们正在往南方迁徙。我起身开窗，一股清新的冷空气涌入室内，这是冬天的气息。我蜷曲着身子在临窗的沙发上坐下，用双手抱住双膝，以使自己暖和一些。临窗遥望，只见碧空蓝天万里无云，真是个10月里难得的好天气。

蓦然间，数百只、数千只天鹅飞来，将天空遮黑，它们的声声悲鸣传入室内，宛如音叉引起我的共鸣，一时间使我竟茫然不知所措。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也是一年里最后的、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那一天一切都乱了套，有好一阵子，好像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一开始并未出什么问题。早上我牵着狗出去散步回来，看见一辆加拿大邮政车停在我的屋前，两个男人正从车上往下卸一些箱子。我一直在等他们送这些箱子来。早在我们全家去温尼皮格度假之前，供给服务部的一位妇女就打电话告诉过我，还有许多有关安迪的材料（她把它们称为“波尔丘克——有关材料”）在省议会大厦的储藏室里，他们想把那地方腾出来，又不想再打扰波尔丘克太太。（对，我想，对一个永远困惑不解的人，应该在某些事上宽恕她。）德夫曾向他们建议说是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安迪的书，和……他们这就把材料送过来了。这下子政府机构倒是高速运转，要清理储藏室了，可我还未准备好地方来存放这些箱子呢。

我在收据上签了字，并对司机和他的助手说，如果他们能将箱子搬到奶奶公寓我的办公室内，我会再付给他们钱。自从我去温尼皮格度假以来，我就不曾到过那儿，里面冷飕飕的，我打开了暖气，并付了钱给来人，便回屋去暖和一下身子。我打了几个电话，回到办公室时已是10点过了。我感到易于激动和沮丧。我讨厌时光被琐事打发掉，但那天又恰恰像是这样的時候。使我更为丧气的是屋里样样东西都蒙上了一层细细的灰尘。从省议会搬来的几口箱子上、书桌上、窗棂上、档案上处处是灰蒙蒙的。显然，尘埃在整个夏天里还进入了暖气系统，我一将它打开，便像是炸开了。我想不理睬那些灰尘，着手打开文件箱，但就连箱内也是灰尘仆仆的。无奈我只好去打了一桶温肥皂水来，开始擦洗室内的东西。中午到了，安格什回家吃中饭来了。我把炉子打开，为他倒了碗西红柿汤。我为自己鼓气说：“你已学会了处理大事，可别让这些小事把你难倒呀。”

安格什去上学后，我决定庆祝一下自己已战胜烦恼。我解开一筐干果来犒劳自己。那是克里格·伊文森感恩节时寄来的。不过我一颗也未吃，便开始翻看刚搬进来的箱子里的东西。其中有一大箱剪报，是按标题而不是按年来分类的。要想在那天下午将这些材料重新分类归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把它们搁在一边，又打开了另一个箱子。那里面装的全部是礼物。那是所有政治家在从政生涯中获得的。其中有一个安放在一大块混凝土上的、用玻璃瓶碎片做成的本省的山脊模型；还有一对绣有安迪和伊芙头像的枕头套，一大堆业余作者画的草原风景油画，展现出草原上耀眼的落日 and 一座座谷塔，在蓝天的映衬下更为突出，斜度更大；还有一个铸有安迪姓名首字母的金属饭盒，是兰尼岗钾肥厂的工人们今年8月初送给他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能让安迪继续努力在下次大选中战胜那些狗娘养的。”

我翻看着这些旧东西，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要丢弃这些旧

东西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它们会在你的脑海里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勾起你对送这些东西给你的人的面庞的记忆；使你想起你收到礼物时，是如何喜滋滋地驱车回城的。

当然其中有的东西还算不上旧货。我坐在那儿端详着一条编织精巧的、漂亮的印第安人用的腰带，吃着最后一颗无花果蜜饯，这时只见两个男孩跑上了奶奶公寓门前的台阶，他们满脸不高兴——准是遇到麻烦了。

还是彼得先开了腔：“我们想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想你没有时间做饭……”

安格什接下来把他的话说完：“既然我们大家都喜欢吃比萨饼，我们手头又有一张可以在新开张的那家比萨饼店得到两个比萨饼的奖券，为什么我们不……”

“订中餐？”我提议说。

“啊，妈妈，”安格什说，“梅卡在家时你从来不提买那种东西。”

“很抱歉，”我说，“尽管有了比萨饼，但我还是坚持买些鳀鱼回来。”

“只买四分之一条吗？”安格什问。

“买半条。”我说。

“买三分之一条。”他高兴地说。

“这样够公平的了。”但这家店里最好能给双份奶酪。

那天夜里我被一阵剧烈的腹痛惊醒过来。我坐起来，打开灯，看了看钟。这时我感到阵阵恶心向我袭来。我赶紧跑进浴室，坐在浴缸边，全身发抖。无奈我顺手捡起了一本《女主人》杂志来读。末了，我穿上长袍，走进厨房，将一些牛奶倒进平底锅中热一热。两只狗不安地嗅着我的脚。在我们屋里，从来还未有过谁半夜里跑下楼来，挤着坐在厨房桌边，唯有狗与我为伴。喝下热牛奶后，我的胃好些了。过了一会儿，那几只狗便与我重又上楼去睡觉。我一觉睡到大天光。

我床边总放着一个记事本。那天早上我记入了一个字——病——不过此后我又洗了个淋浴，觉得好多了。我拨通了狱中医院的电话，询问了伊芙的情况。又给新泽西州的帕特森服装店打了电话，问他们我六周前为彼得生日订的夹克衫为什么至今还未收到。接着我沏了一壶茶，把它拿到奶奶公寓，便一头扎进档案堆里研究起来。中餐时我与安格什一道喝了汤。直到那天下午瑞克给我们打电话时，我感到好多了，并没有向他提起我前晚胃疼的事。两个儿子没生病，我断定是我吃那三分之一比萨饼上的鳀鱼酱使我生病的。听起来瑞克情绪仍很高，仍然念念不忘感恩节与我们一块度假的乐趣，并为我能从省议会办公室得到许多资料而激动不已。

“坚持干吧，乔，我羡慕你有奶奶公寓这么个好去处。我宁愿用六瓶啤酒来换取你得到的宁静。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我们可以摊开所有资料，安安静静地去浏览，直到找到答案为止的地方。请相信我的话，答案终究会找到的。”

他的话给我鼓励，给我带来了力量，使我坚持在那个下午剩余的时间里一心一意地工作。我和孩子们一道进了晚餐，洗了个淋浴，带着一份新的未经证实的，多为闲谈资料的下议院议员的自传材料上了床。那是晚上8点30分。我笑着进入了梦乡。因为我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难怪那年夏末他不号召选举。夜里我又被腹痛惊醒，和前一个晚上的病情一样，不过更严重——恶心，腹部绞痛还伴随着腹泻。我又一次下楼去为自己煮了热牛奶。这一次

我还服用了几粒乳酶生。那是我从一家保健食品店中买来的，对腹泻可能有所改善。我疲惫不堪地又倒在床上，还是睡着了。第二天在我的工作日记中，我写下了“病”一字，并且附带记录了症状。

那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无论我得的是什么病，我已经开始追踪观察。不知不觉地，我已经跨越了一条细细的界线，即那条划分健康和具有所有我所熟悉的症状的疾病之间的界线。原本我生病时往往考虑的仅仅是疾病本身。如今可以说是从认识上提高了一步。

最初的几周继续正常运作，至少我从表面上是一如既往地打起精神来干事。我去了狱中医院看望伊芙，她看来对什么都无所谓。我又去克里格·伊文森的办公室喝了茶，并与他谈了有关为伊芙辩护的事，我还为家中的事多次进城去；我也曾去过奶奶公寓，解开并将那些档案材料分类整理好。星期六早上我还和孩子们到湖畔俱乐部去，不过这时我往往大部分时间是独自坐在湖边发抖。每晚最后的一件事是我一定与瑞克·什班什通话。他那热切关注的声音越来越成为我度过那些日子的动力。只要我能坚持做完日常生活中该做的事，就不会出问题。

第二周时，我很难再佯装下去，我的那本工作日记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病”一字，后边还详细地记录下症状——腹泻、抽筋、恶心，还伴随着发冷，口中有金属味，而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视进食为负担。

也就是在那个第二周里，我和自己做了个游戏——如果明天病情不好一些的话，我就叫医生来——但我却从未叫过。所以到了周末，我精疲力竭，自己被自己吓坏了。我甚至不愿自己带游泳衣到俱乐部去。只是坐在咖啡店里，透过玻璃窗去观看男孩子们在那儿打乒乓球。一个早上的时光真难挨。最后我们回到公寓，把门关上，瘫倒在长沙发上，一睡就是大半个下午。吃晚饭时，彼得为我拿来了一个托盘的食物。他已经十七岁了，但却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他也还记得伊安去世后的那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么样不吃不喝。见了他的模样，我心中很是歉疚，便像一只小狗那样乖乖地跟着他回了家。

“好吧，你们这些小家伙，你们要叫我怎么样只管说吧。”说完我便上楼去淋浴，蜷缩到床上去了。夜里，阵阵痉挛和恶心向我袭来，我起床走进洗澡间坐下。这时彼得前一天用托盘为我送食物到奶奶公寓的景象在我脑中复活了。这景象仿佛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我可以听见我自己用吓人的、但具有挑战性的声音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不会屈服的。”末了，我又回到床上，一觉睡到大天光。

星期天是雨夹雪，很冷。两个儿子不去教堂自愿呆在家中，我身体太虚弱，无法和他们斗。我在床上躺了大半天，夜里又迷迷糊糊睡过去了。星期一早上，我醒来，感觉好受多了——虽然谈不上全好了，但起来策划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

还有一周就是万圣节了。我决定要好好地款待一下自己。安迪从前的行政助理露丝玛丽·威克特于几周前开了一家商店，店名叫做“四季”，那里出售我为庆祝节日要准备的一切，应有尽有。她早就将这事告诉了我。于是我比平时更用心地修饰打扮了一番，不想却惊喜地发现，那条格子呢裙感恩节时穿还觉得有点紧，现在穿上却是宽宽松松舒舒服服的了。

我将手指伸到腰带中去，并对自己说：“今天我宣布我不仅复原了而且减了肥。”

露丝的店铺坐落在一条狭长的林阴路上，那是阿丽·苏德兰曾与人合伙

经营过的同一条狭长的林阴道。我把车停在距阿丽的办公室尽可能远一些的地方。今天我已战胜了疾病，我不需要找医生了。

“四季”是家特好的店，我去到店里时，露丝跑到商业区办事去了，但她的伙计们却是兴高采烈而又谦和。我在店里找到了极好的东西。那是一个饰有橘黄色丝带和小黑猫的花圈，正好可以给梅卡挂在门上。还有万圣节用的挂在我家门廊中的鬼怪风向袋。我还为朋友们买了一些节日卡。我正站在付款台前准备付款，这时有一件南瓜色的、约莫二号大小的衣服映入我的眼帘。我一时冲动，决定买下来送给柯雷·伊文森——萝莉和马克的小儿子。我将这件衣服刚放到柜台上，露丝玛丽·威克特就跨进了门坎。见到我她面露喜色，但又很快收敛了笑容。她说：

“我的上帝呀，乔，你怎么啦？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我得了一次流感，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

“你病得不轻呀，掉了多少体重？”说着她伸出手来摸摸我的前额，又说：“你好像正在发冷呢。”

“我好多了。”我木然地重复着这句话。

“来，看看你自己。”说着她将我的身子转过来，这样我们两人都能看见门边那个展销柜上方的镜子，露丝把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十几个橡皮衣架挪动到一边，这样我便能更清楚地从镜子中看到自己。

不看则已，一看吓了我一大跳。镜中露丝玛丽皮肤透出健康的粉红色，她从我的肩上伸出头来看着镜子。可是她看的不是她自己，她看的是一个嘴唇龟裂、面色蜡黄、眼睛凹下去的妇人，那就是我。

“医生是怎么说的？”露丝问，她仍然从我肩上伸出头来打量着镜中的我。

“我没去看过医生。”我说。

“那我们现在就去，你是想让人送到医生的诊所去，或是看看阿丽的老地方有没有什么人能为你看看呢？”

我没说话。

“乔，”她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判看看你去与不去，我们是商量一下找哪位医生为你看病才好。是不是去的问题我们不谈了。现在就去看去给谁治病好，是找医疗中心的某位大夫或是找阿丽诊所中的某位？”

“找阿丽诊所的人看好了。”我木然地答道，眼睛只管看着自己的脚。我知道，这次吃败仗的还是我。

“你什么毛病也没有。”那位苗条的、穿着白大褂和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的女医生走进诊室来说。“我什么也没检查出来。我已为你安排了一位胃肠病专家来为你诊治，但就我个人看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不过万一需要的话，有个约定总是有益无害的。那些我他看病的人的单子我看早已等了一年那么久了。”她坐在检查台边的一张高脚凳上，将自己的身子转了一圈，又说：“克尔本太太，我刚才已浏览过你的病历，我注意到你丈夫去世后，你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很不好过，你知道，那只是几年前的事。”

“3年前，”我木然地答道，“到12月份就有整整3年了。”

她看着我，友善地说：“你知道吗，你一直生活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压力下，我读过你的病历了，依我看你好像正处在安迪·波尔丘克的谋杀案当中——谋杀案本身就是可怕的，一定揭开了你许多旧伤疤。”

“你正说中了我的心事。”

“我说我们是不可能排除这些因素来为你治病，克尔本太太。你十分清楚，肌体对于来自外部的压力，常常都有一套自己对付的办法。现在，我认为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我给你开些药来帮助你战胜这段痛苦的时期——很短暂的时期。如果事物不出头绪来，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这样行不行呢。你可以和那位胃肠病专家订个约诊时间，他的名字叫菲力普·李博士，他态度有点粗暴，但人还是好的。”

“我认识他哥哥莫特。”

她听我这么说显出很顽皮的样子说：“对，莫特是他们全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位，不过他们兄弟俩都是杰出的人才。”说完，她起身抚平裙子上的皱褶。接着又说：“我一个月后想看看你——哪怕你没病。”

我走进诊室，抓起她为我开的处方和那张上面写有与菲力普·李博士约定的时间的小纸条。这时露丝玛丽·威克特望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什么病也没有，”我说，“所有病根都在我脑子里。”我佯装笑容，但发出来的笑声却是既唐突又不自然的。

露丝跳起来将她的手挽着我的肩部，说：“来，乔，让我们找个地方去好好地吃顿中饭。你可以付账——作为对你吓坏了……”她说着从侧面医生的诊室好好地看了一眼。又说：“作为你的狗屁病把我吓坏了的惩罚。”

中饭时我服了一粒药，回家后一直睡了一下午。那天晚上我去看了彼得的足球赛。回家后，拿着那份未经证实的下议院议员的自传，一同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在我的工作日记中写下了一个“较好”两字，并在其后加上了一连串的问号。我和孩子们共同进了早餐。饭后我遛了遛狗，换上衣服，拿起我为柯雷·伊文森买的那件南瓜色的衣服，便驱车往吾尔夫河而去。车爬上立体交叉道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说：“目前一切还好。”但紧接着我就感到我胸部的肌肉出了毛病。我不能自如地用肺部呼吸，而是大口大口地喘息。我还是忍耐着将车子保持在立交桥上行驶，一直到驶上高速公路为止。我紧握方向盘，把车靠拢路边，停在几乎恰好是我和伊芙六周前停车的地方。汽车的仪表盘上有一个外卖店的纸袋，我把它张开，对准我的口，鼻使劲地吸气。那纸袋散发出一股陈腐的油盐味。过了一会儿，我的呼吸转为正常，我独自在路边坐了好几分钟，便气急败坏地大声说：“你知道我是不会向病魔屈服的。”说完我又挂上了挡，走完了去吾尔夫河的行程。

我在圣徒餐馆歇了歇脚，喝了咖啡。有人告诉我萝利生病在家。看来她也有旦夕之祸福。当她打开她们一家居住的拖车式活动房的门时，的确是满脸病容。但即使不化妆，她也显得很年轻。她请我进了屋，关上了她正在观看的电视肥皂剧，尽量把那间阳光充足的起居室内到处放着的玩具收拾了一下，就瘫倒在长椅上。

柯雷的目光却被从“四季”店买来的色彩鲜艳的袋子吸引住了。他伸伸手来抓我的袋子。

“啊，柯雷，别这样，”萝利用甜美的微弱的乐音说。

“没关系，萝利，这是我为他买来的礼物。”

说着，萝利也像孩子一样，立即从长椅上起身，走到柯雷身边，帮他把袋子打开。

一看见那件南瓜色上衣，她立即动手将它套到孩子小小的T恤衫和牛仔工装裤上。

“啊，柯雷，你这下可成了个小南瓜精灵先生了。”说完她跪坐在地上，严肃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如同她儿子的眼睛那样，睁得圆圆的，充满了好奇感，说：“我怎样谢你才好呢？”

“这只不过是件万圣节的服装，萝莉，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至少可以说是过了买这种衣服的年龄了。我买这件衣服也是出于高兴，柯雷穿上它好看极了。这就足够了。”

“那我得赶紧起来拥抱你才对。”她笑着向我伸开了双臂。但，她看到了什么，蓦地收敛了笑容。我感到胸部收缩，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挤压它似的。萝莉一定已觉察到这一点。她关切地问：“怎么啦，克尔本太太，你病了。你看来病得不轻，你哪里不舒服呀？”

“我什么病也没有。所有毛病都出在我脑子里。昨天我已去看过医生，她说我的病是紧张过度：安迪和梭伦遇害，伊芙——波尔丘克太太——被捕。我想这一切已经够我受的了。”这时我突然感到胸部像是被一把老虎钳钳住了似的，口中涌出唾沫，难受极了。“毛病全在我脑子里。”我木然地重复了这么一句话。

看见我这样，萝莉不禁失声大哭起来。柯雷穿着那件南瓜新衣，原来一直在窗前转悠的，见状立刻跑过来看看他母亲出了什么事。萝莉仍发出阵阵地呜咽，时不时地还用奇怪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自责：“是我伤害了你，都是我的错，”和“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波尔丘克夫人就不会……”

我走到她身边，俯身去拥抱她。这时我胸中的压缩感更强烈，只觉得好像我的心脏快要跳出胸腔似的，出了一身粘粘糊糊的冷汗。

“萝莉，为什么不去为我们弄点茶来呢？”我尖声地说。她起身进了厨房。

我听得见她将水灌满水壶，准备好茶杯，还听见她在抽泣。

我坐在那儿，呼吸急促，我对自己说：“你没有病，毛病只在你的脑子里，在脑子里。”我的双手发抖，但我还是挺住，从我的钱包中取出了药瓶，在萝莉回来之前将一粒淡绿色的药丸放入口中。

药起了作用——或者说至少像是有作用。萝莉在一个上面画有一只大鸟的塑料盘中为柯雷倒了一些果汁，又为我们将茶倒入有蓝绿相间的长条纹的口杯中。我为自己加了三茶匙的糖。我呷了一口茶，口中的金属味没有了，感到自己真正好些。我试图使自己的声音和蔼而坚定。

“现在你说说看所有关于波尔丘克太太的问题怎么会都是你的错呢？”

萝莉用双手捧着口杯，看样子又像是要哭了。这使我记起那次她曾请求我支持她的公公竞选的事。当时，她是这样对我说的：“克尔本太太，我不够聪明，有时要依赖聪明人为我指点迷津。”

这么说，我可算聪明人了。于是我对她说：“萝莉，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从头说起吧，不要流泪。这事太重要了。”

她吸了一大口气，擦干泪水，便从头说来：

“嗯，开头，我想是……”她犹豫一下，又说：“……是梭伦死去的那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当然，这事发生在梭伦去世之前。那人告诉我打电话给波尔丘克太太，要她保证在那天早上7点30分前到梭伦·伊默斯的办公室去。我觉得时间很早，但又觉得事情很重要，所以就给波尔丘克太太打了电话，告诉了她。她问我：‘是不是有关凯里的事？他好吗？’我告诉她完全是两码事，是那人要我这么说的：‘你要完全相信我，伊芙或者是波尔丘’

克太太。’ ”

“你是这么说的吗？伊芙或波尔丘克太太？”

“那人告诉我这么说的，克尔本太太。”她看着我坦然地说。“后来证明，我的电话起了作用。她说她会去，后来就——”说到这儿她的下嘴唇开始颤抖。“——后来到我上班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带上咖啡和松糕给梭伦作为早餐，到祈祷中心去了。只见他惨死在那儿，波尔丘克太太则满身是血，并且……”可能她脑中又回忆起见过的一幕，呼吸急促起来。

我对她说：“放松点，萝莉，吸一口大气，再来一下……现在好些了吧？”她点点头。

这时，我又感到胸中有一把老虎钳再度钳着我，但我还是勉强把话说了出来：“你已经讲了主要部分，现在还有一件别的事，我想了解。”

“什么事？”她已经将自己的呼吸调节好，为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作好了准备。

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问：“萝莉，是谁叫你打电话给伊芙的？是谁让你那天早上把她叫到梭伦的办公室的？”屋子里充满了阳光，但很静，我听得见柯雷·伊文森在厨房里开抽屉的声音和他用童声自言自语。

“萝莉，说呀！”我的声音更有力地催促她。

“说什么？克尔本太太。”

“我要知道，那天早上是谁给你打电话。”

她诡秘地看着我说：“能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吗？”

“我不能答应你这点，萝莉，这你知道。这事是开不得玩笑的。”我正言厉色地说。

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舔了舔嘴唇，终于说了出来：“叫我打电话给伊芙的人是我的婆婆，朱丽·伊文森太太。”说完她将身子往后一靠，期待着我的反应。

我如同遭到了针刺一般。问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朱丽向你作过解释吗？”

“她只是说如果波尔丘克太太那天早晨在梭伦的办公室的话，他会帮助她。”

“我没问，克尔本太太。我没问，因为伊文森太太恫吓我，她从来就不喜欢我，因为马克和我结婚时我已经怀孕。”

当时我一定显得很疑惑不解。

她又悄声解释：“我当时已经有身孕。你知道，自那以来，伊文森太太就以这点来对付我，所以当她要我做这件事时……”她脸上又很阴郁。“她向我保证不会有什么事，说梭伦会帮助波尔丘克太太的。但后来出事了，我想到警察局报案，她又对我大叫大嚷，说我蠢。当然我知道自己不够聪明。她又说，如果此事张扬出去，我的公公伊文森先生就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了。那就是我的错。我婆婆是个臭婆娘，但我公公对我一直很好，我说什么也不能背叛他。我知道不揭发这事是错误的，但我又能做什么呢？现在，我看见你由于过分担忧病成这个样子……我希望告诉你事实真相是对的。”

我感到异常疲倦，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没劲，但我还是站了起来，向她伸开了双臂。她扑到我怀中，把头搁在我的肩上。她的个子和梅卡一样大，抱住她使我心里好受。她的头发散发出苹果味。

“你做得对，萝莉，你没有出卖任何人。出卖别人的是伊文森太太。我

会将此事好好地与克里格谈——我保证。现在去洗洗脸，弄弄小家伙，带他到树林里去散散步吧，这会对你们俩有好处。”

她美丽的脸上流露出感激之情。大概是因为有人已为她除去了思想负担。有人已为她承担这一切。她看起来好多了。

我从戈登·克里森道驶向伊文森家。往城里去的路上，我的胸部肌肉疼痛，心脏在肋间怦怦地跳动，但我没有病。医生早已告诉过我了，毛病都出在我的脑中。我使劲敲前门，叫道：“朱丽，快来！到这儿来，来看看这个局面如何收拾！”

她穿着一套丝质有花的女装，是暗红色的。她的淡金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的，呈一个漂亮的发冠。

“我正要外出，”她说，接着倒是出自内心地脱口叫了出来：“乔妮，你看来像……”

“我知道，我看来不像人，让我进屋再说，朱丽，你哪儿也别去了。”

只见餐厅的桌面上有许多联在一起的摄影底片，我信手拿起一联，有些是克里格的相底，有些是他和朱丽的合影。

“照好正面像准备当新领袖吗？”我问。“你对司法部的看法怎样，朱丽？是赞成还是反对？你家里人的立场呢？你对那些态度尚不明朗的人和信得过的人怎样看？为拉到选票做肮脏交易，你赞成为他们全部提供就业机会吗？”

“你最好快点走，乔妮，你神经质了。”

“不，朱丽，我没有神经质。我只是为有的人被害死，有的人受伤害而感到恶心。”一阵恶心向我袭来，口中有一种金属味，接着只觉得唾沫涌向口中。我不顾这些，又问：“你要的什么鬼把戏，朱丽？你为什么要把伊芙牵连进去？为什么你让你那位虽说愚笨些但却很幼稚的媳妇打电话给伊芙，要伊芙在梭伦被害的那天早上到他的办公室去？”

听我这一说，朱丽化了妆的脸也变得煞白了。她的手握成了两个拳头。

“这是我的家事，乔妮。”

“这是你的错误所在。这应当是警方的事，我马上要驾车到那儿去，告诉他们开一辆警车来，鸣着警笛，到这儿来将你带走，朱丽。他们会很感兴趣的。警察最喜欢这样。他们等呀、等呀，最终他们要看所有的证据——”我拿起一联底片在她面前晃了几下——“他们会推测出这一切，那么你究竟与案件有什么牵连呢？你这位想当省长的的人的妻子有什么嫌疑？究竟出了什么事？这些是警方要做的事，朱丽，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吧。”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脸凑近我的脸。我可以闻到一股咖啡味。

“去叫警察来好了，”她说，“我要告诉他们，你尊敬的安迪·波尔丘克是个同性恋者。”

有好一会儿我的双眼看不清东西，连朱丽的面庞也变得模糊了，我眨了眨眼，才又看清了她。

“你说什么？”我用细而吓坏了的声音问。

她更为得意地说：“你该听到我的话，我说安迪是个男性同性恋者。你知道，乔妮——”她把脸凑得很近，我和她的鼻子差点儿碰着了。——“我是说他是个人妖，是个同性恋者。”她故意一个个音节地将“同性恋”这个词宣布出来。

“我自己会告诉他们这些，”我一边说一边将手从她手中挣脱出来，朝

门走去。“但我要先告诉他们你是怎样将伊芙引入圈套的。”我补充说。

我后面这句话可是正中要害，我要刹刹她的威风，她屈服了。

“乔，等等再走。听听我的解释吧。”

我走到门边，转动了门把手。

“我要你听听我的话，倒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克里格。我知道，你现在仍然喜欢他。”

我重又走回起居室，瘫倒在靠窗的一张旧椅子上。马路对面小溪岸边的树木在10月的阳光照耀下成了青铜色和金色。外边远处的良辰美景似乎不可能存在，因为这儿……

“那好吧，朱丽，让我来听听你的解释吧。”

朱丽的叙述令人不可思议，但足以叫人深信不疑。在发现梭伦·伊默斯被害的那天一大早，电话铃响了。她接了电话。“就在这房间里，”她说，用手指了指起居室。从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是一位男人的声音。他声称是克里格·伊文森的支持者，还说他掌握的情况能有助于克里格的提名。朱丽告诉我那人对他们的竞选运动了若指掌。他估计支持克里格的代表人数居然会与朱丽的估计不谋而合。朱丽知道，那人也知道，第一轮选举中克里格没有获得足够的选票从而未赢得大选，而且，看来克里格在下一轮选举中不可能获得更多选票。“你和我都知道，”那人说，“除非你能从波尔丘克的忠实支持者中拉一些选票过来，否则，克里格当选没门。”朱丽看着我说：“他还提到你乔妮、德夫·迈克里约翰的名字，并且对我说，‘你知道其他人是谁，’当然，我知道。他还说，唯一动摇你们的人的办法，就是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来劝说他们支持克里格。他说这个人就是伊芙。他说要是我能马上把伊芙1小时内请到梭伦·伊默斯的办公室，伊默斯会对伊芙交待一些情况，那将使她保证在大选中照伊默斯的旨意办。”

“你是如何回答的？”我问。

“我感到这事很是蹊跷，一大早，还不到7点钟，打来这样的电话。我记得我是这样问他的：‘什么情况？’他好久没做声。后来，他带笑地说：‘不过，没有什么情况不该让你知道的。梭伦·伊默斯有消息会证明安迪·波尔丘克曾经在他去世时与一桩卑鄙的同性恋有牵连。如果伊芙能叫她周围的人支持克里格·伊文森的话，伊默斯已经同意对安迪同性恋一事保持沉默。’”

“你觉得那人的说法对你有用吗？”

“我刚才对你说了，接电话时是大清早，乔，说实话，他说的也正好是我想听的事。我给萝利打了电话后，曾考虑过此事。的确对我们是有益的。出于马克和萝利的忠诚，伊默斯本来就会帮助克里格。况且，你也知道，教会的基本教义对同性恋也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梭伦知道这类情况，他可能也会利用它。”

“反正我给萝利打过电话，乔妮，你得相信我，我本来并不想伤害伊芙。不过……”说到这儿她又恢复了常态，尖叫道：“那不是我的错，是伊芙自己丧失了理智，把他给杀了。”说完，她又看看我，问：“你要上警察局吗？”

“我现在不去，不过我建议你去。”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朱丽，对给你打电话的人，你一点也不记得是谁了吗？连一般的印象也没有了吗？”我问。

她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显得有点激动，当然，那种卑鄙的同性恋关系的确也太过分了。”

“对，”我附和说，“我也是这么看的。”我重又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对她说：“好啦，朱丽，我会来看你的。”

“乔妮，你要走了？”她的声音小而急切。

我无力地转过身去朝着她，等待着她使出最后一招，不让我到警察那儿去告发她。

“朱丽，还有什么事？”

她朝四周看了看，压低了嗓门，说：“那人我们认识的，乔妮。”

“是谁？”

“打电话那个男人。他试图改变他的声音，但我还是知道他是谁。他知道很多关于我们的竞选活动和我们大家——安迪的一伙人的事。那是一位和我们很接近的人，乔。一定是我们认识的人。”

从哪儿着手？我坐在奶奶公寓内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想起了朱丽说的那个压低了嗓门给她打电话的人；想起了豪沃德·道汉尤克声嘶力竭、难堪地对我说过：“看在基督份上，乔，那是快20年前的事了。安迪说过那是他唯一的一个同性恋者。”我凝视着按年代分类的竖式档案，最后选出了四份放到我书桌上。我选出的是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的——那是安迪读高中的年代，也是他性意识的朦胧时期，看来从这儿着手是再好不过了。

档案中的记录不多。有些照片是他《论贞洁和顺从》的论文获得哥伦比亚骑士奖的，罗马早已给过我了。我翻阅了萨斯克顿E·T·罗塞尔高中四年的年鉴，去寻找蛛丝马迹。其中有他4年里与他所在的班的合影；也有他与田径队、辩论队的合影；还有每学年末那些署名巴巴拉·安·格罗莉亚和雪伦的女孩为安迪的题词：“我永远忘不了你”，“致一个了不起的男孩子”等；还有一些开玩笑的、骂人的话，署名则是：“戏言耳，你最要好的朋友!!!”我忆起了我自己学校的年鉴，摇摇头，笑着把这本年鉴关上了。桌子角还有一些小本的、摸起绒毛了的、我却尚未翻阅过的记载。我俯身去仔细阅读，上面写着“永远，E”，封面上还有“1964，十二年级”，这是毕业那年。我又翻看了年鉴中其他年份的签名，什么新东西也没有。我又翻回1964年的年鉴，发现毕业班里有四十五位同学。其中名或姓以字母E开头的仅有二十三人。叫伊丽莎白的和爱德华的居多。

还有一组全班同学的照片。安迪的老师打扮得别出心裁——蓬松的头发披下齐肩，戴着大圈耳环，围着吉卜赛人的长围巾，穿着紧身连衣裙——尽管是老式的学校照片，她具有了一种了不起的活力。我又查看了这一页的下端，当然，写明女教师是海达·麦考特。就是那位有着令人目眩的红头发，嘴巴很厉害的老教师。安迪遇害那天她曾上台发言，葬礼后吃中餐时我曾低估了她的记忆力，为此，她曾对我大动肝火。

我知道，她住在萨斯克顿，安迪去那儿时常带她去吃饭。我想到了萨斯克顿，记起那天早上我拥抱了萝利及她头发发出的苹果味。接着，我又想能拥抱我自己的女儿该多好啊，我马上拿起话筒，给询问台打了电话。5分钟后，我又安排了第二天中午前与海达·麦考特会面。

那天晚上，瑞克给我打电话时，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像我一样，他也觉察出一些事情的片断，愿只愿我们能找出脉络来。我对他只字不提我生病的事。没什么意思，因为真正的病不在我身体内，而在我脑中。

第二天早晨，我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先穿上的两条裙子居然松得掉下来。第三条裙子穿上后腰间还有一个大空子。我只得走进梅卡的房间，找出一条宽腰带，将裙子束紧。有点像苏格兰人在裙子旁束一条垂下来的折边那样。不过我毕竟开始减肥了。

那天天气温和，不过我却全身发冷。我已穿了一件厚毛衣，但还觉得不够，于是就到地下室去将冬天的外套找了出来。我正欲走出房门，电话铃响了。是菲力普·李博士办公室打来的，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取消了一次预约，问我有兴趣去看病。如果我中饭后离开萨斯克顿，很容易安排。我一放下听筒，腹部阵阵地痉挛，我的身体告诉我，刚才我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等到痉挛停止，我就为两个男孩作了几项安排，拿起我的汽车钥匙，

将钱包挂在肩上，就出了门。还不到早上 8 点 30 分呢。真幸运，我与海达·麦考特谈完话，中午时分就到了梅卡处。

出城约 1 小时，腹部又开始痉挛，还伴有腹泻。总算幸运，碰上一个有修车场的加油站。那是一个真正的修车场，一些穿着连衣裤工作服的人正在观看另一些同样装扮的人检修汽车零件。可以闻到汽油和别的什么气味——一种人造松木的气味——我想一定是来自收款登记处的松树板的除臭剂。

我从洗手间出来时，加油站的一位男子好奇地打量着我。并问：

“你好了吗，夫人？”

“好了，谢谢你……只不过是流感尚未痊愈。”

“现在流感正流行呢，”他附和说。接着，令我意想不到的，他还说：“有咖啡，不过还是让我为你弄点茶来吧。我也患过流感，很讨厌的。喝了茶会对你好些，你就能到……我猜你是上萨斯克顿去的吧。”

我点点头。

“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如果你也同我那次患流感一样疲倦的话，你得吃点东西，在茶里多加一些糖会给你增加些能量。”

喝了茶，使我坚持驶往大卫逊，离萨斯克顿已不到一半路程了。后来我又出现下腹部痉挛，如同有一只拳头在拧紧下腹似的，全身冒出一阵冷汗。我将车子停在一家宾馆后面的停车场中，全身颤栗起来。我挣扎着走进了宾馆的咖啡厅。在早上的那个时候，厅里几乎没人，只闻到一股从酒吧传来的隔夜啤酒味。

柜台后面的镜子上还悬挂着硬纸板剪的南瓜和人体骨架。一个变种的白人女孩正背对着我，将橘黄色和黑色的皱纹纸用胶带粘在镜框周围。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自称是个女巫，在接人们打给她的电话。那女孩一言不发。她的眼睛在白色的睫毛后对我漫不经心地眨了几下。我把我要的东西告诉了她。她小心翼翼地将汤在我面前摆好，再拿来了一杯水和一包用玻璃纸包的脆饼干，然后又回去粘她的皱纹纸去了。收音机里女巫正在解释巫婆的字母。

汤和新鲜空气似乎显了神威。我到达海达·麦考特那间坐落在 B 林阴大道上的整洁的小屋时，感到好些了。我按了门铃，海达从后院走到了屋前。在 10 月的阳光中，她显得精神抖擞。她看上去与她的实际年龄差不多——八十岁上下——但身子还很硬朗，穿着浅绿色的连衣裤工作服和樱桃红棉衬衫，上面都有设计者的品牌，这些品牌都是近几年来在年轻人服装市场上极为流行的。她的头发染成了红色，用一块围巾包裹着。嘴唇抹过一道樱桃红的唇膏——正好与她穿的短上衣颜色相匹配。她与我打招呼时笑得很开心，正如我见过的 1964 年她与 E·T 罗塞尔高中十二年级 A 班合影时的笑容一样。

“请跟我到后院来，我快完成我的花园的冬翻了。我得抓住时机，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了。下周我要出国去度几天假，我想在走之前把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她说。

“我看一切都已经井然有序了。”我随她到后院时说。只见靠车库整齐地放了一行装满落叶的橘黄色塑料垃圾袋；花园中的矮树丛已用麻袋裹住下部；玫瑰花丛已覆盖了土；花圃中的土地也都翻好了。

“还有点蔬菜地未翻，”她说，“等翻完了我们就进屋去喝一杯雪利酒。”说着便拿起了铁锹。接着她又说：“你为什么不在草坪上的椅子上坐下来晒晒太阳呢？你脸色苍白，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可恨的流感仍在流行？”

“像是这么回事。”

海达·麦考特并不是那种想取悦于客人的人。她看我一坐下，便又转回去干她的活儿。她干劲大效率高。我在一旁观察，我想起如果我也能这么干，我的身体会多好啊！我一定会感到身子强健有力又听使唤。我怀疑自己还能否像她这么干，因为即使是坐在暖和的阳光下，我仍发抖呢。

“就这样，”她最后说，“我把这部分留给魔鬼，”她指着菜园角落一块大约3英尺见方的未翻的地说。“你听说过魔鬼的半英亩地吗？在民谣中它有上百个名字——全部取得很妙，当然，也全是胡说，但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这是对黑暗势力的一点妥协。我播种时往往也自我安慰说：‘这些是为我播下的，这些是为我邻居播下的，这些是为魔鬼播下的。’这是美国人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在从英国白金汉郡传来以前——谁知道源于何处？或许我们的祖先在纹身时代就这么说了。反正有来历的说法总是可取的。”说完她脱下工作手套和围巾，摇摇头。她的头发蓬松，散开来，像是本身就具有一种生长力。她伸出一只手来拉我，说：“来，看样子你需要喝一杯。我这儿还有一瓶感恩节对从前的学生买来的哥林尼福酒。已经是日高三竿了。”

她将我安顿在一个俯瞰着她的花园的玻璃门廊内，说：“为什么你不在长椅上躺一下呢——我去拿酒来。”

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门廊。沿墙的一边有一张搁板桌，上面摆满了各种盛开的花儿：绣球花、杜鹃花，还有芙蓉花。门廊的另一端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四轮长椅，上面覆盖着阿富汗针织毛巾。门廊的尽头有一台电视机，对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盏台灯和一堆畅销书。周围墙上贴满了飞行员和领航员的照片，还有穿着飞行夹克和加拿大皇家空军制服的年轻人的照片——都是近年来摄下的——都穿着红色连衣裤工作服，围着白色丝围巾，属于“雪鸮”飞行队的装束。

“这些都是英雄，”海达·麦考特进屋时说。她拿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瓶哥林尼福酒、一小桶冰、玻璃杯和一块圆形的哥达奶酪。她用一只手从墙角拉过来一张小折叠桌，将托盘放到上面。

“瞧，我们的中饭来了。我不喜欢像乡下人那样光喝威士忌酒，但也没必要用水来冲淡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于是她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加冰的纯酒，随后她伸手到她的罩衣的后面衣袋中，取出一把瑞士军用小刀，为我们每人切下了一块楔形哥达奶酪。我们举起了酒杯。

“为英雄们干杯，”她说。

“为英雄们干杯，”我附和说。苏格兰威士忌酒又纯又温和。我感到原来紧钳住我胸部的力松开了一点。

海达俯身过桌子对面打量着我。她说：“你好些了。现在说说看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为安迪·波尔丘克而来。”我说。

“安迪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她扼要地说。

“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说，竟意外地感到我说出这话时居然会热泪盈眶。我又呷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又说：“麦考特小姐，安迪遇害使我们俩都不安，但我不得不向你提几个问题。我想我现在提出来也许最好。”

“发起进攻总是最好的办法。”她说完切下一薄片哥达奶酪，将它外面

的一层红色蜡膜去掉。她的那把军用小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锋利异常。

“安迪读高中时是否有过过失？”我抓紧了机会。

她抬起头，用那双苍老而充满智慧的眼睛看着我，对我问及她的英雄警觉起来。

我又问：“他有没有过与别的男孩子有瓜葛？我的意思不是指他威胁别人。”

“你当然是指性关系，”她说完怀着敌意地看着我，并为她的英雄辩解：“你说什么？是不是某家小报得到了什么传闻轶事？”

“事情比传闻严重得多。”

她靠回椅子中，将小刀重又插入那片楔形的哥达奶酪，切下一片。说：“我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严重的事情你才上这儿来的。”她喝完一杯酒又斟上了一杯。说：“要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克尔本太太，应该说安迪是有过过失的，但那只不过是孤立的事件。多年来我已经不去计较它了。老师们对学生往往知道得很多，但这类事却是暗中发生的，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

“一般说来，在他那个年龄这类事不会很多。你知道，那时候开始分泌性激素，它会使青春意识萌动。我从来未为安迪担心，因为他发育正常，具有男子气概。”说到这儿她将脸转过去看着窗外，我知道她还有更多的话要说。

“可是你的确为另一个男孩子担忧，”我说，“即安迪的伙伴。”

“对，我的确曾为那另一个男孩子担忧过，他是……”说到这儿她将手心转而朝上，又说：“他可不一样，他长得高瘦，文雅而有诗人风度。他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这个名字会毁了这个男孩子，这太不幸了。我是不是一定要回忆起这个名字呢？这事重要吗？”

“我想这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我说，“那男孩子的名字在学校的年鉴里总会找到。”

“我认为不是这样。他是那年未转学来的。”说完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实在记不起那男孩子的名字了，但我一闭上眼睛就记起班级会议室中那张书桌——就在我跟前，几乎全年空着，当然，直到那个可怜的、郁郁寡欢的男孩子转学到罗塞尔高中为止。我当时很气愤，有关同性恋的流言蜚语就在临近高中毕业时与安迪有瓜葛。这完全是一种不该有的操行过失——绝对不该有的过失。”

她看看我的酒杯，说：“见鬼，你早喝了个杯底朝天，瞧我这个女主人太不尽职了吧，对不对？但我会为你尽这个职责的。”她说完为我斟上一杯哥林尼福酒。又说：“不过，有件事我是可以为你做的：我可以到校董事会办公室去，他们保存着每年学生的档案。我曾为学生们重新团聚，有时也仅仅是出于好奇，查找过学生的档案。这事再简单不过了。你打算今天就驾车回利宅那去吗？”

“不，我今晚将在我女儿那儿过夜，她要在这儿上大学。”这时我又感到腹部痉挛，口中有一股金属味。

“我想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克尔本太太。看起来你很疲倦。你女儿住地离这儿远吗？看来你身体不舒服。”

“不远，”我起身说，“我能用一下你的洗手间吗？”我从洗手间出来，海达·麦考特正站在前门穿夹克衫。

她手里拿着我的外衣，说：“我开车送你。”

“我自己能开，”我说着伸手去穿外衣，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多远的。”

“那就好了，”她说，“你女儿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去校董事办公室查阅档案后再给你打电话。一路当心呀，克尔本太太。”

我把车子停在第九大街梅卡屋前，感到四肢沉重无力，说不出的难受。我伸手进钱包取出我的化妆袋，在双颊抹上胭脂，双唇涂上口红。正如一些老太太说的“扮个鬼脸”。我连镜子也不敢照——本身感觉已经够糟糕的了。

我原想让我的到来叫他们大吃一惊，的确是这样。从梅卡和格里格的神态和好久才开门，我揣测出他们正在做爱。

梅卡开了门，在阳光下眨巴着眼睛，她脸色绯红，显得快活而迷惑。格里格跟在她身后，用双臂搂着她。梅卡脸上绽开了笑容。

“啊，妈妈，你该事先打个电话来。”她说。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进入大厅，感到全身哆嗦起来，这是新的征兆。“我以为你们在烤面包或别的什么东西，”我说着径自步入厨房，那里会有一张椅子。

梅卡跟在我身后进来，她说：“我今早上烤了面包。”难怪她还有六条皮已硬黑的面包留在烤炉条上。

“啊，梅卡，”我说着便瘫倒在厨房的椅子上。阵阵的恶心和抽搐难以抑制，我如同动物般蜷缩在椅子中。我口中出现了铁钉味，唾沫涌了上来。末了，在那个暖和的有酵母和新鲜面包味的厨房中，我抑制不住，大吐特吐起来。

两位年轻人立刻到我身边，随着腹部阵阵痉挛，我吐呀，呕呀，没个完。梅卡用双手搂住我，格里格又用双手从身后搂住她，三个人抱做一团。

“我没事了，梅卡，”最后我坐起来说。

“我知道，妈，我知道。”我女儿用微弱的、无可奈何的、但坚定的声音说。这声音自她父亲去世以来我就记忆犹新。随后我感到全身像散了架似的。

“讨厌，梅卡，放开我。”我试图从她的手臂中挣脱出来。从水槽上方的镜子中，我看到了一幅动人的画面。叫它“失乐园”或是“妈妈来访”均可。镜中有一位黑发的青年男子，脸被夏日的太阳晒得黝黑；还有位金发女郎，穿着过大的大学生穿的衬衫，他们体态健美，但面部表情却是那么怪诞吓人：他们手臂中抱着一位金发已转黑灰色的老妇人，睁着一双吓人的眼睛，脸上虽经化妆，在她苍白的双颊周围却只有一圈圈病态的潮红，还有一道口红抹过她的双唇，显得又老又滑稽——那不是别人，就是我。这时，病魔在我的胸部周围作祟，渐渐地、渐渐地，病情有所缓和，随即我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醒来，我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内，躺在一张铺着软软的法兰绒床单的陌生的床上。那床上散发出陌生的人体味。显然，他们还来不及换床单呢。室外，我听见他们用年轻的、厚重的、急切的声音在交谈。

“梅卡，我知道你很爱她，我也会爱她，但你在—英里以外就能闻到她身上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味。宝贝，如果问题出在这里，我们得帮助她。我不是说我们袖手旁观，我是说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接着我听见我女儿用强有力的声音为我辩解：“她并不酗酒，格里格。即使是在情绪最坏的时候，她也不会那样。她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始终未能

从爹爹惨死的恐怖中解脱出来。谁也不能毫无反应地从所发生的意外中解脱出来，但她绝对不是一个酒鬼。这次喝醉了一定另有原因。”

我那已长大成人的好闺女梅卡，已成了难堪的妈妈的辩护人。我蜷曲着身子又昏昏入睡。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瑞克·什班什在梅卡的厨房中做面包，从一长条生面团上撕下一点薄薄的生面来。梭伦·伊默斯和安迪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笑着对瑞克说：“别忘了为我留一粒种子，为你留一粒种子，再为主人留一粒种子。”随后烤炉上的铃响了，响呀响，这响声从我的意识中飘过，使我意识到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话筒，说：

“我是乔妮，克尔本。”

电话另一端传来了海达·麦考特粗哑的激动的声音。“喂，克尔本太太，我可以叫你乔妮吗？我觉得我们是在共同探险，所以能让我直接叫你的名字吗？”

“好呀！海达，你有什么新发现？”我听得出我的声音如同一百岁那么苍老。

“一无所获，绝对一无所获。有人已将微缩胶卷撕掉了一部分。”

我感到被刺了一下似的，马上问：“有人怎么啦？”

“将微缩胶卷撕去了一部分。几年前校董事会将他们所有的学生档案全部摄成了微缩胶卷。乔妮，你知道什么是微缩胶卷吗？”

“就是那些通过放映机放大，在屏幕上能看到的文件胶片，对吗？”

她听后笑了：“你知道就好。显然有人用小刀已将E·T·罗塞尔高中十二年级的档案记录胶卷裁去了。”

“什么时候干的？”

“校董事会的人也不知道。雇员们整天出出进进，本来出进董事会办公室均要求签名的，但他们并未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因为这些并非珍贵文件，甚至可以说没什么特别机密可言。学校25年来学生的档案记录全在那儿，好端端的，谁会去担忧有什么损坏呢？”

“我想你说得对。”我说。我猜想我说话时的声音一定是有气无力的，因为我感到很泄气。

“你好了吗？”她用出奇的年轻的声音关切地问。

“嗯，要是还有人问我身体好了没有我准会杀了他。不过，我想我没事了，只是感到很失望，那男孩子的名字对我们太有用了。”

我说的“我们”本意是瑞克·什班什和我，不想海达·麦考特却乐呵呵地误以为是指她和我了。她自愿为我分担忧患，真太好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乔妮，我相信找出那男孩子的名字对我们有帮助。你可别泄气，我有惊人的记忆力，我想那个名字终究会在我脑海里冒出来的。现在请把你在利宅那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以便我一想起那个名字，就给你打电话。”

我给了她我的电话号码。

“我们一定得弄个水落石出，”她说，“永远不要退却，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了的话，我这儿还有差不多半瓶哥林尼福酒，足够我们庆祝一番。”

我的身子哆嗦了一下，“只剩不到半瓶了！”我谢过她，重又躺下，迷迷糊糊地重又进入了梦乡。

我醒来天已黑。我看看表：5点整。我侧耳倾听，街上几乎没有什么声响，我推测一定是早上5点钟。我感到虚弱无力，不过神智倒也清醒，明显

地好些了。我把过夜用的睡袋放在床头，拿出干净衣服来，踮起脚尖走下大厅，淋浴后换上了干净衣服。我写了张字条给梅卡和格里格，谢谢他们，告诉他们我好多了，没能当面告别很抱歉。我走下楼来，只见他们俩勾肩搭臂地蜷缩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正如我读过的一本小说的标题那样：《躺在爱人肘弯中的年轻人》。

要是我能记起一本加拿大小说的名字，我身体就一定好了。我朝起居室再看了一眼，只见我女儿的金发散开在一位熟睡的男子肘弯处。我为他们祈祷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走出了家门。

除了中途停车喝咖啡和吃了一包锡箔包的饼干外，我驾车径直回家。到家后正赶得上为男孩子们做中饭和接梅卡焦急的电话。对，我好些了。对，我下午与医生还有个约会。那是位备受推崇的专家，莫特·李的弟弟。对，我一旦有什么新消息，还得给那些关心我的人打电话呢。我能记起这些事。我好多了。

我把电话挂断，甚至懒得上楼去取一张毯子下来，抓起我的大衣盖在身上，如同车站的过客那样，就地躺下，睡着了。

那位胃肠病专家的办公室是在一幢医院大楼的顶楼，那栋楼房已年代久远，专门有一个人在开电梯。候诊室特别舒适，过了好一会我才明白其中的缘由。那儿有通常办公室内有的大叠大叠的杂志，杂志的封面多刊载有故事和看来曾经是重要的事件。里面的书页由于经多人翻阅已经磨损。此外，室内还陈设着办公室内必有的诺格登出品的家具，室内还有钢管道，但却没有那种令人窒息的药味。接待员是一位具有40年代电影中异国情调角色的年轻中国妇女。她将她那指甲修剪得很好的手一抬，把一个打火机扔到了火中。我立刻明白了这房间舒适的原因。整个房间弥漫着香烟味。没有癌症协会的禁烟广告，没有硬纸板剪的动画宣传品，唯有许多烟灰缸，供人们使用。我闭上双眼，那股我熟悉的辛辣味混合着别的东西陌生的味儿，来自消毒盆中的消毒物和消毒包中；使我回忆起我年轻时在医生的候诊室内，医生们为我量身高、磅体重，与我谈及学校生活，未来和孩子、丈夫，真是谈笑风生。

当我起身跟随接待员步入诊室时，我感到腹部痉挛，但在烟味弥漫的室内，倒也不觉得难受。于是，我对自己说：“在这儿出不了大事。”

那位动人的中国妇女扬起她那用蜡修过的眉毛，用小镇萨克其万平缓的词调对我说：“那我就不远送了。”说完她穿着细高跟鞋“咯咯咯”地溜烟走出了诊室。

诊室可以鸟瞰市容，我站在窗前观赏着街上的车水马龙，时间已是近黄昏了。这时我听见隔壁房里一个男人在打电话，谈论购置房产的事。我听到他提及“小熊湖”的地名，不一会又听他说到“发展商”一词。电话上他们谈得很热烈。说到有些事未经核查，现在大楼不能动工，“可能要推迟至明年春天，”我听见电话另一端的人说。随后，声音变得模糊不清，末了，我听见有人用又清晰又高的声音说：“你可以告诉那些土包子，我为这事会给他们点颜色看。”听见电话砰的一声放下，这时通往诊室的门开了，菲力普·李博士走了进来。

从外表上看，他长得完全不像他的哥哥莫特。莫特长得像个玩具熊——“一只熊猫”。阿丽曾这样叫他。“毕竟菲力普是出生在香港，全家人现在还有一半仍在香港。”阿丽这样说。所以他长得一点也不可爱。他高而秃头，一副学者派头，见了我他微微地欠了欠身子。

“我很抱歉，克尔本太太，让你久等了——耽搁了你治病的时间。”

“没关系。”我说着便在诊疗室的桌子边坐了下来。“如果发展商垮了台的话，你随时可以为自己盖一幢别墅。小熊湖可是个美丽如画的地方，春天尤其如此。”接着我对他说。他看着我，目光犀利，点点头，说：“克尔本太太，依你看毛病出在哪儿呀？”

我把病史一五一十地向他道来，从孩子们和我从餐馆买回比萨饼吃后，那天夜里出现腹痛说起，一直讲到后来我前天在梅卡家翻肠倒胃为止。最后我说：“我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反正我是个病人。别的医生认为我的病是过度紧张造成的。病根子在脑子中。”

菲力普·李博士朝我冷笑，他说：“当然，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不过还是让我们先来排除身体的更多有趣的可能性。”

他为我做的体检是那么的仔细，弄得我精疲力竭。一开始他就严肃地对我说要“从口腔检查至肛门”。检查完毕，我穿好衣服，接待员领我走进了

医生办公室。

“我什么病也没看出来，”他说完点着了一支万宝路香烟，使劲地吸了一口，又说：“当然，我们还得等检查结果出来，不过一切看来完全正常。”

“那么你也同意我什么病也没有了？”

“在这点上，我得同意我的同行的诊断：你出现的症状看来不是身体的问题。”

“那么全是我脑子的问题啰。”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审慎地说。“我给你开张处方，那是我自己的一个秘方。你处于极度的神经紧张状态之中，饮食紊乱。”

“你这个秘方是专治什么的呢？”

“是一些为你消除神经紧张的维生素，因为你不是医务人员，药名对你无关紧要。”

我把菲力普·李博士开的处方扔进了医院大楼大厅中旧青铜烟灰缸中。回家途中，我在那条狭长的林荫路停车，买了一夸脱牛奶，一些黑朗姆酒和一打鸡蛋。我在自家厨房中举起装满了美味的朗姆酒和蛋酒的玻璃杯，对自己说：“这才是遵医嘱呢，这才是能消除神经紧张的良药呢。”

4天后医生打电话来回访，我那时正在奶奶公寓中整理有关安迪早期生涯的剪报。他说话时态度温和多了，我很怀疑菲力普·李博士已与他在温尼皮格的哥哥通过电话。他在提到他哥哥时称他为“有魅力的家伙”。对我的病他可算是很认真的了。

检查的结果都呈阴性。

“好呀，”我听后说，“这才是好消息呢。”

他问我处方有效吗？

“绝对有效。”我说。

他说：“那你好些了吗？”

“你的处方可真是及时雨呀！”我说。不过就在这时，我不得不挂断电话，因为这时我腹部痉挛，得用双倍的劲来忍受疼痛。

痛苦已成了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另一个就是恐惧。日复一日，我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写下一个“病”字，还记录下症状：“抽搐、腹泻，口中有金属味，时时都感到作呕。”最后一项症状即恶心在加剧，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无法归类的症状，如：出现呼吸困难的频率加快；有一种像钳子钳紧胸部的感觉；心率变幻吓人，就连我闲坐在奶奶公寓中和在房中踱步时心跳都无规律。

一位年轻的、漂亮的、有着鬈发的女医生为我联系到一位心脏病专家那儿去就诊。她曾在阿丽·苏德兰的私人诊所中工作。那位心脏病专家为我做了心电图。

“好消息，”她笑着说，“什么问题也没有。也许短时间服用镇静剂会好。”

一天早上克里格·伊文森打电话来请我去感化中心看望伊芙，我答应马上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案子中，那种工作狂热令我吃惊。往常的“窝囊废”居然被紧张的工作变得判若两人。他说：“在狱中感化中心出出进进的精神病科医生很为她担心，乔。他说伊芙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向我解释说，伊芙就像一座房子中封闭的房间那样，先是关闭了公用的房间，会客室等，直到将自己密封在一个小房间里。伊芙的问题在于她从许多房间里面跑了出来，

但最终还是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外界交往。”

我深知伊芙的处境。我自己也是从许多房间里跑了出来，但还是将自己封闭起来。除了我的两个儿子，我不会见任何人。凄楚的灰蒙蒙的 11 月到来了。那快活的，你可以站在屋前的草坪上与骑着自行车或推着童车从你门前经过的人们搭讪，和到邻居家中串门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唯有来年春天才会再有这种时光了。天冷了，生活的轴心已转到了室内，而室内是很容易拒绝别人进入的。人人都理解这一点。我们党内领导层的会议定在 12 月 5 日召开，所以不断有电话来恳请我给予支持，请我为法规委员会撰写法规，或是主持投票委员会，甚至还有人请我代购出席领导层舞会的票。我对每位来电话的人都告之以同一个理由：我病了，现在正遵医嘱在家休养，争取康复与恢复体力。我往往还会咬紧牙关补充一句：“我正在撰写安迪传记。”

一连几周来梅卡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自从我将菲力普·李博士和心脏病专家对我的诊断结果转告她以后，她才放心了。她遵照我的旨意，把我那天在她厨房中呕吐一事抛到九霄云外，只当是一时压力的不良反应而已。

我尽了最大力来照顾两个男孩。早上我坐下与他们共进早餐，中午为他们做好饭，晚饭时与他们一道度过约莫一小时，每个星期六早上还带他们去湖畔俱乐部。孩子们对大多数的事情都习以为常，就连我生病他们也习惯了。他们对我总是那么体贴关心。当然，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内容：去上学，找朋友玩，打足球、曲棍球等。

不过，我得承认，我是一反常态。他们是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以后才按这个模式生活的。我的脾气变得很坏，又喜欢独处。如今，奶奶公寓已经成了我的避难所。

一个刮风的天，我驾车去看望伊芙。我和她在狱中医院一侧的探视区内，坐在微弱的阳光下，无精打采地玩一种双人牌游戏，其实我们俩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回家的路上，我为我们选择了这种牌戏所具有的讽刺意味而激动不已，以至于不得不把车子停在路边，因为我大笑时胸部又会出现老虎钳钳紧似的感受。

是的，如今我已经明白了与世隔绝的滋味了。到 11 月的第二周，我谢绝了一切社交，把自己关在车库上方那个大房间里，那儿清静，光线充足，与世隔绝。只是要保持那个大房间的清洁却是我的体力所不及的。时不时地那些暖气管道就会使劲喷出一些夏天积留在那儿的粉尘下来，我又不得不去拎一桶热肥皂水来将所有脏东西擦干净。

一天，我正拎着一桶水，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抽搐起来，正像眼睑有时无缘无故收缩那样，我只好将水桶放下，坐等痉挛停止。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双腿又开始抽搐。第二天一早，我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加上了双腿抽搐这一症状。

双腿抽搐和视物有重影使我阅读产生了困难。重影现象最初是我一直在阅读一些旧报纸的影印件时出现的。那上面的字迹又小又不够清楚，所以我出现视力模糊时，我做了眼疲劳的病情记录。我一直为自己的病情找出合情合理的符合逻辑的解释，认为自己根本没病。然而，我在工作日记中列出的自己的症状，却不容忽视，明明是患有某种病，要么是身体有毛病，要么是脑子有毛病。我心中有数，被吓坏了。

我已经说过，疾病和恐惧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部分，还有第三部分就是——瑞克·什班什。无论他在哪儿，每晚必给我打电话，与我长谈。

我们谈的内容已超出了我要写的安迪一书，也超出了他本身和我。事实上，他给我打电话已不再提及那本书了。使他更感兴趣的是我和我每天过得如何。我在干什么？我会见了哪些人？我身体怎么样了？我是明白人，随着他日复一日地给我打电话，我看得出来我们互相倾慕，谁也离不了谁。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见屏幕上的他那张圆圆的睿智的面孔，我的心就会怦怦地跳个不停，我会感到自己像个傻瓜。一个四十六岁的家庭主妇，穿着旧的慢跑时穿的短裤和汗衫，坐在电视前观看她的意中人——一个演播室中的电视记者。10分钟后电话铃一响，准会是他。他又会问我身体怎么样、我在干什么、我和什么人谈过话。而且，毫无例外地问我新闻节目中看见他没有、他制作的节目怎么样、他是否干脆利落、充满睿智而富于洞察力。

正是这个瑞克·什班什，尽管不是尽善尽美，但扮演的角色成功，令我闭锁的春心萌动。常常是，我挂断了电话，总觉得还是与他难分难舍，藕断丝连，如同与他做过爱一般。因此，他也就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成了为我照亮那些个初冬黑夜的仅有的一颗星星。我这样的生活模式一直延续到休战纪念日。

11月11日一大早，电话铃就响了。时间是6点刚过。打电话的人是克里格·伊文森，听起来他气急败坏。他说监狱的感化中心几分钟之前曾给他打电话说，夜里不知怎么回事，伊芙弄到了一把外科手术刀，把自己的手腕割开了。那是早班护士发现的。只见那个心灵手巧的伊芙，用一床毯子盖至下巴底下，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熟睡了的孩子那样。护士先是注意到伊芙盖在身上的毯子中间有块血斑，后来她走近观察才发现那血斑在不断扩大。她把毯子掀开，看见伊芙躺在血泊中，已奄奄一息，手中仍然抓住那把刀呢！伊芙没有死，她还躺在感化中心的医疗区内。

那整个早上如同梦境一般，给人以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天还是黑糊糊的，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落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商店和办公楼里还亮着灯，不过当我们驶入环形东道时，却一辆别的车也没看见。

“你不觉得这世界上就剩下我们俩了吗？”克里格问。

他的声音仿佛来自一个我从不想去的地方，他的话令我的心怦怦地跳。看来天底下的事情的确没有什么逻辑可循，什么时候都随时可能发生。如果我坐进车里，发现克里格遁了土，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正如我回到20分钟前还是我的家，还是孩子们的居所的地方，如果见到的是一片废墟和焦土，我也不会大惊小怪一样。对他的问题我没有回答。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获准进入监狱感化中心的手续是很严格的。我们将车开至大门口等着。只见一束强烈的橘黄色的探照灯光，从操场射过来，照在我们的脸上。顿时，我们的面孔就丧失了原来的脸色，变成了死人般的面孔。包裹在宽大的油布雨衣中的卫兵根据一份名单核查了我们的姓名；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人启开了什么装置，电子控制的大门就打开了。

进到里面，还有一道道熟悉的关卡，开了一道门的锁就看到了另一道锁着的门，这道门一打开，又见到更多锁着的门，真可谓是一座戒备森严的中国式的迷宫。

卫兵领我们穿过以前伊芙曾住过的病房尽头的一道双重门，我们从以前

伊芙睡过的病床前经过，我们已注意到床上的垫子已被拿走，只剩下一个床框了。

“这回要给她一个教训。”我大声地说。克里格听后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伊芙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头上方开着一盏盏很亮的灯。

“难道就让这么强的灯光这样照在她脸上吗？”我问。

站在伊芙床头的一位男护士原来在一个有夹纸装置的书写板上写着什么，听我这么一问，他吃惊地停下笔对我报以温和的、富有同情心的一笑。他戴了一朵休战纪念日佩戴的红花。

“这是规定，或许病人没有注意过这盏灯，或许他们注意到了，又觉得无关紧要。有些病人经过这儿治疗以后，甚至会一反常态。他们会记起那是天堂的明灯照耀在他们身上。”他说。

伊芙看来已脱离危险。瓶架上的瓶子正通过胶管为她输液，有一些胶管连在她身上，为她排出体内的污物；还有一台仪器为她量着脉搏。正如我们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她除了有一张人的面孔之外，简直成了机器人。

尽管伊芙是人，但却不是从前健壮的伊芙了。她曾凭借超自然力和治疗及饮食手段，力图战胜残酷的现实，抵御别人对她的背信弃义，战胜死亡。啊，可怜、可怜的伊芙！

她双手的手腕被厚厚的绷带包扎着。我弯腰小心地将她的一只手拿起，将它放在我的双手中暖和暖和。于是我想起了她曾对我说的话：“想想所有你所熟悉的人的手，你父亲的双手……你母亲的双手……再摸摸我的手，握紧它……松开。触觉消逝了，但留下的印象却永存。永远留在你心中。”——这是她打坐时说的。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克里格·伊文森用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想我们该走了，乔妮。”他把我的手从伊芙手中抽出来，却抓住我的手不放。

卫兵过来领我们出监狱时，克里格·伊文森和我手拉着手，跟在卫兵身后，宛如神话中的童男童女，走出了这梦境般的地方。

“一场双人牌戏。”我说。

克里格已转动了点火装置的钥匙，听我这么说他迷惑不解地望着我。

“上次我和伊芙呆在一块时，我们玩的就是双人牌戏，”说着我的双腿开始颤栗，我说：“啊，上帝，克里格，什么时候这些可怕的事才能完结？”

他不自然地伸开双臂过来拥抱我，说：“我不知道，乔，我也不知道呀！”

我们在车内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雪又下起来了。那一道道橘黄色的探照灯光将这雪也染成了橘黄色。

最后，克里格说：“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想喝一杯。”我看了看仪表盘上的钟，说：“还不到9点呢。”

“那好，”他一边将车子从停车场倒退出来，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到都顿尼俱乐部去。20年来我一直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如果今天这个假日早晨他们不给我弄一瓶威士忌酒来的话，我就要把他们的窗户全砸烂。”

我不解地望着他，说：“你说什么都行，克里格。”

离开狱中那戒备森严的感化中心，来到优雅的都顿尼俱乐部，简直像换了个天地，壁炉内生着火，乐池里哥林·高尔德正演奏着德国古典作曲家巴赫的曲子。克里格将我带至壁炉边一张两人用的桌子前，拿了我的大衣就走了。不一会，他拿了两瓶西格曼酒回来了，一位男侍力图拦住他。只听他说：

“伊文森先生，我肯定我能为你调制一种合口味的饮料。”

“我认为这种就是合口味的，董尼。”克里格说着将瓶子举起晃了几下。

餐具柜中放着那种你只能在杂志上或男子俱乐部内才见得到的早餐。有切成片的，上面涂了黄糖的葡萄面包；一碟碟的腊肠、熏肉和熏鲑鱼，马铃薯块和黑面包、土司和燕麦热气腾腾的放在热托盘中；还有用铜平底煎锅盛着的刚炒好的蛋。

“要点吃的吗，乔？”克里格问。

“也许咖啡加裸麦威士忌酒最好。”

克里格笑了，但他的笑声并非出自内心。

“女士午前是不喝烈酒的，这是——”只见一种痛苦的表情从他脸上掠过。“——这是我妻子常说的。”

我联想到了朱丽，天知道为什么女士午前不能喝烈酒。我呷着我的咖啡、裸麦威士忌酒，酒性温和，坐在火炉边感到舒适，但我的身子终究暖和不起来。

坐在我对面的克里格，为自己斟满了一杯威士忌酒，举起杯说：“为你，乔——好人干杯。”

我斟满了我的酒杯，向他祝酒。

“别这样，”他说着伸手过来阻止我向他祝酒。“此刻，我倒愿雷劈我，将我从这个世界上除掉才好呢。”

我听得出来，我说话时声音有多么无可奈何：“那天早上不是你给伊芙打电话的啰，克里格？”

“本来我可以打的，但后来朱丽帮我打了。”他喝完了杯中的酒，用沙哑的声音又说：“基督呀，是她为我做的。”

我给弄糊涂了，她为他究竟干了什么？是打电话吗？或是干了一些说不出的更糟糕的事？这时我又感到腹部阵阵痉挛。

我说：“克里格，我病了，我得赶快回家。”

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又继续说：“你知道，我是偶然发现的，今天早上才发现的，今早感化中心打电话到我家时，是萝利接的电话。朱丽已到她母亲家度长周末去了——她说为我的事奔波弄得她精疲力竭。”说到这里，他无缘无故地笑出声音来。“她说她为我干了一切——其中包括许多不该做的事，对不对？”说完他若有所思地看着酒瓶，但却并未去碰它。

“不管怎么说，我想朱丽走了，倒是个让马克和萝利回家团聚的好机会，所以就叫他们回来。萝利接电话时我还在睡觉。那位感化中心职员打电话来时，并没有问与他谈话的伊文森太太是不是我的妻子。萝利一听伊芙自杀的事，大惊失色，简直歇斯底里。乔，你知道她是那么纯洁可爱，头脑简单，笃信原教旨主义，认为自己生来有罪。她把伊芙如今所受的苦难都归咎于自己。她把那天发现梭伦·伊默斯的尸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告诉了我——包括——”他低头望着膝盖，又说：“——包括她意外地接到朱丽电话，谈到那位匿名给朱丽打电话的人。如果，”他轻声地说，“真有过这么一位匿名的打电话的人的话。”

这时我感到全身直冒冷汗，心跳加快。于是我对他说：“克里格，请现在让我回家好吗？”

“当然好，乔。”他去衣帽间为我取回大衣。

我们默默地驶过阿尔伯特大街，到达小河上的一座桥上，这时传来了隆隆的大炮声。那炮声震得我脑袋要开裂，连骨髓都疼了。接二连三的炮声是来自河对岸议会大厦前刚摆好阵式的大炮，是每年11月11日11时发射的。那是为了纪念休战纪念日而发射的，因为这一天人们放下了屠刀，建立起和平。

克里格扶我走到我家门前，我并未邀请他入内。我正要进屋，他将手拉着我的手臂，将我的身子扭转过来的，以便看见我的面孔。

“乔妮，你身体好了吗？”他问。

我打量着他，这位动作迟缓，高大的男子汉，在11月的风雪中冻得直打哆嗦。他的未来被阴影笼罩着。他精心构造的婚姻面临着破裂，因为他妻子以爱情为幌子犯下了无法洗刷的罪行。

“我身体不好，克里格，你也不好过，伊芙也不好过，朱丽也不好过。对我们来讲‘好’这个概念已经从宇宙间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快变得歇斯底里了，于是就对他说道：“对不起，克里格。”

我把前门一关，就感到全身颤栗，唾沫涌满了口中。

在大厅的镜子中，我看见自己蜡黄的脸上冒出了一阵冷汗。我听得见我的心在怦怦地跳个不停，这次发作可算是最厉害的了。我抱住腹部蹲下，闭上眼睛，那几只狗忧心忡忡地过来嗅我，舔我的脸。我把它们赶走。我听见男孩子们在楼上叫嚷着。我连大衣也没脱，就径自走出后门，穿过庭院，到奶奶公寓去了。

我不得不抓住楼梯栏杆，一步一步地慢慢爬上楼去。我刚打开门，电话铃就响了。是瑞克打来的。伊芙企图自杀的事已传到了瑞克的新闻演播室。我用担忧的尖细的声音向他汇报了那天早上发生的事。

我说：“瑞克，我们得着手做些事。有些情况你是不知道的，伊芙是无辜的，是有人嫁祸于她，我知道这一点。”说到这里我禁不住失声痛哭，没能再往下说了。

瑞克的声音很镇定，几乎可以说是职业使他如此。听起来他倒像个电台的社会工作者在回答打给自杀热线的电话时那么不慌不忙。他问我：“乔妮，你现在在哪儿？”

“在奶奶公寓中。我想避开孩子们，我宁愿让他们认为我不关心他们，而不愿让他们看到我病得这样。”

“就呆在那儿吧。躺在你上次让我睡过的那张特殊的折叠床上，避开噪音和孩子们的干扰，在床上躺一个周末，就会好的。”

“但瑞克，我们得拯救伊芙，她是无辜的。有人嫁祸于她，把她害到这种地步。”

他回答我的话时，口气变得又不高兴又傲慢。他说：“乔妮，你好好听着，根本不存在‘有人’，伊芙自作自受要自杀，正如她自己要去杀人那样，是罪有应得。事情已明摆着，已经成为历史了。你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警方没抓错人。现在你该休息了。”

“你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吗？”我说话很尖锐，像是在指责他。

他气急败坏地说：“我想这些日子为她的事你已经够受的了。”

“而且在极度紧张下身体要垮了。别忘了我干的事也是有案可稽的。不过，我神智正常，我知道有人要陷害伊芙。”

“没人说你身体垮了呀，医生们检查的结果你像是过度疲劳，没人会弄错的。”

“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脑子有毛病，现在你听着，瑞克，”我用傲慢的被激怒的声音说，“我马上把电话插座从墙上取下来，看你还怎么打电话来。”我独自留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屋里安静得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我也不知道究竟在那儿坐了多久，只觉得全身极度疲乏，打着哆嗦。这时一句奇怪的话从我脑中闪过：“你得要把握好方向。”不过方向往往与航行时迷途有关，我并未迷失方向。我好端端地呆在奶奶公寓中。维吉尼亚·沃尔芙曾说过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嗯，这就是我自己的房间，乔妮·克尔本的斗室。房间的墙上贴了一排我已故丈夫的照片，地板上散乱地放满了硬纸皮做的卷宗夹，里面装着有关我的亡友安迪·波尔丘克生平的文字记录和照片。我女儿摔折了腿的那年夏天，她用勾针编织了一块阿富汗床罩盖在床上。书桌上还放着那个瑞克送我的水晶大花瓶，尽管上面布满了灰尘，依然艳丽得令人惊叹不已。里面插满了我从小溪边采来的齐墩果枝，枝头的齐墩果在11月昏暗的光线中，显得苍白而没有生气。

窗前是我的书桌，我熟悉它如同熟悉我脸上的皱纹一般。书桌上有一张梅卡、彼得和安格什为我们家的狗洗澡的照片，尽管他们全身已湿透，但全都笑得很开心。紧挨着照片，是那棵精致的陶瓷大白菜。那是我买了送给安迪的，后来安迪又将它转送给梭伦，最终梭伦又将它送还给我。这种接力赛式的传送方法，有如一套儿童系列读物般地串了起来。大白菜上的叶片往背面卷回去，露出了一尊小巧玲珑的妇女像，她面部表情严肃而矜持，双手高举着一个裸体的男婴——那是她献给世界的礼物——乌克兰的创世纪。

桌边放着电话机和电话线，我已经从插座上将它取了下来，墙上的插口也闲置无用，谁也不能通过电话找到我了。

这里成了我的个人王国。在这间陋室中，我可以去揣度人生的航向，可

以更安全超脱。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我家的门洞开着，我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窜了出来，从轮廓看，我断定是我的儿子。

他跑过来了，用被吓坏了的、重浊的成年男子的声音对我说：“妈，你身体好吗？看来你刚才坐在这儿睡熟了是吗？你是不是想睡觉？你显得有点疲倦。”

“我挺好，彼得。只是……我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工作呢。”

他看了看我书桌上没什么，很快盯住我的脸说：

“妈，梅卡刚才来电话，她想问问你同不同意让我和安格什上她那儿过周末。这样我就可以去看看她的大学校园，或许还能采购点东西过圣诞节。”

这时我觉得胸中似有一把老虎钳在拧紧一般，口中同时又出现金属味。脚底板下有一种奇异的刺痛感，仿佛我的腿中有某种东西已经短了路似的。

我说：“对不起，彼得。你的想法太好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去呢？”

他双眼看着脚尖说：“梅卡建议我们乘5点30分的长途汽车去。”

我知道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怕，并非出自一位好妈妈的内心。我说：“听起来不错，彼得，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乘5点30分的车去。”

“你答应了，妈？”

“我答应了，彼得……但有一个问题，我手头没钱了，今天又是假日，银行不开门。”

“隔壁的巴巴拉说她可以借些钱给我们，到星期一才还给她。”

“你来我这儿之前已去过巴巴拉那儿？”

“妈，我知道你没钱了，昨晚就没钱付报纸费了，记得我们谈过这事吗？”他说话的声音渐渐地小了，“我不想给你带来麻烦。”

我还是用异样的声音说：“不成问题的。”我转过身去，背朝着他，顺手拾起了一个文件夹。“你们这些小家伙准备妥当了就到我这儿来，我开车送你们到汽车站去。彼得，你能不能做点三明治什么的给你们自己带在路上吃？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他又像大人那样忧虑，关切地说：“妈，其实我们不去也行——真的。”

我佯装笑容，说：“彼得，我真心想让你们去——真的。现在你走吧，我好干工作。”

我目送他穿过庭院朝我们的屋子走去。他留在雪地上的足迹看上去比以前大多了。

我将车子停在汽车站对面，就地坐下，由于冷或别的原因，全身直打哆嗦，直到孩子们乘的那辆车开走为止。那辆车在百老汇大街消失了，车后扬起了纷飞的雪尘。这时一幅可怕的图画从我脑际中掠过，我仿佛看见那辆车在风雪中，驶离了路面，燃起了熊熊大火。“他们会丧命的，那我从此就孑然一身。”我对着我的空车自言自语。过了5分钟后，我才木然地将手中的钥匙插入了汽车的点火装置，又过了5分钟，我才敢转动钥匙，发动了车子。

家中又冷又黑，我为自己调了一杯柠檬朗姆酒，在厨房的桌子边坐下，仰望着夜空。一杯饮尽，我又斟上一杯。后来，我唤来了狗，一同穿过后院到奶奶公寓去了。想到孩子们可能会从梅卡家给我打电话，我顺手将电话插头插入插座，拉开梅卡织的阿富汗床罩，一头倒下，便蒙头大睡。

我的梦荒诞不经。我梦见我在那辆长途汽车中寻找我的两个儿子。车上坐满了我认识的人，安迪也在那儿。他正将一朵朵休战纪念日佩戴的红花别在伊芙缠着绷带的手腕上。“这朵花是给我的，这朵花是给你的，这朵，”

他说着将第三朵红花别在伊芙的血管上，说：“是留给魔鬼的。”蓦然间，他的面孔又变成了瑞克·什班什的面孔，神秘兮兮地向伊芙的脸靠来，只见伊芙别着红花的地方猛然间喷出殷红的血来。他说：“伊芙，这儿有个规矩。”以后我又变成了伊芙，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红花盛开，涌出了殷红的血来。

后来，我又梦见雪花在我周围飞旋，将我的视线挡住。突然，我眼前一亮，看见车中特利·肖和我的两个儿子被手铐连在一起。这时狱中警铃大作——丁零零，丁零零——最后我醒了——是急促刺耳的电话铃声。

是一位女人的熟悉而平和的声音。她说：“啊，好——你在听电话，弟弟们已平安到达。”

“你是谁呀？”我问。

“妈妈，我是梅卡呀，我把你吵醒了是吗？听你的声音好像外星人。你听见了我的话吗？我说两个弟弟已平安到达我这儿了。安格什这会儿正在淋浴，彼得在生火。格里格在做爆玉米花。这儿就像迪斯尼电影乐园那样，合家欢聚乐融融。”

我用不自然的声音说：“那太好了，好，那你们就乐一乐吧。”接着我又说：“谢谢你，梅卡，我的心肝，我得挂断了。”我赶紧把电话挂断，因为我已是热泪盈眶，快哭出来了。梅卡是不需要我的眼泪的。我伸手过去把电话插头拔下，又改变了主意。梅卡说彼得在生火，我记起他们住的是一幢旧房子。壁炉的墙上可能会有裂缝，他们会因此而被烧死的。当然，这点我也不能肯定。算了，留个通话的机会，于是我又将电话插头插上。这时只觉得我脚底板又来老一套了——如同电针或大头针刺般难受。

“世界是个有理性的地方，乔妮。”这是伊安去世9个月后的一个9月的晚上安迪说的。世界是个有理性的地方。我朝着屋外的黑暗世界重复安迪的话。其实屋外的黑暗世界对这个道理更清楚，我对这个道理也更清楚。这时，我只觉得胸部像有把老虎钳拧紧般难受。我为自己在高脚小口酒杯中斟满了白兰地，自言自语：“安迪，我的朋友，你死得好冤枉。这个世界是完全没有理性可言的。”

我举杯邀请玻璃窗上的影子与我对饮，我不明白安迪在死之前是否来得及弄清楚我对世界的看法。

我坐在奶奶公寓中，凝视着 11 月的夜空，雪已经停了，我后院中仍是白皑皑的一片，屋中的灯光洒在上面，闪闪发光，煞是好看。我和我的狗都上这儿来了，我知道，护卫我的人全都已经远离我而去。

雪的表面光滑而松脆，但并不深，我知道只有薄薄的一层。踩在上面，你准会将雪下面的、覆盖在冻土上的潮湿发黑的落叶踏破，陷入泥中。

庭院那边，我的屋子屹立在黑暗中，我们这些理性的人们曾在其间策划我们的一生，但如今它已绝非安全之地。这时我腹部阵阵痉挛，我弯腰搂住双膝，将身子来回摇晃，摇呀摇的，不时还发出悲鸣和呻吟。我摇呀摇，直至东方呈现鱼肚色，才入睡。

我坐在椅中醒来，感到很冷，居然一时间分辨不出是什么时候，自己在什么地方，只觉得似有锤子在敲击我的脑袋；直感到口干舌燥。屋里已通亮，电话铃响了。

电话另一端是一个和蔼的男人的声音：“我想请伊安·克尔本说话。”

我想我得当心点，不能让别人听出我神智不清楚。

“我丈夫已去世了。”我说。

只听那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很抱歉，克尔本太太。请原谅我在你伤心的时候打扰你。”

“不，已经有……他已经去世好久了。你刚才提到他吓我一跳。”我的心的确在怦怦地跳。

“那么，克尔本太太，这事我只得对你说了。我名叫海尔克·德·莱斯。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刚刚买下了‘住房虫害防治所’。”

“我不需要杀虫人员来帮忙。”

“克尔本太太，我不是推销员。当然，你不需要杀虫人员是对的，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了——那就是我。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昨天我花了一整天来细看店里的售货发票——让我自己熟悉熟悉业务。我看到我们曾为你提供服务的记载，我想其中有些错误——”

“是我的错吗？”

“请听我说完。这不是钱算错了，事实上，你所有账都很快付清——况且是预付的。你没错，我担心是我们弄错了。克尔本太太，你在听我说话吗？”

“是的，我在听，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要什么好了，我今天身体一点也不舒服。”

“那是有关你后来又要求我们为你灭白蚁的事。如果你同意的话，或许我将我们的说明在这儿念给你听更好些。”

我感到几乎无力说话，但还是对他说：“念吧，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你的地址是东湖路 433 号——是你家吧？”

“对。”

“在你家后院有一个车库，车库顶上有一套自己盖的公寓房，面积为 150 平方英尺，从小阳台上有一道门可以进入屋内。”

“对。”

“套房的钥匙在房门左边粘在窗户里面的一个花盆箱中的小塑料袋里。”

“不对……”我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听得出来海尔克·德·莱斯不太高兴，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坚定。他念道：“灭白蚁的计划从10月8日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开始执行，每周一次——那是用红笔在下列画了线的，克尔本太太。——直至通知我们不喷药为止。在付款栏中写着：预付现金。在顾客姓名栏中是伊安·克尔本的名字。接着又是用红钢笔手书的一行字：绝不能让家中别的人知道这个喷药计划。主妇和小孩知道就麻烦了——他们都是环境保护者。其中“麻烦”两字是用大写字母写下的，并且还在下面画了线。”

我听后简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立刻拿起一支笔在我面前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杀虫”两个字。

“德·莱斯先生，你能把你们一直在我屋里喷撒的药的名称告诉我吗？”我用颤抖的声音问。

“当然可以。我们喷过的药有有机磷酸盐和甲基碳酸盐。依我看，我们喷药的次数太频繁了。不过今天又是星期六了，又到了该喷药的时间。因此，我想我得问问你，听听你的意见。你说还要不要继续喷药呀，克尔本太太？反正费用已用现金支付到圣诞节后。”

“不用了，德·莱斯先生，我不想叫你们继续喷药了。”

“那么我该给你退钱。”

“那钱根本不是我付的。究竟是谁付给你的呢？”

“反正是用现金支付的，又没有开收据，从前的老板认定是克尔本先生付的。”

这时我心里已略见端倪。我说：“你不用退款了。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们喷的那玩意儿是有机磷酸盐或是甲基——管它什么呢，喷药后是不是会有残留物呢？”

“有机磷酸盐会留下一种黄色的粉尘。”

“是不是像花粉那样的？”

“对，你的比喻再好不过了——像花粉。”

“别说了。”

“那克尔本太太，你的意思是等你下次通知我们时再继续喷药啰？”

“不用了，德·莱斯先生。我的意思是永远用不着喷药了，除非到地狱冰冻的时候。”

那人好久没吭气，后来他大笑说：“又是一个绝好的比喻。谢谢你，克尔本太太。”

“啊，谢谢你，德·莱斯先生，谢谢你。”

我把电话挂断后，感到全身哆嗦，冒汗，心怦怦地跳，还伴随着抽筋。我一生中从未感受过这种痛楚，后来，终于好些了。我十分明白，原来是有人想把我杀了。意识到这一点本来就会把我吓死了，我早该藏身床下，但我的感觉则是如释重负。因为我终于明白，我的病并非源于体内；而是体外因素引起的，病因在外部，是完全可以消除的。

我打开奶奶公寓的门，迈入走廊，只见天空灰蒙蒙的，很阴晦，太阳早已收敛了它的热力。又是一个寒冷的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冷空气，这寒冷的空气吸入胸中，如同刀割般难受。几只狗从我身旁跑过，跑下台阶，在庭院中的雪地上追逐嬉戏着。

我只觉得口干舌燥饥肠辘辘。由于寒冷和激动，居然全身颤栗起来，但

我还是径自走到电话机旁，拨通了阿丽的电话。

我说：“阿丽，好消息。我脑子没有毛病，是有人要杀害我。”

她用热切的，但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警觉而又沉着的声音对我说：“乔，为什么你不从头说起，让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呢？”

于是我将海尔克·德·莱斯给我打电话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并且向她说了这个电话对我的启示。阿丽未加评论，仔细地听着。我说完后，她问了我一些专业化的问题。她要我将防治人员使用过的杀虫剂名称重复给她听，并告诉她奶奶公寓面积有多少平方英尺，屋里的通风设施情况等。

末了，她对我说：“乔，我已经有15年没有研究药理学了。我得去查查大学时的课本，了解下这些杀虫剂的药理作用。一旦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会立即给你打电话。就呆在你屋里，你现在不在——”

“对，我已经不在奶奶公寓中了。我把它的门打开，我再也不会进去了。阿丽……”我禁不住哭了出来。“啊，阿丽，你快点呀！”

5分钟后，她回了电话。

“嗯，这回你可得好好谢谢莫特。他办事像东方人那么有条不紊，样样东西都保存得完好，事事都有章可循。现在我要将《药物治疗基础》一书中有关杀虫剂的章节读给你听，这本书是古特曼与吉尔曼合著的。我们在医学院学习时通常将他们称为G—曼。因为他们的名字第一个字母都是G。下面就是暴露在有机磷酸盐的环境中，人体可能出现的症状。如果有与你的症状相符，请告诉我。”于是她念道：“这种药物对呼吸系统的作用包括胸部出现有如钳子拧紧般的感觉，由于支气管收缩和气管分泌物增多，会引起呼吸困难，乃至喘息。胃肠道的症状出现在吸收药物的初期，包括出现厌食，干呕和呕吐，腹部痉挛，腹泻，局部冒汗，疲乏，全身无力，不由自主地全身抽搐等。”

我听后用微弱声音大惊失色地问：“所有的症状我都有，阿丽。现在还来得及救治吗？你可有办法救我？”

“办法是有的。或许我丈夫的弟弟在我到你那儿之前就已经为你采取措施了。你最后一次在奶奶公寓中是什么时候？”

“昨天呆了大半天和整个晚上。”

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你治病。现在去洗个热水淋浴，把你的头发乃至指甲都冲洗干净，等你走出浴室，菲力普就会敲响你家的前门了。”

“你让他来出诊？”我问。

“这对他有好处。”她抢先回答。“现在去淋浴吧。莫特和我今天下午就出发，今晚我们一定会到你家。”

我又哭出声来了。我说：“啊，阿丽，你可真好。”

“乔，快别哭了。莫特正好上周为他自己买了一辆新车，他正想让它到高速公路上大显神威呢。此去不过6小时的汽车路程。我们晚上10点准会到。别大惊小怪的了。事实上，你花几天时间躺下来治疗和休息，并不是个坏主意。如果你现在想小睡一会儿，就去睡吧。上次你给我你们家的大门钥匙还在我这儿呢。现在你去洗澡吧。请按菲力普交待你的去做。我一会就去看你。”

我用较热的水冲洗着身子，全身擦上上次孩子们好久以前买来的抗菌素香皂，搓呀搓，直搓到皮肤发痛为止。

我擦干身子，穿上长袍，只见菲力普·李博士脸色阴沉沉地出现在我家

前门边。

“真谢谢你来出诊了。”我说。

“要知道我嫂子凭她三寸不烂之舌有什么办不到？”他笑着说，又问：“那么，你究竟得了什么病呀？”

他一边为我检查身体，一边问起奶奶公寓的情况。诸如公寓有多大，通风条件如何，杀虫人员多久来喷洒一次杀虫剂，用的是什么药等。这些问题阿丽早已问过我了。

“有机磷酸盐。”他重复了我的回答，还用他那双灵巧的手挤压着我的腹部。“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人把有机磷酸盐用来做什么吗？”他问。“它们被用作高效神经毒气的有效成分。你的奶奶公寓对你简直成了一间小小的毒气室了。克尔本太太，你知道了会大吃一惊吗？”

“是大吃一惊。”我有气无力地附和他的话。

“不过，”他见我将床单拉过来盖在身上后说，“你没有生命危险。如果我哥哥和嫂嫂今晚来不了的话，我会将你安顿在一家医院里。只不过，你还需请一位神经病科医生和一位精神病科医生来会诊一下——”说到这儿，他举起了他那修长的、被香烟熏黄了的手指。“瞧！他们来了……又有更多的医生出诊来了。”他说完露齿笑了。“阿丽说你是位好人，克尔本太太。你肯定也是位幸运的人。我打算为你开硫酸阿托品和颠茄。你每4小时口服一次，按时服药很重要，这药可以为你镇静，还会减轻你目前的症状。我哥哥还可能为你开些药，以便恢复你的肌肉功能，这事就留给他来处理了。我将为你开个处方到药店中，他们会将药送到你家里来。”

说完他就走出了房间，但刚走到门口，他又转回来，像个电影中腼腆的孩子，眼睛盯住他的双脚，耸耸肩膀，说：

“我能去看一看吗，克尔本太太？”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看什么。

“看看你的毒气室。”他解释说。

“当然可以，看看何妨，噯！”说完我又瘫倒在我那张暖和的床上。

我一直在等大夫开的药，药来后，我便将听筒从电话上取了下来，蜷缩在床上，睡着了。当然，我还有许多事要办：给警方打电话报警，给孩子们打电话，给瑞克打电话，但这一切都得让让路，因为我需要睡觉。5点左右我醒了。我为自己做了一碗鸡汤面，和着一些脆饼干一块吃了，又回到床上，睡着了。

我正好在10点钟前醒过来，国内新闻正要开播。

我打开卧室的电视机，将电话听筒放回原处。有时瑞克会在他的报道一完毕就给我打电话，突然，我感到非常想与他谈谈。我要告诉他我脑子没有毛病。我又成了一个有前途的女性，一个男人可以追求的女性，一个可以渴望生活中有个男人成为未来伴侣的女性。

当然这个伴侣不可能是任何男人。我将几个枕头堆起靠在床头，将背靠在枕头上，让记忆的骏马在我脑海中驰骋。我记得笑容是如何从他的嘴角泛起。他笑呀笑，笑得那么从容而自信，直至面部改变了表情为止。我记得他像我一样的、暗金色的头发，在低头注视我时是如何披撒到他的前额；我记得薄暮暝眼中，他是如何与我坐在棒球场的露天看台上观战，为孩子们呐喊助威；我记得他是如何与我一道做饭，一道工作、谈笑风生的；我还记得在感恩节假日里，他是如何融入我们家所有人的生活中的。因此，我心中盘算，

等阿丽和莫特来后，我要再邀请他们与我们在此度假，与我的孩子们和瑞克重聚。

正当他的面孔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一把抓起听筒，眼睛却还盯着电视屏幕。他仍然佩戴着休战纪念日的红花。他一定是上银幕前从更衣室中抓起昨天穿的那件夹克衫就匆匆忙忙地进入了演播室，只见衣服上的红花和皱褶还留在上面呢。

我极力要去听电视上讲些什么，可是我耳边响起的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既熟悉又苍老：“嗯，我想，我要把这些从海外带回来的书都搁下，到圣诞节后再来细读它们。正当我在车库中找块小小的空间来放这些书的时候……”这时瑞克正在电视上谈有关在本省东部城镇一间农舍中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省长的一伙人正要讨论省长的职务在下次选举前将受到挑战一事。

电话里又传来了那女人的声音：“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那个盒子。我真难以想象为什么以前从未冒出来。”

电视上，瑞克正谈到要对那些试图阴谋推翻省长的人采取强硬措施。他说：“这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们党内的团结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声望问题，在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声望往往是求之不得的，但在任期届满时，我们不能期望过高……”

电话里那个女人又在耳边说：“不管怎么说，这回我们那个小小的难题总算解决了。”

“啊，原来是海达·麦考特。”我说完赶紧把注意力转到与她的谈话上。

“是我，乔妮，我是海达，对不起，我本该先通个姓名给你听。唉，人老了，唠唠叨叨的，只想到自己，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在我的车库中找出了一个盒子，里面装有我教过的所有罗塞尔高中的学生的年级手册。这回要解决我们的难题可是易如反掌的事了。我查了十二年级那本记录，找到了波尔丘克即安朱·彼得——我想你一定知道。安朱这个名字后面，两个字母是UE。”安格什留了一本旧拼写测验簿在桌上，我赶紧抓起一支钢笔在那页顶端的空白处写下了“波尔丘克·安朱·彼得”几个字。

“我记得，那个名字不吉利的孩子，是那年末转学来的。他的名字加写在全班名单的最下面。他的名字叫柏莱麦路什即埃瑞克·什班什·柏莱麦路什。”

我将这个名字写在安迪的名字下，将两个名字的首字母圈起来，即安朱和埃瑞克的首字母A和E圈起来。

“你看出来了吗？乔妮？”海达·麦考特问。“就是这个瘦弱的男孩子埃瑞克·什班什·柏莱麦路什，后来成长为瑞克·什班什。这消息该不会叫你大吃一惊吧？那天在安迪葬礼过后我见了他，总觉得瑞克·什班什这张脸上有某个地方是我熟悉的。当然，我为此也感到不安。我记得当时你对我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一见到各人就感到熟悉。我对你这一解释并不满意，乔妮。我正好不是那样的人。对于我曾教过的学生们的面孔，哪怕是他们已头发灰白或是秃了顶或长胖了，我总能认出他们来。当然——”说到这里她大笑起来，又往下说：“埃瑞克·柏莱麦路什成了瑞克·什班什，要我认出来可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谁能料到竟然能从眼前这个高大肥胖的男人的形象中，寻回他从前那瘦弱的身影呢？但我们的谜底居然在这儿找到了。”

这时，瑞克的面孔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个出售胶卷的商业广告。画面上映出了穿戴整齐的一家正准备过圣诞节。旁边的字幕是：

“为将你生活中美好的时刻摄下。”

海达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响着：“你可不能责备他将柏莱麦路什这个名字去掉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流言蜚语和冷嘲热讽会使他永远不好受的。事实上他已经受够了罪。现在我还能记得起当年我们为十二年级开的课程。比方说我们曾学过威廉·布莱克写的《病玫瑰》那首诗。你读过没有，乔妮？”

我用像萝利·伊文森那样好听的声音，机械地背诵出那首诗来：

啊，玫瑰，你病了。  
是那看不见的蛀虫，  
在夜里飞来，  
在呼啸的风暴中，  
找到你做温床，  
找到了绯红的欢乐。  
他那黑暗隐秘的爱，  
将你的生命葬送。

“教你的老师一定很有学问。”海达·麦考特赞扬说。“嗯，你可以想象，高中学生学这首诗时会有什么感受，快别说那位女人气的名叫柏莱麦路什的男孩子了。”

这时电视屏幕上正播放出美国总统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出国访问。

“是的，”我说，“我可以想象。”

“乔妮，这事一定会使你震惊，是不是？但不会伤害你。你放心，当我当面质问他的时候，埃瑞克表现得还是很得体的。当然，我希望我使用‘质问’这个词不会太过分。他当时说那天他很不安，因为他总是觉得回忆少年的时光会使他很难堪。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青春期对他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期。”

“你什么时候与瑞克交谈过？”

“今天午前，中饭前我给他打了电话。”

电视屏幕上正播出一组百老汇行销的音乐片的画面。一周之前那部片子的舞蹈动作设计者死于癌症。“还有件事要提醒大家。”播音员说，这时本省长与他的家人，穿着漂亮的秋季运动服，正要赴赫林顿湖去度长周末。他们一个个在电视上亮了像。我伸手过去把电视机关上，那些屏幕上的人全部在我眼前消失了。

“乔妮，你身体好吗？”

“我很好，海达——与以前差不多。”我一边说一边琢磨找个恰当的词。

“好家伙，埃瑞克要我别告诉你有关他过去的事，他说你已经经受了巨大的压力了。”

“是的，”我呆板地重复着她的话，“经受了巨大的压力。海达，对你的帮助我非常感谢——说真的，我得就此结束谈话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不等她回答，我就将电话听筒放回电话机上。我独自坐在电视机前，凝视着屏幕，仿佛我能变戏法变出他的面孔，让他的身影从电子光点后面走出来似的。

“你这狗杂种。”我对着空荡荡的电视屏幕说。尽管我已服用了阿托品，

我的心依然跳得厉害。“你这个狗娘养的杀人凶手。”我狠狠地说着站起身来，抓起我的睡袍。我想起我有件东西要看。

我走下台阶的最底下一级，彼得的那双下雪天穿的高统靴扔在那儿。我把一双光脚捅了进去；从大门边的一个衣帽钩上取下一件滑雪衫，穿在我的睡袍上面。那是梅卡的一件旧衣服，腋下已经裂开了。衣服上还有些重的纽扣和饰物的别针，不过，如今这些饰物已不再完好如初，早已七零八落的了。我穿好衣服，走出后门，穿过庭院，来到了车库前。

奶奶公寓的门依然洞开，它一整天都开着。我的双腿一直打哆嗦，但我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要找的东西就在我建立起的当年的竖式档案中，是用一个标有“8月28日”的盒子装着的。用不着再去找别的资料了。我把盒子打开，核对一下标签，就将它放入录像机。我的双手在颤抖。这盒录像带是我认识的一位CNRC电视台演播室中的一位女人，听说我正在写一本有关安迪的书时，送给我的，但在那一刻以前，我一直没能亲眼看一看。

我按下了放像按钮，屏幕上又回到了那年8月，有许多群众场面。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都汗流浃背，但却兴高采烈。一开始我就看见了那位来自家禽协会的男人，他正将烧烤酱油涂在切成半个的鸡肉上，那些鸡肉正被烤得劈劈啪啪地喷溅出油星子，冒着油烟。

我按动了快速向前的按钮，屏幕上出现了野餐会那天的临时讲台，上面还是空空如也的。德夫·迈克里约翰正将罗玛带上舞台。伊芙也出现了。她在公众场合总是那样。紧张而又焦虑，而且正准备溜之大吉。只见德夫凑过去与她耳语了一阵，她笑了。

在那一刻，伊芙·波尔丘克脸上的表情是一反常态——既无忧虑又美丽动人。在她的一生当中，曾几何时，还有过更多这样的时候呢？如今，她的脸色已经蜡黄，正躺在医院僵硬的被单下，手腕还在流血。“埃瑞克·柏莱麦路什，你这个狗杂种，你必须偿还血债，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我说。我呼出的热气在奶奶公寓的冷空气中，变成了一团团小小的水雾。

电视屏幕上，那位高大的女人出现在用作临时讲台的卡车尾部的活动梯子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上，她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的热水瓶，正给安迪送水来。这时，在这寒冷而致命的小屋内，我屏住了呼吸，盯住屏幕。只见那女人小心翼翼地那些联在音响系统中的弯弯曲曲的电线上走过，最后终于走到了讲台的另一端。她将那本皮封面的讲稿夹放到讲稿架上。

安迪总是这样，将他的讲稿递给一位比他先上台的人，这样他自己就可以随心所欲，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现在那女人已将讲稿夹仔细地放在我们告诉她的地方。讲稿夹内就夹着那张如同鸽子胸部那种灰颜色的纸，上面摘录了布莱克写的那首诗。那页的顶端，有A和E两个字母，卷曲在一起，如同维多利亚时代，夫妻合葬的墓碑上他们姓名的首字母联写那样。A和E即安迪和埃瑞克。

只可惜安迪根本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没来得及。

这时，院子里传来了声声狗吠，我吓呆了，只觉得牙齿咯咯地响。克里格·伊文森出现在屏幕上，他正在向人们介绍安迪。他可以说是又一个牺牲品。可我不想看他，于是我又按了快速向前的按钮。屏幕上出现了模糊的斑纹，接着安迪出现了。他穿着蓝色的工装裤和全棉衬衫，显得纤细灵巧。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他笑容满面地穿过讲台，走向死亡。他脱下他的棒球

帽，向人们挥舞致意。那一刻，尽管他动作优雅，但已是劫数难逃，成了那年夏天他与我们的诀别。清冷的月光照耀着我的庭院，几只狗在狂吠。我沉浸在对安迪在那个永恒的夏天举行的最后一次野餐会的追忆中。

只见安迪转过身去，穿花衣服的那位礼仪小姐递给他那个托盘，托盘上放着那个黑色的热水瓶和玻璃杯。我简直看不下去了。我闭上了双眼。待我再度睁开眼睛时，看见我自己在电视上，正跪在安迪身边，安迪这个比我重20磅，曾是一位结实而又能干的人。我根本记不起有这样一个镜头了。我拉下睡袍的边，盖在膝盖上，使它暖和点。这时，只见瑞克·什班什出现在屏幕上。他背对讲稿架，战战兢兢地将玻璃杯举到嘴边。接着屏幕上模糊不清，下一个就是我缠着瑞克的膝盖，他重重地摔下的镜头。

庭院中，几只狗狂吠着，咆哮着。这时录像带映出安迪和瑞克在8月的烈日下，躺倒在卡车的金属车厢内。接着我便听见了瑞克说话的声音，但不是在电视上。只见他站在奶奶公寓的门口，他高大的身子遮住了月光。我感觉到了恐惧，但他说话的声音却并不吓人，倒像是以赢家自居。他说：

“我这个人总是逗人讨厌，说来就来了。从不打招呼。”

“什么？”我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

“你受过良好的教育，你知道‘即兴’这个词的意思。如今事情已经败露，一切已经水落石出。你知道，我并不是吃人的妖怪。从来就不存在陷害你的问题，只是我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补救，尽管我对这些补救措施也很害怕。”

他走得更近，在月光下，我已经看清他的面容。看起来他倒不像个疯子。不过他谈的却是吓人的事情。

“虽然我的预谋成功了，乔妮。当然，我是指你的体验结果不容乐观，但我做事是不会虎头蛇尾的。今晚谁也不知道我来这里。我早就发现，有一点用来对付女人是最有效的。她们遇事总是大惊小怪，歇斯底里，我呢，利用这一点便可逃之夭夭——”他笑得有点凄惨。“好，”他说，“我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你不太像伊芙容易感情冲动。不过，假如你走下楼梯，到车库去，谁也不会感到意外。我想，有一种符合逻辑的让一个绝望的女人去死的地方，那就是让她死在已发动起来的、自己的汽车中。”

“昨天我已与梅卡通电话。我告诉她我担心你的病又会有一次大发作。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吗？她说‘那就等于杀了她，她是个多么好的妈妈，我想她宁愿死，也不让我们再看到她病得那样。’那是你自己的女儿说的，乔妮。”说完他耸耸肩膀，对我得意地一笑。我的一身古怪的打扮逗乐了他。

“瞧你这副样子，已经为你扮演的角色装扮好了——一个穿着睡袍、罩了件破滑雪衫的、光脚穿着一双男人穿的雪靴的疯女人。他一边说一边摇摇头，俯身向我靠过来。“你刚才还戴着休战纪念日的红花呢。”我说。

“什么？”他忙问。我把话题岔开，使他摸头不知脑。“你说什么？”他又问。

我可以觉察到我的双膝在睡袍下打架，但我的声音听起来还算镇定。我说：“半小时前在你的特别新闻报道节目中，三百万人目睹了你在休战纪念日的第二天还戴着那朵红花。像你这么讲究的人怎么会……有人一定会把这事与别的事联系起来。或许会是一些精明能干的年轻警察，或是被你无礼对待的助理节目制作人；或许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已经到了我们这个草原省份，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记录在案，我们大多数人现在都知道录像带的魔力。”说

完，我已无计可施，只注视着电视屏幕发出来的光在他脸上闪动。他脸上的笑容看来隐藏着什么捉摸不定的东西。

一切都出乎意料。“现在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埃瑞克。”我说。他听见我叫他以前的名字，如同当头挨了一棒似的，畏缩了。这下我可是赢了一分。“他们就要来逮捕你了，埃瑞克，以后这事就会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你不只是杀人凶手，还是个尼采哲学的信徒。”说到这里，我居然无法控制，全身哆嗦起来。我用颤抖的声音继续说：“你以为你现在还有高贵的身份，但别高兴得太早，你知道他们会找到那些旧照片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我看见他嘴唇之间有一道细细的唾沫，那是只有现在才能看到或许以后永远看不到的。“小埃瑞克·柏莱麦路什，他们会找到那些旧照片，他们要庆功。瑞克·什班什，你这位曾是要人们的朋友原来就是当年的小埃瑞克·柏莱麦路什。当年那位秀气的小埃瑞克一心梦想着要与一位男子成婚，他把他的名字与他心上人的名字的首字母联写在一块，卷曲起来，加上花朵，把自己装扮成女孩。啊，玫瑰，你病了。诗人布莱克的名字将会成为报道这一事件的大标题，埃瑞克。”

我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朝他走去。他见状倒退，避开我，仿佛害怕我要向他动武似的。我也曾有过迫使他退出门外，然后趁其不备，将他从阳台上推下去的念头，像电影中出现的镜头那样。然而，毕竟我病久了，太虚弱，况且也已被吓得半死，无法实现我的打算，看来只有坐以待毙了。

谁知道下1分钟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不得不继续与他谈话纠缠。只见他胸口不停地起伏。屋里像是要出现一场弱肉强食般的恶斗。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他像是被我的话激怒了。当然，我的话越厉害，也就越使他变得穷凶极恶。

“可怜的安迪，将你卷入了他的生活中，但，你知道吗？他在梭伦·伊默斯身上才找到了真正的爱。他和梭伦才是天生的一对。梭伦曾对我说过，当安迪第一次抚摸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是心花怒放的滋味。心花怒放，埃瑞克，那就是说使他们都感受到幸福。”

听了我一席话，他要发作了。

“我并不责怪安迪与你的爱情的破裂。这不仅仅是因为你现在长胖了，而是因为你是个伪君子。”

他把身体靠在书桌上，用手指尖去抚摸他送给我那个水晶大花瓶的底部。他的手抓住瓶柄，然后将它像一根警棒那样举到头的上方。月光从打开的门外泻入，照在大花瓶的弧形处，看起来他像是举着一盆快要熄灭的火。

猛然间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眨眨眼，再眨眨眼，只见阿丽·苏德兰就站在阳台上，正好站在瑞克身后。

她虽然身高不足6英尺，但块头却不小，看来足以与瑞克抗衡，她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在半明半暗中，很难看清她的面部表情。只见她微微地朝我点点头，我把她的举动看作问候和鼓励。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你想用这个大花瓶将我砸死吗？这样你杀人的总数就会是三个，对不对？如果把伊芙也算上的话，就是四个，她现在如同死了一样，只能躺在那儿数天花板上的裂缝。要是再算上她的儿子的话，一共是五个——那个聪明漂亮的男孩子现在已经成了个植物人。他姐姐死掉了。”一时间，我突然明白了。“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那天，伊芙坐到驾驶座之前，你就知道会出事，是不是？是不是？”

他点点头，将花瓶举得更高，并朝我迈进了一步。

我朝他走去，我的脸与他的脸贴得那么近，以至于我可以听见他的呼吸声。然后，我用极低的声音问：“你怎么不把你自己杀了呢？埃瑞克？”

他朝我啐了一口唾沫，说：“因为，臭婊子，我不该死。”

阿丽·苏德兰从瑞克的肩膀上方呈水平角度看着我。接着，我看到她微微地点了点头。她这个动作很难被人觉察到，我想，她要采取行动了。

阿丽的手和口是同时行动起来的。她说：“你对这一切一定厌烦了，瑞克。”说时迟那时快，她从瑞克身后伸手夺下了那个水晶大花瓶，接着又很镇定、不慌不忙地将瑞克拖到门外，将花瓶放在窗台上的花盆箱中，抓住他的手，口中念念有词，将他一步一步拖下了台阶。我站在那个小小的阳台上，目送他们穿过庭院，步入我的屋中。在月色的银辉下，他们两个魁伟的身影如同外国来宾访问归来似的。

我重又步入奶奶公寓，报了警，关上了电视，然后我走到阳台上，将那个大花瓶从窗台上的花盆箱内湿乎乎冷冰冰的泥土中取出来，放到最高一级台阶上，一直在那儿等到声声警笛传来。水晶花瓶完好无缺。我用睡袍的边将陷在花瓶图案中的泥土擦掉。我擦呀擦，直到我认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将瑞克带走为止，直到我感到安全时为止。

我进屋的时候，阿丽正在沏茶，她身后放着一个平底玻璃酒杯，盛着苏格兰威士忌酒——是没有加冰块的。

“茶是为你沏的，”她说，“想必此刻你腹中会有大量的化学溶液，我认为喝酒是不明智的。”说完她转过身去，将开水倒入茶杯中，“莫特押送瑞克到警察局去了。莫特与他很谈得来，你知道，我猜我们大家原来都喜欢瑞克。”她倒出开水后，又小心地将适量茶叶加入壶中。这时从厨房传来了桔子和香料的香味。

“案情你都很清楚了吧？”我问。

阿丽盯着我的脸说：“我们在等警察来时瑞克都告诉我了。我想，他是想要我谅解他。据他说他和安迪是一对有 25 年多历史的同性恋者。那年春天，安迪突然弃他而去，因此瑞克对梭伦·伊默斯占有安迪十分痛恨，但他对安迪抛弃他更是恨之入骨。所以，他从那时起就阴谋策划要杀了他们俩。”

“他那黑暗隐秘的爱，将你的生命葬送。”我借用了两句威廉·布莱克的诗。

阿丽关切地问：“或许你现在还不准备马上去处理这件案子吧？”

“可能是这样。”我说。“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如果他不想死的话，为什么瑞克那天也抢安迪的玻璃杯，要喝安迪喝过的水呢？”

“你还没看出那是他施的诡计吗？”阿丽说。“你正好解救了他。如果你当时不把他撞倒在地，他会假装喝了杯里的水。你告诉过我，公园里那天有五千人，说不定总会有那么些易受骗上当的人，会站出来为瑞克作证，说他是清白无辜的，因为他也曾要喝那杯水。”

“瑞克真会放烟幕弹。”我说。

“喝茶的时间到了，”阿丽说。她将她的酒、茶壶和一个茶杯放在一个小托盘上，走进了起居室。我跟在她身后。她在长椅子上坐下。我蜷缩着身子，靠在她温暖、魁梧的身子上，如同小孩一般放声大哭起来。她用双臂搂住我，摇动着我的身子，直至我入睡。

将这一切写下来是阿丽的主意。在她驾车返回温尼皮格的前一天早上，她坐在我床边对我说：“把它写下来。先拟个提纲，再往下写。你用不着找人来帮你分析案情，你只需要休息，然后抽点时间来琢磨琢磨。此外，”说到这里她眉飞色舞，“当你在所有专家的候诊室中，闲得无聊的时候，一家杂志会叫你有事干的。”

最初跑了几趟后，我终于不用去找那位神经病专科专家治疗了。那是一位和蔼的剪着平头的大夫。他用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给我听，让我明白了病情。由于控制传导神经冲动的酶被杀虫剂阻止进入神经系统，所以我的神经系统处于受刺激状态，这就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了我所有的症状。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迫不得已再问他。

“当然啦，先必须远离有机磷酸盐，”他严肃地说，然后又笑着说：“对不起，我说的是多余的话。阿丽早对我说过了。杀虫剂并不是你自己弄到屋里来的。反正我不打算用什么贵重药——注射一些维生素 B12 针剂，再为你开一些口服复合维生素 B，加上良好的饮食和多休息，锻炼养生。这就是我为你提供的治疗方案。加拿大足球赛季已告结束。我认识一位跑步教练，他可以帮助你训练——加强你的肌肉功能，负重抬腿以及锻炼你的腿旁腱。他会把你锻炼得结结实实的，克尔本太太，只有一点不利的，就是他是歌星贝蕾·曼尼罗崇拜者，他总是接二连三地听她的磁带。”

于是我的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注射维生素、吃饭、休息、锻炼肌肉和写这本书。阿丽说对过去的事我应当多琢磨、反省，但也要适时地休息，“工作时间不能过长，”她说，“当心患综合症——每 30 分钟测一次脉搏，还要定时检查你的大小便。新年前后会有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但即使到那时，你也不要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我照她的话做了。我们党的首脑会议召开了，我没去参加。一位来自本省西南部的，激进的青年农民当选为我党的领袖。在省里各党党派的竞争中，他没能为我党赢得执政权。不过，从长远来看，他可能是我们的理想人选。克里格·伊文森提了他的名，朱丽却未在场。

还有两周就是圣诞节了。我收到了一大堆出席庆祝会和各种聚会的邀请函。我不打算出席。伊安过去常厌恶地称这段时间为“喝玉米威士忌酒和患沙门氏菌引起的疾病的季节”。梅卡和格里格下周将回家来，阿丽和莫特也会在圣诞节前夕到我家。莫特已经在商业区一家著名的老宾馆订下了圣诞节的晚餐。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个不煮火鸡的圣诞节。不知怎么的，也觉得很有意义。

大多数时候都是彼得和安格什在家做饭，有好几次我们也邀请朋友到家中聚餐。大约在“奶奶公寓事件”（我的朋友米勒·米勒德是这样称呼它的。）发生后的头一周里，男孩子们很担心他们干不好家务活，可是现在我们各自都已经对这种生活模式习以为常了。男孩子们更是得心应手。他们有时候是一个人回到家，有时候则是一块回来，倒在床上，互相揪扭嬉戏，待新闻节目播过去；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呆着，还抱怨他们不知道我需要安宁。不管怎么说，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担当起从前的角色，生活也就恢复了老样子，我们为此心情都特别舒畅。

阿丽叫我谢绝一切社交，在家安心养病，可我却觉得难以从现实生活中

超脱出来。从我收到的圣诞卡中，我知道了别人的许多事情。往常，我总是把贺卡从信箱中取出来，撕开，瞄一眼签名就算了，可是今年，我仔细地读了这些贺卡，不光是搜寻些信息，而是要找出字里行间的意义来。

现在我手边就有许多贺卡，我翻来覆去地读着。有一张是石印的，上面印有奥斯古德大厅，那是豪沃德·道汉尤克从多伦多寄来的。卡片是放在他寄来的一条丝围巾内。他说他将在多伦多度过圣诞假，新年之初将回来，但却只字不提玛蒂。

特利·肖从狱中感化中心写来一张便条。对我寄给她的一件小礼物表示感谢。她还说伊芙心理复原的希望甚小，但毕竟现在这个季节是创造奇迹的时节。

海达·麦考特的贺卡是她亲手做的。其图形是温拿波·比得墓碑图案的拓本。（用她的话来说“是我在海外时为一些特别要好的朋友制作的”。）随贺卡她还寄来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还规劝我不必为那个“折磨人的男孩子”过分伤心。

萝利和马克·伊文森寄来的是通常那种有漂亮的耶稣诞生图的贺卡。贺卡内页，在一个椭圆形的剪口后面，有一张马克和萝利以及他们儿子柯雷的照片。柯雷坐在他母亲的膝盖上，转脸朝着他的母亲；萝利则低头看着儿子，她的脸上容光焕发，充满了自信。我看了觉得很奇怪，倒像是她寄来的圣诞卡封面上圣母玛丽亚的像。

最后一张是又大又漂亮的贺卡，上面有一只灰色的鸽子，口中衔着橄榄枝，在灰色的天幕下飞翔。内页用凸起的字母打印出下面的字：

愿世界和平，祝福所有的人

致以节日的祝贺

住房虫害防治所敬贺

愿我们的名字名符其实

